REMEMBRANCE

記憶

Vol.1 No.2

2019 年 第 1 卷 第 2 期

美国华忆出版社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美国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Austin, Texas, USA

记忆 REMEMBERANCE
2019 年 第 1 卷 第 2 期 Vol.1 No.2 2019
秋季刊 Autumn Quarterly

主　编： 方惜辰 **Editor**: Fang Xichen
副主编： 王立嘉、乔晞华 **Associate Editor**: Lijia Wang, Joshua Zhang

编委 **Editorial Board**
董国强（复旦大学） Guoqiang Dong (Fudan University)
葛　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Karl Ger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韩俪娜（德国弗莱堡大学） Lena Henningsen (Freiburg University, Germany)
何若书（美国耶鲁大学） Denise Ho (Yale University, USA)
金光耀（复旦大学） Guangyao Jin (Fudan University)
李　洁（美国哈佛大学） Jie Li (Harvard University, USA)
李悦歆（牛津大学) Jennifer Altehenger (Oxford University, UK)
梅嘉乐（海德堡大学） Barbara Mittler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潘鸣啸（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 Michel Bonnin (EHESS, France)
裴宜理（美国哈佛大学） Elizabeth J. Per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秦　晖（清华大学） Hui Qin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单少杰（人民大学） Shaojie Sh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施　敏（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Aminda M. Smit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孙沛东（复旦大学） Peidong Sun (Fudan University)
唐少杰（清华大学） Shaojie Tang (Tsinghua Unviersity)
魏昂德（美国斯坦福大学） Andrew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魏格林（维也纳大学）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University of Vienna，Austria)
文　浩（德国科隆大学） Felix. Wemheuer (University of Cologne, Germany)
吴一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Yiqing Wu (Toronto University, Canada)
萧小红（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Xiaohong Xiao-Planes (INALCO, France)
叶维丽（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 Weili Ye (U.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USA)
印红标（北京大学） Hongbiao Yin (Peking University)
余凯思（柏林自由大学) Klaus Mühlhah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STE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
Tel: 512-699-2700
Email: RememPub@gmail.com

ISSN 2687-9964（Print-印刷版）
ISSN 2687-9972（Ebook-电子版）
出版日期：2019 年 11 月

《记忆》季刊

2019 年 第 1 卷 第 2 期

【专稿】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

——兼论“猫论哲学”与“戏子文化”（中） 单少杰 1

“无产阶级专政”在基层

——文革初期湖南岳阳燎原居民革委会的政治生态 刘小萌 10

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母题

——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 司 绛 35

【研究】

文革期间北京市两大派的争斗

胡宗式 48

文革时期山东临时权力机构的变迁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研究 张业赏 58

从电影看毛泽东时期与斯大林时期的爱情观

——兼论中苏对资产阶级文化之迎拒 余敏玲 92

【文化评论】

葵花与太阳

——比喻的神圣与无常 胡 杨 111

引用的等级秩序

乌扎拉 113

中学生喜欢用四字语

向南雷 116

【读片与读书】

《不夜城》

——爱国主义与自食其力 梁幼志 118

《王蒙自传》浅议

——言之有文，行之不远 方延曦 123

【考证】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
何 蜀 126
1964 年末中央工作会议毛刘之争小考
——兼论张霖之“走资派”说 越 人 136

【往事】

东厢记
——我的忘年交 华聿杜 146
艰难岁月
——我的中学生活（1958—1961） 李耿立 149
红色教育
——北京大学读书记（1959—1965） 徐明曜 155

【序跋】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华学人论文集》序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167
思想独立，温故知新
——《文革孽文集》序 印红标 170
《毛泽东时代：历史与现实》序与跋
韦 陀 172

【综述】

文革中的军队
——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余汝信 175

【投稿与征订】

投稿须知 185
征订启事 188

【专稿】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

——兼论“猫论哲学”与“戏子文化”（中）

单少杰

内容提要： 信仰是文化之核心。通过对中西信仰的比较，作者认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取向是多元的。但中共建政以后，用“无神论”和“阶级斗争观念”批判宗教。文革前，儒释道、天主、基督、伊斯兰以及各种民间宗教受到严重打压，文革中，它们遭到了灭顶之灾。在毁灭旧神的同时，毛及其追随者造出了毛泽东这个新神。“粉饰”和“掩饰”是造神的主要方法，这一新神主宰着中共和中国。

关键词： 信仰、宗教、毛泽东、文革、造神

3. 信仰：毁弃旧佛与造出新神

在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信仰问题都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并据此而能够最深切地影响着其周遭各个方面，又因此而能够从整体上影响着这一文化究竟会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性格类型，以及一种什么样的呈现样态。

发生在五十余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曾以“大破”与“大立”这两种非常对立的极端方式，大举颠覆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信仰问题：一方面，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中就包括横扫一切既有的宗教信仰和民间崇拜，于是开始了一场我们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毁佛”运动；另一方面，又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来“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决意要将他老人家变为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一颗“红太阳”，于是又开始了一场我们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造神”运动。

3.1. 大破：毁弃一切旧佛

从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取向是多元化的，即信奉多方神灵。在这多方神灵中，有天地、祖宗、神农与轩辕，有佛祖、玄奘、达摩与慧能，有孔子、孟子、老子与张三丰，还有仓颉、鲁班、华佗与黄道婆，还有关公、妈祖、灶王爷与赵公元帅，甚至还有山妖、水怪、二郎神与送子观音，等等。打个形象的比方，传统中国人的内心很像是那些位于龙门、云冈、敦煌、麦积山等地的石窟，里面分窟分龛地供奉着许许多多尊形态各异且功能各异的神灵，从教你有善心的神灵到教你办成事的神灵，从帮你做生意的神灵到帮你生孩子的神灵，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与之不同，中世纪欧洲人的信仰取向则是一元化的，即信奉唯一的上帝，唯一兼有圣父、圣子、圣灵于一体的上帝。打个形象的比方，中世纪欧洲人的内心很像是那座位于乐山凌云寺的山崖，上面只刻有一尊大佛，一尊大得像座小山似的佛。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将在下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即把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取向与中世纪欧洲人的信仰取向加以比较的方法，试图较清晰且较深入地阐释这一有关传统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也是有关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

由于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中，信仰取向都位于其核心层面，并据此而深切地影响着其他一

些层面；因此，上述两种文化在信仰取向上的不同，也会导致这两种文化在其他一些层面上的不同，比如在文化性格层面上的不同，以及在文化呈现样态上的不同。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多元信仰取向有助于传统中国文化养成一种较为谦和的性格，并因此而拥有一种较为丰满的样态；而单一信仰取向则有助于中世纪欧洲文化养成一种较为偏执的性格，并因此而拥有一种较为狭隘的样态。

在多元信仰取向的影响下，传统中国文化所养成的那种较为谦和的性格，很是宽容且很是大度，能够兼容各种不同的精神诉求，使得儒、道、佛以及怪、力、乱、神都可以和平地相互共处，既可以和平地相互并立，也可以和平地相互渗透，以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士人或两栖于儒与道之间，或两栖于儒与佛之间，或三栖于儒与道与佛之间，尤其是宋以后的大儒均兼通佛老。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既很少有大规模宗教迫害事件，即便有“唐武宗毁佛”，也只是一种特例，其主要原因是唐王朝要向佛庙争夺人口和田地，其经济意义要大于其宗教意义；也很少有大规模宗教讨伐战争，即便有“太平天国运动”，也只是一种特例，其主要原因是洪秀全要借“洋鬼”来灭“清妖”，其政治意义要大于其宗教意义。

另外，传统中国文化所拥有的那种较为丰满的样态很是多姿多彩，不仅其宗教文化的样态很是多姿多彩，有佛庙文化的样态，有道观文化的样态，还有其他各种神祇文化的样态；而且其世俗文化的样态更是多姿多彩，有官场文化的样态，有民间文化的样态，而在民间文化的样态中，还可分出三教九流来，可谓斑驳陆离，五光十色。

在单一信仰取向的影响下，中世纪欧洲文化所养成的那种较为偏执的性格，就不够宽容且不够大度，不能兼容各种不同的精神诉求，非常排斥那些坚守其他信仰的“异教徒”，甚至于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在中世纪欧洲，既可看到对内的宗教专制主义，看到许多滥施酷刑的宗教裁判所，看到许多被烧死的异见者，如像布鲁诺那样的异见者；又可看到对外的宗教黩武主义，看到许多讨伐异教的宗教战争，看到许多被摧毁的异教城市，如毁于十字军东征的异教城市。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文化，既培育了上帝的羔羊，又锻造了上帝的铁掌；中世纪欧洲的上帝子民，既心怀最真诚的感恩，又面露最狰狞的凶光。

另外，中世纪欧洲文化所拥有的那种较为狭隘的样态是颇为畸形的：其宗教文化过于膨胀，挤占了大部分文化空间；其世俗文化过于萎缩，仅占有一小块文化空间。因此，作为整体的中世纪欧洲文化，是畸重畸轻的，是很不平衡的；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中世纪欧洲世俗文化，是单薄枯燥的，是呆板沉闷的，因而远不及传统中国世俗文化。

不过，上述传统中国文化的多元信仰取向，并不只具有正面的意义，也隐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例如，传统中国文化在兼容不同的精神诉求时，往往推崇一种姑且叫做“圆通”的境界，一种能在不同价值取向中左右逢源的境界；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灵活有余而原则不足，常能把随缘和顺看得重于是非曲直，四面圆润，八面玲珑。

传统中国文化既然崇尚圆通，也就难免趋于保守。例如，在人与环境（不只是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的关系上，崇尚圆通的价值取向所看重的，不是变革的方面，而是顺应的方面；不是人应该设法去变革现存的环境，而是人应该设法去顺应现存的环境。所谓顺应现存的环境，或是常表现为人应该设法去迎合当下的权势集团，不问善恶，亦步亦趋；或是常表现为人应该设法去迎合当下的社会风气，不问清浊，随波逐流。

正是在这种崇尚圆通且趋于保守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常常呈停滞状。自秦汉以降特别是自南宋以降的传统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历史而无发展”，纵有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却无堪称脱胎换骨的发展。

同理，上述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单一信仰取向，

并不只具有负面的意义，也隐有一些正面的东西。例如，单一信仰取向有助于欧洲宗教文化发育得更为成熟：一是发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以罗马教廷为轴心的宗教帝国，能够有效地统治欧洲大部地区，既能够通过传播“福音”的方式来控制其治下教徒的脑袋，又能够通过出售“赎罪券”的方式来打劫其治下人民的钱袋；二是发育出了一套精深的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宗教理论，能够有效地整合两种思想资源，既能够吸取前期基督教思想的精髓，又能够借鉴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成果。

即便在中世纪欧洲文化所拥有的那种较负面的性格中，也隐有一些很积极的东西。例如，在那种较偏执的性格中，既隐有一种很亢直的脾性，一种不那么圆滑、说到就要做到的脾性；也隐有一种很较真的劲头，一种不那么马虎、要做就要做到极致的劲头。并且，由前者可发育出一种特别讲究信用的精神，由后者可发育出一种特别讲究严谨的精神。而这两种精神一旦被带入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中，就会表现为一种特别尽责的精神，一种能把工作做得特别有序且特别有效的精神，也就是一种特别能够成就人类重大事业的职业伦理精神。

这就不难理解，近代以来对职业伦理有着极高要求的两大事业，也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两大杠杆，即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什么都诞生在欧罗巴这块地方，这块曾经历中世纪欧洲文化洗礼的地方，为什么都萌发于基督教这一文明，这一曾拥有偏执性格的文明[1]。

在文化大革命前，执政党尽管还打着保护宗教自由的旗子，但实际上已开始挤压宗教活动的各种空间，即思想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人力资源空间。当然，这种对宗教空间的挤压还只是要限制宗教的发展，而不是要消灭宗教的存在，也就是还没有达到要“毁佛”的程度。

执政党用“无神论”来揭底宗教，宣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和佛，并指出各种宗教所宣讲的那些有关神和佛的故事，都是精心编造出来的，都是用来迷惑人心的，因此，宗教在思想上是要搞愚昧的，是要反科学的。

执政党还用“阶级斗争观念”来批判宗教，一是指控宗教是旧时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借以消解人民的反抗意志；二是指控宗教高层人士占有大量庙产，借以不劳而获，本身就属于剥削阶级，就属于压榨人民的统治阶级；因此，宗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是反人民的。

执政党还不仅通过剥夺有产阶级的政策（实为均贫的政策），大量减少那些能够慷慨捐助寺庙的各方施主，而且通过重新划定土地的方式（实为土改的方式），大量划走那些原属于寺庙的山林和田地，从而显著地弱化了许多寺庙特别是一些大寺庙的经济实力。

执政党还不仅限制一些想出家的人出家，而且动员一些已出家的人还俗，劝说他们走出庙门，自食其力，还可结婚生子。结果使得多数寺庙人丁凋零，只剩下为数不多且年纪偏大的出家人，其中不乏老爷爷和尚和老婆婆尼姑。

另外，还有一种常常不被人们划入宗教范畴的中国民间崇拜及其相关文化，即一种为世代中国人所尊奉的祖宗崇拜及其祠堂文化，也受到了执政党的挤压和限制。

执政党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看待祖宗崇拜及其祠堂文化：一是认为在同一宗族里存在着不同阶级，既有作为统治阶级的宗族族长和富有族人（通常是地主），也有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普通族人和穷苦族人（通常是贫雇农）；二是认为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前一阶级总是压迫后一阶级，后一阶级总要反抗前一阶级；三是认为执政党应支持后者而反对前者，并反对前者所依托的那些背景力量，也就是要打击传统宗族势力，并批判传统祠堂文化。

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红卫兵们就不满要设法限制宗教发展，而是要彻底消灭宗教本身了，于是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毁佛运动，一场遍及整个中

[1] 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多元信仰取向与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单一信仰取向之比较，曾作为笔者主讲课程《文化政治学个案研究》中的一个论述单元，此处所论仅择其要点，故颇为简略。

国大陆并殃及所有宗教信仰的大规模的毁佛运动。

这场大规模的毁佛运动，一方面，竭尽可能地毁掉存在于这个国家地表之上的那些佛，那些被供奉在各个寺庙里、各个道观里以及其他各种圣坛里的佛；另一方面，还要试图彻底地毁掉存在于中国百姓内心之中的那些佛，那些被供奉在内心之中不同位置的形形色色的佛，也就是还要试图整个地毁掉存在于中国百姓内心之中的那些“石窟”，那些供奉着各种佛像的“石窟”。

整个中国大陆上的宗教场所，除了极少数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宗教场所外，都遭到了红卫兵的洗劫。

佛教庙宇、道教庙宇和孔教庙宇以及其他各种民间宗教场所（如城隍庙、关帝庙、药王庙、济公庙以及妈祖庙，等等），都被红卫兵扫了“四旧”。在这些庙宇里，各种神像都被推倒，各种经书都被焚毁，各种人员都被批斗（其中一些人员还被强制还俗），以至于各种宗教活动都被完全取消。一时间，偌大中国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供中国人用以礼拜那些传统的神灵，那些已被他们礼拜了许多世代的传统的神灵，如佛祖、老子、孔子以及其他民间诸神。

天主教教堂和基督教教堂也都遭到红卫兵查抄。教堂里的各种人员如神甫、牧师以及修女，都被指控为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派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活动的阴谋分子，若是洋人则被递解出境，若是国人则被监管起来。教堂里的各种设施如条椅、圣坛、壁画以及耶稣受难雕像都被砸烂、被捣毁、被涂抹甚至被焚烧，一片狼藉景象。

伊斯兰教也难逃劫运。红卫兵冲进了各个地区的清真寺，包括伊斯兰教势力十分强大的新疆地区的清真寺。他们在清真寺内，肆意打砸物品，聚众围斗阿訇，甚至公开焚烧古兰经。历来富有战斗精神的穆斯林们此时遇到了更富有战斗精神的劲敌，尽管只是昙花一现的更富有战斗精神的劲敌。

另外，作为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民间崇拜及其相关文化，即祖宗崇拜及其祠堂文化，也都遭到了最为彻底的颠覆，即各家各户的祖宗崇拜都被最为彻底地置换为唯一至上的领袖崇拜，也就是不尊祖宗只尊主席，不拜祖宗牌位只拜主席宝像。甚至一度在每个中国家庭的狭小住所里，都要辟出一块相对宽敞的空地，用来摆放一座精心设置的“宝像台”，上面供奉着一尊毛泽东塑像，或用石膏塑成或用金属塑成，或涂白色颜料或涂黄色颜料。

过去，中国老百姓们在一年之中只需拜几次祖宗牌位，春节拜一次，清明拜一次，碰到重要日子再拜一次。如今，中国老百姓们在一天之中就要拜两次“宝像台”：早上拜一次，叫“早请示”，即向他老人家请示自己今天要干什么；晚上拜一次，叫“晚汇报”，即向他老人家汇报自己今天干了什么，干得怎么样。

3.2. 大立：造出一尊新神

不只是各家各户的祖宗崇拜都被置换成唯一至上的领袖崇拜，还有其他宗教崇拜也都被置换成唯一至上的领袖崇拜，也就是以往的那种传统的较为谦和且较为宽容的多元信仰取向，也都被置换成如今的这种突变的非常狂热且非常排他的单一信仰取向。

就在上述许多旧佛被全然毁弃的那一大片废墟上，这个国家又造出了一尊新神，一尊独一无二且巨大无比的就像是“乐山大佛”那样的新神，也就是一尊名叫毛泽东的新神。用文化大革命时的最为煽情的话说，这尊名叫毛泽东的新神，就是正升起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一颗“红太阳”，一颗“最红最红”且“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那么，这尊名叫毛泽东的新神又是如何造出来的呢？或者说，这颗“红太阳”又是如何升起来的呢？

显然，这是可以从不同维度来加以解析的一个历史课题，一个几乎涉及整个中国现代史进程故而有着很大论述空间的历史课题。由于受本文篇幅所限，笔者将有选择地从以下这两个维度出发，非常简要地解析这一历史课题：

维度之一，若从造神运动都需要采用诸多装饰手法这一维度来审视，便可看出这种“造出一尊新

神”的过程也正是如此，其间既采用了一种粉饰其美貌的装饰手法，姑且称之为粉饰手法，又采用了一种掩饰其丑陋的装饰手法，姑且称之为掩饰手法；

维度之二，若从造神运动都需要被造神者与造神者积极互动这一维度来来审视，便可看出这种“造出一尊新神”的过程也正是如此，其间既有毛泽东本人在积极做出努力，即主动作“伟大领袖”状或主动作端坐神坛状；又有其诸多党徒在积极做出努力，即竭力为其抬轿子吹喇叭并竭诚向其作顶礼膜拜状。

毛泽东尽管被其党人大加美化，以致被美化成云端上的一尊神，但说到底也只是尘世中的一个人，一个像其他所有尘世中的人一样，都拥有许多七情六欲，都拥有许多长处短处。不过，这个人所拥有的一些长处和一些短处都颇有些特别，比如其中一些长处表现为擅于“与人斗”，并“其乐无穷”；又比如其中一些短处则表现为“宁教我负天下人”，而“休教天下人负我”（单少杰 2000b:88-89、579-589）。

显然，要把这样一个尘世中的人，一个有着如此不太高尚的长处和如此不太善良的短处的人，美化成一尊云端上的神，一尊无所不能且无所不善的神，就需要对这个尘世中的人进行装饰，就如同对那些庙里面的菩萨进行装饰一样，既要装饰出魁梧且庄重的身形，又要装饰出聪慧且慈祥的容貌。

这种装饰主要采用两种手法：一种手法，即前文提到的粉饰手法，主要用于粉饰毛泽东的长处，即尽可能地渲染他既取得巨大的成就又拥有高贵的品质；另一种手法，亦即前文提到的掩饰手法，则主要用于掩饰毛泽东的短处，即尽可能地遮蔽他既犯过严重的错误又有着低劣的品质。简言之，就是要通过这两种手法来将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一个像神一样的人。

在粉饰毛泽东的成就时，还搞出了许多名堂：或是将其他人取得的成就粉饰在毛泽东的名下，或是将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取得的成就都粉饰在毛泽东的名下，或是将毛泽东与其所有党人共同取得的成就也都粉饰在毛泽东的名下，集这个党的万千成就于他毛泽东一身。

在掩饰毛泽东的过失时，也搞出了许多名堂：或是将其中一些过失转嫁他人，仿佛完全是由别人造成似的；或是将其中一些过失加以隐瞒，仿佛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似的。借用现代经济术语，所谓“粉饰”，就是要把这个党名下的所有“优质资产”都“划拨”到毛个人名下，为毛个人所拥有，即都归功于这个人的英明领导；所谓“掩饰”，就是要把毛个人名下的所有“不良资产”都“剥离”出去，或是“剥离”到其他人名下，或是“剥离”到不明账户里，予以隐瞒。

通过如此资产“划拨”和如此资产“剥离”，也就把中共组织从原先为一家共属于许多大股东（如许多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的高级干部）和无数小股东（如无数战斗和工作在第一线上的普通党员）的大型股份公司，变更为一家只属于原先那位最大股东（即作为中共党魁的毛泽东）的个人独资公司；同时也就把原先那种共属于许多大股东和无数小股东的集体资产，变更为一种只属于原先那位最大股东的个人资产。

通过这种资产变更，原先那家公司的最大股东也就变身为如今这家公司的全资老板，也就拥有了这家公司的所有资产，即原本共属于许许多多且大大小小股东的所有资产。显然，这样拥有方式实为一种侵占行为，一种带有贪污性质的侵占行为。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选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并以非常简要的方式，来分别诠释上述所谓“粉饰手法”和所谓“掩饰手法”。

毛泽东一生所做出的最成功的事业，莫过于带领其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而他做出这一事业的起点，便是他在 1927 年率领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了井冈山，由此为其党人开辟出一条“武装割据”的道路，一条由井冈山通往北京城的道路。而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上了那座山，有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这个时候收到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一封密信，随即便“引兵井冈”（宋任穷 1994:23-36；晓农 2001；汪向明 2005）。

据亲历者宋任穷回忆，秋收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到南昌去与中共江西省委联系，见到省委书记汪泽楷。汪对宋说："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暴的队伍正向赣西移动，你这就追赶上去，见到毛润之的话，要他们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汪所说的在赣西宁冈的"我们党的武装"，主要指活跃在井冈山地区的由袁文才领导的赤卫队，袁本人已在 1926 年加入中共组织。汪还用密写的方式将其意见写进一封信里，让宋交给毛。

9 月 26 日，宋任穷在莲花县追上了"秋暴的队伍"，将汪泽楷的话和信都带给了毛泽东。此时，毛正率部准备执行 9 月 19 日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做出的决议，即"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当晚，毛主持前委会议，传达江西省委意见，力劝不同意见者，决意转兵井冈山。10 月 4 至 5 日，前委在宁冈古城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针。10 月 6 日，毛泽东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得到可以"安家茅坪"的允诺。10 月 7 日，毛率部进驻茅坪，由此开启了所谓"井冈山的道路"。

从上述史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先是汪泽楷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上赣西井冈山的路，后是毛泽东给全党同志指出了一条上各地井冈山的路。可是，这个党为了粉饰毛的历史贡献，只提毛给全党指路的事，不提汪给毛指路的事，不仅在毛（1965:49-58、59-86）生前由其本人审定的选集中的相关文章里不提此事，而且在毛死后由中共官方审定的《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3:216-223）中的相关纪事里也不提此事，仿佛是毛完全靠他个人的英明决断而选择了这条路[2]。

从上述史实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袁文才领导的赤卫队是井冈山上的第一支中共武装，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则是井冈山上的第二支中共武装。可是，这个党为了粉饰毛的历史贡献，便要凸显毛领导的队伍才是最早上井冈山的中共武装，并为此而尽量淡化袁领导的队伍所具有的"我们党的武装"的性质。例如，毛（1964:60）本人曾提到，当时湘赣边界的"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有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

不仅如此，在以往中共有关宣传材料中，还尽量渲染这两支"地方武装"具有相当严重的土匪习气，甚至直接称之为土匪队伍。笔者年少时就曾受过这样的宣传，还真的以为这两支队伍都是土匪队伍。

在毛泽东一生所做过的许多极其不堪的丑事中，无疑要包括他对有关"西路军问题"的处置。他原本就参与指挥了西路军的征战过程，并直接导致了西路军的全军覆灭；最终却把他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张国焘的身上，还让两万余名或战死或被俘或逃逸的西路军将士也为此而蒙受数十年冤屈。据最重要的见证者即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2016:293-330）回忆：

> 1936 年 10 月 25 至 30 日，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令，他与陈昌浩等率红军第 5 军、第 9 军、第 30 军共两万两千余人渡过黄河。11 月 8 日，中央电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
>
> 11 月 11 日，中央电告宁夏战役难以执行，并征询西路军意见：是单独西进以接通新疆，还是返回河东。西路军选择西进新疆。中央复电同意西进，并告新疆接济正在准备中。西路军迅即向西攻击前进，激战至凉州附近。
>
> 11 月 19 日，中央军委变卦，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事后知晓这是中央军委要用西路军来牵制国民党军队，以掩护中央军委所在的河东红军准备向东或向南作战略转移。随后，西路军通过一连串艰苦战斗，成功地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
>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18 日，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西进以打通远方。

[2] 笔者按：经二十余年武装斗争后，毛泽东把上井冈山的路走到了头，进了北京城。经七、八年和平生活后，曾给毛泽东上井冈山指过路的汪泽楷，因而也是对毛进而对中共革命有过大功的汪泽楷，也把人生的路走到了头：1957 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批判，1958 年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判刑五年，1959 年被押送沙洋农场劳改，并于当年在劳改中病逝。

12 月 22 日，中央军委再次变卦，拟令西路军东返，以助张学良等部应对中央军东西夹击。

12 月 25 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 日，中央军委又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1937 年 1 月上旬，中央军委又再次变卦，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建立根据地。事后知晓这是中央军委又要用西路军来牵制国民党军队，以应对突然恶化的河东形势。

1 月 16 日后，中央军委又数度电令西路军东进，准备策应河东红军作战略退却，并被当作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西路军东进激战至倪家营子，遭数万敌军围攻。

2 月中旬，党中央又再次变卦，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就地坚持，适时西进。这是中央为了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而再次改变西路军前进方向。

2 月 17 日，中央又来电提及西路军领导曾犯过支持“国焘路线”的错误，以此来警示毋宁说是来要挟他们必须服从中央指令。

2 月 27 日，西路军由倪家营子突围，边打边撤。3 月 14 日，西路军残部退至祁连山腹地石窝。至此，西路军西进行动即告失败。

另有重要见证者陈云也在晚年多次谈到西路军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5:325、335、365-366、370）：

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

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上述可见，无论是西路军的渡河行动，还是西路军在渡河后的作战行动，都是遵照中央军委指令进行的；而中央军委中的最核心成员无疑是毛泽东，所以陈云在谈到是谁决定“西路军过河”时，特意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字眼。也正因此，对于西路军的失败，毛泽东无疑是最重要的责任者，故而也是最重要的知情者。

可是，毛泽东（1969:192、234-235）在其文章中却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并作注道：“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

显然，这是毛泽东将他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或说是将他自己的屎盆子扣在了张国焘的头上，并连带地将其中许多污秽物溅洒到两万多名被打死、打伤、打散的西路军将士的身上，其中包括溅洒到许多西路军女战士的身上，致使她们中的一些人很耻辱地活过了毛执政的年代，直到毛死后多年才被有关部门追认其正牌老红军的身份。

为了将毛泽东打造成“一尊新神”，还需要被造神者与造神者积极互动。在这积极互动中，造神者即毛的诸多下属的参与是外因，是迎合性因素；被造神者即毛本人的参与是内因，是诱导性因素，或说是主导性因素，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就被造神者方面来看，毛泽东自身也的确拥有一些可被用来造神的主客观条件。例如，毛泽东身为中共党魁，在与党中同志分享党的荣誉时，自是能分得最大份额，甚至有时能分得所有份额，即这个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被划归在他的个人名下，都被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如前文所言，集这个党的万千成就于他毛泽东一身。

又如，毛泽东本人确有许多过人的资质，尽管其“德”很有问题，但其“才”出类拔萃。在搞政治搞战争方面，此人可谓世上枭雄，虽不能说百战百胜，但其间胜算多于败绩，被他搞掉的各方强人不计其数。在吟诗填词做文章方面，此人也是一把好手，虽不能说篇篇瑰宝，但其中不乏上乘佳作，颇显“绿林秀才”之风采，亦如鲁迅先生所言，颇有“山大王”之气势（陈早春、万家骥 1993:157）。

再如，毛泽东本人也确有为自己造神的意愿，一个无法否认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证据，就是他特别重用那些为他大树权威且大唱赞歌的下属：一是在四十年代特别重用那位竭力标榜“毛泽东思想”的

刘少奇，将他越级提拔为仅次于自己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二是在六十年代又特别重用那位竭力推重“毛主席语录”的林彪，也将他越级提拔为仅次于自己的党内第二号人物。

除了通过重用提拔来鼓励下属为自己造神外，毛泽东有时也亲自参与为自己造神。李锐先生曾数次向笔者谈道，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朱德秘书陈友群发言说，毛泽东在审阅 1950 年的“五一口号”时，亲自加写了一条口号，即“毛主席万岁”。李先生说他还一直保留着那份刊载陈友群这一发言的会议简报（单少杰 2000a、2005、2006）。

2010 年，郭道晖发表文章，引述了陈友群所谈的这件事。随后，党史工作者张素华发表文章，说查了原始档案，没看到毛加写“毛主席万岁”的字样，只看到毛修改其他口号并签发整个文件的字样（郭道晖 2010；张素华 2010）。张素华文章虽然质疑了郭道晖文章，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不争史实，即毛泽东至少是亲眼看到了这句口号并亲自允准了这句口号。

1950 年，可以说是共产中国的开国元年。毛泽东通过“亲自拟定”（陈友群说）或是“亲自审定”（张素华说）的方式，将“毛主席万岁”确定为共产中国的国家口号，即共产中国里的所有人都要振臂高呼他老人家“万岁”的国家口号。这就表明他有意愿在其治下中国大搞以他为偶像的个人崇拜，有意愿把“毛主席万岁”当作其治下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即共产中国的一个“国标”，一个极其愚昧的、极其反启蒙的、极其有辱中华民族颜面的“国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毛泽东，说“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李锐 1999:352-353）。所谓毛“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即表明毛本人也在使用上述“掩饰手法”。彭德怀这是在揭露毛本人也在为自己造神，也在使用上述两种手法。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番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也是相当可信的。之所以非常尖锐，就在于彭德怀直接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贪功且诿过的人，一个很没风格且很不诚实的人。之所以相当可信，就在于彭德怀说话的场合是一个特殊的场合，一个其间有许多人都可以对他说话的内容加以辨识或加以验证的场合。

彭德怀说此话的场合是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即 1959 年前期庐山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大都是与毛泽东共事多年的人，因而大都是对他知根知底的人，并且大都是对他维护有加的人。彭德怀敢于当着这些人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本身就表明他不大可能是在对毛作无端攻击，相反倒有可能是在说着一件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也就是说，彭德怀不大可能当着许多见证人的面来做出伪证；否则的话，他当即就会遭到他们举证反驳，就会遭到他们群起而攻之。彭德怀没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是不敢说出这种话的，是不敢如此品评他的这位老上级的。

另外，毛泽东本人在为自己造神方面还拥有某种演技，某种堪比“戏子”的演技，即能够很成功地出演“伟大领袖”的演技，或能够很成功地扮作“一尊新神”的演技。关于毛泽东拥有某种堪比“戏子”的演技，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论述。

就造神者方面来看，将毛泽东打造成“一尊新神”，是一项有许多中共党人参与的事业，是一项由“延安整风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事业。

笔者曾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运动比作一锅沸腾的开水，并指出这锅水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一直烧到文化大革命：先是由刘少奇领着一拨人开始烧，把锅里的冷水烧成了热水乃至烫水；后是由林彪领着一拨人接着烧，又把锅里的烫水烧成了开水乃至蒸汽（单少杰 2000:67-69、556-578）。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向全党宣布：毛泽东同志是我党的伟大领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以此为发端，这个党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造神运动。

不过，到了建国后，尤其是到了“大跃进”后，

刘少奇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他们造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对毛的执政方式发生怀疑乃至怀有不满，并以某种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在为毛泽东造神时，也开始变得审慎起来，虽还没有改弦更张，但已不再为之加温加热了（单少杰 2000:240-267）。

就在刘少奇迟疑不前时，林彪脱颖而出，成了新一轮造神运动的领衔者。他先是在自己掌控的数百万军队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发誓要把整个解放军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毛泽东对此大为欣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

继而他又将这套东西由全军推广至全党全国，号召所有党员乃至所有国人都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泽东对此更是欣赏，直接让他替换刘少奇而成为执政党第二号人物。

林彪不负重望，为了将毛泽东打造成神，他不遗余力且不顾廉耻地为毛泽东编排出一系列最为极致亦是最为肉麻的致敬词来：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如“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等等。也因此可以说，林彪为上述那口锅里的水，烧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把火，终于把那口锅里的水烧得沸腾起来了。

经刘少奇和林彪等人前后相继地不断努力，最终将毛泽东造成“一尊新神”，一尊曾一度替代了“许多旧佛”的新神，并使之能够居高临下且随心所欲地主宰着这个执政党，进而又居高临下且随心所欲地主宰着这个红色国家。

不过，造出这“一尊新神”的结果却很不如人意，一方面，它既害了这个国家，又害了这个党；另一方面，它既害了被造神者，又害了诸多造神者。

就上述前一方面情况来看，如此造神的最终结果，既使得这个国家相继承受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人间灾难：前者导致了数千万百姓被活活饿死，后者导致了数千年中国文化传承被生生地割断；又使得这个党在助毛为虐的同时也自食恶果：其绝大多数高层成员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不是在高层之内被伟大领袖蓄谋整治过，就是在高层之外被广大革命群众肆意批斗过。其绝大多数普通成员也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生活压力，不是非常拮据地生活在这个十分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非常惊恐地生活在这个不断折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

就上述后一方面情况来看，如此造神的最终结果，既使得这个被造神者很难把控自己的执政行为：或是像抽了风似地搞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结果搞得一地鸡毛，或是像抽了风似地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搞得一片狼藉。又使得这诸多造神者很难把控自己的政治命运：如刘少奇和林彪都先后遭到了他们曾百般维护的毛泽东的无情摈弃，就像扔掉已穿过的破鞋子、破袜子那样的无情摈弃，一个丧命开封，一个亡命蒙古。

参考资料

- 陈早春、万家骥。1993。《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
- 郭道晖。2010。“4000 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炎黄春秋》第 4 期。
- 李锐。1999。《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196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单少杰。2000a。“2000 年 6 月 30 日访谈李锐先生。”
- 单少杰。2000b。《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
- 单少杰。2005。“2005 年 8 月 30 日访谈李锐先生。”
- 单少杰。2006。“2006 年 5 月 15 日访谈李锐先生。”
- 宋任穷。1994。《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 汪向明。2005。“劳人汪泽楷（汪士楷）。”《百年潮》第 1 期。
- 晓农。2001。“毛泽东‘引兵井冈’考。”《炎黄春秋》第 4 期。
- 徐向前。2016。《历史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张素华。2010。“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炎黄春秋》第 7 期。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陈云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专稿】

“无产阶级专政”在基层

——文革初期湖南岳阳燎原居民革委会的政治生态

刘小萌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湖南岳阳燎原居委会的组织、职能及其在政治运动中的思想灌输、社会动员、治安管理和人员清查等问题的全面考察。揭示出居民革委会在毛时代的社会控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文革权力机构对全社会的控制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端赖居民革委会的运作。文革中大批冤、假、错案的形成，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众多民众在极左政治的指导下共同行动的结果。

关键词： 无产阶级专政、居委会、社会动员、人员清查

街道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是中共建政后管理城镇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50 年代初，中共在城镇基层废除保甲制度，并尝试以居委会取代之。1954 年 12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此类组织在城镇基层普遍建立。70 多年来，其形态随着社会变迁而一再蜕变。而文革时期居民革命委员会（简称居民革委会），既继承以往居委会组织的基本职能，同时又带有文革极左政治的鲜明特色。本文拟以湖南省岳阳县城南区吕仙亭居委会（文革中改称燎原居民革委会）为典型个案，就文革初期居民革委会的组织、职能、其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等问题作一初步考察。希望以此为引玉之砖，推进学界有关文革城镇史、基层社会史的研究。

在转入正文之前，首先必须声明一点：本文所用燎原居民革委会资料，全部系已故老友任冬林先生提供。冬林是湖南岳阳 1968 年下乡插队知青，因受父亲政治冤案株连，一生经历坎坷。上世纪末，正当人生处于最低谷阶段，他以拾荒维生，发现并抢救了 1949 年以来湖南岳阳等地大批史料，内容包括 50 年代初期县治建设、历次政治运动、文革初期“造反”、城镇居民革委会与农村社队、知青下乡等诸多方面。其中关于文革期间城镇居民革委会与社队资料，包括自传、履历、表格、检举信、认罪书、调查汇报等，多出自基层社会各类人员的手笔，不失为普通民众在文革运动中的集体记忆。对剖析文革时期基层社会生态，首先是政治生态，尤有价值。而冬林之重要贡献，不仅在于抢救、收藏了大量宝贵资料，还在于他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对芜杂的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分类、抄录、研究，从而为后续研究开启了一片新天地。尤其令我钦佩的，是他将自己呕心沥血搜集、整理的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学界，期望以此为动力推进文革史、知青史、中国当代史研究。2009 年，冬林经知青好友邱新睦、孟淑媛介绍，与我在网上结识。不久，即将他整理的资料陆续用邮件传来。是年冬，他盛情邀我往岳阳家中做客，我带博士生、知青子女关笑晶同往，得以亲睹冬林收藏之丰，愈感其对文革史研究贡献之大。据我所知，在与我结识前，冬林曾与湖南省档案馆、共青团青运史档案馆等单位联系，希望这批资料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2008 年 6 月起，他在人民网开博，陆续将自己的收藏和研究成果公布，并通过民间刊物（如启之先生主编《记忆》）等途径陆续发表。以后，他又与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联系，有望将这批文献尽快入藏并公诸于世。但冬林的突然离世，使这一切努力戛然而止。我甚至

不知道这批资料的最终下落。日前，当我决定利用冬林提供史料撰写此文时，曾上网检索“任冬林”，希望了解一下他去世数年来，网络上存留的有关他的人生轨迹。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除了“价值中国网”上有一条他的简短自我介绍外，只有《岳阳晚报》2012 年 9 月 9 日黄梅撰写的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在民间资料中“挖宝”》。除此之外，相关信息几近于无。无所不在的网络空间居然留有如此大缺憾，实在出乎意料。同时，也坚定了我撰写此文的决心。希望借助此文，纪念这位不应被忘却的民间收藏家；同时也希望学界诸友，沿着冬林所期许的道路执著前行。

1. 居民革委会的组织

燎原居民革委会是文革初期所改，原称吕仙亭居委会，隶属吕仙亭街道，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吕仙亭原名吕仙道观，始建于后唐。相传吕洞宾曾三次到此地，用仙丹救活老树精，并炼蛇为剑，为民除害。后人为纪念吕洞宾，在此建吕仙道观，形成纯阳宫、吕仙亭、后土殿、娘娘庙、灵宫殿等古建筑群，气势壮观，曾为“岳州八景”之一。50 年代初，该街道居民被组织起来，成立吕仙亭居民委员会。文革时期该居委会隶属岳阳县城关镇城南区[1]。

60 年代初，政治舞台上的极左影响迅速扩张，终于孕育出“文化大革命”这匹肆虐中国达 10 年之久的怪兽。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动乱很快席卷全国。7 月 20 日，岳阳县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1967 年 1 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造反派组织掀起夺权高潮，进而分成两大派，严重对立，酿成武斗。7 月，武斗升级，发展到抢夺枪支。至 9 月，造成 25 人死亡。1968 年 3 月，岳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2]，但武斗并未因此偃旗息鼓。8 月 10 日，县城两派组织再次爆发武斗，死 2 人，伤 60 余人，称“八十风暴”[3]。年底，文革新秩序逐步形成，全县开始整党。1969 年 11 月，仙亭居委会改称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简称居民革委会），标志着文革体制的根系已深深植入城市基层。

燎原居民革委会的基本情况：

（1）体现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组织原则4：正主任 1 名，28 岁，为干部代表；二名副主任，一名 45 岁，为群众代表，一名 19 岁，为民兵代表。此种“三结合”，与作为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显然貌合神离，因为这些所谓“代表”，其实际身份仍为街道居民。副主任以下，委员 11 名，其中干部代表 3 名，群众代表 4 名，民兵代表 3 名，还有 1 名 16 岁女孩，似乎为学生代表。委员中，有 1 名兼任秘书，2 名兼任贫（下中农）协（会）工作。

（2）革委会成员以女性居多，正副主任皆女性，11 名委员中仅男性 1 人。

（3）革委会成员阶级成分纯正。11 名委员中，贫农 9 名，佃中农 1 名，中农 1 名；家庭出身：学生 5 名，家务 5 名，唱戏 1 名。

（4）革委会成员年龄相差悬殊。年龄最大 76 岁，最小 16 岁；其中唯一 1 名男姓委员，年龄 74 岁。

（5）革委会下设 9 个居民组（此前为 10 个组）[5]。每小组设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三、五人不等；1 人任组长，其余为组员，其中 1 人兼任贫协组长。

---

[1] 1960 年—1981 年，因设岳阳市，县、市建制有 4 次分合，导致该居委会隶属关系的变化，参见岳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岳阳县志》页 1、48，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2] 同上，页 336。

[3] 同上，页 36—37。

[4] 毛泽东为建立“革命委员会”所规定的方针，即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三方组成领导班子，参见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页 37，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5] 据 1969 年 3 月调查，该居委会有 327 户，1222 口，下分 10 个组；同年 5 月调查，有 317 户，1203 口，下分 9 个组。居民革委会成立后，户口数始终略有变化。

以上，居民革委会与各小组领导成员共 46 人，其中女 41 人，男 5 人[6]。

居民革委会和领导小组成员，以政治可靠的家庭妇女为主体。副主任周某的外调材料多达 14 份。除本人自述、外调，还包括其夫 3 份“政治历史清楚”外调信，以及子女政历清白的证明。关于第 4 组组长侯某的调查载称：女，年龄 23，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文化高小；呈报理由：结合为民兵代表。主要工作经历：1963 年 3 月以来参加居民小组基层活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主要表现：没有参加组织派性及武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无政治历史问题，未受过任何处分。关于第 1 组组长文某的调查：女，年龄 42，出身贫农，成份打渔；文化初小，积极分子；呈报理由：结合为干部代表。关于第 3 组组长宁某的调查：女，年龄 50，出身驾船，成份家务，文盲；呈报理由：结合为群众代表（其余内容均同，删）。说明居民革委会的人选，均经上级机关政审，重点是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本身与配偶有无“政历”问题；此外，政治态度“积极”，也是入选的必要条件。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即便经过如此筛选，领导班子人员的履历及主要社会关系仍不免多有瑕疵。第 2 组组长文某，“夫陈国华（蹬）三轮车，62 年补税 300 多元”。说明其夫曾作为个体单干户谋生，并一度偷税漏税。第 3 组领导小组成员朱某，“前夫当过（国民党）兵”。第 4 小组组长张某：“旧[舅]父地主，已死，原夫 46 年离婚，土改镇压”。小组组员、群众代表兼任贫协的易某：“叔父判刑七年”。第 5 组组长“本人一贯道徒，夫当伪兵九年”。第 7 组组长周某，“夫伪甲长 2 年、伪工会组长”；小组成员徐某，“文化革命前有作风问题”。第 8 组组长“原夫当过伪保长，结婚前，小土地出租”；另一小组组员：“夫投机罚过款”[7]。此外如副主任周某、组长赵某、廖某、易某、李某等，均因自身“政历问题”受到居民检举揭发。她们的“政历”问题原本轻微，但是在文革背景下却被高度放大，并载入每人的履历表、调查表。这种情况表明，自 50 年代初以来，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的荡涤，受到整肃和株连的基层群众越来越多，即便是土改时“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其社会关系也难以清白。此种现象的蔓延正好作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注脚，即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政治清白者越来越少，有玷者越来越多。

在居民革委会和各居民小组管辖下的居民，主体是居家妇女。她们的文化普遍低下，甚至文盲也不在少数。因居民中绝大部分成年男性已被政府组织在企事业单位内就业，各有隶属，故家庭妇女构成居委会成员主体。居委会管下还包括一些老弱残疾男性，以及因成份或政历问题被剥夺就业资格的成年男性。后者，无疑是城镇居民中身份最卑微、地位最低下的一个群体。

燎原居民革委会既继承旧居委会组织的基本特点，又带有文革极左政治的鲜明烙印。首先，它在上级街道革委会、派出所指导下工作，而文革初期在街道革委会、派出所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工宣队或军宣队人员。其次，在组织内部，还穿插着其它一些群众组织，如婆婆组、学生宣传队、民兵组、卫生组、房产组、治安委员会、贫协等[8]。房产组设协税员，是协助房管部门开展税收工作的非正规人员。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则是官方控制的贫下中农“阶级组织”[9]。这些组织，无不滥觞于文革前。再次，在居民革委会治下的居民们，被人为划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专政对象”，划分标准是阶级成份清白与否以及“政历”问题的有无[10]。以此为基础，全体居民被划分为不同等级。这种人为制造的等级，为阶级斗争的开展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落实，提供了必要条件。此种做法，同样溯

[6] 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新生领导班子花名册》1969 年 11 月 11 日，《居民革委会名单》。
[7] 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居民革委会名单》1969 年 11 月。
[8]《吕仙亭居民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1969 年 7 月 20 日。
[9]《岳阳县志》：1963 年，成立“岳阳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1964 年，全县各区、公社、大队相继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开始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页 361—362）。
[10] 燎原居民革命委员会：《各组依靠对象花名册》《各组团结对象花名册》（无年月，应为 1969 年）。

及文革以前。从而说明，文革时期与文革前基层社会控制系统既有变异又有继承。变异主要表现为控制力增强，打击面扩大，极左色彩鲜明；继承则表现为组织结构延续。也就是说，在“居民革委会”的红色外衣下，其作为政府控制城镇居民基层组织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2. 居民革委会的职能

文革时期，极左政治病态发作，在阶级斗争理论推波助澜下，执政者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落实到基层，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日趋严密，居民革委会的政治职能亦空前强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居民革委会成为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前沿阵地。

2.1. 政治灌输

文化大革命初，当全民都空前狂热地崇拜一个神时，只能是理智受到戕伐。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水准的城乡居民，既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忱，又有向政治偶像顶礼膜拜的虔诚，由此投入文革新生活。

对最高领袖的崇拜形式流行全国城乡、内地与边疆：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歌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宣誓“三忠于四无限”。燎原居委会作为湖南一隅，同样被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亢奋中。除上级规定的一、三、五学习制以外，该居委会利用多种形式学习毛著。组织调查小组，对解放前后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摸底。调查报告宣称：解放前，一组（即第一居民小组）有 31 户贫下中农，住房 28 间，做长工的 16 个，讨饭的 11 个，被抓壮丁的 7 个，当童养媳的 8 个，做女工的 6 个，买儿买女的 4 个。解放后，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彻底翻身。有党员 9 个，团员 14 个，干部 9 个，职工 74 个；房子 54 间，自行车 5 部，手表 28 块，收音机 9 架，缝纫机 6 部，呢料衣 101 件，皮鞋 29 双，皮衣 73 件；读高中的 9 个，初中 28 个，高小 27 个。这一鲜明对比，反映出新旧社会两重天[11]。连居民家有几双皮鞋都要悬挂在“光荣榜”上，足见其宣教工作是如何彻底。而报告表达的豪言壮语虽不无虚妄，却足够宏大：“婆婆姥姥们走出家门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他们的心愿就是人人出谋出力，创造财富，支援世界革命，推动社会前进”[12]。

诉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是当局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的惯用手段。1952 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对“诉苦”的解释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如果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去评价，“忆苦”与“思甜”实际是互补的两极。其政治作用，即在强化阶级仇恨的同时，灌输对党和最高领袖的深厚感情。组织群众“诉苦思甜”的作法在中共历史中源远流长，但只有在文革背景下，它才真正在全国城乡遍地开花，恰好满足了当权者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政治需求。

2.2. 办学习班

文革初期毛泽东说过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当时叫“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文革大运动中，实际又贯穿着一连串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每场运动来临，居委会都要举办学习班。

举办学习班，是对学员进行政治灌输、统一思想和行动的有效手段。各类学习班的共性在于，先由领导宣讲，发放学习文件，学员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形成浓郁的政治氛围。接着由学员汇报思想，坦白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周围人员的错误言行。领导根据学员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居民分成几类，除“五类分子”“专政对象”首当其冲进入学习班外，投机倒把、单干户等“走资本主义道路”人员，也是学习班重点对象。

[11]《燎原居委会七三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摘要）。
[12]《燎原居委会七三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摘要）。

燎原居委会某刘姓居民，出身贫民，职业理发。1962 年曾以“工资太少”为由，要求下放，但领取下放金后却因故未下，仍在街边摆摊理发。文革开始，禁止单干。他不仅失去经济来源，还被强制连续 4 次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他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检讨，要求学员对自己“要批深、批透、还要批痛”；表达决心：要“重新做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些学员认为他家庭负担重，本身又是痨病，以后还“可以留单位做事”。但出学习班后，居委会又说照党的政策办事，必须继续下放。他被下放到沙市农村，当地见他是痨病，不能参加劳动，不同意接收，他只好返回吕仙亭，一边单干，一边要求工作。为此，又被居委会强制参加学习班，继续被当作“典型”批判。他在“自我检讨”中违心地批判自己，不惜扣上大帽子：尤（由）于是旧社会里人，思想很复杂，再加上中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流毒，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还想挖社会主义墙角；一贯态度生硬，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对于任何人，一点不好，就是相骂。像这样发展下去，就一定走到灭亡道路上去。我一定要痛改前非，从新做人，一定为社会主义立新功，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深恩。其实，他的全部“过错”，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在街头理发。但在当时，这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典型表现。

学习班类型不一，从专政对象、团结对象、依靠对象到动员下乡对象等，均对号入座。

在各类学习班中，给“专政对象”办的学习班制度尤为严厉。参加者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彼此开展揭发批斗。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该居委会 28 名被审查对象中，有 18 人被办学习班，4 人被群众揪斗[13]。此类学习班宗旨，凸显“专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习”已大相径庭。

2.3. 组织上山下乡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上刊登甘肃省会宁县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从 7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全县 688 户城镇居民中已有 191 户、995 人分别到 13 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尽管在这批下放人口中，知识青年为数不多，《人民日报》却异乎寻常地在编者按中突出了这方面内容。编者按称：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编者按接着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4]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口号，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上山下乡高潮。

尽管政府指定的城镇动员下乡对象明确，一是学校毕业生、二是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但在两者之间何者为主体的问题上，各地情况有所差别，具体到岳阳县城中镇燎原居委会，其组织下乡对象虽由知青（包括社会青年）与城镇居民两类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

对象之一，城镇知青。据《岳阳县志》载：1968 年 10 月 16 日，城关镇 300 余名知识青年（以初、高中学生为主的城市无业青年）首批去农村插队落户。11 月 3 日，又有 800 余名去农村插队[15]。另据《中共岳阳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指挥部统计》，截止 1975 年 4 月 16 日，全县各单位合计应下知青 922 人，已下 627 人，应下未下 309 人，年缓早下 80 人，悬案 54 人[16]。通过对上述文献比较，可以明确 2 点：第 1，“文革”初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主体并非中学初、高中毕业生而是“城市无业青

[13] 燎原居委会：《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审查揪斗对象花名册》1972 年 12 月 14 日。

[14] 按，毛泽东的这段著名指示，本来另有所指，是掌管宣传大权的姚文元在征得毛本人同意后，放在这篇报道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 22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5] 《岳阳县志》，页 37。

[16] 《中共岳阳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指挥部统计》1975 年 4 月 16 日。

年”（又称“社会青年”）。两者隶属关系不同，前者是中学，后者是街道居委会。第 2，在 1969 年初至 1975 年初长达 7 年时间中，该县真正属于知青（中学初、高中毕业生）下乡的只有 627 人。换言之，由各街道居委会清理出的闲散人口构成下乡主体。

燎原居民革委会从 1969 年初开始动员知青下乡。是年 7 月的一份报告向上级机关汇报动员知青下乡的基本情况：大会与小会相结合，干部与群众相结合，居委会与单位相结合，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工作。从路线教育入手，以大批判开路，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指针，在一个月左右共开群众会 5 次，小组会 7 次，座谈会 16 次，其中群众批判会 1 次，宣传发动、思想教育 9 次。以各种不同形式，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前途教育，分别多次登门，个别反复动员，在工作中还着重抓了正反两方面典型。如四组违法青年某某，事先说有病不下，后来通过十来次上门动员教育，最不得不表示愿意下乡。居委会应下知青 14 人，除一人治病外，其他都到农村插队落户[17]。以上汇报充斥着官话、套话，但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即在动员知青下乡方面，居委会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所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对象之二，城镇居民。1968 年底，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来临，组织城镇居民下乡工作已提上居委会的工作日程。为此，

居委会于 1969 年 3 月 10 日编制了《三清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表一）。表格设计有 17 栏，即单位、户主、性别、年龄、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全家人口、何职业、全家收入、籍贯、何年何月来城市、现住何号、是否下放对象、有无政历问题、备考。笔者依据表中所列 33 个应下乡户（每户户主）的基本信息，将“三清”人员归纳为如下 5 类：

第 1 类 7 人，本人或家属有专职历史问题者。

· 马福生，男，56 岁，伪兵，全家人口 2，四类分子。

· 李双口，女，29 岁，成份贫民，全家人口 4，家务（按指家庭妇女），丈夫曾在伪便衣队。

· 杨少普，男，55 岁，成份小商，政治面貌“反革命”，全家人口 4；“备考”栏：“现在牢[劳]改”。按此处“下放”，应指其家属。

· 易安凡，男，61 岁，出身商贩，政治面貌“反革命份子”，全家人口 2。

· 张淑传，女，46 岁，出身家务，全家人口 3，在家（按指家庭妇女）；“备考”栏：“爱人是 4 类分子”。

· 黎桂英，女，61 岁，成份贫民，文盲，人口 1，在家；“有无政历问题”栏：“丈夫有[问题]”。

· 陈秀英，女，46 岁，成分、出身均贫民，文盲，全家人口 7，家务(按指家庭妇女)；“有无政历问题”栏：“夫，反革命份子”；“备考”栏：“儿子现下乡许市 68.11.29”。

第 2 类 2 人，有刑事犯罪或单干经历者。

· 方淑君，女，42 岁，成份贫民，出身下中农，全家人口 2，家务；“有无政历问题”栏：“偷摸盗窃 2 年”。

· 肖祜生，女，56 岁，成份贫民，出身家务，文盲，全家人口 6，在家；“有无政历问题”栏：“单干”。

第 3 类 8 人，地主（包括破产地主）。

· 黎连英，女，55 岁，成份地主，出身家务，文盲，家务，全家人口 3。

· 李立，男，26 岁，成份地主，出身学生，高中，全家人口 2。

· 高桃子，女，34 岁，成份破产地主，出身家务，全家人口 6，在家，全家人口 6。

· 许定均，男，32 岁，成份地主，出身学生，全家人口 5，职业工人。

· 方永香，女，30 岁，成份公[工]商业地主，出身学生，全家人口 6，在家。

· 易正清，男，60 岁，成份破产地主，出身学生，全家人口 6，做米事。

· 易用理，男，67 岁，成份地主，出身学徒，全家

[17] 《吕仙亭居民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1969 年 7 月 20 日。

人口 2，职业营业员。

· 黄小同，男，26 岁，成份地主，出身学生，全家人口 4，职业画像。

第 4 类 10 人，成份、出身清白而家境贫寒者。

· 刘候珍，女，61 岁，成份家务，出身贫农，文盲，职业在家，全家人口 5，全家收入 40 元。

· 刘仲书，男，33 岁，成份学生，出身中农，全家人口 4，全家收入 40 元。

· 程宏生，女，41 岁，成份学生，出身贫民，全家人口 5，全家收入 50 元。

· 赵保胜，男，49 岁，做生意，出身下中农，文盲，全家人口 5，全家收入 40 元。

· 刘伯明，男，65 岁，成份贫民，出身下中农，文盲，全家人口 8，全家收入 9.80 元。

· 王仲口，男，23 岁，成份贫民，人口 1，收入 30 元。

· 龚青，男，23 岁，成份贫农，出身学生，人口 1，收入 50 元。

· 胡银珍，女，54 岁，成份贫民，出身长工，全家人口 4，全家收入 30 元。

· 李淑元，女，60 岁，成份务农，出身家务，全家人口 3，职业家务，全家收入 40 元。

· 徐年秀，女，38 岁，成份贫民，出身家务，文盲，全家人口 7，职业在家，全家收入 90 元。

第 5 类，6 人，基本信息不清者。

综上所述，可就燎原居委会动员、组织城镇人员下乡情况概括如下：

第 1，居民下放的规模大于知青；居民下放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个体；下乡居民的成份远较知青复杂，主要包括四类分子、配偶或主要亲属有政历问题者，有刑事犯罪或违法记录者，成份虽好但家境贫困者。其中不乏文盲、大龄、孤寡之人。

第 2，在下放居民中，“四类分子”及有“政历”问题者是重点。另据该居委会编《知识青年三届毕业生、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情况统计表》（1969 年 3 月），其“动员对象”列为四栏：知识青年和三届毕业生、城镇居民、无粮无（钱）户、21 种人遣送。所谓“21 种人”，即 196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中明确规定的 21 种属于“专政对象”人员[18]。 因其属于“专政对象”，故官方使用了带有明显强制含义的“遣送”，而非词意缓和的“动员”“组织”。该居委会原计划，在 1969 年 4 月 15 号前，将四类份子全部遣送完毕。但从相关文献记载可知，该计划作为岳阳县乃至更高行政单位遣送计划的一部分，是在该年 8 月完成的[19]。与此同时，在湖南省乃至全国许多地区，这种“遣送”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在此，不妨以甘肃等省市为例，略作说明：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事迹，同时发表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以后，甘肃全省掀起上山下乡高潮。1969 年上半年，全省 24 万多人被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知青只有 3.2 万多人[21]。说明在这段时期，甘肃省下乡主体并非高、初中毕业生，而是成份复杂

[18] 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内容分为 6 条，简称“公安六条”，其中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以上所举各类“专政对象”简称“21 种人”。“公安六条”的颁布，为在全国范围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提供了政策依据。1968 年发生在湖南道县、邵阳等地的对地富分子等“21 种人”的血腥大屠杀，就是最触目惊心的事件。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

[19] 《岳阳县志》载：（1969 年）8 月 22 日，县城造反派将 454 名“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遣送农村（页 37）。

[20] 富香玉：《这些事发生在“文革”与“极左”年代》，讲述了 1969 年 2 月，残疾的爸爸带着 75 岁奶奶、两个子女被遣送到湖南绥宁县插队落户的悲惨经历，袁多健、唐喜山主编：《有字的人生——湖南绥宁武阳知青纪念文集》，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13。

[21]《甘肃省志·劳动志》，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下简称《史料辑录》（西北卷），页 1544—1545，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的城市闲散无业人员。

江苏省革委会则于 1969 年 2 月 13 日发出通知，规定城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及社会青年，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必须下乡。又规定，城镇地、富、反、坏、右分子，凡应该遣送下乡的，按以下办法办理：原籍是农村的，遣送回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原籍是沿海公社、国防要地的，应严加控制或变更安置地点；世居城镇的遣送本省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五类分子去农村时，要将其档案转去，使贫下中农了解他们的罪行。该省是组织下放城镇居民规模较大的省份之一，惟总数不详，但从 1969 年第 4 季度下放计划中仍可窥知一鳞半爪。计划提出，该季度将组织 47 万人下乡，其中干部 7 万人，家属 11 万人；知识青年 2.7 万人；城镇居民 26.2 万人[22]。

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下放计划也很庞大。省革委会于 1969 年 4 月提出，全年下放城镇知青 12.4 万人；城镇居民 11.6 万户，44 万人；同时组织部分教师、机关干部同知识青年一起到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23]。

在广西，自 1969 年 3 月起掀起上山下乡运动高潮，采取插队、下放和“社会清队”相结合办法，将城市所谓“黑五类”“二十一种人”与“清队”时“站错队的“坏头头”与城市知青共 20 多万人下放农村[24]。

据《陕西省志》记载，“文革”初期，该省遣送近万名“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下乡[25]。从当时各省市下放人口规模看，陕西省明显居于下游。据此看来，全国二十余省市自治区的强制遣送人员（包括本人及子女），在数量上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大规模下放城镇居民活动，从各省区中心城市一直波及各地级城市乃至县城，并且都是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进行。1969 年底，广东省潮阳县革委会发出关于上山下乡、移民安置任务通知：第一批迁移到陆丰县 12 万人，重点放在棉城、城郊和沿海人多地少的平原地区；春节前要完成 5 万人（实际上没法完成）。同时遣送棉城、达濠、海门“五类分子”5279 人到县内其它人民公社。四川营山县从县城、场镇下放了一批城镇所谓无业人员到农村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遣送农村“监督劳动”。广西天峨县，则借着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高潮，将一批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教师遣回原籍或调到县内大队级小学，从领取工资转为挣工分吃饭。

综上所述，可初步得出几点认识：

第 1，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在组织对象上实际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代表，主体是中学初、高中“老三届”毕业生[26]。第二种类型以上述甘肃、江苏、黑龙江、广西、陕西等省省会城市为代表，对象以无业城镇居民为主体。当局针对两者的动员口号截然不同，对前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后者：“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说明：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席卷范围远比人们现在所了解的更广泛，成份更复杂。也就是说：文革初期卷入下乡高潮的，既有城镇知识青年，又有闲置社会青年，同时包括被强制驱赶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

第 2，考察岳阳县燎原居民革委会的下乡情况，不仅印证前述甘肃等省市区的下乡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且从微观角度，对上山下乡运动与城镇精简人口、“清理阶级队伍”的密切关系，作了更为具体详实的披露。这一点，正是以往研究上山下乡运动史者所疏于了解的。

---

22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干部下放、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通知》1969 年 11 月 2 日。计划完成情况见《江苏省志·综合经济志》：1969—1970 年春，总共下放城镇人口 51 万人，见《史料辑录》（华东卷），页 2441—2442。

23 本书编委会：《黑龙江历史编年》，页 924，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4《广西文革大事年表》，页 141，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25《陕西省志·劳动志》，《史料辑录》（西北卷），页 1398。

26 拙著：《中国知青史——大潮》，页 162—1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第 3，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形形色色的城镇下放者中，身份最卑贱的当属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乃至“21 种人”。如果说当局对知青、社青通常使用“动员下乡”或“组织下放”一词的话，对这部分人所使用的，则是带有鲜明强制色彩的“遣送”二字。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借下放城镇闲散人口之机遣送（清理）各类“问题”人员的做法，并非文革的发明，而是在 60 年代初已露端倪[27]。然而，只有借助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的狂澜，此种作法才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与知青下乡不同的是，被遣送者到农村落户，其子女一同前往。许多被遣送者，年事已高，作为丧失基本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他们根本无法适应在农村的生活[28]。许多人在农村衣食无着，一旦倒流回城，则可能被冠以“破坏上山下乡”等罪名，受到严厉批斗[29]。由此造成的恶果尤为深远。迄止今日，这仍是文革研究者鲜有关注的一个话题。

2.4. 落实“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文革前，各地居委会均设治安委员会（治保委员会）[30]，在基层派出所指导下的群众性治安组织。文革时期，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在居民革委会的招牌下，治安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强化。

1969 年 7 月，燎原居民革委会所属治安委员会设治保委员 11 人，组长 1 人，副组长 2 人[31]。治安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清队为中心，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一个忠字，对阶级敌人心怀一个狠字”。所谓“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是在文革大背景下，中共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196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经验，“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在全国范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运动中，各地普遍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进行一次大清查，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燎原居民革委会，清队工作也迅速展开。

根据 1969 年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其工作包括：干部分工，采取三包（包组、包户、包人）、三知（知心、知情、知住址）、三结合（大会与小会相结合、干部与群众相结合、突击与经常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治安骨干坚持每天带领群众轮流值班，巡逻放哨。婆婆组每天坚持三查（查安全、查卫生、查外来人员）。特别是佳节时间，做到通宵巡逻检查。巡逻要求做到“家务事多缠不倒，孩子多拖不倒，文化低难不倒，困难任务大吓不倒”。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或雨中，也要坚持巡查。据说某治安委员晚上轮到值班，“起迟了点，连忙向毛主席请罪”。某次，有刘姓富农子弟进城以积肥为名，与河西人用大米、粮票私换黄豆，被居民组长方某发现，连忙报告居委会，破获投机倒把黄豆 1 千多斤。不久，刘姓富农子弟倒买粮票，治保员跟踪掉线到深夜，终将该案破获，没收刘某的粮票 270 多斤、人民币 60 多元，交给工人纠察队。

治安委员会协助派出所，对全体居民，首先是四类分子、“社会渣滓”等“专政对象”实行全面控

---

27 早在“文革”前，北京市曾把这种遣送还乡的做法与将首都建成“水晶城”的政治设想联系在一起。同样的做法亦见于边远地区，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史料辑录》（西南卷），页 4550。

28 据《南阳市志》载：自 1968 年末至 1969 年 3 月 13 日，全市先后下乡居民 2184 户，15701 人（含高、初中毕业生 5743 人）。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放面过大，下乡居民中有的丧失劳动能力，有的无依无靠或者是病残人员，《史料辑录》（中南卷），页 3481；参见《南阳市劳动志》，同上，页 3484。

29 《南宁市公安志》载：1970 年 3 月 15 日，市革委会在朝阳广场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从农村倒流回南宁破坏上山下乡的国民党上校军官曾耀源、苏建侯等 9 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大会批斗后，又先后 9 次在 16 个单位巡回批斗。《史料辑录》（中南卷），页 4020 页。

30 岳阳县居委会设治安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始于 1954，《岳阳县志》，页 383。

31 《吕仙亭居民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1969 年 7 月 20 日。

制。60 年代初，国家为控制城乡人口迁移（主要是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得到严格执行。按规定，城乡所有居民都必须在常住地登记户口，变动永久定居地点必须经户口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于是，通过户籍制度，对全国城乡居民实施前所未有的全面控制。城镇基层派出所，掌握居民户籍，同时也控制每个居民从生到死的基本信息。而作为街道基层组织的居委会，在搜集、掌控居民身份与政治面貌信息方面，均起到不可替代作用。

居委会对四类分子无论男女，均实施严格监管。下面以地主徐佩兰为例，说明监管的具体措施：

实行登记制度。徐佩兰的《四类份子登记卡》（1966 年）：“性质：地主分子；姓名：徐佩兰；性别：女；年龄：54；成份：地主；职业：家务；文化：文盲；住址：洞庭南路 20 号。登记卡“六五年口口的表现”一栏这样写到：“该地主份子较老实，如搞义务搞卫生，能参加，不过自己的儿子王小刚在外还东奔西跑，没有很好的教育，群众对她印象较好，会[汇]报情况较少，对子女教育不够。”

制定改造规划。1965 年 11 月 29 日，徐佩兰（改造规划人）在“1966 年的改造规划”一栏中写到：“现年 55 岁……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我的阶级罪恶，好好地改造自己是我唯一出路。1965 年已即将过去，在这一年中我改造得不够，没有能够争取取掉帽子，在 1966 年我一定要好好地改造自己，争取取掉帽子，特订出如下改造规划：1，拥护党的政策，遵守党的法令，发现做坏事的人立即向政府报告，我自己不乱说乱动。2，打扫屋前屋后和屋内的清洁卫生，做好“三防”工作，消灭人为事故。3，不做投机倒把，做好家务事，帮别人带好小孩，让小孩的父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4，挤出时间多参加义务劳动，从劳动中好好地改造自己。”

根据徐佩兰自传，她也是苦出身，17 岁嫁给官僚黄某，“吃了 20 多年的剥削饭”，直到“解放”。因为这段经历，她在 1958 年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到 1969 年仍没摘掉，自然成为专政对象。徐佩兰的例子还说明，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四类分子，未必是土改时依照经济地位划定的阶级成份，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主配偶乃至子弟，均可能因某种株连被追加“地主分子”帽子，而坠入政治深渊。

文革爆发后，随着居民革委会工宣队、派出所军代表的进驻，对居民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作为重要措施之一，居民革委会在 1969 年 3—4 月间编制了一系列表格。每户居民的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文化程度、籍贯、政治面目、工作单位、现在住址；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解放前家庭经济状况、现在家庭经济状况等 14 栏[32]。

1969 年，居委会有四类分子 17 人，其中反革命（历史反革命）11 人，地主 4 人，坏分子 2 人[33]。为加强监管专门成立监改小组，每三户监管一名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外出必须请假，定期向居委会汇报，按期训话。对难以监管户，采取遣送下乡方法，交贫下中农管理。对“反攻翻案，不认罪守法”者，组织群众批斗[34]。

对运动中清查出的未定案可疑人员，则采取“政策攻心”，只准老老实实，不准兴风作浪，更不能破坏社会治安。治安员每天坚持三查（查安全、查卫生、查外来人员），提出“对敌狠，抓紧管严，敌动我知”。提出为“备战”，作好治安管理工作，规定每月 15 号开治安员、监督员会一次，治安员每星期 2 次。

---

[32] 城关镇吕仙亭居委会：《分户花名册》1969 年 3 月 11 日。

[33]《吕仙亭居民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1969 年 7 月 20 日）中列为“四类分子”的地主仅 4 人，而该居委会《三清人员统计表》（1969 年 3 月 12 日）则称：总计 326 户中，工人 1 户，贫农户 143 户，贫民户 133 户，地主户 23 户，富农户 2 户，小资产阶级 2 户，其它 6 户，中农 13 户，下中农 3 户。该居委会大部分地主究竟是已被遣送下乡，还是未列入“四类分子”，待考。

[34] 关于“五类分子”被批斗问题，《岳阳县志》只有一句话，却足够概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五类分子”普遍受到批斗（第 383 页）。

针对全体居民，强化治安管理。具体规定严格细致：（1）来客住一晚，户主带客向组长治安员报告；（2）二晚以上住宿者，须户主持户口登记簿登记，未经批准不留宿。（3）每天做到有婆婆组、学生、治安员逢节日值通宵。（4）居民户坚持做到三坚（门坚、壁坚、窗坚，外出锁门）、四有（有沙包、缸有水、有防火设备、有健全制度）。（5）措施做到五无（无投机倒把、无偷摸盗窃、无敌人破坏、无灾害事故、无火灾出现），一严（严加对敌人监督改造[35]，两不准（一不准留过夜人，二不准点过夜灯）。（6）制度对干部群众一个样，检查与不检查一个样。如有违犯，按情节轻重处理[36]。

燎原居委会位于岳阳城区，车站，商店、旅栈业密布，人员流动量大，来往人员复杂，是犯罪份子作案较多场所。区内原有违法青年 50 多人，违法青年与顽劣儿童出没无常，进行偷扒、盗窃、流氓活动和打群架等犯罪活动，1968 年发案 8 起，治安问题 30 多起，群众惶惶不安。居委会针对这种情况，定期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形势教育。半年中，召开群众大会 10 次，教育群众，认清阶级斗争新形势，认真遵守户口管理制度，切实搞好一日三查巡逻、值班工作。报告称：在干部带头，干群同心协力下，半年中共抓获犯罪分子 8 名，在经常性安全检查中，发现漏洞 37 起，在派出所指导下一一改正。其实，居委会发现的刑事案件，多属“鸡鸣狗盗”、小偷小摸之类，与阶级斗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当时形势下，却不能不提到阶级斗争高度去认识。其结果，势必混淆不同性质矛盾，扩大打击面。

居委会还根据各组情况，建立若干联防小组。对违法青年，采取“帮组小组与群众相结合，干部群众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发现苗头及时教育，定期和不定期地登门教育”的方式。报告称赞说，“有 80%的违法青年和顽劣儿童已改邪归正，从而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革命和生产的向前发展。[37]”

上引报告充斥着文革时期的官话套话空话废话，但是却足以表明：该治安委员会，不愧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小脚侦缉队”，无论是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方面，还是在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社会基层方面，均起到其它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在社会人员良莠不齐、狗盗鼠窃行为此伏彼起的环境下，居委会兼有社会治安职能确实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与开展阶级斗争、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政治紧密衔接在一起却极其荒谬。然而如众所知，这种荒谬结合在全国城乡几乎是一种常态，并且贯穿文革始终。

除上述政治职能，燎原居民革委会履行的职能还有：响应毛泽东号召，走“五七道路”，创办街道厂组；组织居民“加强战备”，落实人防工作[38]；完成上级交办各项任务，协助税务部门收取房租[39]；按户口发放各类票据[40]；调解居民纠纷[41]等。这些职能，涉及经济、民防、税收、居民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政治性。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

35 笔者按：报告在此处原注：“四类分子全部在 69 年 4 月 15 号前遣送完”。

36《吕仙亭居民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1969 年 7 月 20 日。

37《燎原居委会七三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摘要）。

38《燎原居委会七三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摘要）。

39 《吕仙亭居民治安委员会工作报告》1969 年 7 月 20 日。

40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期间，中共采取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方式，完成了对农村个体经济、城市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伴随经济基础的变革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严密、高效、全面的控制系统的形成。而控制系统的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项制度。在此种制度严格管理下的城镇居民凭户籍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数十种票证。每类生活必需品均按定量供应。在保障城镇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其对制度的依附。见微知著，燎原居民革委会协助粮食管理部门，对所属居民粮食供应的控制就很能说明问题。参见《燎原（居民革委会）双核（人、粮）情况登记表》1967 年；《城关镇城南燎原居委会摸底统计表》（部分）1967 年 8 月 4 日；《城关镇城南个体无证商贩、手工业摸底表》等。

41 参见《不团结现象统计表》1969 年。

3. 政治运动与人员清查

中共建政初期，在全国农村实行“土改”，在城镇进行“工商业改造”，进而宣称，在经济领域一举消灭了陈腐旧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制度。但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剥削阶级的消灭所带来的，并非阶级斗争的消弭，反而随着 60 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并在文革时期日趋极端。燎原居民革委会作为城市基层社会一隅，极为生动、具体地再现了阶级斗争的严酷与荒诞，而政治运动的接踵而至与各种名目的“清查”，就是这种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此，对“敌情”进行全面调查，进而实施有效监控，就成为居民革委会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以燎原居民革委会（前身吕仙亭居委会）为例，在 60 年代初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所辖居民、首先是“专政对象”进行大规模调查清理，主要集中在三场运动，第一场“四清”运动（1966 年 4 月至文革爆发）；第二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1969 年）；第三场“一打三反”运动（1970—1972 年）。

3.1. “四清”运动与人员清查（1966 年 4 月至文革爆发）

1963—1966 年中共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中，对农民的阶级成份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对四类分子等“专政对象”随意批斗、打骂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这场运动，实际为文革发动做了理论和实践准备。1966 年 4 月，吕仙亭居委会对居民中的各种“不良成份”进行全面调查。

调查结果，形成一系列表格，主要有：《四类份子登记表》（66 年 4 月 8 日制）；《四类份子子女情况统计[表] 》（66 年 4 月 13 日制）；《开除者登记表》（66 年 4 月 8 日制）；《解除劳教、拘留者登记表》（66 年 4 月 8 日制）；《劳改释放分子登记表》（66 年 4 月 8 日制）；《新老贯[惯]犯顽劣儿童窝主销脏[赃]户黑饭铺外流（表）》（66 年 4 月 12 日制）。从这些表格，不难了解运动的清查重点。

3.1.1. 四类分子

《四类分子登记表》（笔者为简省计，将原表中曾用名、家庭住址、籍贯 3 项删略）：

据下表，“反”即“反革命”。四类分子的基本概念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表中共列四类分子 17 人，性质为地主分子的 4 人、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分子 11 人、坏分子 2 人。若干地主，因在 1949 年以前曾任伪军职、特务，而兼有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分子身份。反革命分子，出身或成份有贫农、贫民也有地主，说明社会来源较为复杂。

四类分子身份低下，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整肃之余早已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他们普遍没有固定职业，年龄偏大，主要在街道基建或社会服务部门从事临时性体力劳动，因此成为居委会监管对象。

在一个强调“贯彻阶级路线”的社会，实际推扬的却是腐朽“血统论”。对“专政对象”的政治压迫，必然株连子女。在此种背景下，对“四类分子”子弟加以清查与管制，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3.1.2. 四类分子子女

《四类分子子女情况统计》共载 19 人。其中，原表“政治面貌”一栏均为“群众”，笔者为省繁文，将其与“籍贯”“家庭详细地址”“档案号”栏等一并删略。整理后的基本信息编为下表：

3.1.1. 四类分子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个人出身	家庭成份	性质	备考
1	张竟城	男	48	学生		反，上尉特务	吕仙亭合作肉食水产公司
2	马福生	男	55			反，伪连长	城南服务大队
3	徐佩兰	女	54	家务	地主	地主	在家
4	邱正汉	男	38		贫民	反，伪排长	街河口搬运服务社
5	孙叶松	男	50	特务		反，保安队长，特务	同上
6	李凤英	女	63	家务	地主	地主	在家
7	彭翥	男	45	学生	地主	地主	百香园
8	万金祜	男	48		贫民	坏分子	街河口搬运服务社
9	高云贵	男	50	学生	贫民	坏分子	在家
10	童爱桂	男	54	特务	贫民	反，特务组长	街河口搬运服务社
11	张知新	男	48	学生	地主	反，伪少校	同上
12	易荣礼	男	63	学生	地主	地主	吊桥日用杂货商店
13	易安凡	男	52	学生		反，少校特务	城南基建队泥木工组
14	钟敏振	男	52	学生	地主	反，伪少校特务站长	先锋路煤建公司
15	胡岳轮	男	46	学生	地主	反，中校军官，情报科长	城南服务大队砂石组
16	姚鲁	男	48			反，特务	岳阳饭店
17	徐井初	男	48	文盲	贫民	反，特务	岳阳港务局

3.1.2. 四类分子子女情况统计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个人出身	家庭成份	现属何单位	文化程度	父属何类
1	张汉珍	女	18	学生	贫民	松洋湖农场	高小	反
2	乌梅秀	女	20	学生	贫民	松洋湖农场	高小	反
3	胡秋珍（划去）	女	40	家务	贫民	在家	文盲	
4	李笔华	女	18	学生	地主	在家	高小	反
5	李光华	男	16	学生	地主	五金修配厂	高小	反
6	方永久	女	50	学生	地主	木场家属队	高小	地
7	方永湘	女	28	学生	地主	会芦席场	高小	地
8	易原生	男	21	学生	地主	叉街铁铺	初中	地
9	易柳生	男	30	学生	地主	运服务社	初中	地
10	彭端英	女	18	学生	地主	在家	初中	地
11	童岳生	女	18	学生	贫民	岳阳青年路完小	高小	反
12	童细毛	女	18	学生	贫民	在家	初小	反
13	高武成	男	39	学生	贫民	先锋路联合诊所	高中	坏
14	高新华	女	31	学生	贫民	岳阳滨湖饭店	初中	坏
15	赵小春	男	26	学生	贫民	岳阳中转站	高小	反
16	万腊梅	女	19	学生	贫民	城园艺场	高小	反
17	易明	男	17	学生		松洋湖园艺场	高小	反
18	易清	女	19	学生		在家	初中	反
19	黄小洞	男	22	学生	地主	城南服务大队	高中	地

上表 19 名四类分子子女中，家庭成份填注为地主的 8 人。其年龄，多在 16、17 至 20 岁左右。他们即便生于土改运动前，因年龄尚幼，本人成份当然不可能划为地主。但居委会并未因此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将其全部打入另册即为明证。

原表注：“以上皆系满 16 岁的”，说明如果计入不满 16 岁者，其实际人数应多于 19 人。尽管他们普遍受过文化教育（文盲 1 人，初小 1 人，高小 10 人，初中 5 人，高中 2 人），但由于受到父辈政治株连，多被剥夺在企事业单位正式就业的资格，不得不在街道从事收入微薄、临时性体力劳动。这正是他们沦为街道居委会监管对象的基本原因。

19 人中，“父属何类”一栏注明“反”（反革命）的 10 人，注明“地”（地主）的 6 人，注明“坏“（坏分子）”的 2 人，未注 1 人。说明居委会确定“四类分子子女”身份，遵循标准不一：有的是依据父亲家庭成份，有的是基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依据父亲是否有犯罪前科。划分标准的随意性，导致这一人群持续增长，以及打击面的扩大。

城乡中四类分子后代，大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 50 年代初的“镇反”“土改”运动，到 60 年代中期“四清”运动，十几年过去了，对他们的政治株连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益发加剧。发展到文革时期，许多地方实行地、富帽子世袭制，由父及子，代有传人[44]。

除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清查对象还有如下社会“渣滓”：

劳改释放分子。登记在册 7 人。“何时何因劳改”栏：王觉知 34 岁，“54 年偷麻袋 800 元”，刑期 8 年；胡岳输 42 岁，家庭成份地主，因“60 年对现实不满”刑期 6 年；李耀雄 33 岁，贫农成份，“60 年因作风问题”，刑期 6 年；肖海棠 35 岁，贫农，“58 年因强奸”，刑期 8 年。[45]

新老惯犯、顽劣儿童、窝主、销赃户、黑饭铺、外流人员。登记在册 7 人。其中顽劣儿童 2 名，外流 1 名，窝主 2 名，黑饭铺 1 名，老惯犯 1 名[46]。

被开除者。登记在册 11 人。其中 10 人均以作风问题被原工作单位（剧团、医专、商业部门、麻纺厂、邮电局、完小、蔬菜公司）开除，一人“思想反动”兼有作风问题，一人生活“作风”兼有投机倒把问题，另一人因贪污被开除。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人群的家庭成份，为清一色贫民（贫农）[47]。说明成份或家庭出身不好的居民，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慑，鲜有敢越此雷池而妄为者。他们也因此成为基层社会中最“遵纪守法”的一个人群。

解除劳教、拘留者。登记在册 12 人。“何时因何故拘留劳教”栏内，6 人因“投机（倒把）”，2 人为扒手，另 2 人为作风问题，还有一人因“59 年骂干部”刑期半月。劳教(拘留)时间有 3 年、1 年、半年、3 个月不等。家庭出身地主的 1 人，未注 1 人，其他都是贫农（贫民）[48]。以上考察表明：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多数人的家庭出身或成份属于好的或比较好的，只是由于在人生某阶段误入歧途，才留下永久“不良”记录。尽管上述人群来源不一，成份比较复杂，但不管怎么说，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始终是居委会监管重点，当无疑义。

3.2. “清队运动”与人员清查（1969 年）

196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经验，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而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运动）。在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方式，对在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一次大清查。

[44]《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19 日。
[45] 燎原居委会：《劳改释放分子登记表》1966 年 4 月 8 日。
[46] 燎原居委会：《新老贯[惯]犯、顽劣儿童、窝主销脏[赃]户、黑饭铺、外流》1966 年 4 月 12 日。
[47] 燎原居委会：《开除者登记表》1966 年 4 月 8 日。
[48] 燎原居委会：《解除劳教、拘留者登记表》1966 年 4 月 8 日。

在燎原居民革委会，“清队”运动同样围绕阶级斗争中心展开。运动的重点，一是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二是严查“现行反革命”活动。在身份调查基础上，编制了一系列表格，主要有：《阶级成分登记表》（背面是“家庭主要成员简历”），《定案结论登记表》，《定案报批表》，《新挖阶级敌人名细花名表》，《敌特反动组织、现行反革命组织成员花名册》（1969 年）等。

“清队”运动第一步，是居民自报自查，并填写《主要社会关系摸底表》（1969 年 5 月 20 日）。表格附加的“说明”称，“主要社会关系”是指：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舅、伯、叔、兄弟、姐妹、姐妹夫、女婿、子女（原注：土改前三年病故不摸）。也就是说，调查内容涉及每个居民以核心家庭夫妇为中心上下 4 代的成份、政历问题（比人们熟悉的“查三代”还多一代）。

由于调查的亲属关系在纵和横两个方面均比较宽泛，势必导致一种结果，即几乎所有家庭，即便是三代赤贫，其“主要社会关系”都难免“白璧无瑕”，诸如某个亲属或姻亲“姐夫”“女婿”之类“当过反革命兵”“当过伪警士兵”等，在摸底表中屡见不鲜。[49] 这样一来，在强化阶级斗争意识的同时，就人为制造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问题”人群。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拥有好成份和出身，但因为社会关系有玷，基于被株连的担忧，不能不对当权者言听计从，平日则谨言慎行。这就是政治株连所产生的寒蝉效应。

“清队”运动第二步，由居民革委会组织调查。居民自报自查，未必真实，因此，由居委会对被检举人（嫌疑人）组织调查，就成为工作的必要一环。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区白螺街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协查通知函》（1968 年 12 月 19 日）这样写到：根据我清理领导小组在这次三查一清中，本着主席教导：“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这一伟大教导，对口口问题通过多方面调查、落实，认为口口在土改时是漏划地主，并对现在进一步落实的情况，而且能够上官僚地主。请你单位接信后，做好下列几点：1. 你单位有无此人。2. 他自己交代如何。3. 如果在你单位查无此人，就请将原件退回我地专案组。4. 如果查证有此人，在 69 年元月 15 日给我地专案组联系。

被调查对象在土改时原本没有问题，在“清队”活动中却被定为“漏划地主”，而领导小组仍不满意，认为应将其升格为“官僚地主”。这种罔顾土改时家庭基本情况，一再加码提升被调查对象“阶级成份”的作法，在文革时期相当普遍。

“清队”运动第三步，在调查基础上，对新旧各类问题人员，按照不同身份定性，分别编为表格。如《敌伪时期敌特组织、机构调查登记表》（1969 年 4 月 7 日），登记表原注：（一）登记范围：敌伪时期军、政（保、乡）警、党、特组织；（二）凡设在各公社、农林场、城关镇的除自建档外，应上报一份人保组和军管会。（三）属全县性的公社的组织机构，除报县外，还应通知有关公社。同样性质的还有《敌伪人员登记名册》，栏目共有 9 项：1 姓名（姓名、别名、化名）；2 性别、3 年龄；4 详细住址；5 现在何处？何机关工作（职务）？6 主要历史；7 文化大革命中是否参加群众组织？有否反革命活动？8 现有否被揪出来？9 备考。表下原注：“统计要准确，注意保密，此表在 1969 年 9 月 3 日前上报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以上情况表明：这种调查是包括居委会在内各基层组织在县公安局军管会统一领导下，有计划的进行。

《敌伪人员登记名册》共列 25 人，“主要历史”栏依次填写为：上尉情报员，上尉连长，特务，地主分子，地主分子，少校、会计，坏分子，地主分子，保安团长，中校科长，伪排长，坏分子，情报组长，少校特务，坏分子，少校营长，伪政科长，右派（已摘帽），伪铁路井[警]长，一贯道坛主（备考:男人是税务局长），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原注：“翻案散布呼吁被斗争”），岳运联黑手，劳改七年。

1949 年 8 月，湖南长沙的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接受中共八项和平主张，通电起义。因系“和平起义”，湖南省曾留用大批国民党军政警人员。

[49] 参见岳阳县龙湾公社方元大队方荣钦《主要社会关系摸底表》1969 年 5 月 20 日。

然而，正如文革结束后一些文献所披露，这些“起义人员”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沦为“清算”“批斗”对象。岳阳也不例外。见燎原居委会《敌特反动组织、现行反革命组织成员花名册》（1969 年 4 月 7 日）记载，如纪洞湘，男，65 岁，主要问题：伪国民党员，区委成员，口业公会常务理事、律师、镇教育干事、县党部录事；董义泉（全），男，61 岁，37 年参加伪县十二挺进支队第二大队等，他们均属“历史反革命”。花名册又载：胡口口，男，29 岁，成份贫民，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现政名称”一栏载：“现行反革命”；朱云新，男，66 岁，学徒，初小，“现政名称”一栏：“造谣”。“现政名称”，应是“现有政治问题名称”的意思。“现政名称”不单指“恶攻”“造谣”一类现行罪，还指“清队”运动中新挖出的“反动分子”，如李淑元，女，61 岁，“现政名称”：特务组织；尹口才，男，54 岁，“现政名称”：伪自卫队。

上述“问题”人员，不管具体罪名有无，均被纳入“21 种人”。如前述，此称源于 1969 年中央颁布“公安六条”，是对 21 种“专政对象 ”的泛称。对照“公安六条”，可知岳阳“清队”运动中明确的“21 种人”，在表述上有若干变化：如将“敌伪的军官（连长以上）”，改为“伪军连长以上、伪军连长以下”；“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改为“反动会道门头子（下分三类：小道徒、中道徒、一般道徒）”；“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改为“被杀家属、被管家属、被关家属、外逃反革命家属”。同时，将“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几种人删除，代之以：“叛徒”“匪首或贯[惯]匪”“恶霸”“现行反革命分子”[50]。可见，与以往相比，燎原居委会进一步扩大了“21 种人”范围，如在原“连长以上”，补充“连长以下”；在原“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基础上，加入“一般道徒”；在原被杀、关、管、外逃的反革命家属前，删去“坚持反动立场”限定词。如此一删，实际意味着即使是没有“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家属，也被扩大进“21 种人”。凡此种种，都说明湖南的“21 种人”比“公安六条”的“21 种人”范围更广，打击面更宽，株连人数更多。联系“文革”初期湖南发生大规模武斗，在道县、邵阳等地发生惨绝人寰“大屠杀”等事件，对岳阳等地在“文革”“清队”中的“左上加左”，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燎原（吕仙亭）居民革委会《对敌情况统计表》（一）（1969 年 3 月 12 日）：“原有二十一种人总数”47 人。其中：叛徒 2 人，特务 3 人，地主分子 3 人，坏分子 3 人，右派分子 1 人，伪军连长以上 4 人，伪军连长以下 1 人，伪政保长以上 1 人，伪警长以上 1 人，被杀家属 3 人，被管家属 10 人，被关家属 2 人，情报组长 4 人，劳改劳教 9 人。此外，在“清队”运动中“新挖”3 人（特务 1 人，地主分子 2 人）[51]。

被定为“21 种人”，必须填写《二十一种人登记表》，除姓名、性别、年龄、家庭成分、本人出身、文化程度、解放后作出何种历史结论、历史身份、籍贯、现在地址等 10 项，重点还有 10 项：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何年何月何地参加何反动组织任何职务、主要罪恶、群众意见、大队革委会意见、公社革委会意见、上级批示、备考。表格下附说明：“1，原定五类分子上次已填写的这次不填；2，46 年以后的军政井[警]宪人员应填写，如果 1946 年以前有罪恶民愤的也应填写；3 其他伪政府人员可参照同等职务进行填写”。[52] 既然规定有“原定五类分子上次已填写的这次不填”，说明前次填表“五类分子”不再参与此次统计。由此可知，“21 种人”的实际人数应高于此表所列 47 人。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中共建政初，阶级敌人比较单一，地主、

[50] 燎原居委会：《对敌情况统计表》表一（ 1969 年 3 月 12 日）“原有二十一种人总数”栏。

[51] 燎原居民革委会：《对敌情况统计表》（二）（1969 年 3 月 12 日）“新挖二十一种人总数”一栏：3 人。其中特务 1 人，地主分子 2 人。

[52] 岳阳县：《龙湾公社二十一种人登记表》。

富农，加上“历史反革命”。以后，运动相踵而至，敌人越来越多，罗织罪名越来越随意，政治帽子满天飞。文革不愧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人整人运动。运动中，除了声名狼藉的黑五类分子统统被打翻在地，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被强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罪名，“反动分子”的队伍日愈膨胀。

1968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第二条明确规定的阶级敌人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简称“九种人”。有的省在上述九种人外，又加进“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53]。这样一来，就形成“反动”的“十种人”。从“文革”前的“五类分子”扩大到“文革”初“十种人”，再到“清队”运动“二十一种人”，足见受歧视、受压迫对象，不仅在人数上出现引人注目增长，在范围上也有明显扩大。燎原居委会的“清队”运动，充其量只是这场地狱之火的几点火星。

阶级斗争的极端扩大化，形成社会中人数庞大的贱民阶层。他们是当权者倡导“阶级斗争”的活教材，也是政治运动所向披靡的“活靶子”。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文革”当权者得以随心所欲施展“专政”的雷霆之力。

岳阳基层居委会的“清队”运动之所以说是“左上加左”，除了随意扩大“21 种人”范围，随意降低“21 种人”标准，还表现在“21 种人”之外，又提出“内定 21 种人”名目，即内定一批“21 种人”，由工宣队和派出所内部掌握，当事人却被蒙在鼓里。

在燎原居民革委会《三查重点对象花名册》（1969 年 12 月）中，所有“重点对象”均按小组分类，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成份、出身、主要问题、性质（21 种人、内定 21 种人、工商业地主等）等栏。与之相关的，还有《档案号码及重点对象性质录》（1969 年 12 月 25 日）（原注：绝密）共 30 名，因资料有残缺，笔者只查到 21 名，列为下表：

编号	姓名	性	岁	文化	成份	出身	主要问题性质
1	许仲池	男	70	初识	出租	开屠	敌伪保长，内定 21 种人，补注：69 年元月 6 日病死
2	徐西林	男	28	初中	资产	学生	现反嫌疑对象
3	廖畅人	男	76	高小	中农	商贩	贪污分子，内定 21 种人
4	刘五林	男	45	初中	小资	兵痞	湘鄂边区少尉队员情报组织组长
5	刘菊英	女	43	初识	地主	地主	漏管地主分子
6	李淑元	女	61	初中	官僚	职员	21 种人（坚持反动立场）
7	钟审安	男	73	初中	出租	职员	福音堂工作 20 多年另有特务嫌疑，内定 21 种人
8	何光宪	女	50	初中	地主	家务	坚持反动立场在押反属， 21 种人
9	易正清	男	60	高中	地主	地主	漏管地主分子
10	董义泉	男	61	初识	商贩	兵痞	历史、社会关系复杂， 内定 21 种人
11	肖凤秀	女	73	文盲	小商	家务	一贯道坛主（1969 年 10 月 25 日病死）
12	邓顺珍	女	76	文盲	地主	地主	漏管地主分子
13	孙德运	男	73	文盲	小商	兵痞	历史复杂态度不好，内定 21 种人
14	朱元花	女	63	初识	资产	资产	资产阶级分子
15	童转珍	女	57	初识	地主	地主	漏划地主分子
16	汪兰桂	女	48	初识	地主	地主	漏划地主分子
17	胡建平	女	54	初小	未	家务	破坏毛主席形象，历史交待不清楚待查，内定 21 种人
18	刘玉珍	女	63	初小	中农	家务	现行反革命分子（贴反动标语）
19	曾湘凡	男	69	文盲	地主	地主	漏管地主分子
20	纪润湘	男	65	高中	地主	自由职业	地主兼工商业
21	李泽冬	男	68	初中	工商业地主	工商业	工商业兼地主

[53] 吉林省革委会政治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1972 年 9 月 20 日。

在上引 21 名“重点建档”人中，有敌伪保长、现反（现行反革命）嫌疑对象、贪污分子、情报组长、漏管（漏划）地主（6 人），地主兼工商业（2 人），神职人员，一贯道坛主，在押反属（反革命家属）、资产阶级分子、历史社会关系复杂者、现行反革命、“破坏毛主席形象”罪犯等。其中，被定为“21 种人”的 2 人，被“内定 21 种人”的 6 人。多数重点建档对象，是被枉栽“罪名”的无辜者。以下，以刘菊英、朱元花、许仲池、董义全 4 人为例，略作考察。

刘菊英，女，43 岁，地主成分，初识文化，一辈子家庭妇女，没参加过任何组织，也没有任何政历问题[54]，却被定为“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运动重点清查对象。据工宣队《关于刘菊英的问题综合意见》（1969 年 11 月 15 日），她的所谓“问题”主要有 3，第 1，第一个丈夫贺某曾在汉口伪公安局派出所任职，1952 年判刑 15 年。第 2，与贺某离婚后，在岳阳多次结婚，社会关系复杂。第 3，其父刘舟山在日伪时期死亡，职务和死因不明。但从内查外调结果看，刘菊英的情况其实并不复杂：其夫曾任汉口某伪派出所副所长 3 个月，是通过其兄担任汉口警察局长的关系；关键一点，其父刘舟山系因坚守民族气节，被日本兵残杀。刘菊英原籍华容县插旗公社向阳街吴立钧的证明是这样写的：“刘菊英娘家地主，父亲刘舟（州）山，读书人，被日本鬼捉到华容，要刘州[舟]山谈国家事情。刘州[舟]山不肯说。刘说：我淋[宁]做刀下鬼，不做忘[亡]国奴，由日本鬼子犬咬死在华容，母亲病死在插旗。胞兄刘迪民过去在插旗当过乡队副，改造回家。住在钱粮湖六分场劳动生产受管制。叔兄住在同福九队，刘墨香，贫农，种田；侄子五个，都在同福九队住，种田，都是贫农。”她叔兄刘墨香所写证明，也证实其父面对日本鬼子刺刀，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尽管如此，其父死后却一直戴着“地主”黑帽子，以致遗传其女，受到一辈子株连。虽然经过多次外调充分证明刘菊英的清白，在 1969 年 12 月该居民革委会“三查重点对象”表、“重点建档人员编号登记”表、“三清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中，她仍被作为“漏管地主分子”赫然在册。至迟到 1971 年，这位新时代的“祥林嫂”，仍在向清查组一遍又一遍交待家世，说明她仍旧未从“专政”的网罗中解脱出来[55]。

朱元花，有资料写为朱元喜，同样是家庭妇女。其夫王本祜（王本福），是普通商人，猪行学徒出身，后与二人合伙开猪行，日本飞机丢炸弹，“猪生意不能做了”，就“采了几包（棉）花”到益阳贩卖。1948 年到岳阳，与人合伙，仍然做猪生意，后开绸布业永新布店[56]，五十年代初因病去世。不想文革爆发后，死去十几年的王本祜，仍是朱元花的梦魇。

有关王本祜生前的财势，经过调查而被层层加码。有调查把他说成是“大老板”“资金很多”；有调查惟妙惟肖地描绘他当年的富商气派：“跑广州时，戴眼镜子，拿的卫生杆子，穿的绸缎、香云纱，戴的礼帽”；有调查检举说，1951 年从他家中挖出 4 两金子，还添油加醋地补充说：“把这 4 两到人民银行对换了，不知换了多少钱，大约几百元钱，是他本人得了”，并捕风捉影道：“河西听说有房屋一大栋，不知有多少间。”[57]类似捕风捉影的调查还有数份。

因为嫁给王本祜的关系，朱元花在文革初期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分子”。她不得不连续写了 4 份自传，交代自己的身世。工宣队则在多次外调基础上撰为《关于资产阶级份子朱元喜[花]情况综合》一文。文中说她娘家是“有名的地主”，丈夫是“有钱的大老板”，本人长期好逸恶劳，还罗列捕风捉影得来的各种传闻。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检举材料说：“解放后，朱元喜由于对我人民政府和我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竟在 1951 年借病发癫，而对朱河一个劣绅的老婆胡凯仙发泄内心地说‘共产党不

54 参见刘菊英《关于我出身在旧社会里娘、婆二家的详细经过》（1969 年 10 月 24 日）及《自传》（1971 年 4 月 3 日）。
55 同上。
56 《抄录岳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王姓工商业者案卷第 65 号》，抄录人黄亚力（钤“岳阳县革命委员会档案馆”章），1969 年 11 月 3 日。
57 1969 年 6 月 4 日调查，口述人载运秀，原批注：“情况属实，可作参考”（钤“岳阳县搬运社革命委员会”章）。

久了’，欲望我党垮台。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大老婆——朱元喜对我党是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她的监督和改造。”[58]正是有了此类无法印证的“罪证”，在 1969 年 12 月 20 日居民革委会《重点建档人员编号登记》表中，朱元喜[花]仍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在册。

许仲池[篪]，男 70 岁，其《履历表》载称：家庭成份：贫农；文化程度：文盲；籍贯：湖南省岳阳县麻塘公社磨家大队（后迁居吕仙亭居委会）。解放前“靠杀猪自己杀自己买[卖]维持生活（从 45 年开始，以前种租田）。家庭有十四人生活”；“日本人压迫抽千[签]当两次保长，共三十五天”[59]。许仲池出身贫寒，年轻时租地为生，后在岳阳开屠坊。他的问题，就是敌伪时期当过保长。但当保长纯属被强迫，因为百姓都不愿意当保长，敌伪政权强迫附近七村村民抽签选保长。许仲池不幸两次中签。第一次当了二十多天保长，第二次当了十五天保长。其原籍麻塘公社磨家大队革委会出具的证明信（1969 年 5 月 5 日）不仅证实了上述情况，还补充说：“该同志出生于我队，解放前受了不少压迫和剥削……没有干过半点坏事，至今群众都很满意。土改时，本应划为贫农，但进城开屠几年了，乡下有水田 4 斗（数字略），所以土改定为小土地出租成份。”原籍革委会的证明说得再清楚不过，许本人也一再就此问题澄清，但居委会工宣队仍不愿就此罢休。

经过反复深究，还真发现了新问题。11 月 10 日，岳阳搬运社职工陈某某检举说：“大汉奸苏省卿、许仲池叛国求荣，出卖民族利益”，曾给日本兵带路，攻打抗日武装，并说是自己 10 多岁时听母亲说的。在许仲池是否“大汉奸”、是否带领日本兵攻打抗日武装问题上，最有资格作证的当然是他原籍乡民，而非许多年后的同事，更何况陈某某还声称是幼时听母亲讲的，明显是不实之词。3 天后（11 月 14 日）许仲池原籍的三级社队组织（岳阳县麻塘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磨刀大队革命委员会、许家生产队）再次开具《关于许仲池的证实材料》，证明他出身贫寒与政治清白。

但热衷于制造“阶级敌人”以向上表功的工宣队却依旧固执己见，在《关于许仲池的问题综合意见》（1969 年 12 月 20 日）中，就许被检举为“大汉奸”问题这样写到：“这个问题我们找检举人介绍不出其它线索，也无另外证明人，而同案的苏省卿却早已死，无法查证。因此，日伪汉奸问题既无法结论，也无法否定。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许的成分不适小土地出租，但也不必重划了。而历史问题又无结论，因此，许应作为内部控制对象，继续发现线索和不断观察，纳为二十一种人的范[围]内。加强内部监视。”就这样，罔顾基本事实，只凭一纸传闻，就草率认定许的成份“不适小土地出租”，“作为内部控制对象”，纳为 21 种人。在同日《重点建档人员编号登记》表中又载：“许仲池，男，70，成份：出租；本身：开屠；主要问题性质：日伪保长；内定 21 种人。编入“档号 1”。半个月后（1970 年 1 月 6 日），许仲池病故，死因不详，不排除与长期政治压力与无休止的清查、恐吓有关。说到底，许仲池的全部“问题”，就是在敌伪政权强迫下当了“两届 35 天轮流保长”。却因此招致一辈子屈辱和打击，被“内定 21 种人”。对他而言，惟有一死才是解脱。

董义泉（全），男，61 岁，幼为孤儿，在家种田、放牛。1927 年参加家乡义勇队，当兵。1928 年，参加宁都起义，成为红军，受伤失散，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开小差逃回，在乡公所当乡丁。后做小生意。日本投降，在当地经商，直到土改。到 1969 年清队，有人检举他当过伪别动队副官和义勇队分队长。虽查证不实，居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仍认定其“历史非常复查”，列为“重点三查对象”，“21 种人”[60]。

[58] 燎原居民革委会工宣队：《关于资产阶级份子朱元喜[花]情况综合》1969 年 11 月 15 日。
[59] 许仲池：《居民履历表》（1969 年 5 月 20 日填表）。
[60] 燎原居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董桂兰外祖父董义全问题给广州军区医院的揭发信》1969 年 11 月 7 日；《董义全的历史交待》1970 年 2 月 1 日。

以上数人都是基层社会普通百姓，只是因为本人或家人在历史上有微不足道的“污点”，即被运动执行者无限夸大，随意编造罪状，并作为“清队”运动重点对象，反复审查，严格监管。他们的档案虽含有大量不实之词，却成为当权者决策的重要依据。反映在档案去向上，就是封面上所标注的：“所有档案在县军管会”“城南三查办取去”“城南派出所李炳甲取去”“县革委张亚雄取去”“先锋路居委会拿去共七份”“全部档案存在县看守所”“韩家河居委会工宣队许新保拿去共四分[份]”等语。

除了重点清查对象，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也难逃居委会积极分子警惕的双眼。据该居委会《三清人员情况数字统计表》（1969 年）披露：无证经商户数 1，人数 1；黑市运输户数 1，人数 1；窝赃户数 1，人数 1；投机倒把户数 5，人数 5；单干自发户数 7，人数 7；“反改造”户数 1，人数 1；“造户口反”户数 2，人数 2；盗窃户数 1，人数 1；高利贷户数 1，人数 1；政治嫌疑户数 5，人数 5。

以上，违法户数 20，违法人员 25。由此可知：

第一，文革运动的大扫荡，虽使各种违法现象明显减少，却远未绝迹；

第二，“单干自发”现象、投机倒把现象较为突出，应与文革时期社会经济空前凋敝，一些家庭深陷贫困，不得不铤而走险，违法经商的背景有关。

第三，“造户口反”，一般指“文革”初从乡村倒流回城的下放知青，他们在城市里既无工作，又无收入，于是沦为无业游民。

第四，列为“政治嫌疑”的有 5 户，定性尤为笼统，虽无确凿证据，并不妨碍居委会工宣队将其定为重点监督、打击对象。

3.3. “一打三反”运动与人员清查（1970—1972 年）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猖獗，法制受到践踏，专制主义肆虐无忌。处在社会基层的普通百姓，难逃其殃。1970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错误估计国际和国内形势：“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在全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活动，简称：“一打三反”。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据统计，1970 年 2—11 月短短 10 个月间，全国共抓捕“反革命分子”等 28.48 万名[61]。按照运动要求，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时，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杀、刑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城乡，直到基层。在湖南岳阳县，运动从 1970 年 3 月拔地而起，整肃重点亦为“现行反革命”，包括带有各种历史“原罪”的专政对象。运动中，全县受审对象 9079 人，原判死刑 15 人，无期徒刑 1 人，判刑 80 人，戴帽子 11 人，拘留在押 229 人[62]。具体到燎原居民革委会，受到清查、冲击的居民至少有 40 多人。燎原居民革委会编《复杂面人员花名册》（1970 年无月日），载有这些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出身	本人成份	性质（21 种人）	主要问题
1	何光宪	女	50	地主	学生	被关	丈夫杨少辅，参加“省无联”，68 年 3 月关在看守所
2	吕正清	男	60	地主		漏管地主	破产地主
3	董义全（泉）	男	61	商贩	兵痞	伪兵	历史、社（会关系）复杂
4	纪润湘	男	65	工地	自由职业	伪区党部	……（特务组织）

[61] 邵华泽主编：《中国国情总览》，页 249，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62]《岳阳县志》，页 336。

5	李泽冬	男	68	工地	工商业		破产地主
6	邓顺珍	女	76	地主		漏管地主	土改时划的
7	孙德运	男	73	小商	兵痞	伪兵	历史复杂、青帮、当兵
8	朱元花	女	63	资产		资产	分子
9	胡建平	女	54	未定	家务	被管	前夫伪营长，任二等兵
10	易友云	女	46	贫农	家务	反属	前夫叶口 1941 年参加过日伪保安队一等兵，现夫 67 年 4 月结婚，是暗藏反革命
11	彭金莲	女	51	贫民	家务		原来有作风（问题），买[卖]煤油，劳教过半年
12	柳腊珍	女	55	贫农	家务		原来有作风问题
13	付秀英	女	58	贫农			丈夫杨燕清定为汉奸
14	胡庆珍	女	48	贫民	家务		前夫已劳改，53 年离婚，二夫常光谦当过兵
15	盛素珍	女	48				是反属，现丈夫有问题
16	李三保	女	50	贫民	驾船		有一吨船，装 24 吨
17	孙淑风	女	52	地主	地主	地主	丈夫臧中鲁在人民法院被（数字不清）
18	侯梅英	女	54	工商业地主	地主		丈夫是工商业兼地主
19	刘天玉	女	59	贫民	家务	被关	丈夫张××判刑十年，强奸幼女
20	王桂英	女	66	贫民	家务	一贯道	自口一贯道，丈夫孙新本当伪兵 12 年
21	彭新民	女	66	贫民			当过妓女
22	彭仁寿	女	46	富农			前夫有问题，当过太太，现在日用厂
23	彭木英	女	58	小商贩	家务		前夫当过伪科长
24	徐庚午	女	39	贫民	家务		据说父亲很富裕
25	陈望珍	女	50	贫民	家务		前夫有点问题，二夫当一年另九个月（数字不清）
26	骆桂芝	女	47	贫民	家务		生活作风腐化，当过伪排官太太
27	潘祜英	女	62	贫民	家务		
28	曾湘凡	女	69	地主		地主分子	社会关系复杂，本人是个地主分子，于土改后迁来（数字不清）长期隐瞒身份，一直不交待，经我会工宣队认为不老实，作为地主分子戴上帽子
29	童转珍	女	57	地主		地主分子	夫恶霸地主，在 49 年外逃隐藏
30	纪冬桂	女	48	地主		地主分子	丈夫潘后威参加过清邦[帮]，有点历史问题
31	王培英	女					反属（数字不清），参加一贯道
32	林桂弟	女	55				劳教三年，58 年
33	高三元	女	45	贫民	家务		反属夫魁守义，有历史问题，1969 年已死
34	李正宜	男	58	贫民	种田		解放时在港务局被开除（数字不清）现在服务队请调查
35	刘信珍	男	53	贫农	家务		1963 年搞投机倒把，抄过，劳教几次，抄布票粮票茶叶等罚款 1500 元，上交 500 元款税 2 次
36	李长生	女	46	贫民	家务		丈夫胡光封在日本洋房（日伪）里搞过五年
37	曾绍珍	女					
38	袁成华	女	57	地主分子	家务		丈夫易口口是地主
39	舒纪文	女	56	未定	家务		舒家园花[花园]，房产主
40	姜长珍	女	58	贫民	家务		敌伪档案里面有一个善长珍，仍未落实
41	口二姑	女	63	未定	家务	道首	属开鸦片口（数字不清）
42	刘成甫	男	62	地主	地主		成份问题

笔者按：原表“单位”“政治面目”“现在职务”“揪出年月”等栏空白，为省繁文，与“籍贯”栏一并删略。其中，第 37 号未有说明。

《复杂面人员花名册》共载 42 人，“性质”一栏，全部定为“21 种人”，说明早在运动初期，已被列为运动重点。这一人群的突出特点：

第 1，家庭妇女多，共 34 人。其中绝大多数人生计一直依靠丈夫（成份“家务”即“家庭妇女”），于是，又导致第 2 个特点，即她们被列为“21 种人”，基本是受到丈夫（包括前夫、亡夫、二夫）的株连（第 1、8、9、10、13、14、15、17、18、19、20、22、23、25、26、29、30、31、33、36、38 号等，共 21 人）。

其中第 1 号何光宪情况比较特殊，50 岁，丈夫杨少辅，因参加“省无联”[63]，1968 年 3 月被关看守所。第 19 号刘天玉，59 岁，贫民，因丈夫的刑事犯罪关押 10 年而受株连。其他妇女则多是受到丈夫历史问题株连，如第 8 号朱元花，63 岁，其情况已见前述，“资产分子”（资本家），是根据其亡夫成份追加的。第 9 号胡建平，54 岁，家务（家庭妇女），因前夫曾任伪营长（本人当过二等兵），受管制；第 10 号易友云，46 岁，贫农，家务，“反属”，前夫 1941 年参加过日伪保安队一等兵，现夫 67 年 4 月结婚，是“暗藏反革命”；第 13 号付秀英，58 岁，贫农，丈夫杨燕清定为汉奸；第 14 号胡庆珍，48 岁，贫民，家务，前夫已劳改，二夫当过兵；第 15 号盛素珍，48 岁，“反属”，丈夫有问题；第 20 号，王桂英，66 岁，贫民，家务，一贯道徒，丈夫当伪兵 12 年；第 22 号彭仁寿，46 岁富农，“前夫有问题，当过太太”；第 23 号彭木英，58 岁，小商贩，家务，前夫当过伪科长；第 25 号，陈望珍，50 岁，贫民，家务，“前夫有点问题，二夫当一年另九个月（兵？）；第 26 号骆桂芝，47 岁，贫民，家务，“生活作风腐化，当过伪排官太太”。此外，第 29、30、38 号等号妇女，皆因丈夫成份或历史问题定为“地主”；第 31 号、33 号均为“反属”。

第 2，因本身成份或政历问题被列为清查对象的妇女较少（第 6、11、12、16、21、32、41 号）。如第 28 号曾湘凡，69 岁，工宣队认为她“长期隐瞒身份不老实”，遂由普通“地主”升格为“地主分子”，戴上帽子，实际是罪加一等。第 41 号口二姑，道首。

有的妇女是因为模棱两可的“作风问题”被定为“21 种人”，有的则是在旧社会当过“妓女”。最令人不堪的有 2 位，一位是 24 号徐庚午，时年 39 岁，往前倒推 20 年，土改前后也就 19 岁，“据说父亲很富裕”，就被打入另册；另一位是第 40 号姜长珍，58 岁，贫民，家务，因敌伪档案里面发现一叫“善长珍”的人，与她名同姓不同，因此成为清查重点。

第 3，被清查的男性，主要是本人有历史问题（第 3、4、7 号），如第 3、7 号都是因“伪兵”问题被列为“21 种人”。

如前所述，湖南岳阳等地对民国旧军人的打击面明显大于“公安六条”，即超越连长下限，扩大到“伪兵”即普通兵丁。仅此一项，就不知把多少普通百姓打为“21 种人”。第 35 号刘信珍，53 岁，贫农，家务（无正当职业），1963 年搞投机倒把，劳教几次，抄布票粮票茶叶等罚款 1500 元，上交 500 元款税 2 次，属比较严重的“投机倒把”犯。

第 4，被定为“21 种人”的 42 人中，不乏以往运动的“老运动员”。如 3 号董义全（泉）、8 号朱元花等皆是。

在燎原居民革委会，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到 1972 年底始近尾声。届时，对“21 种人”的审查揪斗，又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燎原居委会：《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审查揪斗对象花名册》（1972 年 12 月 14 日）

如下表：

[63]“省无联”是文革初期湖南省著名造反派组织，后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杂烩”，受到严厉镇压。

序号	姓名	性别年龄	文化	出身	成份	职业	审查形式	审查揪斗原因	落实处理情况	备注
1	袁成华	女 62	初识	地主	家务	家务	居民会学习班	成分问题		
2	汪兰桂	女 57	初识	工商业地主，未定	家务	家务	居民会学习班	历史问题		
3	胡秀英	女 49	文盲	未定	家务	家务	居民会学习班		随下	
4	口淑娟	女 50	文盲	未定	家务	家务		同丈夫姚口初口口搬家		
5	聂口口	女 55	初识	未定				同丈夫马复生泥木工队下青岗公社		
6	胡正旭	女 55	初识					（数字不清）下龙湾公社		
7	李凤英	女 61	初识	地主	地主	家务		居民会遣送在湖北汨罗，丈夫易荣口		
8	韩以保	女 53	初识	地主	家务	家务	居民会学习班	成份问题		
9	侯梅英	女 53	文盲	资产	家务	家务	居民会学习班	成份问题		
10	董义全	男 66	初识	未定	家务	家务	南区揪斗	历史问题		
11	曾湘凡	女 58	文盲	破产地主	家务	家务	居民会学习班	成份问题		
12	胡金英	女 56	文盲						在先锋路会居住	
13	邓顺珍	女 75	文盲	地主	家务	家务	居民会学习班	成份问题		
14	孙德运	男 76	初识	未定	小高	家务	群众揪斗，居民学习班	历史问题		
15	彭新民	女 62								
16	童转珍	女 66	初识	漏划	家务	家务	居民学习班	成份问题		
17	徐佩兰	女 71	文盲	官僚地主	家务	种田	居民学习班	成份问题	一个人遣送在郭政公社	
18	徐西林	男 33	高中	资产阶级	学生	工人	南区揪斗	写反标（侮辱毛主席像）		
19	柴云英	女 59	文盲	贫农	种田	家务	居民学习班	叛徒		注 1
20	刘玉珍	女 66	初识	未定	家务	家务	县军管会派出所审查	张贴反标案		
21	李淑元	女 64		地主	学生	家务	外调深挖，居民学习班	解放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		注 2
22	黎田英	女 59	文盲	地主	家务	家务	居民学习班		仓库家属随爱人遣送下去	
23	钟审安	男 73	初识	小土地出租	种田	家务	居民学习班	参加伪教会二十多年，特嫌		

24	余春仁	女 59	文盲	地主	家务	家务				
25	李菊华	女 58	初识	资产	家务	家务	群众揪斗学习班	历史问题		注 1
26	李泽东	男 74	初中	破产地主	小商	家务	居民学习班	成份问题		
27	易正清	男 63	高中	破产地主	学生	做炉工	居民学习班	成份问题		注 1
28	李菊华	女 64	高中	破产地主	学生	家务	居民揪斗	成份问题		

注 1：姓名前注“先搞”

注 2：另纸记载：“其夫杨谷仁，伪军官，解放后不堪改造并变本加利[厉]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因此 50 年被镇压

笔者按：全表共列 28 人，其中有关徐西林至易正清 9 人的表格为 2 页，内容基本重复，本表择要摘录。据上表，燎原居委会 1972 年底的统计:审查形式：办学习班 18 人；群众揪斗 4 人；县军管会、派出所审查 1 人。

审查揪斗原因：成份问题 15 人，历史问题 4 人，写反标侮辱毛主席像 1 人，叛徒 1 人，张贴反标（反动标语）案 1 人，解放期间组织反革命集团 1 人，参加伪教会二十多年特嫌 1 人。

落实处理情况：遣送回乡 7 人（一般跟随丈夫）。徐西林，男 33 岁，高中，出身资产阶级，成份学生，职业搬运工，审查形式：南区揪斗，审查揪斗原因：“侮辱毛主席像”。柴文英，女 59 岁，文盲，职业家务（实际无业），审查揪斗原因：“叛徒”。刘转珍，女 65 岁，文盲，职业家务，审查揪斗原因：“犯严重政治错误”。李安华等 3 人，均因“成份问题”定为“审查揪斗对象”[64]。

借一斑可窥全豹，仅就燎原居民革委会这一具体事例而言，“一打三反”运动持续 2 年之久，不仅揪出“侮辱毛主席像”“张贴反标”的“现行反革命”，还再次清理历次运动中挖出的重点对象。随着运动深入，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现象愈演愈烈。沦为“专政”对象的人愈多，罪名也愈荒谬。[65]

4. 结语

燎原居民革委会只是城市基层社会众多同类组织之一，通过对它的考察，有助于明了如下事实：

（一）文革权力机构对全社会的控制，从上到下，一直深入到社会最基层。这种控制之所以有效，离不开居民革委会的运作。正是在居民革委会体制有效运转下，专制权力对城镇基层社会的控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全面干预，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居民革委会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前沿阵地。

（二）燎原居民革委会虽是城市基层社会一个普通个案，却足以彰显文革浩劫给千百万普通民众造成的严重伤害。伤害有肉体的，更有精神的，多少蛮横暴力，假“革命”的之名以行。同时说明，文革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及其走卒亲手铸成，不少普通民众，包括家庭妇女，在极左势力肆虐横行时代，同样起过助纣为虐的作用。

（三）居民革委会的家庭妇女们，少有文化甚至是文盲，却不乏参与“革命”的热情。除了协助基层权力机构（街道革委会、派出所）履行各项行政管理职能，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则用于层出不穷

[64] 燎原居委会:《清队“一打三反”运动被审查揪斗对象花名册》1972 年 12 月 14 日。

[65]《岳阳县志》载：1970 年 3 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中受审查的对象 9079 人，原定死刑 15 人，无期徒刑 1 人，判刑 80 人，戴帽子 11 人，拘留在押 229 人。以上这些在文革后落实政策时，都未成事实，后来一律推倒，予以平反（页 336）。这就是说，所有案件都是冤假错案。相对于此，燎原居民革委会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的政治活动：宣传政治理论，组织“一打三反”，监管黑五类，落实“无产阶级专政”，清查“21 种人”，组织批斗会，遣送居民落户农村，动员知识青年下乡，阻止下乡人员倒流回城，举办名目繁多的学习班，搜集阶级斗争新动向，举报揭发可疑的人和事……其劣迹触犯众多普通居民的权益，也因此获得“小脚侦缉队”的贬称。

（四）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政治运动前后相踵。历次运动都讲究“孤立、打击一小撮”的策略，殊不知一次次政治风暴无情荡涤之下，受过打击的人口就不再是那个策略性的 5%，而是 10%，20%……难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 1980 年会见外宾时会估计说，有 1 亿人——约占城市人口的一半，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在职人员——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66]。一人落难，势必株连妻儿老小，累及亲朋故旧，身世清白者自然越来越少。文革时期千百万城镇居民所经历的磨难，不应随着这场浩劫的远去而被遗忘。

[66] ［美］费正清等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页 22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专稿】

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母题

——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

司 绛

内容提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艺有六大母题：歌颂与效忠、革命与斗争、英雄与模范、新旧对比、进步与落后、爱情与亲情。本文探讨了这六大母题的在十七年中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的特点与互相关系。并进而指出文革时期对这六大母题的继承与改造。文章认为，这些母题中既有党性，也有普世性。

关键词： 毛泽东时代、文艺、母题、普世性、党性

1. 问题的提出

在对文革的反思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国人之所以投入文革，是因为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校教育、文艺作品给他们灌输了仇恨、暴力和伪历史等等。人们称这种教育为“红色教育”，这些作品为“红色文艺”，把这种灌输称之为喝“狼奶”——“狼奶”激发了人性之恶。

尽管这一结论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是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仍旧活跃。很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旧怀念红歌、老电影，多部红色经典被搬上屏幕，改编成电视剧。江青扶持的“样板戏”还进入了课堂。

这些现象把一连串“为什么”摆在我们面前：

为什么，毛时代的人们对“红色文艺”毫无知觉？

为什么，后毛时代的人们对“红色文艺”念念不忘？

为什么，被视为“狼奶”的代表作——江青抓的“样板戏”文革中在港台、欧美也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本文试图通过对文艺母题的探讨来回答上述问题，我的分析分成四步。一，找出毛时代的文艺母题；二，分析它们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三，看看这些母题在文革时期有哪些变化；四，将这些母题中包含的主要思想成分——普世价值（普世性）[1]和政党价值（党性）[2] 分离出来。也就是告诉人们，在“红色文艺”中哪些是“狼奶”，哪些是“人奶”，什么是“新的国民性”。[3] 通过上面的四步，我得出以下的结论：“红色文艺”之所以在毛时代受欢迎，在后毛时代被传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普世性的存在。

2. 十七年文艺的六大母题

母题是来自民间文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4]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母题进入不同的艺术研究领域。

---

1 百度百科：普世价值“就是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它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尺度，或者说是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

2 百度百科：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性和特性。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

3 “新的国民性”是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一书中提出来的，见此书上册，页 15，台湾：联经，2012。

4 汤普森(*Thompson*，*S*)：《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页 499，上海：上海文艺，1991。

戏曲史学者给母题下的定义——母题是“稳定承传，具有共同属性及特点的最小的情节单元或单一的叙事单位”[5] 这一定义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

文艺母题是意识形态的投射，是集体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反映，也是建构作品的文化形态和思想主题的基本元素。本文将毛时代的文艺母题概括为“歌颂与效忠”“革命与斗争”“英雄与模范”“新旧对比”“进步与落后”和“爱情与亲情”六类。文革文艺承袭了这六个母题，但根据需要，对其内涵做了增加、剔除、置换和强化。下面依次述之。

2.1. 歌颂与效忠

歌颂指的是为共产党/毛泽东歌功颂德，效忠指的是忠于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他们所信奉的理论、主义和制度。颂扬、赞美、感激党和毛，向其输诚尽忠，是毛时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文艺上，这一母题经常以爱的形式呈现。而爱党就意味着爱国。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宣传爱国主义，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有着特定的含义——爱国首先要爱党，只有爱党才算爱国。党与国的等级化，使国成了党的附属品。同时，爱党也意味着爱民。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承诺为人民谋幸福。中国的为人民服务有着强烈的政治指向性——爱民首先要爱党，只有爱党才能爱民。因为只有共产党才“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共产党是不但是“为人民”的垄断者，而且，所有的为人民，都是党教育的结果。

十七年的小说，如长篇小说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没有一部不是告诉人们，只有跟着党和毛，才有光明前途。十七年的诗歌中，颂歌是重要一支，其主要功能就是歌颂党/毛，歌颂党的主义以及走向上了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十七年的散文三大家之中至少有两家（杨朔、刘白羽）以歌颂党之伟大、毛之英明，祖国之可爱为能事。十七年的话剧，从金山的《红色风暴》到胡可的《战斗里成长》，从老舍的《龙须沟》到曹禺《明朗的天》，都围绕着这个母题做文章。可以说，运用语言、造型、歌舞表演及戏剧电影，或直或隐地歌颂党和毛的伟大英明正确，表达对他们的热爱与忠诚，是毛时代文艺的基本职能。

2.2. 革命与斗争

“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观念，它“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还成为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源，甚至被赋予了道德和终极怀的意义。”[6] 就价值而言，革命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科学、艺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7] 就范围而言，革命占领了所有领域。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人生还是社会，过去还是现在，都在革命的掌握之中。就手段而言，革命不但是“用群众性的暴力活动来破坏、打倒、推翻、摧毁现存的事物（包括人和物）、制度、秩序、程式等”[8] 还包括对人与社会的无休止的改造。毛时代的所有文艺都是革命的承载者。

斗争与革命是双胞胎，用毛泽东的话讲“工作就是斗争”。（见毛《关于重庆谈判》原话是：“什么叫工作，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它在毛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阶级斗争，二是生产斗争，三是思想斗争。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革命历史与战争题材中，生产斗争和思想斗争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题材里。在这三种斗争中，思想斗争最复杂多样，因此也就成为文艺作品最难以把握的内容。

革命和斗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包括辩证唯物、共产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阶级理论等意识形态基本内容的“母题群”。这一“母题群”的主要功能，就是告诉人们“溥天之下，莫

[5] 王政：《中国古典戏曲母题史》页 1，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15。
[6]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页 365，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与演变》，页 2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8] 李泽厚：《告别革命——回望 20 世纪中国》页 313，香港：天地图书，1997。

非革命；率土之滨，唯有斗争。”就是圣化理想，鼓吹暴力，渲染仇恨，制造社会等级。

这一“母题群”不但散布在各种艺术作品之中，而且连古人古事也受到了它们的洗礼——古代的农民起义成为20世纪现代革命的“历史资源”。长篇小说《李自成》“与直接表现现代革命运动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9]电影《宋景诗》隐去这个黑旗军领袖投降清廷，镇压战友的史实。鲁班成了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的传说》。关汉卿成了以杂剧为武器，反对贪官污吏，救助下层人民的战斗者。武训行乞兴学则成了“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10]

2.3. 英雄与模范

所有的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模范，主持正义、扶弱济困、不畏强暴、机智勇敢、公而忘私等优秀品质为古今中外的英雄模范所共有。不同的是，毛时代的英雄是实践革命英雄主义的英雄，毛时代的模范是奉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革命英雄主义“同一切旧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英雄主义根本对立”。因为它相信人民创造历史，所以把自己看作是群众中的一员。“在革命斗争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己为公，敢于为真理而冲锋陷阵。”[11] 共产主义道德据说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高形态。它没有剥削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它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放在第一位；对本阶级的人互爱互助，责己严，待人宽，相互尊重，彼此谅解等等。[12] 这里的英雄模范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忠于领袖忠于阶级，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三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从塑造人物上讲，毛时代的文艺是战斗英雄的集锦，是生产模范的荟萃。战斗英雄集中在革命战争题材之中，生产模范集中在工农业题材里。李季向石油工人献歌，阮章竞向钢铁工人致敬，张志民为农民劳模叫好。新民歌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赞美革命英雄主义。十七年的散文的重点就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

2.4. 新旧对比

新，指的是新社会、新生活、新思想、新风尚；旧，指的是旧社会、旧生活、旧思想、旧习俗。在十七年的语境中，这个“新”代表着幸福的生活，进步的思想，人人平等的，文明健康的新中国；“旧”代表着悲惨的生活，封建的思想，人压迫人的肮脏堕落的旧社会。毛时代的文艺，凡是涉及到新旧的，一定要斥旧颂新。

与新旧对比同一性质的是忆苦思甜，忆苦思甜源远流长。从解放区到新时期无不沿袭着这个传统。忆苦是为了思甜。思，就是对比。忆与思是“政治规训”，和“动员工具”，都是让国人在翻身的同时翻心——获得精神的解放。[13]

新旧对比与忆苦思甜同中有异，第一，功能不同。新旧对比可以结构作品，可以将新旧分成不同的比例来支撑整个叙事。第二，容量不同。新旧对比涵盖深广，不但可以反映新生活，还可以讲述新思想新面貌新风尚。忆苦思甜大多偏重物质生活的比较。可以说，新旧对比是大型的忆苦思甜，忆苦思甜是“迷你型”的新旧对比。

功能、容量的不同决定了这一母题组在文艺作品（主要是叙事作品）中不同的呈现方式。忆苦思甜散布在情节之中：战斗前夕，指导员动员战士们诉苦，讲述一家人如何受苦受难成为动员令；合作化时，支书们告诉农民旧社会单干的坏处，宣传集体化的好处；工厂的积极分子讲述四九年之前，怎么受资本家剥削，现在做了主人，多么扬眉吐气。老奶奶老大爷的光荣使命，就是给少先队员忆苦思

---

9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页121，北京：北大出版社，1999。
10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5月20日。
11 百度百科：革命英雄主义。
12 百度百科：共产主义道德。
13 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甜，激发他们忠君爱党之心。总之，忆苦思甜灵活多样，适应性强，经常以回忆、倒叙、对话等方式出没在各种题材之中。

新旧对比形体庞大，结构性强，适应性差，容易在两种类型的题材中栖身，一种是“展示赞美型”，一种是“揭露控诉型”。前者赞美新生活新风貌，后者揭示控诉旧社会的黑暗腐朽。

2.5. 进步与落后

在观念史中，“进步多指适合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14] 也就是说，与进步相对的落后，就是“多指不适合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阻隔作用。”问题是，“适合时代要求”的未必能“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不适合时代要求”，“未必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因此，这里的进步与落后是有时效性的。也就是说，在毛时代的进步，在后毛时代可能就是落后。在毛时代的落后，在后毛时代可能就成了进步。

作为现实题材中的一个重要母题，“进步”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的事物，如，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破除保守观念，勇于创新等等；而落后则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否定的事物，如：个人主义、骄傲自满、贪图虚荣、好逸恶劳、本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包括移情别恋在内的道德问题等等。

在进步与落后这一母题之下，有一条长长的“母题链”，讲述进步/落后的故事，离不开思想改造。改造大多落实到“兴无灭资”上。“兴无灭资”的办法有很多，革命传统教育是重点。这种教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五十年代这类影片，侧重于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爱情婚姻方面）教育；六十年代初，侧重于到艰苦的环境中，接受工农兵的教育；1963 年后，侧重于进行阶级斗争、革命气节、革命英雄主义、艰苦奋斗等为内容的教育。而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则构成革命传统教育的核心，且针对全体民众。”[15]

这些的作品的主要功能就是表彰进步，批评落后，让进步帮助落后，最后大家一起进步。可以说，这些文艺作品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的形象体现。

“适合时代要求”其实就是适合政治要求。因此，顺应政治的就是进步，反之则是落后。而政治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进步/落后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是“时代要求”。把土地收归集体，农民入社，以至农业学大寨，也是“时代要求”。十七年文艺史上很多被批判的思潮和作品，在当时都被认为落后，而事实则证明，落后的恰恰是进步的。十七年电影史上的三波“非主流”，拍摄前都被认为是“适应时代要求”的，而在公映之后，都受到批判。原来进步的，成了“宣传改良主义”“污蔑农民起义”“暴露黑暗”“抹杀党的领导”“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1962 年重提阶级斗争之后，影片中的进步/落后就与阶级斗争发生了关系。进步的，是阶级界限清，斗争性强，觉悟高，落后的是上了阶级 阵线模糊，觉悟不高，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而从结果上看，大部分被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行为和人物，都站到了社会发展的反面。

2.6. 爱情与亲情

生与死，爱与恨，人伦情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与“歌颂与效忠”一样，在十七年的文艺中，爱情/亲情是无处不在的母题。二者之不同，在于“歌颂与效忠”是主流意识形态从外部加给文艺的，而爱情/亲情则是文艺中固有的。换句话说，如果一部文艺作品里没有“歌颂与效忠”，观众不会减少；而如果没有爱情与亲情，观众则会减少。

人性之中包括阶级性。各阶级既然能共存于同一个社会，就一定存在着共同的伦理，共同的情感。优待俘虏为不同阶级的军队所遵守，说明敌国之间，也有共通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否认普遍抽象的人性，认为在阶级社会

[14] 金观涛、刘青峰，页 596。
[15]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页 447，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

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进而认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并且把提倡这种爱的，都说成是欺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时代文艺中的爱情/亲情，无不打上政治的烙印。“亲不亲，阶级分”。因此，白毛女就不能给黄世仁当小老婆。莫家湾的地主小寡妇巧凤就不能暗恋游击队员罗文川，伪甲长就不会暗中给游击队通风报信。(《五更寒》) 否则就阶级阵线不清。而资本家张伯韩就不能为民族工业呕心沥血，更不会痛痛快快地接受公私合营（《不夜城》），否则就是美化资本家。

在政治的束缚下，文艺中的爱情/亲情难以顺乎人性地发展，“表现爱情的目的，归根到底，还在于写革命，写劳动，大多仅为着说明一个道理：只有同革命、劳动相结合的爱情才是幸福的，才是有意义的。”[16]日益膨胀的激进主义则把它们视为异端，1957 年的“拔白旗”运动不但清洗了讽刺文艺，而且把影片中的爱情/亲情统统打成资产阶级和小资思想感情而大批特批。1963 年批判“毒草”影片，爱情/亲情人道更成为靶子。致使爱情/亲情逐渐萎缩，以至成了银幕禁忌。可以说，在毛时代的文艺母题之中，爱情/亲情是争议最大，磨难最多，而生命力又最强的一个母题。

3. 母题的特点及互相关系

上述六大母题是一个家族。它们之间虽亲疏有别，远近有异，但彼此依靠，相互支持，共存共荣。第一母题“歌颂与效忠”是纲，其它都是目，纲举目张。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歌颂与效忠”是“革命与斗争”的统帅，是“英雄与模范”的导师，是“新旧对比”和“忆苦思甜”的理由和根据。是它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提升到“精神原子弹”的高度；是它制订了不断变化的“进步与落后”的标准；是它将爱情放到政治的炉火中烧烤，是它把亲情放到阶级分析的试管中鉴定。总之，在六大母题中，它是威力无比的“巨无霸”，除了历史、神话和外国题材，所有影片都以它为叙事前提和思想背景。可以说，“歌颂与效忠”是母题中的母题。

第二母题“革命与斗争”是题材中的“大哥大”——所有的革命历史/战争题材都要高举这面旗帜，所有的社会主义建设题材，无论是写农业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还是写工业的草明、周立波、艾芜都成了它的粉丝。自 1962 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这一母题中的主要成分——阶级斗争在现实题材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革命与斗争”在空间上胜过了“歌颂与效忠”，可在时间上却远不是“歌颂与效忠”的对手。换言之，“革命与斗争”的势力范围较“歌颂与效忠”广大，而后者的生命力却比前者顽强长久——“后毛时代”可以告别革命，窄化斗争，但并不妨碍“歌颂与效忠”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相比之下，“革命与斗争”只能在三大战役、抗战神剧等主旋律作品之中存身。在主旋律之外的地方，无论是网络小说，新生代的电影，还是舞台上的历史，都只剩下了爱恨情仇，再也找不到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历史唯物史观的踪迹。

话说回来，尽管排行老二，别的母题对“革命与斗争”还是毕恭毕敬——“歌颂与效忠”要靠它落实，“新旧对比”要靠它实现，“英雄与模范”“爱情与亲情”常常要接受“革命”的考验，“斗争”的洗礼。如果说，“革命与斗争”是母题中的指导员，那么“新旧对比”就是母题中的班长。它与诸母题也有或紧或松，或显或隐的联系——旧，离不开阶级压迫；新，离不开翻身得解放。因此，控诉旧社会之黑暗，歌颂新社会之光明就成了这个母题的宗旨。控诉、歌颂一定要伴随着感恩戴德。因此，“新旧对比”又会与第一个母题并肩携手。而歌颂新生活，感谢党和毛的后面，又免不了赞美英雄——正是由于他们流血牺牲才结束了旧，迎来了新；正是党和毛的培养，才扫荡了旧思想和旧文化；涌现出那么多闪耀着共产主义道德光辉的模范。

[16] 孟犁野，页 498-499。

在毛时代，“英雄与模范”的塑造始终是文艺的最高任务。跻身英模有几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首先，他/她一定是党培养出来的，因此，为抗日捐躯的国军官兵，以实业救国的商界精英，献身学术的知识分子，致力乡村建设的志士仁人，肯定不在此列。其次，他/她一定是成分佳，出身好，政审合格。所以，文艺作品中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即使不是苦大仇深，也是根正苗红。最后，英雄与模范必须完美无瑕，雷锋箱子里的手表一定不能拿出来；陈毅说的逃跑叛变绝不允许在《南征北战》里出现；根据这个逻辑，关连长即使为救孩子牺牲，也不能说粗话。打了胜仗，也不能像石东根那样骑在马上撒酒疯……

“进步与落后”足以与“革命与斗争”相抗衡。十七年的文艺，除了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对之外，其余的地盘几乎都是它的天下。它，跟在“革命与斗争”的队伍后面，打着“人民内部”的旗号，招募一切阶级斗争之外的人们。以表彰先进，批评落后为职志。进步者一定是“歌颂与效忠”的典范，在劝说落后者时，一定要忆苦思甜，对比新旧社会。而爱情也一定会眷顾进步者。

比较而言，第六母题“爱情与亲情”与“革命与斗争”的关系最密切。十七年的文艺，除了古代题材之外，所有的现实题材的爱情与亲情，都要以这一母题为背景.换言之，这些人伦情感必须建立在革命与斗争的基础上。即使《我们夫妇之间》《红豆》《在悬崖上》等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小资阶级的作品，也仍旧离不开革命。显而易见，英雄、模范更有资格获得爱情，自由恋爱与封建婚姻是新旧对比的好材料——白族青年阿鹏是炼钢能手，他的金花则是当了副社长的劳动模范。达吉的汉族生父解放前是穷石匠，解放后成了工程师；达吉的彝族养父解放前是奴隶主的娃子，解放后是尼古拉达人民公社的社长——小说、电影中的爱情与亲情必须政治正确，立场分明，进步向上。换言之，必须与其它母题的倾向性保持一致。

根据题材和人物的要求，这六大母题有一个大致的分工。一般说来，革命与斗争会包含前四个母题，英雄模范的事迹会成为主要的叙事，“歌颂与效忠”的领导会成为背景，“新旧对比”会出面结构作品，忆苦思甜会作为情节、桥段穿插其间。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现实题材讲述的多是“进步与落后”的故事，党培养出来的英模或新人常是这类片子的主角。同时，合乎政治要求的爱情与亲情也会出没其中。

上述母题在文艺中的比重和含量，是一个动态系统。它们会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当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时，“进步与落后”“爱情与亲情”“英雄与模范”（主要是模范）等母题就会突显。阶级斗争就只能在“反特小说”“反攻电影”里出没。当工作重点转向了意识形态，尤其是转到阶级斗争上面时，文艺中的“革命与斗争”“新旧对比”的气息就会更加浓烈。

4. 文革对母题的继承与改造

文革文艺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上述母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造，具体的方式有四种：增加、剔除、置换和强化。

4.1. 增 加

文艺为政治服务，文革时的最大政治，就是颂扬文革。这种颂扬兵分两路，一路是重新解释历史，按照文革的理念和逻辑，1949 年以前的中共党史被改写，1949 年以后的中共建政史被重编。另一路是高度颂扬现实。文革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样板戏、红卫兵、上山下乡、造反夺权、革命大联合，老中青三结合、工宣队、五七道路、教育革命、赤脚医生等等成为文艺创作的热门。

历史与现实交织汇聚于各种文艺作品中，戏剧有了革命样板戏，小说有了《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第一课》以及被改编成电影的《征途》；诗歌有了《西沙之战》《理想之歌》以及红卫兵的激情创作；电影有了《艳阳天》《金光大道》《山花》《海上明珠》《春苗》《红雨》与《雁鸣湖畔》。

这支颂扬文革的队伍的主力，是那些赞美文革新生事物的作品，它们将这一新鲜出炉的母题，与

“歌颂与效忠”“新旧对比”“英雄与模范”等传统母题紧密结合。编造出了各种并不感人的故事：知识青年感谢恩人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歌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山村新人》《寄托》）；赤脚医生感谢恩人把医药卫生送到了农村，歌颂“合作医疗”（《春苗》《红雨》与《雁鸣湖畔》）；革命师生感谢恩人带来的教育革命，歌颂工农兵占领学校的壮举（《决裂》《小将》）；工宣队员们手捧着御赐的芒果仿制品，歌颂领袖对工人阶级的信任（《芒果之歌》）……。

江青揪住《园丁之歌》不放，说它“贩卖智育第一”，“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等，文化部迎合江青之意，为《创业》开出十条罪状，说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江青封杀《海霞》，说它“背离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其实都是如何对待文革。毛泽批评百花齐放没有了，嫌样板戏、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太少。指示调整文艺政策，固然是针对江青等激进文艺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允许文艺家们可以自由地评价文革。

4.2. 剔 除

剔除“爱情与亲情”。在十七年中，“爱情与亲情”虽然因为政治的挤压而变得谨小慎微，但男女爱情，人伦亲情总还是在“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掩护下，出没在各种艺术作品之中。文革文艺以样板戏中的“三无”（无家庭，无丈夫，无后代），“两去”（去性别，去欲望）为榜样，在把男女主角捧成“高大全”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扼杀了他们为人父人母人夫人妻人子的欲望。

但是，这种剔除并不彻底，表面的爱情与亲情可以剔除，深层的，结构性的无法肃清——《红灯记》的基本结构就是建立在祖孙三代相依为命的情义之上的。

4.3. 置 换

置换是存其表，而变其里。明显的置换是“新旧对比”。文革的“破旧立新”赋予了“新旧”双重含义。“新”既指新社会，又指文革时代。“旧”，既指旧社会，又指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十七年。如此一来，“忆苦思甜”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现如今，在忆旧社会的苦的时候，还要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之苦挂在嘴边，在思新社会的甜的时候，更要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甜。

文革时的文艺家们迅速地将这一新型的“新旧对比”用到了创作之中。青年教师杨大庆上了大学，就不认农村的养母，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责任。工宣队的教育使他重新加到了养母身边，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芒果之歌》）。公社卫生院的杜院长和钱医生一想为县领导服务，致使小妹病亡，是刘少奇反革命医疗路线造成的恶果，田春苗等贫下中农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大权，是毛革命路线的功劳（《春苗》）……。

这种置换也发生在“进步与落后”身上。文革中，所要改造的“落后”，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不像十七年那样，是从自己的脑袋里产生的，而是来自于阶级敌人，是受了阶级敌人的诱骗。原来的进步/先进和落后/保守获得了新的意义，曾几何时，向苏联学习是进步，是先进；反之是落后，是保守。这时候，反修防修成了进步/先进，借鉴外国技术成了落后保守。原来的进步/落后，先进/保守与阶级斗争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不行了，文艺中的进步者一定是站在了阶级斗争的最前列，是对敌斗争最坚决的人。落后者要么是阶级敌人，要么是受了阶级敌人的蛊惑。

4.4. 强 化

强化主要发生在“歌颂与效忠”“革命与斗争”和“英雄与模范”方面。与“造神运动”相匹配，文革文艺把对毛和党的感戴和歌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被强化的，还有“革命与斗争”。在题材革命化的同时，风格类型也被革命化。工业片学大庆，农村片学大寨，与天地斗。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要“与人斗”，继《收租院》之后的大型泥塑《农奴愤》在刻划农奴的苦难和斗争时，“明确了压迫愈深，反

抗愈烈，苦与斗相辅相成，斗是主导思想。”[17]阶级斗争不但充斥了红色历史，而且主宰了向阳院的孩子、卫生院的药箱、学校的课堂。

在所有被强化的母题中，“英雄与模范”是最有后台，最有理论，最有样板可循的。文革伊始，郭沫若就给江青献上了这样的颂歌：“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8] 而于会泳总结出来的“三突出”又使这一母题有了理论的支持。样板戏为英模的塑造提供了可模仿的榜样。浩然、张永枚、谢铁骊等人的创造性劳动，为这一母题在文坛和银幕上的繁衍提供了可能。

在文革后期的文艺实践中，“英雄与模范”向一条更大众化的方向迈进——英模毕竟是少数，将经过文革洗礼的红卫兵、造反派塑造成“新人”，对“颂扬文革”更有功效，也更有现实意义。传统的“英雄与模范”提升为将革命至上、斗争哲学和道德主义兼于一身的造反“新人”。至上的革命就要配以至难的斗争。“新人”的斗争对象常常是他们的亲人兼顶头上司——高山花与她的养父兼白石滩的大队长斗；凌燕子与大队党支书兼其公公斗，周小双挑战的夏彩云，既是她的母亲，又是工宣队队长（《芒果之歌》）……。这种人物关系设计提升了“好斗”的难度，也由此塑造出一大批前所未有的文革闯将。

闯将斗争的重要武器，就是“高调道德专政”——在“新人”看来，组织社员外出打工，既为社员挣些零花钱，又为队里攒些公积金，这种一举两得，公私两利的好事，破坏了集体经济，引诱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绝对不能允许（《山花》）。用生产队的土特产跟工厂换台发电机，建立发电站，装配机帆船，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腐蚀国家干部，同样在杜绝禁止之列（《山村新人》《海上明珠》）。队里遭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公社送来救济粮款，坚决退回，以示学大寨之决心（《山花》）……。

5. 母题中的党性与普世性

上述母题中，包含着普世性和党性这两种观念。也就是说，在同一母题之中既包含着“人奶”，也包含着“狼奶”。它们混合杂糅，难分难解，不易辨别。下面，让我试做分析。

5.1. 歌颂与效忠

在六大母题之中，“歌颂与效忠”之中的“狼奶”成份最高，影响也最大最深远。它美化、神化了共产党和毛泽东，使之以救世主自居，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命。它奴化、愚化了民众，使之安于“螺丝钉”、被拯救者。以为普天之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才是大救星。党毛一体养育了一个高度极权、不受监督的体制，建构了个人崇拜，一党迷信的温床，成为一场又一场祸国殃民的运动的培养基。

十七年文艺的功能之一，就是将这种美化和神化从空洞的口号和抽象的说教，变成与民族利益、国家前途和人民福址相关的故事。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告诉人们，只有推翻旧政权，国家民族才有出路，而只有在党和毛的领导下才能做到这一点。现实题材告诉人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来幸福生活，而只有跟着党和毛走，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通过这样的逻辑编码，“歌颂与效忠”就被赋予了正义性与合理性——因为党和它的领袖，是为国为民的，所以我们应该热爱党，忠于党的领袖。

更能蛊惑人心的是人物形象。十七年的文艺主要塑造了正反两类人物，正面人物是真善美的化身，反面人物是假恶丑的代表。当那些真善美的好人为党的事业前仆后继，英雄牺牲的时候，人们对其精神、道德的敬佩，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对其献身的主义、政党、领袖的认同。同理，当那些假恶丑的坏蛋迫害好人的时候，人们对其行径的厌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相反的方向逆转。

[17] 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页 174，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18] 这是 1966 年 6 月 6 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郭沫若即兴创作的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中的诗句。

举个例子，当观戏的战士们举起枪，要打死台上的黄世仁时，他们心中反压迫的正义感，就已经同对共产党的拥戴融为一体。当观众们拭巾擦泪，为走上刑场的江姐难过的时候，他们对这位伟大女性的敬仰之心，就会与革命志士对党和毛的感情汇成一处。

更何况，中国有上千年的封建皇权传统，颂圣献忠已经成了国民性，成了集体无意识。百余年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尝列强欺侮之苦，中共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国家，满足了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歌而颂之，情之所至。在传统文化心理与现实政治的共同作用下，“歌颂与效忠”乘着普世价值的便车，愈演愈烈，气吞万里，从毛时代走向后毛时代。

5.2. 革命与斗争

在所有母题中，革命与斗争中的“党性”和“普世性”的形态最复杂。一方面，它是正义的化身，是人类理想的至高点，是免除恐惧的手段，是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盛大节日；另一方面，它又是暴力血腥的标志，是扭曲人性，践踏常识的载体，是制造冤案，滥杀无辜的能手，是践踏人权，实行独裁的工具。

文革后，从官方到民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放弃阶级斗争，告别革命。那么，怎么评价革命？怎么评价那些描写革命历史与战争的文艺作品？红军长征中的英勇与悲壮，难道也是“狼奶”吗？

李泽厚的回答很有启发意义：“不要革命，并非不尊重过去革命所高扬、所提供、所表现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道德品质、崇高人格。它们仍然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太上立德’，这些英雄们在这个方面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情感语言和典范人品。……人们可以从过去的革命情怀中吸取力量，用在更有实效，更少毁伤的生活和人生道路上。因此，尽管十月革命已经泯灭，尽管那美好的理想早已落空，尽管那革命近乎无谓，那些流血牺牲似乎并不值得……你可以去责难那些设计者、领导人、空想家，但是那奋斗，那流血，那牺牲本身（也包括那些领导人本身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不仍然给后代人们树立了值得学习、仰慕和尊敬的光辉的道德榜样、人格力量和崇高形象吗？怎么能去非议去诋毁它们本身呢？”[19]

当年的北大学生、毛泽东钦点的著名右派谭天荣告诉我们，“年轻时，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一书，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我心中的英雄，每当遇到困难或面临抉择时，我总要问自己：如果保尔处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这种“保尔情结”是我们那一代 人一个共同的特征。书中有一段话至今我还能倒背如流，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20]

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之后，谭天荣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与保尔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坎坷的经历；都终生奋斗不息。但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保尔为了他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参与了在枪林弹雨中“在马上夺天下”的斗争；而我却面临对保尔所说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进行反思的历史使命。”[21]

“保尔情结”可以为共产主义献身，也可以为批判这个事业战斗。

那些批判“狼奶”的人们，大都是在毛时代文艺中长大成人。他们的精神养料同样来自于那些描写革命历史与战争的文艺作品，来自于那些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而走向刑场的革命志士。像千百万中苏青年一样，他们也有保尔情结，保尔的那段名言也曾是他们的座右铭。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文艺以情

[19] 李泽厚：《告别革命——回望 20 世纪》页 328-329，香港：天地图书，1997。
[20] 谭天荣：《评波普尔哲学》附录二：一个幸存者的自叙。页 318，香港：文艺出版社，2015。
[21] 同上，页 319。

感人，阶级情之外，还有些情感是人类共通的。感动了李泽厚的那部苏联影片，同样也会感动李泽厚的批判者。感动了中国人的《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同样也会感动港台和西方的观众。历史证明，保尔·柯察金所自豪的“为人类的解放”的伟大事业不过是人类的一枕黄粱，但是，他的精神、人格仍旧会感动很多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人们会把保尔的精神，用到相反的方向。李泽厚说得好，“政治必须从宗教、道德、情感中分离出来，才是现代化的进化之道。”[22]

然而，当包含着这一母题的故事情节不断地重复，当这一母题泛化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且与歌颂与效忠、英雄与模范、新旧对比等母题结合起来的时候，革命就异化成一个唯此唯大，至高无上的精怪。因为革命是党和毛领导的，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毛的思想高于一切。“三忠于四无限”，绝对服从；无条件地放弃个人的志愿和思想就成了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因为革命高于一切，所以，爱情、亲情、道德良心就要服从革命需要，而常理、常识、良心也就成了革命的奴仆。“革命至上主义”由此诞生。

因为革命要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就“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兴无灭资，大公无私，甘当革命的螺丝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成了主流鼓吹的公共道德，道德主义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高调道德专政”[23] 呱呱落地。

与时同时，斗争也“做大做强”，并上升为一种人生哲学，在这种哲学看来，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人间只有对立，没有同一；世上只有冲突，没有妥协；合作、和平就是修正主义，就是红旗落地。在这种绝对化、极端化的哲学指导下，斗争幻化为一种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手段，制造危机感和“假想敌”成了革命的每天的功课，推崇暴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成了一时风尚。

5.3. 英雄与模范

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英雄模范，主持正义、扶弱济贫、不畏强暴、机智勇敢、公而忘私等优秀品质为古今中外的英模所共有。所以，英雄模范是有普世性的。这就是中国人欣赏《阿甘正传》《美国队长》等美国电影，美国人称赞雷锋精神，以及样板戏至今仍旧感动世人的原因。

中外都提倡英雄主义，但是，理念大不相同。美国人认为，“英雄主义的核心是围绕着对一个崇高目标的承诺，并甘愿接受为此目标奋斗的后果。”在他们看来，英雄主义并不是几个“英雄人物”特有的稀奇品质，而是普遍人性。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任何人都具备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做出英勇行为的潜力。”[24]中国则完全从政治出发，认为英雄主义的前面必须加上“革命”这样的限制词。

中外也都推崇模范。专业上的杰出人物，生活中的利他行为，在西方同样会受到媒体的表扬，社会的尊敬。而中国的模范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党。即使是文学、电影里自生自长的英雄——《芦笙恋歌》里的猎手扎妥，《红旗谱》中的冀中好汉朱老忠，《独立大队》中的大队长马龙，最后也要投入党的怀抱。至于模范人物，雷锋、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等，更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

中外都知道“榜样作用”的重要性。西方不说“为人民服务”，只说“利他主义”“助人为乐”“乐善好施”；他们也不提倡“无私奉献”，“忧国忧民”；而是提倡“勇敢地选择与面对困难”，“对生活富有激情和真诚”。

中国英模身上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感动、教育了无数人。看毛时代亲历者的日记、信函、回忆录就会知道，这种榜样作用有多大。“毛粉”所怀念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安全感与当年大树英模，大学雷锋是分不开的。红卫兵、造反派、知识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同样得益于英模。

---

[22] 李泽厚，页 328。

[23] 钱理群：《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载《记忆》170 期。

[24] Zeno Franco, Philip Zimbardo《平凡的英雄主义》（The Banality of Heroism）http://www.xinli001.com/info/100011629）

学英模，能学好，也能学坏。对于英模来说，忠君爱党是第一位的。当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冲突时，人民就得服从党。换言之，为什么人服务，怎么服务，是否服务，以及为哪种主义奋斗终生，都是以党和毛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子很多：拒绝征过头粮，拒绝放卫星的，要撤职查办。打开粮库，为快饿死的百姓放粮的，要判刑坐牢。兰考百姓称焦裕禄为青天，是因为他冒着被处分的风险，批准他们到外地逃荒要饭。张志新、王佩英、李九莲等成千上万甘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被当做反革命处死。由此可知，毛时代的英模是个人崇拜和一党迷信的载体，而宣传他们的文艺，则是载体的载体。

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英雄情结，都会在“英雄想象”的激励下做出英雄行为。毛时代的文艺极大强化了这种想象。文革中的年轻人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入伍当兵，渴望爆发战争。以至有些人迫不急待地赴越南、缅甸参战，更多的青年则希望在生产建设兵团，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实现自己英雄梦。而那些“为毛主席而战”的武斗者则把这种英雄主义直接落实到派性的枪林弹雨之中。义和团的愚昧、狂热和无法无天在“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的祝贺声中重演。[25]

5.4. 新旧对比

如前所述，新旧对比这一母题，背靠阶级斗争，遵循着党性原则，与前三个母题携手并肩，密切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虎踞熊蹲，牢牢地守护着毛时代的文艺作品。

在党性关照下，这一母题带给作品的是政治偏见和极端的思维方法。最显著的，就是无法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评价 1949 年前后的中国。旧中国的优秀人物被遮蔽，旧社会的英雄事迹被否定，从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战争，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到有钱人搞的慈善事业，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被妖魔化。武训的行乞兴学，肖涧秋的扶危济困，张伯韩的爱国保厂都成了毒草。

同时，新中国的罪错被掩盖，新社会的劣质干部不存在，大至土改的暴力，人相食的惨剧，制度的缺陷；小至百姓的牢骚，干部的贪腐，领导的官僚，都被屏蔽，被粉饰，被美化。所谓“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如果万一漏网，比如某部电影写了干部进城后忘本负义（《探亲记》），就要大改，改得面目全非，把忘本且官僚的局长，改成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如此一来，文艺作品就形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公式：新中国一切都好，旧中国一切都坏。而新旧对比与忆苦思甜的母题，也就成了造假之能臣，毒品之干城，“狼奶”之批发站。

进入 21 世纪，当袁伟时发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跟日本的一样，以掩盖历史真相为能事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26]

这些话，完全可以用到新旧对比上，不同的是，文艺对历史真相的掩盖，比历史教科书来得更隐蔽，更曲折，因此更不易觉察。接受了上述新旧观的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也接受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极端的思维方式。在读书观影时，他们会自觉地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分析情节、人物。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面一号召“破四旧”，从中学的老三届到大学的老五届，就会以毁文物、烧旧书、砸牌匾、改地名为乐事。而一旦国门小开，看到台湾的政经发达，讲信修睦，文明礼貌，才霍然梦觉，于是，信仰崩塌，信念扫地，信心丧失。

---

[25] 这句话是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家宴时对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说的。见《王力反思录》页 963，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26]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 年 2 月 23 日。

5.5. 进步与落后

在进步与落后这个母题中，党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党和毛制订了进步与落后的标准；二是进步之所以进步，落后转变为进步是因为有了党和毛的领导。不用说，这对制造一党迷信和个人崇拜是大有帮助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个隐蔽得多的“狼奶”——集体主义。

在毛时代的文艺中，进步与落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对待新事物，如前面所说的技术革新，反对包办婚姻等；二是如何对待个人主义，如前面提到的思想改造、兴无灭资。前者中还有些普世的东西；后者就成了党天下。

个人主义不是损人利己，而是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这是基本人权。杨友生认为，青年人应该有上进心，不愿意在“得月楼”饭馆当服务员，想当工人（《满意不满意》）；韩小强高中毕业，不愿意在码头当装卸工，想当海员（《龙江颂》）；医生沈浩如不愿意未婚妻简素华离开上海，而与之分手（《护士日记》）；银环的母亲不愿意女儿嫁到农村去，而大哭大闹（《朝阳沟》）；学地质的林育生装病不去地质队（《年轻的一代》）；农业大学的教师不愿意到山沟里教书（《决裂》）……，在今天看来，这些正常且合理的要求，在毛时代都成了自私自利，思想落后的个人主义。

这一母题在培养人们的进取心（天天向上）、利他心（为人民服务）、不甘平庸、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优秀品质的同时，也把“集体至上主义”教给了人们。“集体至上主义也可以看作是革命至上主义的延伸，因为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集体性的，而且是有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行为，它所奉行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因而要求绝对服从作为集体意志的集中代表的党的意志，并无条件地放弃、牺牲个人利益。”[27]

集体至上主义其实就是以集体的名义，用非强制性的手段剥夺个人的权利。这一主义所持的理由，往往与虚假有缘。曾几何时，在毛的号召下，几千万大学老五届，中学老三届高举“集体至上主义”的大旗，奔赴农村边疆；数年后，还是这些人，写血书，集体上访，以命相争，恳求中央下令，允其回城。曾几何时，只因毛泽东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于是，姓农的单位争先恐后迁往穷乡僻壤。文革后，这些学校又都打破脑袋返回城市——毛时代的集体主义败给了个人主义，进步大军到变成了落后大军。可以说，知青大返城不仅是一个人口的大倒流，也是一个思想观念的大翻转。它以极端的方式，宣告了人权意识的觉醒，戳穿了集体至上的假面和谎言。

按照安 •兰德的说法，集体主义就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是一种吃人的道德，它“广泛地腐蚀了人们领会权利概念或个人生命价值的能力”，“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从而确保某些人享有安全。”[28] 历史以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主自由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没有了私有财产，就没有了个人自由；没有了个人权利，就没有了自信和自尊。显而易见，集体至上是全能体制的产物，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是它的两条腿。后毛时代断了这个主义一条腿断，软了另一条腿，于是这个主义只能在轮椅上消磨岁月。毛时代的进步与落后也随之瘫痪在历史的河床上，而由此酿造的“狼奶”，也就只能在“青春无悔”的自慰中藏身。

5.6. 爱情与亲情

“爱情与亲情”中的人性最浓，市俗性最强，对党性的抵抗力最大。因此，党性对它的改造也最下功夫：一方面以“三观”作为能否产生爱情和维系亲情的标准。另一方面以血统——出身、成份为爱情和亲情站队划线。仿佛这些美好的人类感情只存在于“红五类”身上。

尽管这两手一直都抓得很硬很硬，但是，效果并不佳——十七年的文艺史上，每当政治稍有放松，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就会大肆反扑，描写普世爱

---

27 钱理群，《记忆》170 期。

28 （美）安 • 兰德（*(Ayn Rand*）：《自私的德性》（*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页 84，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情/亲情的作品也就会跟着兴风做浪。

总之，这一母题有着强大的自卫能力，党性在这里只能浅尝辄止。文革文艺之所以要剔除这一母题，把所有的男女主角都变成“三无”（无家庭，无丈夫，无后代），“两去”（去性别，去欲望）的孤男寡女，就是因为只有把男女之爱屏蔽在文艺之外，才能避免它对“文艺新世元”的腐蚀，保证革命的纯度。

6. 结 语

上述思考，对于我来说，无异于一次游宝禅山式的学术探险。这次长达七个月的探险，解答了长期盘踞在我心头的疑问，我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毛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对“红色文艺”毫无知觉，除了政治、文化、心理等原因之外，还因为这些文艺作品中，包括着“人奶”。同样，后毛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对“红色文艺”念念不忘，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坚持和怀旧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外，是因为这些作品中，还蕴含着让他们感动的普世性的思想情感。样板戏在港台和外国欢迎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因知识能力不济，学术准备不够，我无法到达“宝禅山”的深处。我知道，如果把目光从毛时代的文艺，转向毛时代以及后毛时代的文化，会有更多的罕见风光。但是，不管你发现了多少胜境，也不管这些母题怎么变异，毛时代的红色基因都会或多或少地残存在此后的文化中，就像遍布中国各地的红色革命遗址一样，即使在鼎革之后，也仍旧无法打扫干净。因此，取其普世性精华，去其政党性糟粕，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研究】

文革期间北京市两大派的争斗

胡宗式*

内容提要： 早就相识的关锋、吴传启等人在文革中形成最大的帮派。115 档案事件暴露了这一伙行为不端；高教部事件中王力、关锋拉偏架；反击“二月逆流”使群众组织分裂成师大派、北大派。聂元梓、孙蓬一向江青状告王力、关锋结党营私。中央文革对反吴传启的斗争不断施压。王力、关锋倒台后，又限制对他们的批判，还把高校学习班里坚持批判王、关、戚和谢富治的做法，说成是“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关键词： 文革、北京、造反派、聂元梓、中央文革

前 言

1967 年初至 1968 年 8 月，北京市的文革中产生了两大派，即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天派”“地派”。天地派名称出现以前，就有两派之说——北大派、师大派。师大派的核心表面上是谭厚兰，实际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的吴传启。北大派的核心是聂元梓。

文革前，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以“撒仁兴”（三人行的谐音）的笔名发表文章，他们的关系密切而久远，关锋和林杰是《红旗》杂志的同事，关系密切。林杰先入师大历史系，后进入《红旗》杂志。谭厚兰作为调干生 1961 年保送入师大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工作。文革开始时，谭厚兰在师大进修，从而参加师大的文革。高教部（有时称教育部）的卢正义和吴传启同住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早就相识。上述这些人结成一伙，在文革中协同配合，成为北京文革中最大最强的派系。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遭到北大等社会上许多力量的抵制，促成北大派的形成。

若要以一个标准来区分两大派，那就是对待吴传启的态度，但两派的大多数组织并不了解分歧的根本。两派群众都是怀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革命路线的愿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笔者从 1966 年 12 月期担任北大《动态报》主编，亲历了两大派形成、发展、争斗和结束的全过程，兹将这一过程简述如次。

1. 师大派的核心人物吴传启

吴传启、林聿时于 1966 年 5 月 23 日率先在学部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6 月中旬，

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6 月 26 日，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

1966 年 8 月份，学部出现两支观点对立的红卫兵：“学部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和 “学部红

* 胡宗式，1941 年生，1960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革中任造反组织“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北京大学文革史榷》的主编之一。

卫兵总队”（简称总队），前者支持吴传启，并为其所控制。后者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吴传启。

1966 年 12 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 12 月 19 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信息的吴传启、林聿时指使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蒙在鼓里的总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一下子使自己陷于被动。1967 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暴力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

1967 年 4 月 12 月，北大孙蓬一发表讲话，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随后，总队的一部分人开始活动，目标对准潘梓年、吴传启。联队中对吴、林不满的人，则成立了以傅崇兰为首的“大批判指挥部”。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因为潘梓年是吴、林的牌位，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影响最大（排名仅在郭沫若之下），若打倒潘梓年，则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大批判指挥部”和北大等单位一样，也选择潘梓年作为突破口。

1967 年 8 月 26 日，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学部红卫兵联队随之垮台。

2. 高教部夺权问题上的冲突

1967 年 1 月 18 日，周总理在一次关于夺权问题的讲话中说：“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据此，北京高校纷纷派出夺权大军，其中高教部夺权最引人注目。在北大派出的 13 路大军去高教部前，已有 30 多个单位去了，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高教部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徐非光。由于叛徒问题，北大不承认延安公社，为延安公社问题，北大和师大矛盾突出。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高教部的代表胡宗华深入了解情况后，发表了一个中立的宣言，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清华退出高教部夺权。

1 月 19 日，高教部北京公社在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的支持下夺了高教部的权。不久，卢正义、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搞反夺权，双方发生冲突，多人被打伤，称之为“高教部事件”。2 月 2 日，事件发生后，《红旗》杂志的林杰俨然以中央首长的姿态向师大和延安公社下达四点指示：

（1）我们（师大和延安公社）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北大

（2）解放军参与这一行动是错误的；

（3）新北大是错误的；

（4）解放军马上撤回去。

2 月 2 日下午，关锋、王力电话批评北大，内容如下：

关锋：孙蓬一同志，……你们为什么说徐非光是叛徒？当时大家的水平都那么高吗？要说检查的话，聂元梓也有检查嘛！……师大的同志还是顾大体、识大局的，没有公布聂元梓的材料。你们现在有些做法，恐怕是要考虑的。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还是要听的。

王力：在你们的支持下，砸了延安公社，抢了北师大的广播台，然后北师大又去抢回延安公社。你们又调了一两千人，还有军队（注：指在北大军训的解放军）。他们遭到你们的围攻和打骂。据说北大同学还要师大同学承认是反革命事件，师大提出不能这样做。结果你们绑架走了 7 个人，围攻了三百多人……（孙蓬一说：“我们掌握的情况和你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不是我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不听了，你们两家打架的情况我都不愿意听了。……

2 月 4 日，关锋、王力又一次打电话给孙蓬一，批评北大要搞什么“三路进军”等等，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在接到关锋、王力的电话后，北大撤出了高教部，也将在其他单位参与夺权的人马撤回。关锋、王力捏造关于北大的谣言，使聂元梓、孙蓬一及北大的一些人对他们的政治品质产生了怀疑。

这场冲突的焦点主要是对卢正义的看法。卢正义是高教部司局级干部，他于 1966 年 5 月 26 日凌

晨贴出高教部的第一张大字报而成为“左派”。但很快卢正义被揭发来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卢正义是“延安公社”的头头（与延安公社对立的群众组织是“北京公社”），北大坚决反对卢正义，但他受到关锋、王力、戚本禹、林杰、吴传启和北师大井冈山的保护和支持。

北大动态报 1967.5.10 登了一篇报道《奇文共欣赏——卢氏叛徒哲学》（摘自延安公社的大字报）

（1）“越是叛徒，越是左派”

（2）“卢正义同志是鲁迅的形象”

（3）“卢正义是第二号马克思”

（4）“30 年代卢正义犯了政治错误，60 年代卢正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5）“即使三十年代犯了错误，难道六十年代就不能变化吗？……他至今是革命者，而不是什么叛徒。”

（6）“卢正义同志第一次被捕，还没有确立毛主席为党中央领导。”

在北大等单位向吴传启公开宣战以后，卢正义很快就隐藏起来并且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 1970 年，公安部还向全国发布通缉令，追捕卢正义，但没有结果。

3. 在陶铸问题上的分裂

1966 年 6 月，陶铸由广东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8 月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第四号人物”。他在许多问题上和中央文革发生分歧，其中关于对吴传启的评价更是针锋相对。

1966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李冠英等五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前受到戚本禹、阎长贵（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怂恿，而大字报 19 日贴出，戚本禹 20 日就写信支持。因为卢正义贴了支持李冠英等人大字报的大字报，于是就闹了个“反陶英雄”的桂冠。1967 年 1 月 4 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

1967 年 1 月，许多组织集中在中宣部，成立了一个联合批判陶铸的组织，对高教部延安公社是否能加入该组织的问题，发生分歧。吴传启、谭厚兰等人支持延安公社加入，北大等单位反对延安公社加入。林杰也来过问，和北大的代表聂向前顶起来。林杰说：“凭聂元梓的权威，不能把延安公社排除在外。”聂向前把桌子一拍，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经过大多数组织的坚持，延安公社没能参加第一次批陶大会。但是，“批陶”组织从此分裂。后来吴传启、卢正义、谭厚兰等人又召开了批陶大会，在学部外的橱窗里，还展览了他们三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可见“师大派”的核心早已形成。需要说明的是，北大当时对陶铸和吴传启的关系还没有深入了解，在一些场合曾称吴传启是“陶保派和保陶派”，这是不对的。

4. “1·15 事件”：北京两派初具规模

1967 年 1 月 15 日凌晨 1 时 15 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 时 20 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 1949 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后来的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

下午，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第二天，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1 月 17 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称“接管了中

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公安部释放刘郢、洪涛以后，民族学院总部的人到公安部论理。对立派以冲公安部和打击左派的名义，将民院红卫兵总部的头头郑仲兵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竟然将郑仲兵关押了 13 天。

因对“1•15”事件的不同看法，民族学院两派发生多次武力冲突，许多单位到民院支持“造反红卫兵”（对立派是郑仲兵为首的民院红卫兵总部）。这些单位除了统战民委系统外，还有师大、学部、高级党校、马列主义研究院，公安部支持抢档案的一派，红代会核心组把民院红卫兵总部开除出红代会。种种迹象表明，“师大派”有了雏形。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发表声明，认为红代会的这一决定是非法的。[1] 北大校文革站在民院红卫兵总部一边，成为师大和学部等单位联合反对的“北大派”。“1•15”事件不但使统战、民委分裂成两派，而且使北京高校也分裂成两大派。

5. 反击“二月逆流”，多个系统分裂

“二月逆流”事件的本质，是老帅们和几位副总理在会议上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怀疑，引起了毛主席的震怒，被扣上“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帽子。

1967 年 1 月北农大东方红曾经发动过一次“炮打谭震林”。1 月 7 日，周总理接见七机部“915”“916”两派代表时说：“一向拥护毛主席的谭震林说成是农林战线最大的黑帮，非要揪，还要揪李富春，这怎么行？把毛主席身边都揪了，这怎么保卫党中央呢？”

1 月 8 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说：“我是同意总理意见的。……首先，在刘邓反动路线问题上谭震林过去有些错误，但是在农业走什么道路上谭震林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听了上述讲话，农大东方红贴出“向谭震林同志请罪”的大标语。

3 月 7 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铁学院 919、民族学院东方红这六个单位，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是农口的，其中的五所高校，除师大井冈山，其他四所高校组织，还不是“红代会”的单位。当时绝大多数院校的组织，也都是晕头转向。农大东方红的人到北大的动态组了解情况，对笔者说：“师大真不够意思。我们到师大去，师大的人说你们先表态，再给材料。”

动态组全力调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另外还了解到，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新北大总部态度明确：不能反总理，由于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可疑，公社总部三天对谭震林问题没有表态。3 月 11 日戚本禹提出收回他 1 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后，公社总部才正式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在“打倒谭震林”后，某些单位开始攻击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提出揪副总理后台的口号，矛头指向总理。周总理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天师大等单位就开广播车到计委门前狂呼：“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洪涛到地质学院说：“谭震林、余秋里是‘二月逆流’的哼哈二将。”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和统战部的刘郢贴了题为“就统战民委系统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同时，在经委，一派通过反薛暮桥来反李富春，进而把矛头指向总理。

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北京市分成了“打倒派”和“炮轰派”。打倒派认为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敌我矛盾，并要揪出他们的后台；炮轰派认为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人民内部矛

[1] 红代会的开除决定和民院红卫兵总部的声明，详见北大《动态报》1967 年 5 月 3 日第 121 期。

盾，反对炮打周总理。北大是炮轰派。

6. 民族宫 4·8 事件：两大派亮相

文革前，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工作展览。1967 年初，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1967 年 4 月 4 日，民族宫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等 19 个单位组成“批判展览联委会”，并于 4 月 5 日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这个大会受到对立派的冲击。4 月 8 日上午，双方和民族宫警卫排一起商定：双方各自分时派人进入展览会场。9 点半左右我方人员按时来到会场，但把门的人是对立派，不叫进入，协商不成，我方强行进入。11 点半对立派调来 300 来人，说“你们是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强行把我们的人赶出去。按说事件到此可以结束，但是对立派得寸进尺，要把我方人员全部赶走。冲突的现场已不是民族宫了，而在民委的大院内。公社总部接到学校协助批判展览人员的告急电话后，公社总部头头卢平于晚饭后带领 50 余人乘一辆大轿车去民族宫（我恰好在总部，也跟着车前往）。

笔者和卢平曾去谈判，未果。在谈判过程中，由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蒯大富签发的“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两项命令传到：1. 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2. 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对此，地质东方红当即发表严正声明：1. 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2. 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3. 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凌晨两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和吴德在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但对立派一心要把北大等单位赶走，吴德等的讲话不起作用。到了后半夜，对立派的总攻开始。他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从楼门口到大门外，排起两行，组成一个夹道，他们四人一组（都是男生），从每间屋子里把人拽出来，送到夹道的首端，夹道的人则你一把我一把地拽着你往前走（顺便也打你几下），送出大门外。我到了门外，上了学校的汽车。一位女同学把新北大公社的旗帜缠在身上带出现场。

4 月 9 日，双方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单位并不多，但在声明上签字的单位却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了存在两大派。第二天，聂元梓和孙蓬一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情况，陈伯达、戚本禹也在场，聂孙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人都有历史问题。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江青耐心地听汇报，戚本禹则不断地为王、关辩护。临走时，江青嘱咐聂孙：“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2]这次告状，对北大有利的只有江青的一句话：“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指潘梓年、吴传启）联系吗？”而对告状的主要内容，中央文革是否定的。4 月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会议上，中央文革成员都对聂元梓、孙蓬一的观点、对炮打谢富治进行了批判。

7. 炮打谢富治：地院东方红要打倒孙蓬一

1967 年 4 月 11 日晚，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等 6 院校开了 6 辆广播车到北大来，他们高喊着：“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北大同学将他们的广播车推出了南校门。

[2] 详见孙蓬一 1977 年 1 月 3 日给笔者的信。

4 月 12 日晚，北大召开大会，孙蓬一发表讲话，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3 4 月 13 日，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一场冲突。聂元梓、孙蓬一和笔者参加了会议。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你们两家不必发言。"会场上有人质疑我的身份，谢富治问聂元梓，聂元梓答道：已经和会议的组织者说明了。会议开始后地质虽然没能发言，但是参与事件的其他五个学校都可以发言攻击北大。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我在聂元梓的身后，看到她流下眼泪。这时，会议室的大门开了，一下进来 20 来人，其中一位女的我认得，她是地质学院动态组负责跑北大的。他们一看屋里有那么多人，就嚷着："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说着就要往外走，会议组织者一拦，他们又都回来坐在后排，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经过这一折腾，会议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谢富治起身到边上的小房间，地质的人随后进去。过了一会儿他们过来，围着我们说："谢副总理说了，找聂元梓来解决。"聂元梓起身到小房间去，我和孙蓬一到大会堂门口，一会儿聂元梓出来，地质的人围上。聂元梓问会议组织者："会议还开不开？"答曰："不开了。"我们便走下台阶，地质的人一直追到我们的汽车旁，骂的是老保、挑起武斗之类话。

汽车开动后，孙蓬一问："谢副总理怎么说的？"聂元梓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 停了一会，孙蓬一说："回去以后要把接见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群众讲。"聂元梓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因为都很生气，一路无话。

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 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已聚集了不少北大同学，孙蓬一即席讲话。他讲了下午的接见和"1·15 事件"等情况，他说：处理"1·15 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在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的会议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 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问，地质多去 20 多人，什么话都不讲。孙蓬一还讲了吴传启之类是真正的摘桃派以及和他斗争的性质等。

群众的情绪被煽动起来，新北大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聂元梓、李清昆闻讯赶到现场，制止了下步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

1967 年 4 月 16 日，地质学院革委会和东方红公社发表《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声明》，主要内容：1.孙蓬一是现行反革命，其罪行是为刘邓翻案，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和解放军。因此必须将孙揪出来批斗。2.一小撮人操纵了北大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资反路线。3.新北大公社不是造反组织，而是校文革的御用工具，它成了反动保守势力的庇护所。因此，新北大公社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4.聂元梓有负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信任和培养，在近几个月的工作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聂元梓根本没有资格代表红代会进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6.地院东方红等组织与新北大公社的争端说明北京市两种势力、两条路线、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全面决战开始了。

8. 对潘梓年、吴传启宣战

4·13 炮打谢富治的事平息后，1967 年 4 月下旬，北大联合"北大派"，正式向"潘、吴"开战了。为了政治上的主动，聂元梓指示不提关、王的名，并说是不反王、关的，"关锋就是关锋，吴传启就是吴传启"，"吴传启的后台"解释为陶铸。

清华蒯大富在"4·8 事件"和"4·11 事件"

[3] 1967 年 4 月 13 日的《新北大》上，刊载了孙讲话的全文。

中支持地质，和北大的关系很僵。蒯大富后来发现有人支持“414”搞他，使他两边都孤立，便向北大靠拢，请民院抗大说情和北大搞关系。1967 年 5 月，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参加反吴传启的斗争。

关于潘梓年的材料，由冯定证明，1926 年组织上曾通知潘梓年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证明潘已是党员。但是 1927 年恐怖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吹捧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说明在政治上他已经叛党（这是第一批材料）。67 年 5 月在批刘少奇吹捧《武训传》时，“除隐患”战斗队收到一封匿名信，揭发潘梓年在某杂志某期上发表吹捧武训的文章。战斗队一查果真如此，并公布之（这是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是潘在 1933 年组织上叛党（这是当时的看法）。搞吴传启的问题，潘梓年要更困难些。1967 年 4 月 3 日，周总理在孙蓬一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北大搞二机部的一个叛徒的调查，战斗队借这个名义到武汉档案馆，终于查清了吴传启以前是国民党员，并查出了他的党证号码。

1967 年 5 月中，周总理驻交通部的联络员想了解北大对交通部运动的看法，约北大交通部问题调查组去中南海谈情况，笔者也随同去了。调查组谈完情况以后，笔者向联络员汇报了，反总理集团的组成和他们在 3、4 月份的活动，点了潘梓年、吴传启、谭厚兰三人的名。谈到他们在余秋里、李富春、李先念问题上的做法，名义上是反这几个人，实际是和总理对着干。

9. 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成为被打击对象

北京市革委会是 1967 年 4 月 20 日成立的，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谢富治的小圈子里，当时，把聂元梓列为主要矛盾。王乃英（林杰之妻）1968 年初接受审查期间写的材料中，有这样的内容：“革委会成立不久，一次周景芳让我给谭厚兰谈谈革委会内部的形势，即：聂元梓野心很大，新市委干部不敢站出来，部队同志不了解情况等。其主要矛盾是与聂的矛盾。让她便于起作用。我答应了。后来，金吾伦带着谭厚兰到我办公室，让我与她谈。我就周的上述意见给谭说了，后来王世宽也说过。”[4]

吴德的回忆录也谈到：“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5]

被吴传启等人控制的《北京日报》5 月 28 日发表社论，提出“现在特别要批判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分裂主义倾向”。其矛头显然指向的是聂孙、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的《红旗》报 1967 年 5 月 30 日第 42 期刊登的观察员文章《<北京日报>近来在为谁说话？》“我们要问：《北京日报》到底掌握在谁手里？是谁把黑手伸进了《北京日报》？”在那个时代，要写出这样的文字，不仅需要深刻的观察力，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清华《井冈山》、北京体育学院《体育战线》、北航《红旗》、矿业学院《东方红》四家报纸 1967 年 6 月 3 日合刊，发表了这篇评论员文章。

1967 年 6 月 2 日，多家单位在学部大院召开批判潘梓年大会，这是北大派活动的最高潮。

10. 反吴传启受到中央文革的打压

1967 年 5 月 27 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

[4] 详见 2016 年 4 月 30 日电子杂志《昨天》第 67 期。
[5] 吴德：《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第 36 页。

找聂元梓谈话。[6]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聂元梓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陈伯达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 关锋说："北京分出两大派，你要负责，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聂元梓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聂元梓说：你们满耳都是谣言。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是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6月5日，陈伯达、谢富治在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上（傅崇碧主持会议），公开批聂元梓和校文革批吴传启等人，公开批判北京日报，是打内战，搞分裂，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陈伯达"6•5讲话"的作用，就是打击了轰轰烈烈的反潘、吴的斗争。凡是参加这一斗争的单位都受到了压制，北大的"反聂"势力一下子拉出4000多人的队伍，外校的一些组织也不断来北大游行示威。

传说北京有四大保守组织，即新北大公社、民院抗大、石油大庆和人大三红。北航、清华、矿院要抛开这四大保守组织，把"北大派"其余单位拉到自己的一边，重组一派。由于有北航取"航空"之意，就叫"天派"，另一方有"地质"对应的叫"地派"。这就是天地派名称的由来。"天派"的名称出现以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行动。

11. 王力、关锋垮台后两派的变化

1967年夏，全国形势动荡，由武汉7•20事件引发"揪军内一小撮"，同时在外交上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国际影响很坏。是年8月26日，毛泽东对关锋、王力问题做出指示。9月1日以王、关不出席会议的形式，宣布了他们的倒台。

中央文革非但不号召批判王力、关锋，反而压制对他们的批判。最典型的是北师大的"97"事件——谭厚兰的亲信樊立耀成立专政委员会，批斗了谭厚兰。蒯大富和韩爱晶等人也头脑发胀，支持谭厚兰的对立面师大造反团公开活动。没想到，9月7日当天下午，市革委会就发文件保谭厚兰，同时抓了樊立耀等人——谭厚兰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这块牌子是要保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聂元梓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她要求北大"不许上街游行庆祝，不许贴大标语。"告诫北大学生："王力、关锋无论如何是中央文革的人。"

中央文革对批判王、关的弹压，使所谓的"大联合"成了空喊。《北京日报》的通栏标题是：旧话不再提，旧账不再算，责任不再追，共同朝前看。1967年9月16日，江青在接见"天派"代表的会议上说："你们何必来干扰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她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但是，被王、关倒台搞得十分兴奋的学生们，没有意识到：红卫兵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曾参与火烧英代办。

[6]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第219页。

王力、关锋倒台以后，他们反思前一段的作为，观点发生了变化，其“九七战团”（谐音“揪戚战团”）全力来搞戚本禹和谢富治。414 在 68 年 3 月高校学习班中大反谢富治。414 的这种表现被团派戏称为“变天派”。

12. 高校学习班，北京两派的最后表演

1968 年 1 月 27 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联合发出《关于分期分批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学习班于 1968 年 2 月 5 日开学，根据上级要求，增加了北大、北师大、地质学院、北航四所院校。北大被要求参加的有聂、孙，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各选派了五个人，笔者也忝列其中。

学习班领导宣称“一碗水端平”，实际上是回避王、关、戚问题。他们认为提出批判王、关、戚，就是“派性”发作，就是破坏学习班。 然而，盖子是捂不住的。3 月 6 日新北大公社在学习班上首先贴出了《是解决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主旨是通过批判王、关、戚，找出高校分裂的根源，以便实现大联合。3 月 6 日晚，中央首长接见学习班代表。聂元梓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说：“井冈山要砸烂校文革，二次夺权，他们口号是“一切权利归井冈山”。学习班指导思想不清楚，不明晰，什么是大联合的基础，不是把两派捏在一起就算联合。学习班里解放军不相信群众，还偷听我们的谈话，不准串连。高校如何分成两大派，要揭派性盖子，把坏人揪出来，就能实现北大内部以及高校的大联合。……孙蓬一是个好同志。孙蓬一有严重错误，但是整孙蓬一我是不同意的。卫戍区现在有他的专案组，据说再有两个问题调查清楚就可以抓起来了。不能把孙蓬一当敌人看，整他的材料是错误的。”

1968 年初，北大校文革主要领导人认为：社会上存在右倾的情绪和走向，并以“傲霜雪”和“独立寒秋”两个战斗队的名义，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中央首长。1968 年 3 月 7 日中央开会，江青需要这份上报的材料，叫谢富治派人到北大要一份。谢把这件事交给傅崇碧办，傅崇碧派他的部下哈斯到北大来要材料，以卫戍区的名义要。办公室的聂向前说：“这材料都已上报。”哈斯要底稿，聂向前说：“底稿也没有了。”哈斯无礼地问：“把这材料都上报给哪些首长了？”还拿走了写有毛主席名字的上报名单。为此事，聂元梓当即打电话给江青，说有紧急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江青于 3 月 8 日凌晨在钓鱼台接见了聂元梓（在场的还有陈伯达）。江青问聂元梓 “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刘少奇吗!”江青说“王、关、戚的后面还有大的嘛!”这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又不指明是谁，聂元梓就定了一个方针：打死的，看活的（就是打王、关、戚，看形势的发展）。

3 月 9 日聂元梓打破学习班不许串连的规定，到一些学校进行串连。同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在学习班内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在学习班里，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组织提出：高校的分裂是由王、关、戚的黑手造成的，应该通过批判王、关、戚来澄清是非，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上实现大联合。但是，这种坚持批判王、关、戚的方针，没有得到学习班领导的支持。3 月 11 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学习班汇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吴法宪出席会议。会上，中央首长对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在“二月逆流”问题上的表现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3 月 11 日，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第一号严正声明》。声明说：“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直接领导下的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始终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办事，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完全正确！ ”3 月 13 日、15 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北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联会。聂元梓出席了串联会。大家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

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

在提到学习班到底执行了什么路线的问题后，"反谢"的问题开始露面。师大造反团、人大三红、清华 414 等单位先后贴出针对谢富治的大字报或大标语。新北大公社当然对谢富治有看法，但鉴于 67 年 4 月 13 日"反谢"的教训，没有贴大字报。清华井冈山兵团和北航红旗持观望的态度。

3 月 18 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江青说："现在有人要替去年的"二月逆流"翻案"康生说："什么叫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插话：这是毛主席讲的。）

3 月 19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对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主要内容有二：第一、王、关、戚是江青搞出来，利用关、王、戚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没好下场。第二，谢富治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北京市革委会是红色政权。把矛头指向谢，是企图颠覆市革委会。这些人也没有好下场。

从 3 月 22 日开始，众多"地派"组织分别到学习班驻地、天安门广场、市革委会等处游行集会，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口号，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

迫于压力，新北大公社于 3 月 23 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则揪住"反谢"问题不放。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

3 月 24 日中央宣布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并把杨、余、傅说成是"天派"的后台。于是，在高校学习班里坚持批判王、关、戚和批判谢富治的做法，被说成是"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一场空前规模的反聂元梓浪潮在北京展开。

3 月 25 日地院东方红总部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声明》。《声明》说："坚决揪出在其黑后台操纵下，为"二月逆流"翻案、炮打谢副总理、颠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小丑聂元梓！聂元梓必须交待与杨成武之流的黑关系。"同日下午，校外组织上万人来到北大，其中有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持大铁棍，还有人说 "到北大来看斗聂元梓"。在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的严竣时刻，聂元梓强拉住谢富治到北大制止武斗。外校万余人准时准点到北大校园里闹事，显然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但时至今日，其内幕也没有被揭示。

3 月 27 日，首都军民 10 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向广大群众公布了"杨余傅事件"。江青在讲话中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总理：一批二保）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错误的。"

"杨、余、傅事件"出来以后，学习班不可能再办下去了。1968 年 3 月 30 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我们的错误就是只斗私没有批修。" "杨、余、傅事件"扑朔迷离。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声浪中，北京两派的争斗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化，直至发生了北大、清华、师大等一些院校的大规模武斗。1968 年 7 月 27 日，毛泽东派大批工人和解放军进入清华大学，用血的代价来制止两派的武斗。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标志着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大革命退出历史舞台，北京的两派斗争也随之结束。

【研究】

文革时期山东临时权力机构的变迁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研究

张业赏

内容提要： “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期间各级政权和各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山东省是最早成立革委会的省份之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省省级领导机构，成立之初采取“三结合”的形式。省革命委员会与当时负责“三支两军”的军队力量和山东党的组织的关系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性质和职能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有所变化。革委会的建立是文革的产物，是中国政治体制在职能、结构上的一次重大倒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文革、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政治体制

山东省是文革时期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省市自治区之一。深入研究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在山东产生的过程、人员构成和组织机构的演变以及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既有利于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了解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又能一窥中共权力机构的建制特点和运行机制，为从制度层面探究文革现象和本质提供一种有益视角。

中共执政的山东权力机构的名称几经变迁。最早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0 年 8 月的省级政权机关，名称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1943 年 8 月山东省战工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政府。1949 年 3 月山东省政府改组为山东省人民政府。1950 年 3 月召开的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选举产生山东省人民政府，康生任主席。1954 年 8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

1967 年 2 月，山东省造反群众组织宣布夺取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为山东省权力机构，到 1979 年 12 月，山东省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按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时设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为具有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一共存在 12 年之久。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省级及其以下各级政权和各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作新生事物大加赞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建国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重要变革，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有重要影响。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开始为党政合一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成立之初虽名义上设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但实际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之后，在革委会内部设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1 年 4 月中共山东省第三届省委成立后，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随之撤销，革委会成为纯粹的省级行政机关。1975 年 1 月全国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级革委会为地方行政机关。

1. 成立缘起——党政机构的瘫痪半瘫痪和毛泽东的美妙构想

1966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主要负责人既是发动文革所要依靠的领导、指导运动的力量，又是文革运动中被怀疑、打倒的对象，处于相互矛盾的尴尬地位。

大字报的提倡使文革运动的氛围日益高涨；对“造反有理”和红卫兵组织及其行为的肯定，使青年学生成为文革运动的急先锋；破“四旧”使文革运动由学校推向全社会；大串连使文革运动由首都北京向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等推进；以超大字号的字体在《人民日报》等媒体连篇累牍地登载“毛主席语录”，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剧升温。9 月 29 日《大众日报》报道，国庆前夕，济南掀起了一个大写毛主席语录、大挂毛主席画像，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今日的济南，从宽阔的马路到偏僻的小巷，从高大的建筑物到低矮的平房，从繁华的商场到市民的庭院，鲜红的毛主席语录牌、标语牌和宣传牌，连绵不断，放眼望去，宛如红色的海洋。无数毛主席画像高耸在条条街头上，高挂在千家万户门头上。红卫兵小将们朗读毛主席语录的声音，响彻在学校、街道和公共汽车上。”据济南市新华书店统计，近来市民购买毛主席画像 173000 多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标语 120 多万张。

到 1966 年 10 月，虽然毛泽东为推进文革运动采取的非同寻常的措施似乎已经点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运动好像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但文革运动的重点斗垮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和做法却遭到各级党政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抵制。极少有领导干部像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那样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向地方、部门党委及其领导者发难的造反行为。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按照自己对运动的理解，根据以往政治斗争，特别是反右派的所谓经验，坚持过去把批评、反对党委及其负责人的做法看成向党进攻，把反对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责人与反党等同起来的观点，在不违背自身利益的同时，巧妙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自身成为斗争的目标和运动的牺牲品，同时对造反学生以及其他反对者进行压制、反击、打击。即使是在大、中学生中间，起来反对各级党委的仍然是少数，拥护、支持各级党委的力量占着优势。

林彪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的文革情况，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两头的劲很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程度有差别，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改得快一些，有的地方改得慢一些。”[1]

为了打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推进文化大革命。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既对高级干部对文革的态度及其在运动中的表现十分不满，又要对这个因被定为主要斗争目标已感到“人人自危”的群体进行说服和劝慰，说：“路线错了，改了就是，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2] 10 月 9 日至 28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才召开一个多月之后，为了推动文革运动，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1]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 10 月 25 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页 1451，北京：中央文献，2002。

线”。毛泽东、林彪在会上讲了话。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自我检讨。陈伯达向会议作了主题报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山东省最初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是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三人。后来毛泽东提议让王效禹参加会议，谭启龙阻拦未果。王效禹在会议小组发言中，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特别对山东省委提出尖锐批评，谭启龙等拒绝接受。这次原定开 7 天的会议实际上开了 20 天，但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正如林彪在讲话中所说的，“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就如一位“文革” 史研究者所说：参加会议的人员在小组发言会上“既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明显抵制，也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拥护——这就是所谓‘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到会者许多人忧心忡忡，实在做不出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姿态。”[3]后来，毛泽东把各地造反派招来参加会议，才彻底改变了会议的气氛。陈伯达在会上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和林彪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在这次会议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都有一个预计和设想。毛泽东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周恩来在会议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会议如何传达作具体部署，说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春节前基本结束，并对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原则性的答复。

陈伯达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度赞扬红卫兵运动，把各地党委采取的控制局势的措施指责为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陈伯达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变成了一大片，引起了与会地方干部的强烈不满。在听了陈伯达的讲话后，谭启龙、白如冰在一起议论说，在上面话好讲，不信下去当个书记让群众冲一冲试试，一样顶不住。10 月 17 日，迫于当时的形势，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三人联合发言，检查了山东省委在运动中的所谓错误，但内心并没有想通。 苏毅然说：“为什么一定要搞成两条路线呢？历史上哪一次出现两条路线，都使党受到很大损失。”谭启龙说：“等叫各省表态时，一定要表示拥护，但是对陈伯达的讲话不能估计太高了，要有分寸，要他们嗅出个味道来。”他们统一口径，山东省委只能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承认顽固地“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如冰说：“只要领导核心不出问题，我们就不怕。”最后三人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稳住阵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4]

为了破除推动文革的党内阻力，毛泽东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在路线、口号上由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加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 月 3 日，《红旗》杂志第 13 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提出并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和这个口号的提出，十分引人注目。它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给造反派以最有力的支持。”[5] 第二，公开支持揭发、批判各级党组织的学生，把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置于受批判的位置。10 月 5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

[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106，郑州：河南人民，1996。

[4] 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批判刘邓联络站、济南市机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翻印：《谭启龙、白如冰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页 13，济南，1967 年 7 月。

[5] 王年一，页 98。

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后来中央批示这个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在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说明《紧急指示》适应于一切单位。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合法性被这一指示完全否定，造反行为受到肯定和公开赞扬。

此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和工厂、农村外，各级党委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全国出现了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黑材料的热潮，引起无数纠纷，进一步加剧了各阶层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分裂。第三，针对各地工人、农民群众对造反学生的不满和冲突，严禁工、农干预学生运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在山东，对党政机关冲击的事件，对领导干部侮辱打骂和随意绑架的事件，时有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早在 10 月 7 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就进入山东省委大院，占据办公室，成立所谓联络站和广播站。14 日晚，红色敢死队以查“黑材料”为名，封了省委大院两个办公大楼的门，使省委大部分工作人员无法办公。10 月 12 日，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济南市大中学校师生及部分地市大中专学校师生12000 余人参加大会。大会猛烈抨击山东省委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并发出《告全省革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书》。会后，进行了游行。10 月 17 日。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又在山东省委院内召开“声讨山东省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罪行大会”。10 月 23 日，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再次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山东省委负责人被迫参加各种斗争大会，进行检查、检讨，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此后，山东全省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各级党委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省在会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并表达了对各省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不满。根据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要求，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从北京回来后，于 11 月 3 日至 27 日，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由于当时红卫兵不断冲击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会议是在晚上秘密开始的。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各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省直各部门负责人、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共 237 人。3 日晚，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的讲话，并不让记录。由于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不满，会上意见很多。与会人员大多感到，有话不能说，很受委屈。据《山东省委关于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简报》载：会议开始先让大家亮思想，说心里话，经过一周的时间，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基本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由于我们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贯彻得不好，来开会的同志，比较普遍的对两条路线的斗争，很不理解。明明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却没有觉察到，还自以为正确，因此，思想距离很大，怨气很多。普遍反映：“运动来得突然，没打招呼，缺乏准备，挨了闷棍”，“很多问题向上请示得不到答复，被动挨整”。有些工作组的同志说：“当了三四十天工作组，斗了几个月，还揪住不放”，“挨了斗和骂，还赚了个路线错误”。还有的人认为：“这样冲法，是把领导干部都当了革命对象，都不可靠了”，思想上很抵触。[6]

会议讨论时，谭启龙也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陈伯达同志的报告问题很大”，“在中央听了陈伯达同志的报告后，大家压力很大，都很紧张，都接受不了，讨论了一个星期，才勉强地接受了。”“现在下面已经够乱了，各方面都说我们怕字当

[6] 山东师范学院批判刘、邓联络站、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红卫兵指挥部《造反有理》战斗队、山东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罪恶言行集》第四册附件四，1967 年 7 月 15 日，页 66。

头，这次陈伯达又说出了六个怕字，这个报告传下去，让学生抓住一个怕字，我们也说不清楚。”“按照陈伯达的说法，从好处说才是现状维持派，那不就成了洪洞县了吗？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吗？”“这些秀才们坐在家里不出门，光知道写文章，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写的东西根本不切合实际！”“我们都是老革命，现在把我们搞臭了，对后代有什么影响啊！”“中央文革都是些知识分子，只有陶铸是做过实际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情况，都是从学生中得到的，来自地方的少，各级领导情况反映不上去”。[7]

山东省委还借向中央报告三干会议情况的名义，向中央表达对陈伯达讲话的不满，说一部分同志对陈伯达讲话的一些提法，不很理解，出现了新的思想阻力，思想认识上有反复。如有的同志提出，如果向好处估计是现状维持派，那不是没有革命的了？也有的提出，什么都成了怕字派，生产也不敢提了。还有的人说，我们对毛主席还是坚信不移的，说我们抵制毛泽东思想没法接受。会议由于受红卫兵的干扰，再加上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没有解决，因此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回去如何干，心里没有底。有的说，虽然现在思想“上了线，上了纲，但仍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的说：“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上下左右，里里外外，一起动起来，如何掌握？”有的说：“这样被动下去，今天不知明天干什么，生产怎么领导？”有的担心：“现在检讨执行反动路线，过几个月又要检讨没抓好生产”。[8]不少干部提出希望省委在重大问题上，帮助出主意，不要眼看着干部犯错误。

谭启龙等虽然在会议期间不断被红卫兵揪斗，在会上还不得不反复做干部的思想工作，要大家不要有怨气，要坚持工作岗位，他说：“现在你既不能上山打游击，又不能自杀，自杀是叛党，台湾又不能去，去了是投敌。学生来了就要接见，所以只好老老实实地作检讨。”“不要怕罢官，不要怕戴高帽游街，甚至还要准备牺牲”，“说实在的，这个官早就做够了，死了组织上做结论，晚节也就解决了。”“我看自己总可以做点事，到金牛山当个管理工人总还可以吧？”在会议结束时，谭启龙说：“回去检查时，具体问题不能摆，只能原则摆一摆，主要是检查思想。”“现在学生起来了，会后工人农民起来，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这次会后省委难以保持集体领导了，你们要独立作战。”[9]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文革运动也一改把运动主要在党政机关、文教单位开展，对农村、企业的运动采取诸多限制的做法，把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不断扩大到全社会，以实现其“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66 年 7 月 2 日发出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工业、交通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财政贸易基层单位以及医院等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但大串连实际上使这一规定很难实现。

为了尽可能减少“文革”对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影响，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陶铸千方百计限制文革的范围，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工矿、交通企业、农村的文革作了种种限制。如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要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

[7] 山东师范学院批判刘、邓联络站、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红卫兵指挥部《造反有理》战斗队、山东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罪恶言行集》第四册，1967 年 7 月 15 日，页 27。

[8] 同上，页 67。

[9] 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批判刘邓联络站、济南市机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翻印：《谭启龙、白如冰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1967 年 7 月，第 14 页。

产；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等等。

《人民日报》也发表题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的社论，指出："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下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工人、贫下中农是完全能够把本单位的革命运动搞好的。同时要指出，工人、公社社员，机关企业干部不能像大中学校的学生那样放假，也不要到外地去进行革命串连。广大工农群众，应当把文化革命和四清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用到生产劳动中去，促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10] 这些规定和宣传，对限制运动的范围和规模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干扰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给各级党委、政府控制学生运动的做法留下了一些空间，对减少社会动荡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这些限制文革运动的措施，由于与毛泽东欲把运动推向整个社会的想法相违背，被一一否定。11 月 16 日，根据中央指示，谷牧主持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指出，由于生产不能中断，公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做法应当与文教部门、党政领导机关有所区别，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进行，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但这些意见被予以否定。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分别于 12 月 9 日和 15 日制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彻底改变原来的做法，把运动推向了全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的规定对文革的进程和走向发生了重大影响。《规定》使工矿企业等单位党的领导以及规章制度对工人的制约失去效力。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或因犯各种错误而受到处分从而对本单位负责人心存怨恨的人，一些试图通过混乱局面实现个人企图的人，惟恐运动冲击自身而力求自保的人等等诸色人等，纷纷打起造反的旗号，加入造反的行列，向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发难，从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荡。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的提出，工交企业、财贸部门和广大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推行，导致企图限制文革范围与影响、极力转移斗争方向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失去了最后的屏障，被置于受批判的处境。谭启龙等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被红卫兵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文革事件的裁决者变为直接被攻击者。到 1966 年底，毛泽东基本实现了发动文革的最初目的和意图，对文革怀疑、或明或暗予以抵制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成为批判、打击的对象。支持、保卫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冲垮。在山东，11 月 3 日晚，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在南郊宾馆门外

[10] 《大众日报》，1966.9.15。

召开“揭发批判省委错误”群众大会，并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议，遭到省委的拒绝。为了给红卫兵一个交待，省委工作会议与会人员被迫中止会议参加批判会。红卫兵勒令谭启龙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谭启龙指出红卫兵的做法是错误的，并拒绝了红卫兵让他回答问题的要求。之后，红卫兵强行将谭启龙带到北京，并向中央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并在京游行（即游街）并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明确答复：十万人大会不能开，游行不能搞，并委托陶铸、谭震林出面处理山东问题。

11 月 6 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等 43 名代表。谭启龙参加了会见。陶铸、谭震林对谭启龙采取保护的态度并就山东的有关问题谈了看法。[11]

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主要向陶铸、谭震林谈了他们对谭启龙和济南红卫兵师的不满，指责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济南红卫兵师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要求罢谭启龙的官，取缔济南红卫兵师。红卫兵代表认为，谭启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就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 挑动群众斗群众，篡改中央五条指示，利用公安部门镇压学生，给阶级兄弟带上手铐脚镣，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搞停革命，抓生产，包庇黑帮分子成仿吾，对抗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等。陶铸对红卫兵说：中央还没有罢他的官，要允许人家（谭启龙）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对犯错误的同志应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他不是敌人，是敌人就把他打倒。

关于济南红卫兵师，红卫兵代表认为，济南红卫兵师自运动以来，就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说谭立夫讲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济南红卫兵师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师 。陶铸认为，对济南红卫兵师要区别红卫兵师和部分领导。说红卫兵师一小撮领导人是修正主义的，不要说是修正主义红卫兵师。

红卫兵代表中的山大红色敢死队成员“揭发”谭启龙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搞社教贯彻了形左实右的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包庇成仿吾、张敬焘，迫害山大敢死队的同学。当红色敢死队成员谈到他们都是红五类时，陶铸说：还是不这样提法，第一是有成分论；第二，不是惟成分论；第三重在表现。出身好不一定是革命的，出身不好，表现很好，很革命，可以吸收做红卫兵。谭启龙被迫承认山东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陶铸和谭震林在听了红卫兵代表的所谓“揭发批判”，经过慎重研究后，答复了红卫兵代表提出的问题：第一，山东省委肯定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必须向全省作检查，坚决改正。这种反动路线实际是执行的，执行得也有严重性质不同，转变的也有快慢，可以给他们点时间。“一一.三”谭启龙是讲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山东省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根子在中央。三级干部会议前，由于没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所以会议由 3 天到 7 天，又到 20 天，要解决思想问题，不然回去不行。第二，既然犯了路线错误，是党内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谭启龙要坚决支持你们闹革命，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这样可以不罢官嘛！不是打倒的问题是揭发批判的问题。第三，罢官的问题，可以不罢官。罢官不罢官，我们把意见转告给中央，省委书记罢官要由毛主席决定。同学们有权利提出罢官，另一方面要由中央决定。我个人意见是彻底批判，给谭启龙改正错误的机会，若不改，再罢！

红卫兵代表还提出了要派代表参加正在召开的山东省三级干部会议问题。陶铸和谭震林明确表示：开三级干部会议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搞通思想；你们一搞，他们就开不下去，表示中央不同意红卫兵参加三级干部会议。

谭启龙在陶铸、谭震林接见红卫兵之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山东省委在济南的负责人。11 月 17 日，谭启龙回到济南后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介绍到北京的情况，传达陶铸、谭震林的谈

[11] 山东大学八.卅一红卫兵：《陶铸同志于 11 月 6 日晚对我省 35 名代表的讲话（记录简稿）》，1966.11.9。

话。之后，在继续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谭启龙亲自传达陶铸的指示说："山东几年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有饭吃了。谭启龙过去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只是五十天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官不能罢。"谭启龙说："这次去北京坏事变好事了，得到了陶铸、谭震林的指示。"他对陶铸对待学生运动的"高姿态、软办法"很佩服，并深有体会地说："今后对学生千万不要用硬顶的办法。"谭启龙还在有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会上说："陶铸的讲话要传达下去，传达到学生中去。""现在省委很困难，大家回去也处于困难的时候，省委可能和大家联系也困难了，各地要独立思考。""底，陶铸已经交了，大家如果不是三反分子，就不要承认。"[12]

然而，陶铸、谭震林对山东省委和谭启龙采取的名为批评、实则保护的做法所产生的影响，很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与山东红卫兵所谈的完全相反的意见所代替。11 月 12 日，王力在国家经委礼堂接见山东省赴京部分师生时讲话，谈了与陶铸完全不同的观点，反映了中央内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分歧和矛盾，也使山东省委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中央文革小组原来是想派王力和关锋接见山东学生，由于关锋临时有病，改由王力和穆欣两人接见学生。

在讲话中，王力说，犯错误的干部是否改正错误，主要看三条：第一条是不是公开承认、检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量事实摆着还不承认，你光说改正，口头说但不检讨是不对的。第二条看他是不是纠正错误，特别对过去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是不是认真地平反，公开地平反，是不是当众给他们恢复名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做了，坚决做了。第三条，第三个标准，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谭启龙同志呢？是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镇压群众，那你改正错误呀？错误是很严重的，是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做到第一条、第二条，还有第三条，必须真正地移到革命群众一边，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和错误路线作斗争。做到这三点，就叫做改正错误。我们希望同学们看一看是否做到了这三点，看一看他们的行动是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看一看，不是要睡觉，要斗争！每前进一步都要斗争。我们要观察、观察，也要进行斗争。斗争的艺术、斗争的策略要注意、要提高，党中央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革命师生。[13]

王力的讲话，使反对省委的学生感到莫大的鼓舞，山东省委虽然传达了陶铸的指示，但对稳定山东的局势作用不大。

之后，造反红卫兵组织开始对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多次进行揪斗、批判。11 月 25 日，山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与会人员参加了山东大学红色敢死队召开的所谓"控诉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26 日，又参加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批判省委的大会。27 日，参加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召开的大会。从 12 月到 1967 年 1 月，山东省委领导人轮流遭到群众组织的揪斗、批判。12 月 2 日，红卫兵山东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起召开"批判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谭启龙作了检查。由于谭启龙检讨犯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的错误，并认为是因为"迷失方向而犯了错误"。这与红卫兵组织逼迫他承认犯了所谓"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名相差甚远，谭启龙等又受到多次揪斗、批判，还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从 12 月 9 日到 15 日，谭启龙又多次遭到批斗、批判。12 月 16 日，青岛的造反派又把谭启龙及青岛事件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多次对谭启龙等进行轮番批斗。1967 年 1 月 17 日，被扣留青岛的谭启龙与各方面的联系完全中断。

12 月 27 日，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在珍珠泉批判白如冰。25 日，白如冰又被揪到山东工学院批斗。1967 年 1 月 9 日到 23 日，白如冰被押到山东大学

[12]《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罪恶言行集》第四册，页 32。

[13] 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整理：《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山东赴京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1966 年 11 月 12 日于北京（国家经委礼堂）。

作检查。期间，省委其他领导人和各地市负责人也频遭批斗。

此时，山东省委完全失去对山东局势的控制，一些党政机关的干部、工人也纷纷宣布造反，各级组织系统失去控制能力，陷于瘫痪、半瘫痪。各级干部成为揪斗、打击对象，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或半无政府状态。从 1966 年 10 月初，济南大、中学校学生就开始到工厂、农村、文艺单位串连，鼓动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工人起来了，农民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革命群众起来了。革命造反派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了总攻击。”[14]工矿企业的生产等也受到严重冲击。到 1966 年底，山东全省有 15%——20%的企业陷入瘫痪。[15]

当时，除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之外，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纷纷成立打着造反旗号的各类组织。这些组织大多与激进红卫兵组织有很密切关系。有些组织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建立的。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师文革串连红卫兵在各界群众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开始就注意在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发动工作。11 月 23 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大队抢占省总工会机关，挂出“济南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牌子。24 日，换成“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的牌子，并在济南市及全省各地吸收下属组织。12 月 27 日召开大会，宣布“山工联”正式成立。在济南，参加山工联的群众组织主要是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一些较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动组织的，如济南钢铁厂、济南铁厂、山东化工厂、国棉厂等的大的群众组织大都参加了山工联。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在山东省和济南市文艺团体建立“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以济南市郊部分造反组织为主树起了“山东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的牌子。

在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动成立工人群众组织的同时，一些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等对本单位党委及其负责人不满的一些工人，也纷纷进行串连，成立名目各异的造反组织，并迅速按行业系统组织起来。如济南工业企业系统就成立了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并很快发展到数万人之众。为便于活动和指挥，造反团又按行业分设纺织、交通、机械、饮食、卫生以及长清县等十几个分团。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与工人造反团建立了密切关系。接着，济南工人造反团把总部迁到济南市总工会。随后，吸收了一些外地工人组织，改称“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

1967 年 1 月 23 日下午，济南、青岛、淄博、泰安、聊城等地的工人造反派两万多人，在省体育场集会，宣布成立“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上海市各革命造反派联合驻济代表、首都三司驻济联络站和北航红旗驻济联络站、山东省贫下中农造反联络总站、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等造反组织代表出席大会。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则在文艺界成立了“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农民组织中成立了“山东省贫下中农造反总指挥部”。

此一时期，山东各地除大、中学生建立的各类红卫兵组织之外，又建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造反组织，诸如什么手工业总部、炮打司令部、特别司令部、荣复转退造反总部等等。这些组织大的数万人，小的则只有几个人。在 1966 年底 1967 年初，以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工联为主和以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山工总为主的两大派别在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社会各界形成。这两大派均属于在文革运动初期怀疑、批评、反对地方党委、单位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激进造反组织。两大组织互相攻击，展开混战，围绕对夺权的不同态度和对权力的争夺产生了激烈冲突。

1967 年 1 月，谭启龙、白如冰等省委负责人对山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分析说：“看来红卫兵要把

[14] 《大众日报》，1967.1.16。

[15]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工业综合管理志》，页 71，济南：山东人民，1999。

省委从政治上、组织上搞垮，他们打不倒省委是死不瞑目的。机关造起反来比高校红卫兵更厉害。在政治上搞垮，就是不让省委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省委打成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在组织上把书记们都揪出来，分隔起来，不让互相见面，互相联系，不到一块商量问题，这样就瘫了、垮了。现在看他们的这个活动是有计划的。”于是，他们制定了“政治上积极准备检查，反击不让检查的做法。在组织上要各部门独立作战，不要依靠省委，要顶得住，要经得起考验，不要把矛盾上交”。[16]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各级党组织和主要负责人置于被公开批判的处境，拥护、支持各级党委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衰落。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激进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一些原来拥护、支持党委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参加所谓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用意就是为了在表现鉴定、入团入党、毕业分配等方面不受影响。他们看到中央公开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领导干部遭到揪斗、批判，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已失去往日的权力和权威，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造反派”，也纷纷发表造反声明，宣布脱离所谓保守红卫兵组织，加入所谓造反红卫兵组织。

王效禹在后来曾这样谈到这一时期山东文革的情况：“第一个时期是从 1966 年 8 月到年底。运动的形势是联合分裂又到联合，从红卫兵出现、破‘四旧’立四新的统一行动，很快分成绝对对立的两派，也是代表着两种绝对对立的思潮。一是造反派，一是保守派，就是毛主席说的一是官办派，一是民办派。两派发展的特点是：造反派由小到大，由学生到工人到农民，由分散到联合，由受压到主宰局势。保守派是由大到小，由统一行动到分散到最后解体。干部是由怕群众到压群众以后又转到怕群众，使运动完全失去领导。到 12 月份左右，保守派基本上解体了。除了些分散零星的活动，统一的组织形式基本上不存在了。造反派自动形成了一种大联合的局面。虽然组织与组织之间有时发生些小磨擦，成为绝对对立的两派已经没有了。十月以后，学生一批一批出去大串连，群众运动的主体已逐渐转到了工人和街道居民。（在城市）带头的还是学生。”[17]

2. 全面夺权——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前提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在山东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山东省委和行政机关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在受到严重冲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下由造反派通过夺权成立并得到中央认可的临时权力机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

山东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是 1966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1 日召开的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在 1966 年 10 月之前，毛泽东通过播发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成立红卫兵组织，破“四旧”和大串联等种种形式，推动运动的开展，但遭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的抵制。为了减少开展文革运动的阻力，1966 年 10 月召开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成为集中攻击的矛头和目标。到 12 月底，山东各级党政机关失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各级领导干部成为揪斗、打击的对象，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或半无政府状态。毛泽东 “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18]

中央对 1967 年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的肯定和赞扬，引发了全国性的夺权热潮。1967 年 1 月份，各地的造反群众组织就在 18 个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委、政府进行了所谓“夺权”。宣布“夺

[16]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罪恶言行集》第四册，页 30。
[17] 王效禹：《自我检讨》，1979.1.9。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页 1440。

权”容易，但能够得到中央的认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上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后，先后被夺权的省、市、自治区有：山西（1 月 12 日）、辽宁（1 月 14 日）、吉林（1 月 18 日）、广东（1 月 22 日）、广西（1 月 23 日）、陕西（1 月 25 日）、贵州（1 月 25 日）、新疆（1 月 25 日）、云南（1 月 26 日）、湖北（1 月 26 日）、江西（1 月 26 日）、安徽（1 月 26 日）、宁夏（1 月 27 日）、青海（1 月 29 日）、辽宁（1 月 31 日）、黑龙江（1 月 31 日）、湖南（1 月）、河南（1 月）等。[19] 到 1967 年 2 月，只有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夺权得到中央的认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上海外，被中央认可的“夺权”省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原来的党政或军队领导干部公开表态支持造反组织，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山西省有副省长刘格平，黑龙江省有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贵州省有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山东省则有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

山东省是最早实现夺权的省份之一。夺权最初是从基层单位开始的。上海市是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组织分别于 1 月 4 日和 6 日宣布接管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山东省的夺权也是从新闻单位的夺权开始的。1967 年 1 月 10 日晚，大众日报社造反群众组织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发出《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电》，声称：“我们《大众日报》革命造反派，于 1967 年 1 月 10 日晚 11 时，接管了《大众日报》，使《大众日报》获得新生。”[20] 11 日，《大众日报》革命造反联络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布 10 日接管了《大众日报》，称《大众日报》忠实地执行了山东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制造舆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压抑和打击革命左派，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使之夭折；要使《大众日报》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报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

与此同时，青岛市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部等八个造反组织封闭青岛日报社，并宣称其权力归“青岛日报社革命造反总部”。《青岛日报》自 11 日起改为《红电讯》，只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文章以及新华社电讯稿。到 1 月 18 日始恢复《青岛日报》刊名。青岛人民广播电台也于 11 日被青岛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等 13 个造反组织接管，电台只播送毛泽东语录歌和气象，转播中央台第一套节目。在 1966 年 11 月山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与王效禹一起揭发青岛市委、山东省委的鞠维信、李元荣（青岛市长），在王效禹发表声明退出市委文革后，鞠维信、张子石和其他 30 多名干部也于 1967 年元旦发表联合声明，李元荣发表个人声明。他们提出既做革命对象又做革命力量，到群众中去，参加造反。

上海夺权后，青岛、山东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计划下一步夺权的地区。山东的夺权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王力、关锋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从造山东省委、青岛市委的反，要求罢几个人的官到夺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是在短时间内实现转换的。1967 年 1 月 6 日，王效禹等人在青岛散发《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1 月 14 日，他又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呼吁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

他说：“我在二十多天以前，曾经多次向市委提出，对极少数严重抗拒中央指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罢他几个官，搬掉几个阻碍运动发展的绊脚石……是必要的，但当时市委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现在革命群众起来了，造了省、市委的反，这个反造得好，反得对！挡也挡不住了，于是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摇身一变，貌似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样子，大批大批罢了基层厂矿一般干部的官……这是个新阴谋，是企图把运动搅乱，把斗争引入歧途，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对于那些死不回头，负隅顽抗、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决不留情，必须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他们批臭、

[19] 王年一，页 198-199。
[20] 《大众日报》，1967.1.11。

斗倒！”[21]

在上海夺权得到中央肯定后，青岛的几个群众造反组织推举孙枫丹、张子石（康生的儿子）等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汇报青岛的情况，请求夺权。当时，青岛的各个造反组织之间分歧明显，冲突激烈，各组织之间互不服气，互相指责。以在青岛活动的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三司”）为首的红卫兵组织与王效禹支持的红卫兵组织成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在派人到北京去汇报后，王效禹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请关锋劝说“首都三司”不要在青岛插手，并谈到去北京汇报请求夺权的情况。关锋答应与“首都三司”联系并告知王效禹说，中央很忙，管不过这些事来，只要你们有条件就夺。1 月 19 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接见青岛赴京代表，在大谈党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后，表示支持王效禹在青岛实行自下而上的夺权。

在关锋的授意下，王效禹和一些群众造反组织决定，不再等去北京人员的请示结果，立即进行夺权。据王效禹后来讲，为了能够取得成功，夺权采用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事先向群众宣布召开批判大会，等人员到齐后，把原来会场的会标一换，就宣布夺权了。1 月 22 日，青岛东方红、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青岛市化工企业革命职工联络总部、青岛市八一革命造反兵团等 23 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汇泉广场举行数万人参加的夺权大会，宣布“青岛市的革命造反派，已经把青岛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从青岛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

从此，青岛市被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重新回到了无产阶级手中。”[22] 会上散发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关于对待国家机关与干部的态度，《告青岛全市人民书》中说：“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砸烂一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反动机构，要彻底捣毁所有反动的资本主义的专政机器，让那些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什么‘书记’‘市长’，什么‘部长’‘局长’，都统统滚蛋；什么‘市委’‘市人委’，什么‘法院’‘检察院’，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它要沿着毛主席所开辟的革命航道，乘风破浪向共产主义迈进！”[23]

对于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态度，在 1 月 22 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中指出：“由于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委员会郑重宣告：对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并呼吁全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24] 1967 年 1 月 30 日《人民日报》专门为青岛夺权发表《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

青岛的夺权遭到了“首都三司”和支持它的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反对。王效禹向关锋电话汇报了青岛夺权情况，并再次请求关锋设法让“首都三司”的人回北京。夺权之后，王效禹等对反对他们夺权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王效禹在夺省委、省人委的权之前，介绍在青岛的夺权经验说，那时支持我夺权的人不一定足半数，但由于大权在握，用政权可以争得一部分人，对那些反对我们夺权的人就要发挥政权的作用，对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头头就要坚决抓起来，使其组织失去核心而迅速解体。由于青岛夺权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支持下进行的，很快就得到中央的承认和表态支持。青岛夺权

[21] 王效禹：《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1967.1.14。
[22] 《大众日报》，1967.1.29。
[23] 同上，1967.1.29。
[24] 同上，1967.1.29。

是继中央承认上海市、山西省夺权之后承认的第一个地、市级的夺权行动。

在青岛夺权伊始，由于当时不允许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 驻青岛的部队第六十七军采取了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的态度。在王效禹向关锋汇报青岛夺权情况时，关锋专门问及部队的态度，要求王效禹到青岛驻军联系，请求部队对夺权予以支持，并表示向军委副主席林彪汇报命令驻军予以支持。1 月 26 日，关锋打电话告诉王效禹说，他已向林彪汇报。林彪指示部队要支持王效禹，并让王效禹去联系部队。关锋还指示王效禹“从后台走到前台来领着干”。1 月 28 日，驻青岛部队游行示威表示坚决支持夺权斗争。同日，驻济南部队也举行热烈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并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1000 余名干部战士参加大会并游行示威。1 月 29 日《大众日报》记载了当时的情况。驻烟台、济宁、德州、淄博、临沂、潍坊、泰安等地的部队也举行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斗争”。

在青岛夺权两天之后，济南市也进行了夺权。1 月 24 日，济南市九个群众组织组成“济南市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在工农兵剧院（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发表《告济南市人民书》，宣布夺了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权，建立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同日，山东省省级各群众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夺取省、济南市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的问题，因未达成协议，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工总）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山工联）两大派分别行动，到省委、省人委和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抢权。在有些地方两派发生冲突。当晚，山工总出动近万人袭击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山工联办公机关，绑架了山工联负责人。

次日，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山东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原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山东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山东省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部、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山东省财贸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济南文化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济南中等学校红色教工革命造反组织联络站、山东省卫生界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大众日报革命造反联络部、山东省体育系统革命造反总部、六四年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山东省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毛泽东思想红色服务员山东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全国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员工红色造反团山东分团、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驻鲁联络站等 17 个造反派组织在《大众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展开全面夺权斗争！——告全省人民书》，号召：“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联合起来，把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统统夺过来！紧紧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

中央承认各地夺权的前提是有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或军队干部支持造反组织并参与夺权行动。王效禹在青岛夺权后，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让王效禹到济南，联合群众造反组织夺山东省的党政大权。1 月 30 日，王力两次给王效禹打电话，要他到省里夺权，并明确指示要求王效禹到济南后与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合夺权。1 月 30 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发表最紧急呼吁：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

中央文革小组让王效禹联合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合夺权的意图并没有实现。因为事情在 1 月 31 日发生突然变化。1 月 31 日，与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关系密切的山工联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后，数千名工人、学生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拘押的山工联负责人，并与公安人员、军队人员发生激烈冲突。他们连续两次冲击省公安厅办公大楼，扣押公安厅负责人，砸开一些办公室和保密室，砸烂扩音器，割断电话线，围攻和揪斗公安人员，并对前去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进行谩骂、围攻和殴打。晚上，济南驻军某部赶来包围了现场。（据韩金海回忆录：镇压山工联得到了中央军队领导人的批准）。省公安厅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宣布山工联是反革命组织，冲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当场拘捕山工联成员 200 多名。随后，解放军

配合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25] 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及其它几个与山工联关系密切的组织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在全省各地市、县抓捕它们的负责人、骨干。

由于形势突变，王效禹决定随机应变，联合山工总等群众组织夺权。他于 1 月 31 日即到济南的第二天，便召集济南的主要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商议如何夺权。会议商定兵分两路，一路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夺权，一路在济南组织召开大会宣布夺权。2 月 1 日上午，山工总等群众组织两万多人举行集会游行，表示坚决支持济南驻军镇压反革命，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当日，解放军济南卫戍区也发出通告，宣布解放军坚决镇压反革命。1967 年 2 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市卫戍区发布《第二号通告》，称："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操纵下，在夺权问题上，在'一.三一'反革命事件中，以及此后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反扑中，都扮演了极其丑恶的角色，担任了向人民解放军冲击的急先锋，罪责难逃，必须悬崖勒马，向人民认罪。如继续顽抗下去，就是自寻绝路。"[26]在此情况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赴省夺权代表团也表示支持军队的行动。2 月 2 日，山工总、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省委省人委大权赴省代表团等 25 个造反派组织两千多名代表在济南八一礼堂举行"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驻济南部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发言，表示支持。

2 月 3 日，近十万群众代表和解放军指战员在省人民体育场举行夺权誓师大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王效禹、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在会上讲话。大会通过了 38 个团体和单位（包括山东省军区）的《告全省人民书》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第一号通令》。山东省的通令内容与青岛、济南第一号通令内容基本一致。《第一号通令》的主要内容有：

一、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

二、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委、办、局负责人，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其它（他）一般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在本委员会领导下积极工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干部，应成为夺权斗争的骨干。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负责同志，要和那里的革命造反派联合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新的斗争实践中，考察他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

三、自即日起，废除前山东省委、省人委自 1966 年 5 月 16 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发布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除外）。

四、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领导并坚决支持全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其中包括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革命的基层组织），向本地区本部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凡是被右派、保皇派组织篡夺，或抢去的权力，革命造反派要坚决彻底夺回来。如有敢于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者，坚决严加惩处。一切革命造反派夺权之后，都要拥护和服从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五、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风头主义、分散主义、非组

[25] 1 月 31 日"山工联"围攻山东省公安厅遭镇压，后来被称为"一.三一事件"。详情可参阅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袭击山东省公安厅反革命事件的真相》，1967 年 2 月 2 日；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山大主义兵"总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部分罪行》；鲁迅大学红二.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扫残云》战斗队：《"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

[26] 《大众日报》，1967.2.23。

织观念、极端民主化，以及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提倡顾全大局，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谁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阴风，点鬼火，挑动群众斗群众，蓄意制造事件，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就坚决打倒，毫不留情。

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凡是矛头指向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惩处。全省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必须同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密切结合，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

七、坚决取缔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解散一切保皇派组织。严防政治扒手。要加强政治攻势。彻底摧毁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这个反革命组织。但对它下属的一切革命和愿意革命的基层组织，必须加以保护和支持，决不准许保皇派借机打击革命群众，如果乘机报复，立即制裁。一定要把一小撮反动分子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

八、大声疾呼：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者，都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坚守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要做革命的闯将，生产的模范，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生产、交通、财政金融，不准私分公共积累和储备粮，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违反规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者，坚决依法惩办。

九、一切革命造反者和革命群众，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开展触及自己灵魂的大革命，打破私字，大立公字。特别是夺权以后，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十、以上各条，自公布日起立即生效。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贯彻执行。”[27]

2月4日，军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名义发表《最坚决支持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胜利的声明》。同日，青岛驻军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青陆海空部队全体指战员”名义电贺大联合革命委员会诞生，表示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2月5日，十万余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在济南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所谓夺权胜利。济南军区空军部队出动两架直升飞机，在济南上空散发传单，传播所谓夺权胜利的消息。在游行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部队的车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2月6日上午，驻青岛陆、海军部队举行武装示威游行，祝贺所谓夺权胜利。场面可谓蔚为壮观。宣传车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数百辆汽车组成的示威游行大军，浩浩荡荡通过市区，每辆车上都高悬毛泽东的彩色画像，两边挂着歌颂毛泽东和庆贺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夺权胜利的巨幅标语。2月6日下午，德州驻军与群众万余人在车站广场集会支持夺权。2月8日，驻济南部队指战员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济南部队负责人讲话，指出：“我们这次大游行，就是用实际行动最坚决地支持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全力支持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28]

山东夺权虽然声势浩大，但反对“二三夺权”的势力也很强大。有的造反派组织，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组织镇压的山工联、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本来是山东最大的造反组织，由于冲击省公安厅被当作反革命组织取缔，但其人员仍有极大活动能量。以原来拥护山东省委、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为主的济南红卫兵师等，在1966年10月之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冲垮，其人员仍在。“二三夺权”遭到了这两方力量的质疑和反对。一些群众也迷惑不解，“夺权是个大事，思想准

[27] 同上，1967.2.3。
[28] 同上，1967.2.9。

备不足，这样夺太草率了吧？”“夺权要光明正大，为什么要幕后秘密策划？这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这不是大联合夺权！”“这不是自下而上的夺权！”“人民解放军武装示威是吓唬人！”这些议论在夺权同时出现。山工联等还散发传单，扰乱解放军游行队伍。有个题为“北京来电”的传单，说中央军委派来“海陆空三军调查团”，调查冲击公安厅的“一三一”事件。[29] 有的学生还冒充调查团成员活动。夺权中军队与群众组织的矛盾也开始显现。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左派。但何种组织为左派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完全由军队自己判断。因此，与军队发生冲突的群众组织无疑不会被认为是左派组织。

“二三夺权”后，山东各地群众组织纷纷向各地、各单位夺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省直各机关、各地市、县、公社、大队以及工交企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近十万个单位，都展开了夺权斗争。到 2 月 25 日为止，全省 13 个地市中，有 7 个被夺了权；112 个县市中，有 62 个被夺了权。[30]1979 年 1 月，王效禹在《自我检讨》中认为在夺权中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夺权把老同志一律靠边站。夺权后解放干部没有抓起来，到九大才解放了 83%，有些应该早解放没能解放。这当然会使老干部一肚子气。夺权面太广，从省到生产大队都夺了，这是第二个错误。第三个错误，联合的面还不够广，应当联合的没联合上。[31]

按照当时规定，夺权必须得到中央认可。山东省的夺权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催促下进行的，但也必须经过这一程序。在夺权的同时，王效禹派张子石带队，组成由军队干部、原来的党政干部、工人组织和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共十几人的代表团赴北京汇报。1967 年 2 月 7 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赴京代表，了解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谈了看法。2 月 9 日，王力在对北京有关群众组织的讲话中，谈到了中央对山东夺权的看法。他认为：“中央认为山东的夺权：（一）是真夺权，（二）军区的支持是得力的，（三）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有些过左，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构的很少，左啦。要他们回去后，按此精神改进，过一段时间再来汇报。”[32]由于王效禹未来北京，王力、关锋接见山东赴京代表团只是以个人名义，不代表中央，并指示要由王效禹率代表团到北京，中央才予以接见。之后，山东组成由王效禹带队的山东省赴京代表团，向中央汇报山东夺权斗争情况。

1967 年 2 月 18 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赴京代表团达到北京。当晚 8 点 10 分至 11 点 30 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省赴京代表团，并听取代表团关于夺权斗争情况的汇报。赴京代表团主要汇报了四个问题，即原来的省委当权派的所谓罪恶活动及认识；夺权情况和夺权后“敌人”的反扑；山大的情况和山工联的情况；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参加夺权群众组织的情况以及济南当时的形势。为了形势需要，中央文革小组对原来颇为欣赏并大力支持的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予以抛弃。由于代表团是由不同方面的代表组成的，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据《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山东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记载，在汇报会上，康生问：“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过去不是说是左派吗？”汇报人介绍了山大主义兵的产生背景，一开始就是保杨希文和孙衷文、王公乾，后来又被谭、白利用，张子明、童辛亲自把 21 箱和九麻包党内机密文件交给了山大主义兵总部一小撮作为礼物。这时江青说要逮捕。王力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期容纳了各种坏人，招降纳叛。”当汇报人谈到夺权后，山工联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对准了解放军和公安厅时，江青说，对准了

[29] 《王力、关锋同志接见山东省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讲话》，1967 年 2 月 7 日，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材料组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内部参考材料》，页 45，1967。

[30]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政权志》下，页 1209，济南，：山东人民，1995。

[31] 王效禹：《自我检讨》，1979.1.9。

[32] 《2 月 9 日晚王力同志对新北社、三司讲话》，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材料组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内部参考材料》，页 43，1967。

专政机关，应叫山大主义兵的广大同学、广大群众起来造上面个别的少数人的反。当汇报到部队游行，有的山大学生和联合会的成员攻击辱骂解放军时，江青说，你们应当当场逮捕。当谈到解放军到工厂做调查研究，有人造谣说解放军支持保皇派时，江青说，真是颠倒黑白，并要大家注意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有一种特务组织的严密性。在汇报会上，康生表现出了与江青等人不同的风格和素质。康生要代表团并详细询问了委员会成员各方代表比例。又问了农业怎样抓，煤炭生产怎么样，铁路运输怎么样，在不在你们手里？当谈到部队派人下去与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时，康生又问到有几个军分区，他们对大夺权的态度怎样，并说抓军分区、抓县武装部很重要。康生要求把山大毛泽主义红卫兵的一小撮坏家伙同广大的同学们分开，也要把联合会总部一小撮坏人和工人群众分开，要做争取工作，不要笼统讲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联合会，要讲一小撮，具体的工厂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33]

2 月 20 日，康生与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代表谈话。

2 月 22 日，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汇报了夺权情况及其后采取的办法；童国贵汇报了军队“支左”情况；韩金海汇报了山工总的情况，山东大学代表也作了发言，为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辩护；还有学生组织的代表指责军队在有些单位的“支左”中支持保皇派。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将文革小组和周恩来商量的意见作为建议提出：山东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

周恩来参加这次接见并讲了话。其讲话主要有以下内容：

首先，讲全国夺权形势：值得鼓舞的是上海首先打起了光辉的红旗实现了夺权，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夺了权，值得庆贺。毛主席注意山西夺权的三结合经验。毛主席指示解放军要支持和参加夺权斗争。人民解放军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坚强的后盾。如果我们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决策，怎么能够发动这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运动，因为有毛主席健在，亲自发动，同时有林彪同志作副帅，他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我们大家是心悦诚服的。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革命的党团员、革命知识分子，有人民解放军作后盾，保卫夺权斗争的胜利。1949 年我们夺了权，现在是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我们当时没有全部夺过来，有些地方还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有些是我们干部蜕化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夺权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

第二，阐述军队在夺权斗争的作用。山东从青岛发展到济南，正在向全省发展，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卫是不可能的。所谓保卫文化大革命，就是支持和参加，当观察家是不行的。参加运动要经过调查研究，实际接触。运动初期（去年八、九月份）我们有个念头，想要解放军参加，后来认为还早。现在不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了。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今年一月份主席提出的号召，山东是首先响应者之一，这样支持是对的，支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两个问题没有看清，出点毛病，是完全可能的，不能因为有一两点缺点，就不敢支持，不敢站在一起，连这个大方向也不敢承认。决不能与人民解放军对立，敌视就更不行。应该支持人民解放军参加夺权，这是前提，如果这个大方向搞错了，就要犯大错误。不能因为有一两点缺点，就放风，这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问题，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人民解放军站出来，支持大联合大夺权斗争，这是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威风的。这是总的趋势。人民解放军站出来，要互相学习，要调查研究，要实践，要摸索，要总结经验，不断前进。你们听了山西的

[33]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山东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1967.2.18。

报告，要进行讨论。这场伟大的斗争，没有解放军参加是不可设想的。

第三，讲夺权中的“三结合”与夺权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的思想——三结合一直发展到基层组织，工厂、公社需要夺权，也要三结合。我又讲了机关三结合，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革命群众相结合。将来机关要改组和合并，人民委员会进行监督。山东的革命委员会要成立，你们回去可以考虑扩大这个组织。山西的是 85 个人，山东才六十几个人，山东人口比山西多两倍。委员会要留点名额，给专区的、大工厂工人的、农民的代表。工人联合会开始是造反的，搞着搞着就向公安厅同志讲的那样了。我们要把大多数争取过来。济南是产业城市，还有青岛、潍坊、淄博、枣庄，这些城市工厂很多，要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另外，一个更重大的工作在农村，要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回去就要开会。有些地方可能假夺权。假夺权不要紧，组织左派夺过来嘛。造反派夺了权的，发现个别保字的、形左实右的，不要紧，错了再换嘛。农忙季节到了，一定希望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有的县委瘫痪了，要通过武装部这一组织，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影响生产。希望人民解放军在生产上要显一手，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这一点江青同志提出，主席同意，军委要下命令。济南军区也参加，山东省军区要负直接责任。”

第四，关于群众组织问题。山大主义兵在初期是有贡献的。你们（指参加汇报的山大同学说）中有少数人有一线、二线，但多数是可以争取的，这是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不断扩大这个夺权斗争，最后逐渐达到 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我们不赞成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赞成搞超单位的组织。全国搞了荣复转退组织，被我们否定了。它并不在机关工作，可是领着工资，容易被坏人利用。像山东的回民组织，这是不妥当的，这不是搞自治区（康生插话：自治区也是论阶级的。你们医学院支持回民造反团，这是错误的，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没有别的结果，只能造成民族分裂，这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个不能支持。类似哪年的毕业生，单独成立组织，变成了封建性的组织。还有合同工、临时工，单独成立了组织，搞乱了，到处串联。最近我们决定，除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回本地区、本单位、本学校参加夺权斗争。革委会的名单要扩大一点，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把三级干部会议开好。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都由主席审定。[34]

山东夺权时的名称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 月 22 日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中央负责人接见山东赴京代表团时明确提出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这是经过中央慎重考虑而决定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决定也反映了毛泽东在“文革”运动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上海的一月夺权并不是中央与毛泽东按事先的预定设想发生的。在上海一月夺权后，张春桥等人根据毛泽东称聂元梓大字报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和“十六条”崇尚巴黎公社原则等意图，并从陈伯达处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决定夺权后的全市政权组织叫“上海人民公社”。2 月 5 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但对夺权高度赞扬的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名称却持谨慎态度，这从“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词从未在《人民日报》中出现可以推断出来。叶剑英 2 月 11 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也批评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擅自改名的做法。毛泽东表示上海可以暂时叫“人民公社”，但其他省不要这样叫。可见，夺权后成立何种组织代替原来的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夺权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因此，在一、二月份夺权的省份、地方、企事业单位，夺权后的名称五花八门。如山西省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黑龙江省成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叫“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青岛市叫“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山东省和济南市均称“无产阶

[34]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山东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摘要》，1967.2.22。

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上海玻璃机械厂则成立了“革命生产委员会”。对夺权后原来的省委、省人委的问题，按照周恩来、陈伯达在接见山东赴京代表团讲话时的说法，在省委被夺权后，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小组，人民委员会负责监督改组合并后的机关。但两者到底与新的临时权力机构之间是何关系，并不明确。

针对新建立的政权名称不统一的状况，2 月 12 日，毛泽东为此事专门召见张春桥、姚文元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涉及到外国是否承认问题）。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上海一时改不过来，可以过一段时间。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一般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张春桥 2 月 24 日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谈到毛泽东对如何对待党组织的意见。毛泽东说，（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35]2 月 24 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 月 23 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关于更改名称的决定》说：“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自 1967 年 2 月 23 日起，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原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颁发的一切文件，一律有效。”[36]

“二三夺权”后，各群众组织纷纷向各地党政机关、各单位领导机关夺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省直各机关、各地市、县、公社、大队以及工交企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近 10 万个单位，都展开了夺权斗争。到 2 月 25 日为止，全省 13 个地市中，有 7 个被夺了权；112 个县市中，有 62 个被夺了权。[37]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先后建立。

3. “三结合”组织形式的确立及其原因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的机构由文化革命小组、生产指挥部和办公室组成。1967 年 3 月 3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生产指挥部，其领导班子由军队干部、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构成，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任组长。生产指挥部对省人委所属机构根据职能不同进行合并、调整、整合，设立办公室、农林办公室、公交办公室、财贸办公室、计划办公室、内务办公室等机构。[38]生产指挥部行使原来的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的职能，实际上是建国以后对政府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文化

35 《张春桥 2 月 24 日传达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1967.2.12—18 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纂委员会编纂，香港,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36 《大众日报》，1967.2.26。

37 《山东省志.政权志》下，页 1209。

38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议记录》，1967.3.3。

革命小组由王效禹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省直机关文化革命小组，实际上行使原山东省委的职能。[39]

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权力机构刚开始时，推举委员 60 余人，其中常委 19 人。他们是：王效禹、何志远、赵修德、韩金海、王竹泉、穆林、杨毅(9 月 6 日被撤销)、王历波、杜春胜、武如山、彭世杰、刘长茂、姜庆本、花光隆、刘欣德、张美智、陈凤来、王新阳、周海舟等 19 人。2 月 23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召开，标志着革委会开始作为临时权力机构行使职权。根据周恩来接见山东代表团时提出的要把革命委员会规模扩大一倍、增加委员人数的意见，革委会增加了部分成员。到 3 月，山东省革委会由 124 名委员组成。其中领导干部代表 25 名，占 20.1%；军队代表 33 名，占 26.6%；群众代表 66 名，占 53.2%。群众代表中，工人 26 名，占 20.5%；贫下中农 6 名，占 4·8%；学生 19 名，占 15.3%；其它 15 名，占 12.2%。[40]

山东省革委会成立后，着手建立两大职能机构，即生产指挥部和文化革命小组。3 月 3 日，山东省革委第四次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生产指挥部。[41]其领导班子由杨国夫、童国贵、孙芳圃、穆林、陈雷、李予昂、杨介人、刘欣德、张美智 9 人组成，杨国夫任组长，童国贵、陈雷、穆林任副组长。生产指挥部实际上行使了原来的省人民委员会的职能，下设所谓六个大口：办公室由原来后勤部的一部分加上办公厅组成，负责办理文电和机要交通；农林办公室负责原来的农业办公室等 13 个单位的工作；公交办公室负责原来的经济委员会及各专门工业厅局的工作，包括工业、交通、运输、小三线、支援大三线；财贸办公室以原来的财贸办公室为基础，负责财政、粮食、银行、商业、供销、内外贸、物价等工作；计划办公室负责计划、统计、劳动、物资、基本建设；内务办公室包括原民政厅、卫生厅、生产救灾指挥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另外，生产指挥部还设有外事办公室、民族、宗教、华侨、政协、政治学校和人事局等部门。生产指挥部实际上从 3 月 1 日起即开始办公。

山东省革委会在成立生产指挥部的同时，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小组由王效禹、何志远、赵修德、王路宾、陈凤来、王历波、韩金海、王竹泉、秦洪洲 9 人组成，王效禹任组长，何志远、赵修德任副组长。3 月 12 日，省革委第七次常委会议讨论文化革命小组组成机构和干部问题，决定文化革命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省直机关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由杜春胜、王路宾、周海舟、耿万茂负责；组织部由陈凤来、彭世杰、秦洪洲、田义生、刘文辉等负责；宣传部由王历波、武如山、张子石等负责（军队中一人是高维真还是徐杰暂不定）；保卫部由花光隆、姜成栋、刘正新、王云生等负责；联络部由魏振京、刘长茂、姜庆本、朱前贵负责；省直机关文革小组由王路宾、张自修等 13 人组成，王路宾任组长，张自修、姜庆本任副组长，26 日又公布孙芳圃任副组长。[42]

从山东省革委及其组成机构的人员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当时称“三结合”，即“文革”中成立的工人、学生等各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如韩金海、王竹泉、刘长茂、彭世杰、张美智等；原来山东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如穆林、陈雷、杨介人、杨毅、王路宾、王历波等；驻山东部队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干部，如杨国夫、赵修德、童国贵、孙芳圃、陈凤来、王新阳等。王效禹则属于比较特殊的人物，但从中央的角度，还是把他归属于原来的党政干部之列。山东省革委会的这种人员构成状况，与在青岛夺权时发出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中几乎排斥一切原来党政干部的论调大不相

39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议记录》，1967.3.12。

40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1921-1987）》，页 471，北京，中共党史，1991。

41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议记录》，1967.3.3。

42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七次常委会议记录》，1967.3.12。

同。青岛夺权之后，王效禹也曾向中央发电报，说叫老干部都靠边站了，重建了一套新的领导班子，都是 30 岁左右，很有生气。但中央并没有对此表态。

1967 年 3 月 2 日，《人民日报》就山东夺权发表的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的社论，更是对所谓“三结合”极尽赞扬之能事，称“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山东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山东省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山东省革命的领导干部一批一批地挺身而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并肩战斗。革命干部，特别是长期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地区部队，在最尖锐复杂的斗争日子里，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解放军同革命干部、革命左派群众一起牢牢掌握以毛主席为伟大代表的党的方针政策，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强大的支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43]

从山东夺权的史实看，这种说法未免牵强附会。所谓的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中一批一批挺身而出支持造反夺权的群众组织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三结合”不是夺权胜利的保证，而是当时形势下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在夺权之后建立的新的临时权力机构能够履行职能、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基础。

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毛泽东基于现实考虑而做出的决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以实行群众自治、全面选举的所谓巴黎公社原则动员民间力量来冲击官僚阶层和官僚队伍的。“十六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关于文化革命的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职能和性质，“十六条”认为它们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其实这些令人憧憬的词句中含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一是关于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性质的表述既不明确，也充满矛盾。群众组织和权力机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组织，与现在的政权机构是何关系并没有明确规定。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作为文化革命小组等代表的产生办法，政权机构的代表及工作人员产生办法是否也采取这种办法没有涉及到。但这些原则却对许多大、中学校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成为他们推崇的理想方式，一直坚持这一思想的群众组织，如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为毛泽东“文革”的最虔诚的崇拜者和推崇者，也成为“文革”中理想主义者的代表。即使毛泽东从他原有的思想退却之后，这批人仍在坚持这一原则。他们从这一原则出发，不与其他派别联合，而成为毛泽东后来提倡的大联合的反对者。因而，被其他造反组织称为“唯我独革”论者和分裂主义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文革”，对这些人不应忽视，而应正确分析对待。

“三结合”是从崇尚群众自治、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建立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的一个过渡。“三

[43] 《人民日报》，1967.3.2。

结合”这一权力机构组织形式甚至确定在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之前。夺权伊始，中央高层人士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周恩来、陈伯达 1967 年 1 月 1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群众大会上讲到上海出现“接管风”时，要大家防止“接管风” 刮起 。毛泽东当天就开会予以批评，讲了一些话。1 月 16 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当日的《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并经其亲自审定的。这篇第一次公开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以及《人民日报》1 月 19 日《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和 1 月 22 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虽然均号召大联合夺权，或者提出“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但对夺权后的政权组织形式均没有涉及和规定。1967 年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44]这可以说是“三结合”的最初完整表达形式。1 月 31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1967 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指出，在夺权过程中，要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建立的政权要以“三结合”作为基本组织形式，但对于权力机构的名称仍未明确。

1967 年 3 月《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45]关于三方面的关系，《社论》指出：三结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革命干部应该“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人民解放军代表也要起重大作用。从此之后，文革初期被至为推崇的巴黎公社式选举则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其充满理想主义的信奉者则被视为“唯我独革”者。

“三结合”是当时毛泽东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态度的体现和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的需要。1966 年毛泽东推动文革的几个重要举措，都是基于利用社会动员、群众动员的方式，借用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达到政治上改变现实、争取优势的目的。毛泽东并未意识到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对政治秩序和社会关系并不想做任何改变，而是仅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体制、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对在实际行动中赞同、支持中央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党的各级组织、各级干部不满，指斥他们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从其内心讲，并没有把这些人彻底打倒的意思，只是让群众“冲一冲”。所以，上海夺权之初，在毛泽东未表态之前，周恩来、陈伯达等都不赞成上海的做法。一旦毛泽东表态支持，周恩来即采取折衷的办法，在对“夺权”一词的理解和范围上做文章。在 1 月份的多次讲话中，周恩来反复讲“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抛弃，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首先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46]一旦夺权之后，如何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军队“三支两

44 同上，1967.1.25。
45《红旗》，1967.5。
46 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页 44-45，北京，人民，2006。

军”、把干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在全国的夺权部署中，有没有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上海自不必说，其它最早夺权的山西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山东省都是如此。如山西省有副省长刘格平、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张日清；黑龙江省更是有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贵州省则有多次给中央写信反映贵州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山东省则有王效禹。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这几个省都不是所谓群众组织自发的夺权，而是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有关。所有起来参与夺权的干部均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较密切联系。有的就是直接由毛泽东指使的。据王力回忆，毛泽东 1966 年早些时候就让刘格平到北京了解他的情况和受处分的情况，并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全局。12 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1967 年 1 月 4 日，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一说是受江青委派），要他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九个常委（当时山西省军区党委常委实有 12 人——引者注）只有他一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47]黑龙江省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则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1967 年 1 月毛泽东曾对毛远新如何在文革中发挥作用有批示。[48]潘复生、汪家道可以从毛远新处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所以支持造反派夺权。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最初起来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以前受到过处分或不公正待遇，此问题对分析研究文革很重要。

1967 年 1 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中指出，对领导干部要作分类，并要提出处理办法。毛泽东认为，当权派中的干部有五种：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是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是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关于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对当权派可分几种不同形式处理，一是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二是停职留用；三是撤职留用；四是撤职查办。1967 年 1 月 17 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代表时的讲话中也说：“夺权以后，（对干部）分四类处理，区别对待：（一）完全罢官，纯粹斗臭的就没用了；（二）撤职留用，三月为期，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三）停职留用，改过自新，以观后效；（四）留用，另外分配工作。这是我的想法，我在中央、主席那儿谈过，你们还可以创造。”[49]

康生则从维护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角度给造反代表谈干部参与政权、管理的重要性。1 月 19 日，康生接见青岛赴京代表时，在谈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后，康生说：“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又有问题了，实质上是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打江山的办法，解放那个地方接管了，不是通过群众暴动，从底下起来接管的。军队占领，军队接管，包括许多留用人员，当时是需要这样的。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理就在这里。接管有各种方式方法，有的完全接管，因为那些家伙全是黑帮。”当有代表插话问青岛市委是不是全部接管时，康生说：“ 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因为我们还有些具体事情，我们不熟，今天一个条子，明天一个条子，闹得你头昏眼花，不能抓

[47]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 749－751，香港：北星，2001。
[48]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195 页，北京，中央文献，1998。
[49]《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和科学院代表时的讲话 1966-1976》，1967.1.17。

文化大革命了。第三种，轻一点的可以停职留用。第四种更轻一点的可以监督使用，你听我的！这里有的全部接管，有的撤职留用，有的停职留用，有的监督使用，这要看具体人，具体时间，还要看自己的力量怎么样。可能还有反复，接了又下台。你们要看见具体的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经过几次反复，还有个王效禹。谭启龙让王效禹当市长，可能是想拴住他，搞不好再把他轰下去。所以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要注意不要陷入被动状态。具体问题你们来研究。革命不是绣花，但革命又是艺术，是有政策的，它也不是简单地一冲就完了。”（《康生对青岛市造反派谈两条路线斗争》，1967.1.19）

在确定“三结合”的临时政权机构之时，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斗或打倒。中央如何能让一部分干部出来工作，同时也让造反组织接受领导干部成为夺权后的第一任务。在1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提出：“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则专门论述了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它指出：“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50]

2月7日，王力在接见新华社记者时的讲话，基本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和中央的看法。他说：“夺权要采取三结合的方法夺权，不搞三结合，中央不予承认（有威信的造反组织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有代表性的党政机关的革命的负责人。如山西的刘格平，黑龙江的潘复生等）。以三结合来区分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不是过左，是不是脱离群众，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夺权。三结合搞得好的是真夺权，不搞三结合就不予承认。”[51]

毛泽东也意识到干部在革命委员会中的重要作用，对造反群众组织拒绝干部的态度不满。1967年4月毛泽东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说， 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三结合”也符合造反组织的需要。管理社会、组织生产、解决矛盾纠纷等不像起来造反那样容易，只要有勇气、热情就可以。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50]《红旗》，1967.4。

[51]《2月7日上午王力同志对新华社记者讲话》，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材料组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内部参考材料》，页43，1967。

特别是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与领导干部相比，社会阅历、管理能力、专业知识、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有欠缺，不可能立即实现对社会和生产的有效管理。1967 年 3 月 12 日至 18 日，毛泽东关于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问题三次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其中谈到，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青年人作了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52]1967 年 1 月康生在接见青岛代表团时的讲话也反映了这一点。夺权中的实际问题也使造反派认识到这一道理。如山东工学院 1 月中旬 27 个群众组织组成了革命造反指挥部，夺了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院内的一部分领导干部组织起来，准备成立行政领导小组，以抗衡革命造反指挥部。一些科室负责人对造反派“大事不找你，小事来麻烦”，利用造反派对业务不熟悉的特点，故意出难题，搞得造反派焦头烂额，体会到了造反容易掌权难。

4. 稳定社会秩序——革命委员会的首要任务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虽然确定建立以王效禹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但只是确定以王效禹为负责人，并没有确定其具体的职务。山东“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按照大联合的精神，着手夺权斗争后的稳定社会秩序，把社会引向正轨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具体举措与夺权之前有了很大变化。1967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革委、省军区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王效禹主持会议，赵修德代表山东赴京代表团传达了中央负责人的指示、讲话，杨得志传达了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指示，杨国夫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穆林作了关于生产的报告，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会议确定了下一步夺权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要求已夺权的地方继续发动群众，巩固成果，充实加强“三结合”领导班子，抓革命，促生产，完成斗、批、改任务，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在需要夺权的地方，要进一步做好夺权准备，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的条件下，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革命和生产抓起来；要紧紧掌握夺权斗争的大方向，积极整顿革命群众组织，一面战斗，一面学习，进行开门整风。

此后，山东省革委会为实行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实施了诸多有效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充分显示了“三结合”组织形式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第一，在继续批判谭启龙、白如冰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的同时，让一些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

3 月 22 日至 5 月 19 日，山东省革委召开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地区（市）群众组织的代表、解放军代表、站到“造反派”一边的领导干部和原省、地（市）委、省直各部门的负责人共 537 人。会议由王效禹直接领导，运用大、中、小会和大字报等方式进行所谓“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对山东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刘秉琳、秦和珍等进行批判，并集中揭发谭启龙的所谓问题。夺权之初，造反组织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普遍以“群众”和“干部”，“一般干部”和“领导干部”作为划分革命和不革命的标准，凡是干部就一律靠边站，凡是领导干部就一律打倒。对于所谓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领导干部，抓住不放。后来，由于中央的要求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这种做法有所改变。

1967 年 2 月 13 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的革命行动》，对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些干部加入大联合表示欢迎和支持。“对当权派，我们必须作阶级分析。严格区分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还是拥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不能乱轰一气，痛快一时，反对一切，

[52] 陈文斌、林蕴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页 322，北京，中共党史，1999 年。

排斥一切，打倒一切。那种见领导干部就揪，见当权派就打，‘洪洞县里没好人’，统统都要踢开的想法和做法，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极端错误的”；称赞领导干部“斗争经验比较丰富，政治上比较成熟，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较强”；“好的或比较好的革命领导干部占大多数，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团结他们，联合他们，信任他们，依靠他们。”[53]

一些领导干部看到夺权已成现实，不予承认也无济于事等种种原因，在承认所谓错误，表示支持造反后被吸收到革委会重新工作。2 月 13 日《大众日报》发表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山东省副省长陈雷的《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闹革命》和济南市市长杨毅的《热烈欢呼革命左派夺权的伟大胜利》的表态文章；14 日《大众日报》又发表山东省副省长杨介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的表态文章。2 月 18 日，王路宾写出《热烈欢呼我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伟大胜利》（在 2 月 19 日 《大众日报》发表）支持夺权造反。在济南，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杨毅在全市首先站出来造反，市委常委、监委书记徐珍，市委常委、副市长刘献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峰也相继宣布起来造反。之后，市委委员、市人委秘书长郑涵生，宣传部副部长陈岩生宣布起来造反。杨毅、徐珍、刘献林、郑涵生、陈岩生被吸收到革命委员会中来。[54] 惠民地区对原地委、专署的主要领导干部进行分析排队，并确定了认定站出来的干部的三个主要表现：

（一）彻底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和他们一刀两断；（二）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检查交代错误；（三）大胆地到革命群众里面去，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和革命群众战斗在一起。做到了这三点，就是真革命，就同他结合。在召开地委常委亮相揭盖子会上，以地委常委互相揭发批判为主，同时吸收中层领导干部参加揭发批判。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到 3 月下旬，惠民地委常委中的大多数人被允许重新工作。其中的地委副书记辛晓村、专员郭林、副专员谷前、王玉华等还被吸收参加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55]

第二，对一些社会各阶层成员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愿望组成的群众组织予以取缔。

在文革初期，特别是社会失控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群众都想借此机会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维护与争取自身的权益，他们成立了各种组织，提出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身的权益和利益。并为实现这些利益诉求与愿望采取一定行动。这类组织一般是由处境相同或相似的人组成，如一些所谓“地富反坏右”等社会底层的群众，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处于被歧视、被侮辱的社会地位，文革的斗争矛头指向所谓“当权派”，使他们看到了一丝改变处境的希望，从而借社会控制放松，中央号召造反，鼓励建立群众组织之际，打着造反的旗号，建立组织开展活动；一些从城里到乡下的知识青年，也借机成立组织，开展活动，争取回城；一些转业退伍或因受伤残疾退伍的军人也借机成立组织，要求提高待遇；一些临时工、合同工，因不能享受与正式工相同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借文革之际，要求转正。这些组织由于在省革委会成立后仍然活动，从而被看作不安定的因素，被新成立的山东省革委会或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当作“黑五类”等组织予以取缔。

除山工联、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在夺权以前因冲击省公安厅被当作反革命组织取缔外，1967 年 2 月 16 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发布通令，取缔一些群众组织，指责“他们有的公开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有的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欺骗和煽动部分群众，擅离工作岗位，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相对抗；有的疯狂反对革命左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挑起武斗，围攻和殴打革命群众，故意制造混乱，转移

[53] 《大众日报》，1967.2.13。
[54] 同上，1967.2.24。
[55] 同上，1967.3.23。

斗争大方向；还有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侮辱妇女，胡作非为等等，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当作反动组织明令取缔的群众组织有八个，即山东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特别司令部、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司令部、山东省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部、工农兵学干华东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国际造反军、中国工农红卫军山东革命造反总部、山东省革命妇女造反联合会。对八个群众组织和所属单位的处理意见是：“一、自即日起，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其为首分子应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如拒不登记或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定予严办。二、对上述反动组织中大多数受蒙蔽、被欺骗的成员，一律不予追究。对他们要和一小撮反动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欢迎他们迅速醒悟过来，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检举揭发为首分子的罪行，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生产和工作。三、上述被取缔的反动组织所占用的国家财产，全部追回，任何人不得转移和破坏，违者视情节轻重，依法惩处。”[56]

1967 年 2 月 19 日，济南市卫戍区发布第二号通告，规定：“绝不允许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造无产阶级的反，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目前夺权斗争中，更要老老实实，如胆敢妄为，坚决镇压。”，“‘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操纵下，在夺权问题上，在一三一反革命事件中，以及此后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反扑中，都扮演了极其丑恶的角色，担任了向人民解放军冲击的急先锋，罪责难逃，必须悬崖勒马，向人民请罪。如继续顽抗下去，就是自寻绝路。”[57]

此后，又有一些组织被当作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中有些组织是 1966 年之前由于国家政策调整或某项政策的受害者，如一些由于压缩城市人口、下乡上山、支持边疆、职工调出支持外地建设等从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员，在文革时纷纷回城，提出种种要求，要求回到城市。他们有的斗争街道居民委员会干部，有的冲击政法机关，斗争民警。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司令部就是主要由要求回城知识青年成立的群众组织，被当作反动组织取缔。历城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据称是由被打成右派的陈玉镐组织的，其成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想趁机造反夺权。他们被指责为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策划先夺鸭旺口等四个公社的党、政、财、文大权，然后再夺区委和县委的权，把银行、粮所等统统掌握起来，并对其成员分别任命了“公社党委书记”“武装部部长”“团委书记”等，“公开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翻案”，并组织队伍，手持刀棍凶器，多次袭击其它群众组织，与其它组织发生冲突。他们还被指责为大量撕毁毛主席语录，割断电话线，抢走了电话机、扩音器、广播喇叭、自行车等公共财物，对前去该区执行任务的军人和公安人员进行围攻、殴打、辱骂、搜身和关押，“对贫下中农非法进行扣押、捆绑吊打，罚跪罚站，有的竟被打的死去活来。不少贫下中农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土匪’‘大坏蛋’等等。

所谓‘历城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这个总部中的一小撮头目，多系地富反坏右分子。”2 月 16 日凌晨，驻济南部队派出两个连的兵力，联合历城县公安、检察、法院专政机关和群众组织在陈家岭、桥南、四风闸等村庄开始搜捕镇压，陈玉镐等被捕。当日，在遥墙区驻地召开所谓声讨大会，宣布其总部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58]2 月 28 日，“临沂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郯城分站”总部被当作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这个组织的骨干力量被认为多是成份不好的社会底层人员，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政治面目不清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其罪名是此组织认为，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四清”运动中发展的党团员、提拔起来的干部，统统都是保皇派。他们被指责为多次聚众冲击公安局、派出所、邮电局等，砸烂家具，抢劫机密材料，毒打群众。2 月

[56] 同上，1967.2.18。
[57] 同上，1967.2.23。
[58] 同上，1967.2.27。

3 日，城关邮电局遭打严重破坏，停止电话 30 多小时也被认为是他们的重要罪状。济南部队领导机关、省军区和省公安厅组成联合检查组，前往郯城与当地驻军配合，进行调查研究和处理。他们首先派出若干工作组，深入机关、学校、农村社队，开展政治攻势。2 月 28 日，郯城驻军配合专政机关，分批拘留了周英奇、戴平、田野、张铁朋、周元奎等骨干分子，并宣布取缔。3 月 3 日在郯城县城召开了声讨大会。

第三，对所谓造反群众组织进行整顿，逐渐恢复社会秩序，确立“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文革运动初期，为了把工人发动起来，打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的界限，实行大串连，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可谓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夺权之后，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态度和行为对恢复秩序、稳定局势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某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存在严重的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只注意小团体的利益，以扩大队伍为名，行发展自己势力之实；有些自以为有势力，自立门户，各自为政，把自己的组织变成独立王国，对其他组织不是平等相待，而是互相猜疑，互相排斥；甚至老子天下第一，有己无人，独霸一切，唯我革命，粗暴蛮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各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攻顸，甚至武力相向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在失去共同的斗争目标之后，群众组织各自混战的状况很容易把斗争矛头引向刚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这是毛泽东和已经夺权、掌权的所不愿看到和竭力阻止的。于是，开始采取整风等办法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2 月 16 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全市革命造反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7 日，青岛召开各群众组织 1300 多名代表参加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风动员大会。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对于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整顿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对工人组织的整顿，主要是取消跨地区、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跨地区、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的成立，为毛泽东在 1966 年底实现自己的意图创造了条件，达到了“天下大乱”的目的。夺权之后，毛泽东想恢复秩序，稳定局势，而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人群众，分属于许多自成系统的群众组织，在下面各自为政，甚至互相对立，已不能适应所谓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必须加以改造。在具体做法上，按单位、按部门把各派群众组织在统一的群众组织中，然后自下而上的按产业、按系统、按地区，实行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大联合。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 1967 年 3 月 2 日发出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公开信《在新形势下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大联合》。要求“全市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各总部（联络总部）应当立即撤销。”“各企业、事业系统或地区性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联合起来，和革命干部一起组成相应的系统或地区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临时权力机构一旦被市革命委员会承认，各系统、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分部（总部）立即撤销，原分部(总部)的脱产人员，除参加相应系统或地区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外，全部回原所在单位，与这些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完成新的共同的战斗。”“各基层单位（厂、站、商店、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联合起来，和革命干部一起组成本单位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它既是临时权力机构，又是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联合总部。这个临时权力机构一旦被上级临时权力机构承认，跨科室、跨车间的各革命群众组织的支队（总部、分部）等机构，一律撤销。除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成员外，不得再保留革命群众组织的脱产人员。”[59] 3 月 3 日，青岛东方红总部宣布即日起撤销总部，倡议各联络总部、分部、联络站也立即撤销。青岛国棉九厂原有的全无敌战斗兵团、东方红战斗兵团、赤卫队等 23 个群众组织，从厂级到生产小组层层归口，统一到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领导下，实现了所谓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

3 月 11 日至 16 日，山东省济南地区无产阶级

[59] 同上，1967.3.6。

革命派工人代表会议召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王效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负责人何志远、赵修德、陈凤来、济南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杨毅、济南市武装部队负责人于化坤参加并主持会议。600 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三号通令》，其主要内容就是对工人组织进行整顿，并规定通告各条也适用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其它企事业单位。通令共八条。关于工人组织问题，通令要求“按地区、按单位、按部门整顿和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省和济南市的各革命工人组织要联合起来，吸收原省、市总工会内革命造反派参加，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人临时领导机构——山东省革命工人临时总指挥部和济南市革命工人临时总指挥部。基层的革命工人组织，按单位、按部门联合起来，吸收原基层工会的革命造反派参加，建立厂和车间的统一的革命工人临时领导机构——革命工人指挥部，在各级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又对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起监督作用。各级革命工人指挥部一经建立，原有的省、市、基层的革命工人组织的总部、分部，一律撤销，不得再单独进行活动，其脱产人员也应回原单位，同革命群众一起，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整顿的方式方法，规定：“整顿革命工人组织，必须切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首先要自上而下地召开革命工人组织代表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实现思想大联合。尔后再自下而上地召开革命工人大会或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有代表性的、有群众基础的各级革命工人指挥部。”关于对原来参加出外串连造反回厂的人员的处理，规定“各基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响应省革命委员会号召返回原单位的各革命组织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要热情欢迎。……各级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在革命群众同意的情况下，可吸收他们参加各级临时权力机构或革命工人临时领导机构工作。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对这些革命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严肃处理。”对于各地如何贯彻执行，规定：“凡已经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地（市）、县（市），可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参照本通告的精神，与各革命工人组织酝酿讨论，整顿本地区的革命工人组织。”[60]

对于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整顿，首先是把学生从社会重新拉到学校中，复课闹革命。早在 1967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其中规定：从 3 月 1 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安排上课。2 月 27 日，济南市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举行有 32000 余人参加的“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提出了整风的要求，通过了《济南市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决议》。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山东工学院、共青团山东省团校等十几个学生群众组织代表和山工总代表 15000 余人集会，决定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开门整风运动，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纪律，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向所属组织发出《关于整顿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意见》，夺头脑中“私”字权，实现思想革命化。如山东省财经学院的 14 个群众组织，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按班、系和处（室）行政单位组织。财经学院按新的组织形式实行大联合，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通过充分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个联络总站——东方红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其任务是召集各群众组织，共同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互相通气。第二步，从组织上合并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当时，毛

[60] 同上，1967.3.17。

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人数最多的组织，但提出大合并、大统一的倡议后，这个组织的少数人暴露出“唯我革命论”的思想，他们说其它组织“革命闯劲不足”“右倾保守”，想“下山摘桃子吃”，是“政治投机”，和它们合并，是搞折衷，和稀泥。其它组织的有些人也在组织名称、袖章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在“二三夺权”之前，山东几乎各个较大群众组织在北京都有代表，有的还设立了联络站。夺权之后，所有参加夺权的组织和支持夺权的组织的人员，均被要求从北京撤回，所有联络站一律撤销。王效禹亲自去北京把这些人接回，据说一次飞机接回 300 余人。

第四，在力图恢复社会秩序的同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特别是春耕生产给予充分重视，并号召各行各业支持春耕生产。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经毛泽东批准，1967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发出。信中建议立即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2 月 14 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发出《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掀起春季生产高潮》的通告。山东首先从组织上保证春耕生产，要求建立和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县以上领导机关，建立生产指挥部；县以下单位，建立领导生产的小组或委员会。把农村中所有的劳动力，最大限度的组织到春耕生产中。到外地串连的社员，劝说回社队，就地搞生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凡外出的立即回生产岗位。到社队串连的学生，要参加春耕生产运动。关于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规定“凡是中央颁布的农村中的各项政策，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规定前，一律按照原规定执行，任何人不得任意改动”。[61] 2 月 23 日，周恩来紧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人，火速布置春耕生产的领导工作，要求立即建立以当地驻军或武装部门为首、吸收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各级生产领导班子。2 月 23 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当时的春耕生产由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负责领导，由省军区召开春耕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各军分区、武装部、省革委和农村部门的人参加，部署春耕生产工作。

3 月 1 日，省革委组建了以济南军区、省军区和原省委、省人委几个负责人为主体的生产指挥部。 3 月 12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紧急通知》，要求“各行各业支持农业生产，应以支持春耕生产为当务之急”。到 3 月中旬，山东省从省、地、县自上而下，不论夺权还是未夺权的地方，都建立起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指挥部由群众组织代表、部队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组成。省革委会抽出 500 多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各地组织春耕生产。

3 月 10 日至 18 日，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3 月 17 日至 25 日，又召开全省财贸工作会议。3 月 23 日至 3 月 25 日，济南部队领导机关召开济南铁路局和省交通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可能因为铁路局已实行军管）。驻济南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军队大力支持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省军区、各军分区和县武装部，从领导机关到下属部门，从干部到战士，把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迅速进行各项工作。

在工矿企业，在 1966 年底，由于受到学生和造反工人组织的冲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组织一度瘫痪，厂长的行政指挥权也被取消。为恢复和稳定生产秩序，在对各种工人群众组织进行整顿的同时，山东省革委与山东省军区联合召开会议，贯彻国务院有关指示。从 1967 年 上半年开始，大型工矿企业相继建立由军代表、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小企业一般由原来的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均为党政合一机构，统管企业的一切事务。后来，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还派出官兵，进驻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有的企业还一度实行了班、排、连等军事化建制。

[61] 同上，1967.2.15。

历史地看，夺权成立“革委会”显然是错误的，但有了权力机构毕竟比没有权力机构为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无政府主义，稳定局势，促进某些有益工作，如抓生产、复课等的开展。

5. 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冲突以及与军队、党的机构关系的演变

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权力机构行使职权，但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职能、组织形式等诸多方面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革命委员会同原来的党的组织的关系、同原来政权组织形式省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群众组织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规定。特别是省革会与地区革委会之间，省革委会内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革委会在“文革”期间并没有成为一个正常有效发挥权力机构作用的组织。

关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与当时负责“三支两军”任务的驻山东省的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关系，有一个演变过程。

在山东省革委会初期，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接连不断。如有的军队“三支两军”负责人就说：省革命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我们可以听它的，也可以不听它的。在 1967 年 2 月到 5 月期间，军队与造反派发生了尖锐冲突，并曾一度出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挥部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双方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指责对方。如山东省军区认为：“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造反组织负责人则指责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用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群众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62] 山东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分歧和冲突在省会济南和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济南，主要表现为在“三支两军”军队干部支持下建立的各机关、学校、大中型企业等革委会和拥护、支持军队干部的群众组织与省革委中群众造反组织之间的冲突。如在济南公安局、济南针钉厂、济南国棉三厂、济南灯泡厂等地持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不断，到 4 月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即拥护、支持“三支两军”军队干部的“四二二”派和拥护、支持省革委和王效禹的“四二八”派。在山东其它地区，除青岛、烟台等少数地区外，则表现为各地区革委会与省革委会的分歧和冲突。由于地区革委会是在军队“三支两军”的帮助下建立的，绝大部分地区革委会由军分区的负责人任革委会主任，掌握实际权力，他们与济南军区和省军区采取基本相同的对待激进造反群众组织的态度，从而与省革委会和王效禹产生了严重对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王效禹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况是说：“在全省若干地区革委会带头反对省革委形成了反对省革委的一派，各地被压的群众形成支持省革委的一派。部队支左的同志许多是站在反省革委的这一边，从而影响到军队和省革委的关系问题。”[63]

为解决王效禹、省革委与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的矛盾，1967 年 4 月底，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等中央负责人接见双方代表，解决山东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采取了压制军队，支持造反派的态度。要求济南军区、省军区负责人都要参加省革命委员会。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把一切大权集中于革命委员会；撤销军队支左指挥部；各地区革委会部队干部当一把手的，要调开或者采取过渡的办法等等。[64]1967 年 5 月初，拥护、支持军队，反对王效禹、省革委的一派群众冲进省革委大院静坐、示威，试图迫使中央对山东问题重新表态，5 月 7 日，王效禹和省革委以反击“资产阶级新反扑”的名义包围和镇压了这一派群

6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页 339。
63 王效禹：《自我检讨》，1979.1.9。
64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领导同志接见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等同志的讲话》，1967.4.27。

众，这就是“五七事件”。

“五七事件”之后的第二天，即5月9日，中央正式任命王效禹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第一副主任；5月10日，批准韩金海（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王竹泉（学生造反组织负责人）、赵修德（军队代表，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为副主任。5月19日，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央试图通过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委会成员相互到对方任职的方式解决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这并没有消除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5月底6月初，山东省军区、济南军区被迫公开承认、检查支左工作的所谓错误。到1968年3月，青岛、济南、淄博等10个市地、91个县（市区）重新成立或改组了革委会。大批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组织也成立了新的革委会。山东省在其它各地武斗不止的时候，实现了暂时的稳定。1968年底到1969年初，省革委会中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再次激化，王效禹企图通过反“复旧”运动排挤、打击军队的负责人，但遭到中央的批评。1969年4月“九大”之后，王效禹失去对省革委会的控制，造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被从省革委会中清洗。造反派控制山东省革委会的局面结束，军队干部和原来的党政干部后来实际上掌握了省革委会的权力。

关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与山东省委等党组织的关系，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组织和党的权威是一次严重冲击，山东省委和各级党委一度停止活动。对党的各级组织以及负责人的贬低和批判，使许多人对党组织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以群众组织负责人为荣、以党员为不光彩的思想倾向。山东还一度出现“群众组织领导党，群众组织发展党，群众组织审批党，群众组织代替党”的论调和做法。但毛泽东虽然对绝大多数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和表现不满意，并一度把党的组织系统抛在一边，利用个人的权威去指导和领导运动。但对党组织的作用和党组织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还是持谨慎的态度。毛泽东多次表示，党还是要要的，不管怎样，总要有一个核心，要建立一个改造了的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中央也曾明确要求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为贯彻中央要求的成立共产党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的意见，在“五七事件”后山东省革委会曾专门研究，并确定由王效禹、王路宾、王历波、庄中一、韩金海、王竹泉等组成。由于韩金海、王竹泉当时根本不是党员，这一意见未获中央批准，此事也就此搁置。因此，在1969年中共“九大”之前实际上在省革委中并不存在党的核心小组。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重要内容之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以整党为中心，逐步恢复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健全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班子。在“九大”之后举办的山东27人学习班上，中央决定建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7名成员均属于原来的领导干部和军队干部，没有一个造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但当时对核心小组的性质、组成原则以及与省革委会、群众组织的关系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有的认为核心小组应当由革委会常委会批准，有的提出核心小组应当在省革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为了确定和树立党的核心小组的权威，中央负责人强调：核心小组是党组织，不能把党组织实行“三结合”，不能把党的组织和行政机构混在一起。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在革委会中是最高领导机构。从而明确了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党组织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和领导。之后，省革委会的组成人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王效禹由于发动反“复旧”实际上处于被批判的处境，造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被从省革委会中清除出去，原来的领导干部和军队干部被补充进革委会，并担任领导职务。白如冰、苏毅然等原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和一批厅、局部门的负责人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配合军队干部构成省革委各部门的领导核心。“三结合”的形式在“九大”之后已经名存实亡。“三结合”的含义被解释为老、中、青“三结合”。

1971年4月，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成立，杨得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至此，山东省革命委员

会的性质、职能均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成立之初的党政合一的机构转化为单纯的行政机构，履行政府职能。1975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实际上第一次对"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通过立法的程序加以确认。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性质、职能也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6.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评价与分析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但并没有随着 1976 年 10 月文革的结束而取消。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是逐步改变的。首先取消的是地区级革命委员会。1978 年 7 月 5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将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行政公署的通知》，并确定自 7 月 10 日起，将昌潍、烟台、临沂等 9 个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行政公署，作为省革委的派出机构。[65] 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问题的决议》，决定取消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名称，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1979 年 12 月，山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设立省人大常务委员会，组建山东省人民政府，撤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至此，存在 13 年之久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寿终正寝。

不可否认，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力图解决建国以后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机构臃肿等种种弊端的意图，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定效果。革命委员会的也可以看作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的一次重大探索，也是实行大部制的一次尝试。但从根本上讲，成立革委会的初衷并没有达到。

精简机构是成立革委会的原因和目标之一，在革委会初期确实见到了一定成效。1967 年 12 月，王效禹在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提纲中谈到当时省革委有工作人员近 600 人，并准备将行政编制定位 1000 人左右。[66]这确实比"文革"前的人员大大减少，但由于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变化，精简之后即膨胀的怪圈并没有并打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为单纯的行政机构后，其工作机构的设置也逐渐回归到"文革"前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时的建制，工作部门大大增加。1972 年设工作部门 37 个，1975 年增加到 48 个，实有人数也由 1972 年的 3115 人增加到 1975 年的 6097 人。[67]通过设立革命委员会实现精兵简政的意图都没有实现，更遑论实现消除党政机构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意图了。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革命委员会的结构违背决策、执行、监督机关分立、行政机构负责人应采取选举方式产生等现代政治制度应坚持的原则。这种体制把以往的党政不分、政企合一的一元化体制发展到极端，只适应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而不适合管理现代国家的要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群众组织和群众代表直接进入政权机构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工作。革命委员会重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消除官僚体制所存在的弊端，维护公民的权益，限制官员的权力，其目的和出发点确实是现代民主政治所追求的目标。但由于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规则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也就决定了其目标不可能达到。这也是"文革"存在的诸多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悖论之一。公民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是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色，但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法律为基础。群众运动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但对公民有序参与国家管理并不一定有益处。在当时，革命委员会被认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是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直接参加管理的权力机构。实际上它的产生是中国政治体制在职能、结构上的一

[65] 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山东四十年纪事》，页 137，济南，山东人民，1989。
[66] 《王效禹向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提纲》，1967.12。
[67]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组织史资料 1949-1987》，页 61，北京，中共党史，1991。

次重大转变和倒退，违背了当代国家政治体制内各种职能的分化及其由单一向复合发展的方向，是有悖于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组织机构。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全国建立最早的五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之一。夺权、成立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显然是错误的。但在党政机构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或半无政府状态，绝大多数党政干部遭到揪斗、批判，无法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有了权力机构毕竟比没有权力机构为好。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无政府主义，消除武斗，稳定局势，恢复和促进生产。山东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减少了社会冲突，减轻了社会动荡。一是为一部分原来的领导干部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在夺权之初，造反组织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普遍以“群众”和“干部”，“一般干部”和“领导干部”作为革命和不革命的标准，凡是干部就一律靠边站，凡是领导干部就一律打倒。在成立革委会后，原来的领导干部被认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政治上比较成熟，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较强，成为“三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一部分领导干部在承认所谓错误，被吸收参加革命委员会，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二是对造反群众组织进行整顿，取缔了一部分造反群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秩序。仅 1967 年 2 月 16 日，就命令取缔 8 个群众组织。对工人群众组织的整顿，要求采取取消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根据原有组织系统，按单位、部门、系统和地区把各派群众组织组织在统一的群众组织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运动对生产的影响。对于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整顿，首先是把学生从社会重新拉到学校去，复课闹革命，然后把各种组织进行联合归并。并开展整风运动。如山东财政学院的 14 个群众组织，按班级、系和处室行政单位组织，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特别是春耕生产给予充分重视，并号召各行各业支持春耕生产。1967 年 3 月 12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紧急通知》，要求“各行各业支持农业生产，应以支持春耕生产为当务之急。”之后，省革委会又相继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省财贸工作会议部署工作。1967 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近 10%。[68] 而 1967 年山东工农业生产总值则比上年增长 5.9%。[69]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较早成立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68] 孙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 年代初）》，页 34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2。
[69]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 计划志》，页 327，济南，山东人民，1996。

【研究】

从电影看毛泽东时期与斯大林时期的爱情观

——兼论中苏对资产阶级文化之迎拒

余敏玲

内容提要： 本文以电影为媒介探讨和比较中苏的爱情观及其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中苏两国同样强调爱情观应以集体为重，先公后私，但是苏联给予的爱情空间大于中国，甚至在二战期间“以私济公”，利用爱情宣传保家卫国。更重要的是苏联不会直接将谈恋爱与资产阶级言行挂勾。反观中国，公的比重从大跃进到文革越来越高，最后只能允许有公无私的集体感情，不允许个人私情。本文藉由中苏两国在电影中所呈现的爱情观，说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认知差异。自 1936 年苏联公布新宪法之后，斯大林基本上将作为敌人的经济上资产阶级和作为学习对象的文化上资产阶级分别对待。毛泽东则将两者合而为一，既要打倒经济上的资产阶级，也要消灭文化上的资产阶级。两国领袖对资产阶级文化认知差异，因而有不同的政治实践，这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中苏同为共党政权本质及其政治文化之异同。

关键字： 爱情、社会主义新人、电影、集体为重、资产阶级文化

中共建国后，在官方逐渐掌握所有的诠释权之下，1949 年以前的一切都是“旧”的，植基于封建主义、封建阶级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旧”观念及“旧”行为模式等等，都应该铲除。反之，1949 年以后的一切都是“新”的，都应该扶植与推广。根据这样的思维逻辑，“新社会”“新中国”治下人民的言行和人生观必须迥异于“旧社会”；“旧社会”过来的人需要改造，“新社会”生长的人需要塑造。为此中共树立了以共产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新人”或称“社会主义新人”典型，他们是所有人都应该见“贤”思齐的最高标准，并广为宣传。

在毛泽东时代，新人的核心价值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崇尚劳动（体力劳动为要），重视阶级斗争，具有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人类的理想，强调集体至上，摒除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则是以党国意志为依归，亦即党性的培养。中共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毛泽东所谓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教育群众。中共重视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更重视社会教育，而宣传就是社会教育关键的一环。共产党的宣传媒介多元多种，电影是其中之一。列宁说过，电影对党来说是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掌握了电影之后，电影就成为教育群众最强而有力的一种工具。斯大林也说过，“电影帮助工人阶级及其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为社会主义奋斗而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与他们政治战斗的能力”。因此电影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1] 本文利用电影探讨社会主义新人的爱情观，分别从公与私、集体与个人、阶级的角度来检视爱情与党国、劳动、革命

[1] 斯大林在 1934 年苏共十七大中提到苏联电影放映机的数目，从 1929 年的 9,800 单位，增加到 1933 年的 29,200 单位。Н. А. Лебедев ред., *Партия о кино* （党论电影），(Москва: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1939), с. 24, 7, 10, 41, 44-45.

事业的关系。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爱情？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爱情?新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如何正确地摆放爱情的位置？中共认为这些绝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它与集体、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本文将毛泽东时期与苏联的斯大林时期的爱情观作比较与对照，希望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苏两国共产政权本质及其政治文化之异同。中共从建党开始，由早期的以俄为师，到 1960 年代以后的以苏为鉴，均与苏联的关系密不可分。两国意识型态、制度和机构的同质性高，然而在落实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上仍有差异。本文想追问的是中苏处理私领域的感情和公领域的党国集体有何异同?谈恋爱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言行?为什么会产生差异?两国的差异不仅反映出历史文化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显现斯大林和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文化之迎拒，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其次，本文讨论的爱情观主要以情为主，不涉及性。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之下的苏联电影基本不谈性，二战之后连性暗示也被审查删减。[2]中国电影在毛泽东时代也几乎不触及性的问题。此外，中苏电影生产机制复杂多面，本文讨论的以影片最后上映的文本为准。剧本创作过程或审查机构要求修改的部分，原则上不加讨论。

1. 斯大林时期的爱情观

苏联共产党以党掌控文艺的基本方针，最早表现在 1905 年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他主张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更不能与无产阶级大事业无关。“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有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3]这个方针的实践在十月革命后及接续而来的内战，却力有未逮。党的许多行政命令基本上是纸上谈兵。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当时所有文艺工作者，均与党的文艺政策背道而驰。1920 年代数位国际著名的苏俄导演相当认同党所提出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1925-1929 年苏联制片厂生产了 514 部电影，绝大多数的电影都有政治目的，鼓吹政策性的各种运动(如对抗性病等)。事实上，艺术家面对这样的挑战，每个人的反应和解释国家政策的方式不见得完全相同。4有关当局也能容忍这些歧异的内容呈现或诠释。即使其后苏联实行文化革命，[5] 打击“资产阶级文化”，党对文艺界的控制仍然相对有限。1932 年俄共政治局决议废止苏联所有独立的作家组织，确立以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为文艺创作的原则。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过世为止，政治局关于意识型态或文化议题的决议均有他的参与或得到他的同意。但这不是说苏联的文化完全由斯大林及其亲信所形塑而成。掌管文艺的党领导对文艺政策的看法也很分歧。许多文艺工作者即使是党员也不一定无条件支持政治局的决议。[6] 二战期间文艺界对政治局决议的实践程度远不如党中央的期望，二战之后政治局冀图升高对文艺的控制，因而有另一波大规模的文艺清算，宛如文艺冰冻。直到斯大林过世，苏联文艺界才出现解冻现象。

素有生活百科全书之称的电影，乃是推展正确爱情观的一个主要媒介。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劳动创造人类所有的幸福，这也包括了爱情的幸福。共产党人相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免受经济的支配，两性关系乃是以个人财产为衡量标准，

---

2 Herman Ermolaev, *Censorship in Soviet Literature, 1917-1991*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pp. 89-133.

3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ература, 1960), 5 изд., том 12, с. 99-105。俄文的“литература”含意比中文直译的“文学”要广，可指涉任何书面文字。但是中共中央编译局迳译为“出版物”也不合适。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 年 11 月 13 日[26 日]〉《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二版，卷 12，页 93-96。

4 Peter Kenez, *Cinema & Soviet Society, 1917-1953*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4.

5 关于苏联文化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差异，详见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Abbott Gleason et al ed., *Bolshevik Culture: Experiment and Order in Russian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79-293.

6 Katerina Clark & Evgeny Dobrenko with Andrei Artizov & Oleg Naumov, *Soviet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1917-1953*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40-41.

恋爱转变成一种买卖、一种商品。人类的真正自由恋爱和幸福，只有在打破私有财产及其社会制度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列宁认为爱情是有阶级关系的。但他没有明言无产阶级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间接提到无产阶级的恋爱最重要的是可以脱离物质及钱财上的顾虑等。[7] 斯大林时期官方宣传资产阶级在男女恋爱关系上，烙下了肮脏的金钱买卖印记。婚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成为娼妓制度的变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婚姻和家庭基础，“更基于生产和文化利益的共通性、基于政治、思想观点的统一而建立的真正相互的恋爱”。同时，有关当局驳斥任何不受节制的恋爱自由，乃是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跟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毫无关联。[8]所谓不受任何节制的恋爱，指的是爱情不能只有自我，还需要工作、参与劳动或致力于更远大的集体福祉。这也是苏联新人的爱情观基调：谈情说爱的前提是心中要有劳动或集体大我。

1930年代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描写工农生活的电影成为主旋律。有关农民的电影多于工人电影，以集体农场为背景的电影更多。其中裴利耶夫(Ivan Pyr'ev, 1901-1968)导演的《富裕的新娘》(Богатая невеста, 1937)、《拖拉机手》(Трактористы, 1939)、《养猪姑娘与牧羊小伙》(Свинарка и пастух, 1941)的主题都是描述集体农庄的青年男女致力于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幸福的爱情生活。这三部电影都有三角恋爱的情节，且均拍摄于大整肃及德苏战争即将来临之际，在政治与战争的高压与紧张气氛下，并没有影响到电影对爱情的着墨，而且受到党的高层支持。[9]例如，在中国最有名的《拖拉机手》叙述一位从远东复员的坦克兵克里木，决定回到故乡乌克兰开拖拉机；因为他心仪的劳动英雄玛丽亚娜也在那里工作。在集体农场工作的玛丽亚娜是个热情、豪迈的人，拜倒在她工作裤下的人（全片只有结婚那一幕她穿了裙子），络绎于途。这些不断求爱的人，令她无法将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为了断绝仰慕者对她的追求，她谎称拖拉机手那札勒是她的未婚夫。此话一出，全体哗然。原来那札勒是个工作落后分子，既不爱惜机器，做事马虎，又爱喝酒。克里木亦信以为真，但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依然积极投入工作，还帮助那札勒也成为劳动英雄；并教导农庄的青年学习军事技术，以便抵御可能随时而来的外侮。结果因为他这种忘我地为集体劳动的精神，终于获得了玛丽亚娜的芳心。全片主旨是爱情可以和劳动兼得，但劳动在先，其后才会得到美丽的爱情。本片拍摄于苏联大整肃期间，又值日苏远东关系紧张，国家处于内外敌人严重威胁之际，但片中展现了即使有战争的可能，并不妨碍人民谈恋爱结婚。

在集体农场可以得到的美丽爱情，同样可以在工厂得到，《光明之路》(Светлый путь, 1940)就是讲述这样的故事。来自农村的姑娘塔孃，原是个文盲，来到城里一小旅馆当经理儿子的褓母，因故被解职，转到工厂工作。她在工作之余，时时抱著书本，初为识字，后为钻研技术。室友说她是书呆子，她也不在意。塔孃长得甜美，追求她的人很多，他们经常用送花、抱吉他唱情歌等方式向她传情。塔孃爱上了工程师列别杰夫，但认为自己是个技术欠佳、文化程度也不够的纺织工，自形惭秽，觉得配不上这个“有学问、有知识”的工程师。在党的领导与支持下，她发愤图强，终于如愿当上劳动模范、工程师，甚至当上最高苏维埃代表。她住的女工宿舍舒适富丽，有如过去贵族居住的豪宅。全片对女主角的际遇和爱情的处理，宛如灰姑娘故事的翻版。特别是片尾塔孃和列别杰夫在莫斯科相见的大厅，金碧辉煌，就像灰姑娘变成公主与王子相遇、跳舞的宫殿。[10]其后他们沿着苏联农业成就展览馆

---

[7] 列宁，〈致伊·费·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二版，卷47，页69-70。(1915.1.17)这里只谈苏共的主流想法，柯伦泰较具争议的观点不在讨论之内。

[8] 柯尔巴诺夫斯基着，草婴译，《苏联的恋爱婚姻与家庭》（上海：时代出版社，1950），页16, 25 , 27-30。

[9]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А. А. Ждан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ЦК ВКП(б) по вопросам кино»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кинотеатр 1928-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док. 258, с. 724.

[10] 本片原名就叫做《灰姑娘》，斯大林认为影片内容比灰姑娘的故事更为宽广。他列了一张表建议改名，最后导演亚历山大罗夫选了《光明之路》。Г.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Эпоха и кин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3) с. 257.

内的喷水池散步的场景，也是拍得如梦似幻，十分浪漫。不过，党在塔嬢的感情世界并没有扮演任何主导性的角色。这部片子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塔嬢觉得自己必须也成为“有学问、有知识”的人，才能和列别杰夫匹配。事实上，这反映了斯大林时期的资产阶级生活品味和文化价值观，[11]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女工们用香水，以及塔嬢出席劳模表扬大会时，穿的是洋装和高跟鞋，不是工作服。另一方面是本片不讳言工农不满足于当下地位，想要向上爬升到工程师、专家的身分地位。同时，代表知识分子/专家的文化是应该被赞赏与效法。即使工农成为劳动模范，斯大林也期望他们的文化水平要提高到与工程师、技术人员相同的程度。例如，劳模家中的书架上除了有列宁和斯大林的文选，还必须有伟大的俄国/苏联作家如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爱伦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萧洛霍夫以及西方作家如 Walter Scott, Jules Verne 等的作品，还有旅行、探险、描述遥远国度的书籍。[12]

换言之，知识分子的身分和文化并不会受到歧视，反而受到鼓励。这是因为自从 1936 年颁布新宪法之后，斯大林声称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工具均已为国家或为集体所有，私有财产制已经被废除，所有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代表农村资产阶级的富农在农业集体化后都被消灭了，国内的阶级敌人既然消失了，国内的阶级斗争也随之消失。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过去资产阶级社会下的知识分子，而是苏联新社会的产物。苏联知识界 80%-90%都是由工人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阶层出身者组成，因此在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13]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推崇的同时，过去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文化也跟着借尸还魂地再度出现，而且被视为苏联社会进步的象征。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苏联当局允许电影所表现的男女爱情，其态度前后颇为一致：只要没有忽略劳动工作，恋爱是受鼓励的。因此，完全没有呈现劳动工作的爱情电影，无法为官方所认可。例如，喜剧片《四个人的心》(Сердца четырех, 1941) 围绕着两男两女的感情而展开。女主角的妹妹因为堕入爱河而无心学习，受到姊姊的谴责，但是仍受到母亲的呵护。当时掌管苏联文艺大权的日丹诺夫 (Andrei Zhdanov, 1896-1948)，批评本片许多近乎闹剧的手法，如人不小心掉到水里、杯中的水无意间洒到他人脸上等，琐碎庸俗，不能唤起群众的热情。日丹诺夫不反对本片以爱情为基调。不过，先是一个科学家和一位军官同时爱上数学家女主角，她妹妹却以为军官爱上自己；接着变换角色，科学家爱上她妹妹。这样陈腔滥调的情节，不足为取。特别是红军军官们变成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吸引异性，想出求爱的各种手法。结果中央委员会宣布已经上演 10 天的电影停映，理由是没有正确地反映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将苏联人民描绘成轻浮享乐、无所事事的人。[14]喜剧片向来是苏联当局喜爱的一个剧种。善于拍摄喜剧的导演裴利耶夫主张创作需要有些罗曼蒂克的情节，否则无法过日子。日丹诺夫同意这样的看法，但坚持这些情节必须表现出其背后驱动力是为崇高的五年计划而奋斗。[15] 换言之，没有结合劳动工作的爱情不为

---

[11] Vera S. Dunham, *In Stalin'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9-20, 96-104.本书的”Middleclass”，指涉的不是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而是较接近俄文 мещанство 的小资产阶级。全书焦点虽放在二战后的苏联社会，但是作者也认为资产阶级价值的发端于 1930 年代。关于 1930 年代苏联当局鼓吹的资产阶级文化品味，参见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0.

[12] G. Griedrich, *"Miss U.S.S.R." The Story of Dusya Vinogradova*, p.24; Иван Гудов, *Путь Стахановца: Рассказ о моей жизни* (斯塔汉诺夫工作者之路：讲述我的一生)，(Москва: Гос.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8), p. 130.

[13]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编，《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新华书店，1949)，华中第一版，页 11。

[14] «Неправленая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го слова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ВКП(б) А. А. Ждан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кинематорграфистов в ЦК ВКП(б)(1941-5-14)»; «Поставление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ВКП(б) о запрещении к выпуску на экран кинофильма 'Сердца четырех' (1941-5-26)» Артизов А, Наумов О. сост.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 — ВКП(б), ВЧК — ОГПУ —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9) док. 64, 66. с.472-473.

[15]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А. А. Ждан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ЦК ВКП(б) по вопросам кино)(1946-4-26) » Г. Бондарев ред.,

官方所允许的。

此外，倘若电影描述党的干部对爱情不忠，等于破坏了党的形象，亦在禁演之列。电影《生活的法则》(Закон жизни, 1940)即为一例。电影的广告宣传本片是关于苏联青年的爱情和友谊，但片中却揭发素来受人尊敬的共青团书记的始乱终弃，对感情不负责任。《真理报》批评这是部不真实的电影，片中的大学生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对寻欢作乐的兴趣大于马克斯主义，电影没有反映苏联正面、阳光型的人民。[16]事实上，影评反对的不是青年谈恋爱，而是特别不满影片中将代表党的共青团书记描绘成一个生活淫荡、道德沦丧的人。斯大林认为在银幕上传播共青团领袖的腐败形象犯了意识形态的罪行，败坏了青年团的名誉。[17] 由此可知，有损党团干部形象的爱情电影也在禁演之列。

二战期间，工农之外，反映城市职工爱情的著名电影是战前已经开拍的《马珊卡》(Машенька, 1942)。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姑娘马珊卡偶然遇上一个开出租车的青年阿辽沙，他们交往、堕入爱河，因为情人间的争吵和误会而分手。苏芬战争开始，阿辽沙成为坦克车手，马珊卡成为护士。他们最后重逢于前往芬兰前线途中，阿辽沙向马珊卡表达爱意，两人误会冰释，进而相拥。这部片子当时连《纽约时报》都称赞是一个难得的、单纯的男女爱情故事，处理爱情如此坦率纯真，有许多自然的细节表露。[18] 本片的确对男女感情的描述很多。不过，背后还是有个大我的存在。男女主角在短暂的相逢之后，因为不同的工作任务而各奔前线。剧终的一幕是女主角微笑地，不是含泪地，向男主角挥手，暗示着战争结束后他们终将在一起。党在这部电影几乎没有角色。

如何解释党在战争期间不是官方宣传的主要焦点？这与苏联战前的集体化、大整肃渐失民心，以及苏联匆促迎战德国，使得斯大林及官方宣传无法再以党的身分来号召百姓抗敌，而必须诉诸亲情与爱情、故乡与家园来激发人民的参战斗志。斯大林第一次昭告全国人民抵抗德国的广播，即可见端倪。[19]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苏联官方必须借用爱情来动员群众抗敌。二战期间电影中的爱情均是以这样的思维来拍摄。其中一部有名的电影《战后黄昏六点钟》(В шесть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после войны, 1944)，描述原本不相识的男女主角在前线相遇，产生爱情，他们盼望幸福的生活，相约战争结束后的一个黄昏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前相会。全片拍摄期间离战争结束尚有半年之久，现实中举目所见是更多的伤亡，电影却充满乐观主义和胜利在望的情绪，不见战争的痛苦和哀伤。这是官方以爱情的甜果来宣传奋力杀敌，激励人心，保家卫国。换言之，私可以助公。恋爱对于集体事业反而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小我的关怀也可以帮助、成就大我，大小我之间的界线也就变得不是那么分明。

不但一般老百姓在战争期间不需摒弃爱情，就是军人的爱情也受到鼓励。例如，拍摄于二战期间的电影《空中悄悄飞行》(Небесный тихоход, 1945)，讲述三个单身飞行员互相约定在战争没有结束前不能谈恋爱，颇有“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气魄。但他们却又接二连三地打破承诺，分别爱上女飞行员。电影呈现的这些女飞行员不只是忠心的苏联战士，而且个个长得漂亮，还会与男人调情。这部影片 1946 年上映，大受欢迎。由此可见，即使在紧张的战争时刻，只要不影响集体大我的工作，苏联当局也鼓励谈恋爱。

二战期间由于苏联与英美的同盟关系，加上战后的接收，使人民有更多机会与西方接触，西方文化顺势进入苏联。大多数人民也期望战后政府的政策能够进一步松绑。可惜随着东西冷战的开始，苏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кинотеатр 1928-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док. 258, с.724-726.

[16] ”Фальшвый фильм о кинокартине «Закон жизни» студии «Мосфильм»”, *Правда* 1940-8-16, с.3. Jamie Miller, *Soviet Cinema: Politics and Persuasion under Stalin*, p. 66-67.

[17] Е. С. Громов, *Сталин: Власть и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8), с. 256-257.

[18] Bosley Crowther, “The Screen: Soviet Boy Meets Gir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1942, p.10.

[19] 德军进入苏联境内后，斯大林第一次对全国广播，使用的号召字眼，不是同志与公民，而是兄弟与姊妹，彷佛是东正教大主教所用的语汇。换言之，他不是用党的名义，号召人民抗敌；而是要他们为了祖国、为了家庭而战。Geoffrey Hosk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R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Past and Present* 175 (May 2002), pp. 162-187.

联官方畏惧英美等国文化对人民不良的影响，对抗西方资产阶级的论调又重新响起。同时，国内又有马林可夫、贝利亚及日丹诺夫争宠于斯大林而产生的权力斗争。日丹诺夫先下手为强，主导新一波的文艺整肃。他多年来一直主管列宁格勒的党组织，该市有许多精力旺盛的年轻官员和技术专家都受他保护。这个新世代对于马林可夫及贝利亚之辈的权力是一大威胁。斯大林开始将其中许多人陆续调到中央工作，以削减他们的力量。日丹诺夫很可能为了自保，决定领导对列宁格勒知识分子的整肃，以遮掩他过去身为党领导却没有做好意识形态工作。[20] 这一波文艺大整肃的力道远超过 1930 年代。正因为如此，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之为“斯大林主义高峰期”(high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高峰期间，在文艺上苏共高层主要打击“贬低苏联人”，或向西方磕头、带有西方资产阶级色彩的“世界主义”的作品。他们认为列宁格勒的两个重量级刊物《星》和《列宁格勒》，大多刊载“意识形态有害、艺术性低”、颓废或琐碎的作品，没有刊登二战期间列宁格勒人民英勇抗敌事迹，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若干作家也出现类似问题。当时直接点名大批判的两个列宁格勒作家，一是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 1894-1958)。他在短篇故事〈猴子奇遇记〉所呈现的苏联人既原始又很笨。这种将苏联人描绘成二等人的作家，就是视西方人为老师，苏联人为学生。[21] 另一位是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 1889-1966)。日丹诺夫批评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为艺术而艺术，带有资产阶级——贵族的倾向及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缺乏政治思想，空洞颓废。她的作品基调以爱-色情为主，交织着哀伤、欲望、死亡、神祕主义和宿命，只能播下幽暗、低潮、悲观、欲望的种子，逃离重要社会生活的问题，远离人民，对年轻人一点好处也没有。他进而指责部分苏联文学界人士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学生，采取谄媚、敬畏的态度对待外国文学，难怪列宁格勒的文学杂志开始刊登廉价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这种谄媚地对待西方廉价、伪善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不应该用于进步的、世界上最革命的苏联文学。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是腐臭的。这个文化不是为私有资本主义的所有权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自我中心及自私的利益服务。一大群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企图将注意力由尖锐的政治及社会斗争问题，转移到下流、没有思想性的文艺，先进的苏维埃文化不该向资产阶级文化下跪或成为其学生。[22] 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暴力、绝望和个人主义，[23] 而不是指革命前的俄国资产阶级文化。这些指责反映了苏联二战期间和战后文艺政策的不同。特别是列宁格勒被围困 900 天，当局允许人民有较多个人情感的抒发。战争的胜利使得党自认恢复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严格要求文艺须以大我为重，歌颂苏联及苏联人的伟大。琐碎或个人心境的描写，均被解释成侮辱苏联或苏联人对西方磕头。

文学之后，紧接着就是对“错误”电影的大批判，首当其冲的一部是《灿烂的生活》(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 серия 2, 1946)。该片第一集拍摄于 1939 年，曾经获得斯大林奖。剧情讲述年轻工程师和矿工采用技术革新，使得产量大为提高，参与的矿工因而得到劳动模范的称号。二战后开拍的续集，重点在战后的重建工作。由于顿巴茨矿区在战争期间受到德军严重的蹂躏，电影忠实地呈现重建的艰辛历程：简陋滴水的宿舍，人们失意时的藉酒浇愁等。不过，斯大林对续集非常不满，认为这根本不是“灿烂的生活”，影片混淆了内战后与二战后的矿区重建。片中的采矿全部用过时的技术和人工，不是用机械，没有反映出苏联的进步。他坚信苏联有最好的工人，他们在战时英勇抗敌，战后也积极投入重

[20] Katerina Clark & Evgey Dobrenko, *Soviet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1917-1953*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01.

[21] Katerina Clark & Evgey Dobrenko, Soviet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1917-1953, pp.402-404.

[22] 日丹诺夫 8 月 7 日对中央宣传鼓动部门的报告，删节本后来转载于《真理报》，见«Докладт. Жданова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Правда*» 1946.9.21, c.2-3.

[23] Timothy Johnston, *Being Soviet: Identity, Rumour, and Everyday Life under Stalin, 1939-1953*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8-173, 176.

建。但是影片反映的却是由普通工人管理矿区，不需要工程师。资深工人变成教授，排挤工程师。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发生在苏联刚成立、工人阶级初次掌权的时候。从那时候起，苏联借助于机械化，国家发展到达空前的地步，煤的产出比那时候高出七、八倍。电影中却连一部机器的镜头也没有，所有景象跟内战结束后没有两样，完全没有展现国家已经进步到机械化的高度。再者，全片关于重建部份只占了八分之一，且以游戏、可笑的方式表现。其余则用大量的吉普赛和餐厅助兴的歌曲讨好观众，加上许多喝酒的镜头，予人印象是工人如没闻到伏特加或听到酒杯碰撞的声音就无法起床。那八个女子组成的工作团凑巧出现，不合情理。他严厉指责电影呈现矿区的破落，矿工的落后无知、缺乏文化、常常酗酒、庸俗的爱情、夜间的夸夸其谈等。斯大林坚信苏联政权创造出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有文化的现代人，电影用没有文化的人管理矿场是荒谬的，扭曲了对苏联人的描述。[24] 斯大林对片中爱情的批评倒非无的放矢。电影中的爱情确实肤浅，令人看了一头雾水。女工作团突然来到顿巴茨协助重建，男女青年互相认识，就产生了爱情，为何喜欢对方，没有任何铺垫或交代，显得相当突兀。不过，本片被批判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呈现爱情，而在于呈现出矿区的种种落后，彷彿苏联从未发生工业化和技术创新，这才是被禁的原因。

尽管二战之后与冷战的开始，电影产量大减，部分是经济原因，部分是政治原因，量少有利于审查与监控。不过，主要原因来自斯大林当时坚持的拍片原则：宁可量少，但要质精。他批评若干著名导演没有仔细研究电影拍摄的主题，对于历史不够了解。实际上，斯大林要求电影展现的是他认定的历史解释或“事实”，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25]

斯大林透过日丹诺夫对文艺界进行大整肃，但爱情电影也没有完全消失。战后仍然出现了鼓励谈恋爱的电影《春天》(Весна, 1947)。它讲述一位女科学家致力于造福国家的科学研究，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生活。经人提醒，科学家同意对人生的态度不该太过严肃，生活不应该像隐士，也应该要有爱情。后来她爱上了要拍摄她研究工作的电影导演，两人沿着河边散步聊天，背景是光亮的黎明天空，昭示着春天的来临。剧中的主要人物对于自己的工作均相当投入，并非竟日无所事事之徒。在影片中党完全没有扮演角色。

再者，苏联当局为了向世人宣传战后百姓如何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1949 年推出《幸福的生活》(全中国上映时的译名，原在东北上映时译为“库班河上的哥萨克人”，кубанские казаки，1949)。全片不但呈现富裕的、多采多姿的集体农庄生活[虽然本片拍摄期间正值苏联闹飢荒]，还有更多谈情说爱的场面。电影主要透过农民欢欣鼓舞地工作，不仅丰衣足食、享受快乐的文化生活等劳动成果，而且可以拥有美丽、圆满的爱情，藉此彰显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民因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部片子有几首动听的情歌，到今天还是许多大陆 1940 年代后出生的人爱唱的歌曲。本片也呼应了斯大林心中的苏联进步和明亮的生活，凡是拖拉机耕过之处，犁痕深浅适度，整齐画一。影片开始未几，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堆积如山的各种农产品，令人垂涎欲滴；黄金般的麦浪滚滚，充满整个画面，在在宣示了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平日辛勤认真工作且以参与生产为傲的女拖拉机手，在收成之后均换上美丽花俏的衣裳，快乐地结伴游玩，在市集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她们银铃般的笑声。此外，剧中还穿插着最令青年男女向往的谈情说爱。整部片子所呈现的农村生活如此地浪漫与美好，令人不觉心生羡慕。农民的人间天堂舍此为何？

《幸福的生活》和《拖拉机手》一样，都在表明爱情的基础是建立在共同热爱劳动、心中有集体，最后虽经过一些波折，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24] «Правленая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И. В. Сталин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кинофильме «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1946-8-9),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кинофильме «Большая жизнь»)(1946-9-4), *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док. 16, док. 23, с. 581-584, 598-602.

[25] Timothy Johnston, *Being Soviet*, p. 189; Katerina Clark & Evgey Dobrenko, *Soviet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1917-1953*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56.

两片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党在男女感情产生矛盾时所扮演的角色。《拖拉机手》中的拖拉机站站长彼得洛维奇获知玛丽亚娜的未婚夫是那札勒，表示反对。理由是一个党特意培养出来的女劳动模范，不应该与工作散漫的那札勒结婚。玛丽亚娜没有坦言这是谎称，反而气愤地说："我不需要保姆"(в няньках не нуждаюсь.中文译制片则翻成"这是私人的问题"。) 玛丽亚娜的回答说明了她自认可以决定恋爱的对象，拒绝党的干涉。即使党培养她成为劳动模范，功不可没，但也没有权利干涉她的感情生活。代表党的拖拉机站站长只能无奈地从旁协助，希望那札勒也变成一个积极工作的人。当那札勒也成为劳动模范，彼得洛维奇希望他们早点结婚。这时克里木勇敢地说出他爱玛丽亚，党也没有干涉。党只有期望玛丽亚娜的配偶也是劳动积极份子。而在《幸福的生活》中，男女主角的误会、争执等问题，最后是党区委书记扮演和事佬，让他们误会冰释。

总而言之，苏联当局利用电影宣传的爱情观，虽然也强调谈情说爱必须以劳动与集体大我的关怀为前提，不过，个人与集体、公与私可以并存，有时候爱情在公与私的界限中也非截然分明。即使在政治或文艺整肃的高峰期，也不会直接将谈情说爱与资产阶级言行挂勾。党给予个人的爱情空间较大，但是也不能将党的化身如党团书记描绘成在情感上始乱终弃或荒淫无度的人。其次，各阶级的人都有谈恋爱的资格，不限于工农。知识分子的爱情也受到鼓励，不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经过阶级转换，谈恋爱才会有好结果。

2. 毛泽东时代的爱情观

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旨在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具体而言，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日后成为指导中国文艺的中心思想。1949 年后，中共实行文艺思想一元化的同时是管理一体化，表现在国家包揽与主导电影剧本的创作、电影发行放映、影评的撰写等等。1952 年元月私营电影业被勒令公私合营，1954 年之后全国只剩下公营电影业。电影的内容主要以党国政策为依归。电影是否能拍摄与放映，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审查制度；主要是政治审查，审查尺度总是随政治气候而变。制度性的审查牵涉的层级很多，常常须经过反覆修改与再审。1954 年以前一个剧本至少须经过四级审查，1954 以后则需经过六道关口。审查内容广而多，可以大到故事梗概、剧本、编剧、导演、演员；也可以小到祥林嫂手中的鱼该何时掉下来。此外，电影还会受到突发性政治运动的牵连而招罪。一部电影经常发生制度性审查已经通过，却在拍摄完成后，受到突发性政治运动的冲击，顿时成为负面典型与箭靶，不准上映或必须下片。[26]

中共建政之后，首要任务在战后重建，呼吁全国人民致力于建设新社会，自是应有之义。1950 年代初期，中共公布了新婚姻法。为了倡导政策，电影业者拍摄多部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的电影。如 1950 年的《儿女亲事》《婚姻大事》，1951 年的《两家春》、1954 年的《一场风波》等。比较特殊的是，电影《只不过是爱情》(1951)，强调爱情算不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保卫国家。《结婚》(1953)，男女为了工作不断的推迟婚期。基本上，50 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显示恋爱并非禁忌，但为了建设新社会，必须先公后私。

一般而言，1950 年代大量的爱情戏只有在苏联电影才看得到。当时中共热切学习苏联老大哥，即使有些电影内容不一定完全政治正确，依然放行。例如，《人民日报》介绍苏联电影《拖拉机手》，全文强调的是男女主角忘我劳动，一切以祖国利益和人类的建设事业为考量；没有一个字提到男女情爱，对于爱情完全视而不见。[27]不过，还是有观众写信质疑，男主角克里木是否带有"恋爱至上"或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他决定回到故乡乌克兰，是因为他心仪的玛丽亚娜的关系。编辑的答覆是：首先

[26] 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 年）》（台北：秀威出版社，2010），页 1-3，32-35、53-69、123-136；易凡、紫卉，〈"禁映影片"的禁映内幕〉，《档案春秋》，2006 年第 3 期，页 25。

[27] 汤戈，〈看苏联影片《拖拉机手》〉，《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19 日，第 3 版。

必须检视克里木处理爱情和工作的关系是否正确。如果他是个“恋爱至上”的个人主义者，一旦知道玛丽亚娜已经有了未婚夫，他会出现失望、消极的情绪，这种不健康的感情，一定会影响到工作。但他还是努力地去帮助那札勒，帮助他改正缺点[爱护机器、工作积极]，最后成为全国劳动英雄。再者，“恋爱至上”的人，只关心自己，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但克里木却是热爱集体，对祖国有高度责任感。他除了用全部精力搞好工作外，仍然时时想着要保卫祖国，所以利用休息时间，教授拖拉机手军事技术，激发他们的爱国精神。[28]事实上，对于克里木帮助那札勒，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当党委书记告诉克里木，要帮助那札勒改变他的坏习惯，否则那么好的姑娘和那札勒在一起，实在可惜！克里木问：“要是教不好，怎么办？”书记答：“那就拆散他们。”换句话说，克里木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这也可以说是潜藏的个人主义。编辑不可能明言苏联这种表现手法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倾向。当时还在全面学习苏联，苏联老大哥即使有错的地方，也要说成对的。

又如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许多中国观众投书抱怨描写爱情纠纷太多；其中的恋爱方式也不够严肃，像同为劳动模范的谢达沙和郭国良的恋爱，就是不好的“一见倾心”惟爱主义。他们没有经过了解的过程，也没有直接与大我的问题挂钩。编辑解释道，十月革命带来了男女的真正平等；由于苏联已经没有私有财产，女性可以不为经济原因委身于他不爱的男子。苏联男女已经建立了崭新的、真正的人的关系。他引用克尔巴诺夫斯基的话来解释谢达沙和郭国良的恋爱正是建立在“生产和文化的共同利益，以及政治见解和思想观点的一致”上。俩人都是劳动能手和积极分子，政治面目更是非常清楚。他们都在同一区的集体农场生活，熟悉对方的生活史。他们的相互了解和认识的过程，确实和当今中国青年的恋爱有些距离。因为他们都是苏联年轻的一代，从小就生活在新社会，历史单纯，出身清白。而中国青年都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生活历史更需要详细了解；出身什么阶级，需要长时间接触才能明白。所以他们在生活上，比中国跨前一步。这种没有把恋爱从苏联的社会生活孤立抽离出来，正好反映了苏维埃制度的优越。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苏联人民才获得了幸福与自由的恋爱生活，它是整个苏联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9]事实上，全片主要的男女人物没有一处讨论政治或涉及政治的言论。所谓政治见解应是编辑自己加上去的，以便冲淡过多谈情说爱的情节。其次，编辑也是在提醒读者，正因为“新中国”才从“旧社会”过渡而来，尚未进入社会主义，不能忽视恋爱对象的历史背景、思想状况和阶级出身。

《幸福的生活》是1949以来，对爱情着墨最多的电影。这也是最吸引青年学子的地方，难怪有学校老师认为这部片子光谈恋爱，担心恋爱会影响学业，拒绝用其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于是有学生投书，批评老师的错误思想和不正确的爱情观。有趣的是，学生的信先以官方常用的制式语言作为开头，如这部片子具体反映了人民在党领袖的领导下，辛勤地劳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而得到无比的幸福生活。最后才提到《幸福的生活》中的爱情，既健康又朴素，并且建立在先进思想和正确的感情基础上，具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不会对青年男女有害，反而建议应该多多放映。[30]

另一部苏联电影《教师》(Учитель,1939)，是斯大林时期一部正面、大胆描写爱情的影片。本片描述一位从莫斯科教育学院毕业的男主角司界班，不顾父亲反对和村人嘲笑，决定回到农村老家教书。当他得知在莫斯科的女友，不愿前来农村和他一起办学，司界班转而追求妹妹马尼亚的挚友格鲁尼雅。从他依然想念莫斯科的旧情人，又突然冲动地亲吻格鲁尼雅，到后来确定不可能和莫斯科女友在一起，转而决定与格鲁尼雅结婚，电影没有妥善地交代男主角感情的心理转折，反而容易引起误

[28] 方学勉，〈问题解答：有关《拖拉机手》影片中的两个问题〉，《大众电影》，1953第22期，页33。
[29] 梅朵，〈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大众电影》，1951年第30期。页14-15.
[30] 傅显文，〈正确认识苏联电影、学习苏联电影〉，《大众电影》，1953年第22期，页34。

会，以为女主角只是他感情真空的替代品。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常常发生，但在“戏以载道”的电影中，难免令有些中国观众感到困惑，觉得片中时好时坏的爱情不正确。其实这些政治味道很淡的感情叙述，反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出男女之间的感情。从格鲁尼雅失恋而不自暴自弃，到决心求学成为一名科学家，确实可以说明她的决定和行为明显地有别于传统妇女。但她的成长不是在党或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导之下，而是受到失恋的刺激。苏联影评称赞格鲁尼雅是个内心丰富、意志坚强的人，具有少见的完整性格。[31] 她具备了足够的自信与能力，面对工作、生活与未来。格鲁尼雅的决定与作为同时展现了新的爱情道德原则，必须是双方相爱，互相了解对方，而不是单方面的爱恋，才能成婚。在这个意义上，女主角是更完整的新人。其次，司界班最后赢得了格鲁尼雅的爱情，并当上最高苏维埃代表，满足快乐地在片尾情不自禁地说：“多么可爱的生活！”即有中国观众指责这句赞叹生活之词，明显带有个人主义色彩。[32]观众的意见并没有错，虽然司界班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他最后快乐的赞叹，却是建立在得到爱情和得到父亲的肯定上。

如何解释格鲁尼雅的成长转变动力和司界班带有个人主义之嫌的赞叹，成了中国影评人的烫手山芋。首先，《大众电影》的主编梅朵引用苏联电影专家克拉夫琴科的话作为背书：“如果我们只限于表现主人公的劳动的活动，而不描述新的苏维埃家庭形成的历史、不描述美满的真正自由的爱情，不描述在苏维埃生活条件下新的父子关系，不描述评价一个人的新的标准以及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引起的普通苏维埃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中的许多其他变化，那么，我们现代人的面貌在艺术作品中就会被表现得苍白无力，而有时简直被歪曲了”。[33]梅朵费尽心思地解释司界班和格鲁尼亚的爱情，如何反映建立在新的道德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他说：“正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因为司界班的努力不懈劳动和热情地坚持斗争，才使格鲁尼雅受到高度的文化和教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新一代的农民知识分子，是他们在这基础上建立了美好的爱情，得到个人幸福。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私人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是不能分割的。为了使每个人在各方面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道德质量的完整的人，就必须从各方面来描写：个人的和社会的、『私人的』和国家的问题来描写主人公，正包含用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来教育人们，使人们在各方面都成为具有这种道德和精神的新人。”[34] 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固然无法完全切割，但梅朵将“私人的”生活打引号，间接暗示了在中共想象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私领域，私其实是公的一部分。不过，他诠释“私人的”生活并没有直接和资产阶级思想挂勾。

中国观众对上述这三部苏联电影的质疑，全围绕着爱情至上、个人主义、一见倾心的唯爱论。编辑的答覆均强调暂时失恋者，并没有变得灰心消极，依然积极投入劳动，热爱集体。同时，描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致力于劳动是不够的，除了生产之外，新社会带来真正的爱情，人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劳动而已，还有男女双方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爱情带来的幸福生活，这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

享有真正爱情的幸福生活，既然可以呈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为何 1950 年代初期关于爱情的中国电影并不多？这与 1951 年《武训传》事件

---

31 Е. Довин & С. Кара, “Тема художника: «Учитель» с Герасимова” (艺术家的课题：«教师»与格拉莫西夫) *Искусство в жизни*(生活的艺术), Ленинград, No. 10, 1939. c. 33；Б. Иванов & Д. Орещкин, “«Учитель» Новая кинокартина студия «Ленфильм»”(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新片«教师»),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共青团真理报)，4 ноября 1939 (1939 年 11 月 4 日)，c. 4.

32 梅，〈关于影片《教师》的几个问题〉，《大众电影》，1954 第 8 期，页 29。

33 电影评论指导思想是中共宣传单位十分重视的一部分，主要电影杂志的影评其实就代表党方的看法。梅朵在《大众电影》创刊后，即担任主编。因与胡风为旧识，1955 年受胡风事件波及，虽没有划为胡风分子，但被撤掉总编职务。梅朵，《相伴六十年：梅朵文艺评论选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页 7；梅朵，〈平凡而伟大的劳动——介绍苏联影片《教师》〉，《人民日报》，1954 年 1 月 31 日，第 3 版。

34 梅，〈关于影片《教师》的几个问题〉，《大众电影》，1954 年第 7 期，页 24-25；第 8 期，页 28-29。

有关。《武训传》初映时颇受好评。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带头批判《武训传》没有站稳阶级立场，含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由此引发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思想大批判，顿时令电影工作者噤若寒蝉。电影产量由前一年的二十几部，骤减成两部。[35]不幸的是，1954 年下半开始，毛泽东又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接二连三地发动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到 1955 年的批判胡风是资产阶级思想典型的代表，已上升到“反党”“反人民”的高度。这更使得电影业者不太敢碰触，怕会被戴上“有资产阶级思想”大帽子的爱情片。然而，为了吸引观众，爱情这个永恒的话题，不可能完全受忽略。1954 年越剧戏曲改编成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票房极佳，受到全国观众的青睐，即为明证。[36] 不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毕竟均为传说中的古人，剧情关注的是梁祝个人的爱情，不是集体的重要，不符合中共想要推广的新人。一直要到施行双百方针后，才出现爱情较多的中国电影。[37]

中共当局提倡的百花齐放政策，确实为文艺创作者带来了春天气息。这段期间拍摄或完成的电影，如《如此多情》(1956)、《国庆十点钟》(1956)、《妈妈要我嫁》(1956)、《芦笙恋歌》(1957)、《护士日记》(1957)、《青春的脚步》(1957)、《寻爱记》(1957)、《幸福》(1957)、《上海姑娘》(1957)、《花好月圆》(1958)等均对于爱情着墨甚多，交往对象不会特别强调阶级，有许多唱歌跳舞的场面，处理男女交往的方式也比较活泼。这些电影主旨还是宣扬理想的伴侣能以工作为重，集体先于个人，但多了不少爱情的场景，比起 1950 年代初期的先公后私，私的成分多了些。

好景不常，短暂的百花齐放之后，接着是对知识分子巨大打击的反右运动，严重影响文艺创作。反右运动引发的寒蝉效应，使得许多文艺工作者抱持宁左勿右的创作原则。爱情在电影中的着墨越来越少，这种情形直到筹拍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方有改变。[38]

献礼片之一《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以农村为背景，描写的是一群青年热火朝天、劈山夺水的工程建设，并加上数段很浓的恋爱插曲。女主角孔淑贞城里中学毕业后，打算留在故乡农村工作与结婚。活泼聪明、个性倔强的孔淑贞，吸引了至少三位男性的爱慕。李克明一心向往到城市工作，已有女友，也暗恋孔淑贞。生产队长高占武即使心仪孔淑贞，还无私地为别人作媒，忘我地参加水利建设，且不顾危险地救了李克明的性命。最后高占武的集体主义打败了李克明的个人主义，赢得了孔淑贞的芳心。这虽然是多角恋爱的故事，每段感情都处理得异常明快。剧中想要传达的讯息是：男女主角无私忘我投入村里引水工程的结果是获得美丽的爱情。反观个人主义至上的李克明，最后连原有的女友都跑了。影评人赞许该片将社会主义新人的劳动态度和爱情结合得很好、很健康。男主角得知朋友同时喜欢自己暗恋的对象，能抑制自己的激情，而将其宣泄在劳动上。[39] 有些观众认为恋爱插曲有一点喧宾夺主，但也有不少观众赞赏这部片子拥有青年说笑热闹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工作干劲，十分讨喜。[40] 由于反右运动的冲击，即使爱情是允

---

35 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主要批判武训兴学没有站稳阶级立场，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走的是阶级调和路线。毛泽东以社论的方式，批评武训否定了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同时他还严厉指责为文称颂这部电影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反而向这些敌人投降。〈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36 〈国产影片上座率情况不好〉，《文汇报》，1956 年 11 月 14 日，第 2 版。

37 自 1949 年到反右运动前的中共爱情观，参见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页 240-242。

38 夏衍，〈在讨论艺术片放卫星座谈会上的报告（1958 年 11 月 1 日）〉，收入《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页 214-215。夏衍 7 月 21 日在故事片厂长会议的讲话，另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1949-1959》（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页 320-321。

39 陈默，〈劳动、爱情、革命干劲的交响曲——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众电影》，1959 年第 18 期，页 25。

40 夏衍，〈让三面红旗在银幕上迎风招展——1960 年 7 月 30 日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人民日报》，1960 年 9 月 15 日，第 7 版；钱中良，〈咱农民就喜欢这样的电影——陕西白庙村农民座谈影片《我们村

许处理的题材，又是阶级正确的农民，如何拿捏尺寸，仍是一大挑战。全片的情感表达非常含蓄，男女连牵手或用眼神传情的镜头也没有，遑论打情骂俏。双方的爱意仅能用比较安全的含笑讨论工作来表现。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 1963 年出现了续集。全片主轴放在农民修建发电站。高占武和孔淑贞已经是公认的一对，孔淑贞坚持要发电站盖好才成婚。李克明已克服了个人主义，全心全意投入公社的集体利益，最后也获得冯巧英的芳心。片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全都是工作狂，情侣见面讨论与关心的都是工作，私情基本上仍是透过工作来表现。党的角色更为重要，村里什么问题都要经过党书记同意才算数，就是婚姻也要得到党书记的祝福才算圆满。

献礼片之二《五朵金花》(1959)是部受人欢迎的喜剧，以西南白族为背景。剧情叙述一对男女匆忙相识，相约一年后再见。男主角阿鹏不知道名为金花的女子很多，不断认错人，制造出不少笑料，虽然阴错阳差，最后还是找到了他的金花。当阿鹏误以为金花已经结婚，虽然失望、痛苦，并没有影响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依然秉持乐于助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帮助炼铁厂解决技术问题。阿鹏要找的金花是公社副社长，她精明强干，认真负责。阿鹏四处找她的时候，她也正焦虑地等待阿鹏，但这也丝毫没有影响她忘我的工作精神。《人民日报》赞扬这电影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青年的新恋爱观；由于大跃进所展现的社会制度优越性和人民的新道德观念的成长，产生感情悲剧的根源已经一扫而光。[41]全片强调的重点依然是工作先于爱情，以及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一般而言，中共当局从汉人的观点出发，认为少数民族文明程度较低，非理性的情感表达较多。[42] 但是《五朵金花》比起在双百期间的少数民族电影《芦笙恋歌》(1957)，表达爱情的尺度已经缩小许多，主要只有片头和片尾的情歌对唱传情。1964 年，根据云南彝族撒尼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拍摄完成，电影大胆地将原作男女主角的兄妹关系，改成男女关系。全剧以爱情为主轴，没有阶级、强调劳动等或意识形态的说教；但尚未公映，即被批为大毒草。[43]文革前夕，连少数民族也不能在银幕上谈恋爱了。

献礼片之三《青春之歌》(1959)处理的是知识分子的爱情电影。该片讲述女主角林道静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党，走向革命事业，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指出一条具体的光明道路。片中以林道静的第一任丈夫余永泽作为负面的资产阶级爱情观的代表。余永泽是北大学生，经常是说一套做一套；最初抱有理想，却不愿为理想牺牲。口头上赞成妇女走出厨房，实际上只想要妻子服伺他，生活以他为中心，成为他的附属品。即将毕业的余永泽，想到的只有现实利益，如何能当上学者名流，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无视于国难当头，需要个人投入抗日与革命事业。中学毕业生林道静体认到自己同丈夫在思想上的歧异日益扩大，提议分手，各奔前程。电影只拍到林道静热血激昂地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游行作为结束，删去了小说中她和她的政治启蒙者党员卢嘉川、江华的爱情戏，只保留了她和余永泽的感情部分，作为批判的对象。有观众认为删去这两段爱情，给予林及两位党员更正义、更健康的形象。[44] 事实上，电影删除小说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那一段，却是林成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幕。因为她首先想到的是江华拥有正确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阶级。林道静最后和出身工人的党员江华结合，代表她的阶级转换成功，意味着她对群众和革命的认

里的年轻人》〉，《电影艺术》，1960 第 12 期，页 21-24。

41 陶钟，〈新时代的新喜剧——影片《五朵金花》观后〉，《人民日报》，1960 年 3 月 10 日，第 8 版。

42 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1 (Feb. 1994), p. 101.

43 本片直到 1978 年才首次公映。荒煤，〈阿诗玛，你在哪里？〉，《人民日报》，1978 年 9 月 3 日，第 6 版；郭玲春，〈《阿诗玛》回来了〉，《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4 版。

44 〈《青春之歌》座谈会〉，《电影艺术》，1960 年第 1 期，页 19；吴时长，〈歌颂革命英雄的诗章〉，《人民日报》，1959 年 11 月 15 日，第 7 版。

同。[45]电影中的江华以党的化身出现，后来也成为林的入党介绍人。他和林道静在一起都是谈工作，即使在诗情画意的北海公园划船，话题仍绕着工作转。他们之间唯一“谈爱”的场景是江华问林道静是否告诉别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林含笑地摇头。这是暗示观众他们之间的情感有进一步发展。片尾江华和林道静胳臂挽着胳臂，站在游行队伍的中央迈步前进，意味着他们因为革命事业而与党密切结合，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正确爱情观。党的角色在本片特别突出，没有经过党的改造和正确的阶级转换，知识分子不可能得到肯定并获得幸福。

为何在反右运动打击资产阶级思想之后，这三部不同阶级或民族的献礼片，仍有对爱情的着墨?理由不难想象。献礼片乃是为庆祝中共建国十周年而拍摄，从 1956 年工商改造完成，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 1958 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爱情的呈现等于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因为百姓的热爱劳动、认同革命事业而获得美满的爱情。不过，这个新的爱情观比建国除其更强调劳动与工作是主要的，爱情是陪衬，不能喧宾夺主。再者，知识分子的爱情一定要经过阶级转换，认同革命事业。同样处理知识分子爱情的《早春二月》(1962)，也是跟随这样的思路而开展。

《早春二月》刚拍摄的时候，正值中共文艺政策在 1962 年春天略有松绑。同年 9 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制片厂没有表示必须停拍，导演谢铁骊也就继续拍下去。不幸的是，影片完成后，毛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声，已经压倒了先前的“思想解放、艺术民主”的指示。结果这部电影被批评是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用人道主义取代共产主义，被当作是宣扬人道主义的反面教材。[46]《早春二月》描述男主角萧涧秋应老同学陶慕侃之邀，到浙东小镇的中学任教。陶的妹妹陶岚活泼大方，爱上了萧涧秋。萧涧秋也爱陶岚，但是当萧知悉他的同学李志豪，因革命而牺牲，妻小无依。萧为了帮助李的妻子文嫂抚养两个小孩，决定与她结婚，以便解决文嫂的生活问题。文嫂后因流言受辱而自杀。萧受到刺激，决定投入北伐的时代洪流，陶岚也追随萧而去。平心而论，《早春二月》的女主角陶岚个性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女主角孔淑贞活泼倔强的个性十分相像。由于孔淑贞是贫下中农出身，她的言行和爱情就颇受赞赏，反之出身资产阶级的陶岚就遭到十分恶毒和严厉的批判，她和林道静一样在没有转换阶级、认同革命事业之前，谈恋爱不会有好的结果。知识分子出身的萧涧秋想和革命烈士的家属结合，也因同样理由受到挫败。

同样地，阶级属性不正确的农村地主子女若非经过被改造或自我改造，并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恋爱也不会有圆满的结局。电影《南海的早晨》(1964)就反映了这样的思维。中共明确表示，凡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或地主子女，必须改造，并且互相督促，共同努力为革命事业的理想牺牲奋斗，这样的爱情才会受到党的肯定，才会开花结果。

中共拍摄以农民为主角的电影远多于城市工人。《青年鲁班》（1963）是工人电影中较具代表性者。剧情以木匠工人李三辈的遭遇为主轴，他在“旧社会”三代都是要饭的，被人瞧不起，“新社会”让他重拾做人的尊严。李三辈为了要替工人阶级出口气，努力学习文化，致力于技术革新，创出佳绩。他遇到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就是读毛泽东选集，从中寻找精神资源。在同一工地工作的技术员秦淑贞是个大学毕业生，刚开始看不起李三辈这个工人，渐渐为他的努力向学、奋斗不懈的精神所感动，并爱上了他。他们以互赠礼物来表达情感(铅笔盒、书、亲手织的围巾)，李三辈感谢秦淑贞的帮忙，一度激动得紧紧握住秦的手。这是 1960 年代电影中难得一见的汉族男女肢体接触。剧终的画面是两人并肩站在卡车上满足地互看对方，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前方，同时响起的片尾歌曲一再强调“我们是光荣的工人”。片中有段值得探究的对白：秦淑贞问李三辈是否想当工程师?李回答：“不，我只想当

[45] 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 1950、1960 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页 282-283。
[46] 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页 139-145。

个好木匠，当个有文化的木匠。”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对照苏联电影《光明之路》的主角塔孃，原是文盲，但努力向上，终于当上工程师。为何塔孃会毫不犹豫地想当工程师，而李三辈的志向仅止于“有文化的木匠”，而不愿意当工程师?当时的一篇影评解释了部分的原因。耿西认为当工程师也是为人民服务。但是若只想当工程师而不愿当有文化的工人，就意味着在思想上轻视体力劳动只重视脑力劳动。这样的人当了工程师，不愿与普通劳动者自居，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的一种反映，如果不能克服这种思想，其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一种精神贵族，乃至于蜕化变质。”耿西发表这篇评论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早已公开，中共正如火如荼展开“九评苏共”。中共与苏共舌剑脣枪、你来我往地激烈批判对方背离马列主义。耿西所谓的“蜕化变质”，也是间接批评苏共由共产主义蜕化成资产阶级。他认为工程师和有文化的木匠之间，字面上的区别不大，但从潜台词来看，两者有原则性的区别。[47]耿西的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中共当局眼中凡是成为脑力活动的知识分子就带有“资产阶级的原罪”，有异化蜕化的可能，政治上不稳定、不可靠。当然这也和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自中共掌权以来，一连串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扫除知识分子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习性”。本片同时提倡知识劳动化，也就是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学习，文革期间更强调向农民学习。反观斯大林掌政期间，虽强调劳动的重要，却没有提倡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反倒是期望工农能够提升到知识分子的文化及技术水平。[48]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法的最大不同点。

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特别重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然而，处于第一线捍卫革命者却最没有谈恋爱的自由，电影处理战士感情遭遇的禁忌最多。中国第一部正面处理革命与爱情是《柳堡的故事》(1957)。全片委婉低调地处理男女战士的感情，导演利用美丽的江南风光和悦耳的歌曲〈九九艷阳天〉，来表现男女主角的感情与心境。独到的艺术处理，令观众耳目一新，也打破了革命军事片不谈爱情的禁忌。不幸的是，本片从 1958 年上映到文革时期，批判从未停过。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日益激进的政治情况下，有关当局认为谈恋爱是对革命者的亵渎，革命者没有权利谈爱情。[49] 以后有关军人的电影，最多只能像《战火中的青春》(1959)感情的表达更为间接含蓄，特别是男女主角的相识与互有好感，均是在女主角扮男装之下发展的，男女之恋在某种程度变成同性情谊。唯一情愫的表达只有送剑这个十分刚性的动作，像《柳堡的故事》中互诉衷曲的歌声完全没有了。

1964 年同时也出现一部以战士为题材，牵涉到男女感情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该片主旨在提醒全国百姓，资产阶级随时可能复辟回潮。《霓虹灯下的哨兵》事实上是要宣扬毛泽东不断革命论，即使在非战争时期仍然不能松懈，资产阶级还是会趁虚而入，用糖衣砲弹向没有站稳阶级立场的战士进攻。电影讲述 1949 年中共军队进入上海的花花世界后，所受到各种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排长陈喜经不起上海的各种“香风”熏染，应穿着时髦的特务邀约，自己也穿上花袜，抛弃了打仗时期结实的老布袜，并想与乡下妻子春妮分手；暗示要抛弃了革命时期的一切。直到特务的破坏阴谋被揭发，陈喜才知错大悟。另外，上海新兵童阿男不守军纪，没有请假便和资本家女儿到大饭店用餐；他一受到批评，便离队扬长而去。指导员决定召开欢迎阿男归队的大会，又请阿男母亲忆苦思甜，讲述其父为革命牺牲的经过，让阿男迷途知返。片中引述毛泽东的话明示主题：“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砲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

[47] 耿西，〈一部值得重视的创作——漫谈影片《青年鲁班》〉，《电影艺术》1964 年 3 月 31 日，页 34。

[48]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 年 5 月 4 日)〉，《斯大林选集》下卷，页 368-373。讲话中的干部不是指政治干部，而是指人才、技术干部。

[49] 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 62-70.

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50] 本片要求全国军民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相较之下，苏联电影处理军人与爱情的关系，很不一样。即使身处真正的战争、面临外来的敌人，苏联当局仍允许拍摄放映如《玛珊卡》《战后黄昏六点钟》《空中悄悄飞行》的爱情电影，藉着“以私济公”来鼓舞全民士气，打赢战争。反观中国在反右运动之后，国内的“资产阶级”假想敌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随着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出现，欲破坏革命成果或复辟的“资产阶级”颠覆分子不断增多。作为捍卫革命的忠诚战士没有恋爱的权利，至少在银幕上他们心中只能有党国，不能有个人的私情。

1962 年以来，银幕上的爱情虽没有完全被禁止，却越来越稀薄。文革前夕，毛泽东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的通病”，其中之一便是“对男女关系问题，说起来津津有味，不是严肃的研究讨论，而是求得知识上的愉快。要谈恋爱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感情第一，甚至抱有自由主义态度”。[51]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凡是涉及男女爱情或男女关系的都叫“黄色”“小资产阶级”思想，“爱情”成了流氓语汇。即使文革之前许多受到好评的电影，文革期间几乎全被以江青意见为主的红代会等组织上纲上线地狠批。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三角恋爱，四对，歪曲农村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没英雄形象，尽是中间人物”。《五朵金花》：“整个影片写了一男一女，别人都是陪衬他们谈恋爱的。对少数民族不说他们进步，政治成长，精神面貌的变化，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题”。《青春之歌》：“影片竭力美化和赞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捧为革命的主力军，和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指示唱反调”。[52] 这等于将大跃进以来官方认可的有节制的、可以先公后私的爱情，全部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无情无性、大公灭私的生活。

文革时期中共鼓吹的恋爱对象是抽象的无产阶级，不是实体的个人，无论是电影或样板戏爱情部分全部被删。例一，《红色娘子军》在芭蕾舞剧(1970)或京剧(1972)中都没有一丝爱情戏。芭蕾舞中男女主角完全没有独处的场面，京剧中他们几秒的独处中是在谈如何布置痛击国民党的军队。这与 1962 年出品的电影不同。该片描绘 1930 年的海南岛，贫农女儿吴琼花受尽地主南霸天的压迫和欺凌，为假扮成巨商的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所救。吴琼花并没有像《白毛女》的喜儿获救后回家务农，而是参加娘子军。洪长青时时告诫她必须克服狭隘的复仇观念，树立消灭封建制度的理想。两人后来不期而遇，吴琼花委婉地对洪长青表达爱意。原话是：“我的年龄也大了，……”。有人反对这段感情告白，结果吴琼花的话被换成：“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那可真、可真有意思。”但是她带着爱意的表情和眼神却无法删除。[53] 这段再相逢的戏，即使对白更改，肢体语言丰富，除了表情和眼神，还有两人的握手不放就好几秒，独处说话的时间也长达两分钟。这些在样板戏中全部不见了。

例二，1967 年，张春桥在样板戏《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中，明确指示要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武装斗争，突出党的领导；不要过多地表现大春和喜儿的爱情关系。[54] 因此，1950 年拍制的电影《白毛女》，描述喜儿在结婚前夕边唱边贴着鸳鸯剪纸，充满着幸福喜悦的情节，在样板戏中全部被删。其次，原来电影结尾是喜儿和大春一起耕种，喜儿因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又恢复了黑发。到了样板

---

[5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卷 4，页 1439。

[51] 毛泽东，〈小资产阶级的通病〉，《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 武汉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138.htm, 页 138.

[52]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1968 年 1 月），转引自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页 211、58、215、132。

[53] 谢晋，〈我拒删《红色娘子军》中的爱情戏〉，《凤凰视频》，2008 年 10 月 25 日，http://v.ifeng.com/e/200810/8f9bd63f-01bf-4b65-9a71-a4ab43e472e7.shtml。(2014 年 1 月 23 日检索)。

[54] 永卫东，〈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新胜利–从《白毛女》的创作看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67 年 5 月 1 日，第 5 版。

戏，结尾改成喜儿和大春一起从军去了。作了这些修改，还不能明确显示喜儿和大春是男女关系，有关当局尚得大力宣传喜儿和大春的关系是一般的阶级情谊，不能看成是一对，否则就是修正主义。[55] 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复辟。

其他样板戏的典型人物亦是如此。《红灯记》的李玉和为革命不结婚；《龙江颂》和《海港》的女主角感情生活完全省略；《杜鹃山》柯湘的丈夫在女主角还没出场就牺牲了；《沙家滨》的阿庆嫂虽有丈夫，但人在远方工作，不在身边。[56]更有趣的是，过去电影中的坏人，都是生活淫荡，乱搞男女关系。到了文革，样板戏中的坏人也没有什么感情生活，十分隐讳。《龙江颂》和《海港》的坏人都是单身汉。《智取虎威山》中的坏人座山雕的寿宴上，连一个女的也没有。如果说正面人物没有感情生活，是为了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火炉、投入无产阶级斗争，藉由禁欲来彰显他们道德的高尚和伟大，那么反面人物的感情也是如此隐匿不彰，又该如何解释？过去描写反面人物，淫欲横流是他们不可少的罪状之一，为何到了样板戏，也变成如此“清心寡欲”了？难不成他们也戮力于筹划更大更坏的阴谋，无暇纵欲，才能更为突显正面典型人物的高大完美？

样板戏如此，文革电影也不例外。电影《火红的年代》(1974)男主角赵四海接受党的委托，自己研发制造国产合金造船，屡遭挫折和破坏，终于成功。他为了这项革命事业，到了四十多岁仍未婚，只跟老母亲过活。《春苗》(1976)讲述农村医疗问题，但年轻、单身的男女医务人员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却连一点爱情火花也没有，每个人的表现都是大义凛然，完全没有私情私欲。同样地《决裂》(1976)重点在严厉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故事发生背景是共产主义大学。就常理论，大学是爱情最常发生的场所，但片中的青年男女学生除了致力于劳动与学习外，爱情全然与他们无关。

由此可知，文革时期官方认可的典型人物都是鳏寡孤独者为多。除了同志情谊，典型人物唯一能够被允许的恋爱对象是革命、是党及其化身毛主席。文革宣传十分强调同志、同性的情感；异性之间只有阶级感情，没有男女关系。既然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57] 响亮的口号“斗私批修，将革命进行到底”震翻天。革命的恋爱观是“亲不亲，阶级分”，恋爱的指导思想是马列毛思想。[58]这背后的思维是爱情会消磨革命斗志，折损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进的精力，所以必须大公灭私。这时大公无私显然已经不够，而是要做到大公灭私，要斗私批修，要跟自己的私心“刺刀见红”，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3. 代结论：中苏爱情观异同背后的成因

中苏同为共产主义国家，对爱情的诠释均以马列主义为依归，强调须以集体、大我为重。同时，从文艺主导思想来看，两国基本上没有差异，理论上都主张由党掌管文艺。虽然列宁谓写作事业绝对需要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写作事业仍是无产阶级党的事业中的一部分，最终还是需要服从党组织的领导。[59] 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只是将列宁的原则说得更直白，党的政治领导占第一位。既然如此，为何两国利用电影呈现的爱情观会出现差异?

由银幕上呈现的爱情观可知，苏联斯大林时期

---

[55] 刘心武等编著，《让我们来讨论爱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 102。

[56] 参见余岱宗，〈样板戏的“禁欲”与样版戏的伪激进〉，《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1 年 4 月 20 日检索)。

[57] 刘振祥，〈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人民日报》1967 年 10 月 6 日，版 1。

[58] 祝丽，〈我的文革生活：从劳动、恋爱到结婚〉BBC 中文网，2016 年 5 月 16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5/160516_culture_revolution_a_normal_day

[59] 列宁谓写作事业“绝对需要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5 изд., том 12, с. 99-105。

对于爱情与劳动、大我之间的关系，从 1930 年代的先公后私，二战期间的公私并存、甚至以私济公，到战后再回到公比重升高的先公后私。相较于中国，苏联给予爱情较多私人空间。中国在 1949 以后均是先公后私，只有在政治最宽松的双百时期私的比重稍多，但没有发展到像苏联二战时期那样的程度。政治运动越激进的时候，爱情的空间越紧缩，而且党在男女情爱所扮演的角色远比苏联吃重。从大跃进到文革，进而演变成大公灭私，最后反映男女之爱的电影成了禁忌。为什么会如此?这至少可从两方面来解释。

第一，两国文化传统之异。俄国人在法律上婚姻须得到父母同意。然而，随着西方开明思潮不断进入，加上社会的日益激化，到 19 世纪末，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的婚姻自主性越来越高。俄国的个人主义虽比西欧发展要晚，但是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在 1917 年革命前已有相当发展。[60]苏联在二战前后拍摄的电影都有“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气魄，但只要心中有劳动与集体大我，并不妨碍人民谈恋爱，可以公私并存。二战期间，官方甚至需要借助私情帮忙抗敌，成了道地的“假私济公”。反观传统中国，爱情与婚姻并非个人能够完全做主，至少涉及两个家庭或两个家族。直到五四时期方才出现相当短暂的个人主义，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很快地，内容宽泛的“革命责任”又凌驾于恋爱之上。[61]其次，在感情的表达方面，苏联也远比中国开放。苏联与中国相比，算是偏西方的国家。对许多中国青年而言，苏联电影含有异国风味，他们的感情表达没有好莱坞电影那么露骨，衣着也相对保守，但是影片中以大唱情歌、互相调情、送花或肢体接触等方式来表达爱意，还是比中国电影要开放、活泼得多。因此，有些中国人观赏苏联电影，看不惯其中的恋爱镜头，干脆闭上眼睛，认为苏联电影也是黄色电影。[62]

第二，中苏领袖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解释与迎拒的差别。斯大林从 1930 年代后期开始，基本上将作为敌人的经济资产阶级和作为可以学习对象的文化上的资产阶级分别对待。毛泽东则将两者合而为一，既要打倒经济上的资产阶级，也要消灭文化上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中苏共产革命均要打倒的对象。不过，苏联要打倒的主要是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城市资本家移居海外，代表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则因为农业集体化而被消灭。在全国生产资料和工具均成为国有或集体所有之后，1936 年苏联的新宪法宣布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苏联社会阶级结构改变了，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已经消灭干净，苏联社会也没有敌对阶级的存在，工、农、知识界人士都是平等的。只有“苏维埃工人”“苏维埃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存在。[63] 既然苏联国内已经没有阶级敌人，所有的敌人都与国外势力的勾结有关。此后苏联各种政治整肃，无论是 1930 年代后期的大整肃或是二战后文化界的清除世界主义运动等，理论上“人民的敌人”都是与西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托洛斯基派有勾结者，或对外国文化卑躬屈膝者。基本上，苏联当局不会将谈恋爱视为资产阶级的行为或直接与资产阶级思想挂勾，即使在政治气候最寒冷的时候，也不会将男女关系解释成资产阶级关系，谈恋爱并没有阶级正确才会有好结果的要求。虽然苏联电影也有反映不同阶级出身难以结合的电影。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1942)的男主人翁保尔，因为阶级不同，决定主动和世界观相异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冬尼娅分手。但这部电影的拍摄乃是以 1930 年代初期的同名小说为基础，小说出版的时候苏联宪法尚未公布，当时不

[60] 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6, 16-19.

[61] 吕芳上，〈192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关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收入吕芳上编，《无声之声(I)：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页 75-102。

[62] 〈上海市“中苏友好月”陷于僵局〉，《内部参考》，期 261（1952 年 11 月 24 日），页 295-296。

[63] “О проект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Союза ССР: Доклад н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м VIII всесоюзном съезде советов (25 ноября 1936 г.)”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在全苏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6 年 11 月 25 日)，*И. В. 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斯大林选集),Том 1 [XIV], (1934-1940) Robert H. McNeal ed.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1967) cc. 141-146, 152.

同阶级之间的爱情难为官方所认同。1936 之后就不是如此。再者，苏联电影不仅鼓励工人向上爬升到知识分子/专家的地位，也期望他们能够拥有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电影《光明之路》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则不然。中共会鼓励工农成为技术人员或专家，但不会鼓励也应该学习知识分子的文化，反而要求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

列宁和毛泽东都同意人民的文化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但两人对于如何让群众获得现代文化的手段，以及谁是现代文化的传递者和代表，却大为不同。列宁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仍是最具决定性的，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经过适当的政治和技术教育，即成为先锋部队，由他们带领落后的俄国转变成现代工业国家，以及在这过程中带给群众知识和文化。向来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对群众自发性创造力保有民粹般的信心。他认为有文化的人民终究会从群众活动中出现，进而体现他的“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文化工作者。”

再者，列宁强调为了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需要有文化革命，利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仍处于“前资本主义”习惯、风俗和工作方式的工农群众。列宁坚信要掌握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并以其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除了要清除其中有害的“亚细亚”元素之外，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新社会将继承俄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基本上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怀有敌意，更不赞成 1920 年代激进的破坏偶像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他主张共产党人必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虽然他们是疏离的社会阶级，如果拒绝学习是“共产党人自负”的征兆。[64] 斯大林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也推动文化革命，掀起阶级斗争，严厉打击资产阶级专家及其文化。[65] 不到几年的时间，斯大林体认到如不藉助资产阶级专家的知识与技术，无法实现苏联工业化。他同时也无法忍受过度激进、不听党中央指挥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因此文化革命在 1931 年就收场。斯大林又回归到列宁对资产阶级专家及其文化的态度。

毛泽东则高度怀疑“新社会”与过去文化遗产的联系。毛极力抨击的过去的文化遗产，包含中国传统的儒雅文化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他称中国传统的儒雅文化为封建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则是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历史情境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更为疏离，是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来到中国。[66] 其次，毛泽东认为不能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只要是知识分子就需要不断被改造。他坚信“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才能防止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蜕化或变质。他不同意斯大林等“对资产阶级的一些旧东西采取迁就的态度”。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是两回事。“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既要打倒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资产阶级，也要消灭资产阶级价值观与文化。[67] 这与他在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代表团长会议上所说的“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来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68] 异曲同工。

因此中共建国以来，发起的各种思想改造或政治运动，要攻击、打倒的对象就主要就是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包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武训传)、“资产阶级唯心论”(批俞平伯和胡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右派)、“资产阶级

---

[64]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Bolshevik Culture*, pp. 287- 290.

[65] Sheila Fitzpatrick,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8-40.

[66] Maurice Meisner, “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Bolshevik Culture*, p. 290；竹内实监修，〈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集》(东京：苍苍社，1983)，第 2 版，第 10 册，页 183。

[67] 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页 741-742, 120.

[68]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代表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5 月 18 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 8 月)。

人道主义”(早春二月)，不一而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在 1956 年私有制消失后，阶级敌人理应随之消失。但是毛泽东认为“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又重申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复杂性。[69] 因此，即使官方宣布中国已无资本家，但这只是消灭了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尚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这是他随后发动反右运动的主因。大跃进之后，他认为各方面的资产阶级依然蠢蠢欲动。不单单有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敌人要对付，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要复辟，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要复萌，文化上的资产阶级要复兴。到了文革时期繁衍出来的资产阶级种类更多。文革批判的最关键“敌人”就是名目繁多的各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凡是不认同于“革命事业”者，均被归于资产阶级思想，包括谈恋爱。个人的爱情完全没有空间，只剩下公领域对党及毛主席的感情。

高层这样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在官方出版的《雷锋日记》《王杰日记》完全不谈私人感情，只有毛泽东思想。风行草偃，当时许多青年的日记也反映这样的看法。例如，文革前夕为高中生的王端阳，为自己设定的交女友标准是，“共同的准则——毛泽东思想，其次才是爱好、兴趣”。王端阳承认曾想要有个知心女友，但他一方面想交女友，一方面又不断谴责自己这样下去会给资产阶级思想进攻打开缺口，让自己“堕落”，“像那些反动学生一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多么可怕呀！”他不断告诉自己：“爱情只是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而革命才是终身大事，才是最根本的。”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个矛盾：希望找个漂亮的爱人，有个安静的小家庭。[70] 另一方面又深知爱人必须是政治思想水平高，也非常向往火热的斗争。这种心中的矛盾其实显示了要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大公灭私的困难。

虽说中苏两国爱情观的歧异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素，不过产生主导与关键作用的还是两国领袖对资产阶级文化之迎拒而有不同的政治实践。列宁和斯大林咸认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这完全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看法背道而驰。自中共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打倒资产阶级。中苏官方透过电影宣传，所反映出的不同爱情观，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中苏同为共党政权的本质及其政治文化之异同。

[69]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 年 11 月 21 日）〉、〈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 年 11 月、12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 7，页 553、574。

[70] 王端阳，〈王端阳日记〉，《记忆》，179 期(2017.1.31)，页 14, 22, 67, 70, 93- 94。

【文化评论】

葵花与太阳

——比喻的神圣与无常

胡 杨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句语录用在政治词语身上很合适——它是一个杂七杂八的队伍凑起来的部队，但是目标一致——把自己做大做强，让别的语言死光光。

在这个杂牌军中，有一支特种兵，它们总是成双结对地出现，比如群星总跟着北斗，禾苗总随着阳光、雨露，葵花、向日葵、向阳花，红花一定要跟着太阳、红太阳、金太阳。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特种兵，都是通过比喻加入这个部队的。

比喻分明喻、暗喻、缩喻、博喻、借喻好多种。毛主席像太阳，是明喻。毛主席是太阳，是暗喻（隐喻）。“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借喻。

在比喻家族中，借喻的档次最高，它不用本体（毛主席），不用喻词（像、好像、是、成为等），直接以喻体出现，让人们从喻体领会本体，把喻体当作本体。一提到太阳，马上就想到毛主席，一提到牛鬼蛇神，马上就想到“黑五类”。一提起葵花、禾苗，马上就想到自己，并让人民对号入座。既省事，又高效。无怪乎专家们说，在修辞效果上，借喻有含蓄蕴藉之美，简洁典雅之功。

与其它的政治词语相比，这支特种部队有几个特点——

（1）神圣性。在政治空气浓厚的时期和地区，这类词语必须小心侍候。因为成了专用，以至于御用名词，所以，个个尊贵得得像皇宫里的玉如意。你不能说太阳有黑子（孙犁在《修房》一文中给我们举了一例子：“1966 年 3 月，上级布置‘突出政治大讨论’，号召说真话，说心里话。王兴根据所说知识，说太阳上也有黑点，因此犯了大错误。”王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1] 不能说阳光太毒，不能说雨露打湿了衣服，不能说葵花含羞低下了头，更不能说禾苗缺水打蔫。举两个例子：五十年代初，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被台湾改编成了电影《翠翠》，其主题歌叫《热烘烘的太阳》：“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呀，往上爬。爬上了白塔，照进我们的家。我们家里人两个哟，爷爷爱我，我爱他呀。”[2]幸亏是在台湾，如果在大陆，这首歌的词作者、发表者、歌唱者恐怕都逃不过文革这一劫——光一个“热烘烘”就可以把你打成牛鬼蛇神。而一个“爬”字，就足以请你当“现反”。内蒙师范学院的外语系青年教师高树华，在日记里说自己情绪低落，像“窗下那低头的向日葵”。被工作组发现，视为其思想反动的证据。[3]

（2）无常性。这里的无常，不是佛教里说的“无常”，不是鬼魅世界里的“活无常”，而是庄子所说的“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这个“无常”的意思是“变化不定”。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时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词在某些人那里尊贵得不行，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普普通通，一丁点皇家气息也没有。太阳就是头顶上的阳婆，跟伟大领袖无关。雨露就是天上降下来的水，跟政治组织八杆子打不着。换言之，这些词语的神圣性是有条件的。

---

[1] 孙犁：《芸斋小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第 63 页。
[2] 季季：《热烘烘的太阳——关于一首歌以及一个人的一九五五之回想》，《万象》2011 年 11 月，第 11 期，第 35 页。
[3]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第 155 页。

举个例子：阿城的小说《孩子王》，讲下乡知青老杆到当地的中学教书，教学生们写作文，贫农的儿子王福写的是《我的父亲》，结尾有这么一句："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老杆丝毫没想到，王福犯了天条，而把字典送给了他，以示表扬。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穷乡僻壤，而是大城市，老杆跟他的学生都吃不了兜着走。

这类的事，既使在最严酷的文革期间，也层出不穷。我插队地方的老乡，说什么都带个球，说太阳、北斗星这样神圣的字眼，在他们哪里一样要接受球的洗礼。有一次，我到旗里办事，看见旗委搞宣传组的两个造反派为一幅画吵架：一个说："瞎球搞，太阳是这个球样吗？"另一个说："咋拉？你给爷画画看，太阳不是求样，还能是个B样？"当时滕海清司令员正在大搞"挖黑线、肃流毒"，抓人如麻，而这两位在旗委办公楼里的叫嚷，竟没有一个人认为是大不敬。

这种无常性，显示了常识的力量，习俗的顽强。尽管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网络，恢恢天网，密而有漏。就像文革中有逍遥派，有手抄本，有地下沙龙，有民间文艺一样。在语言上，也有非政治化活动的空间。这是毛泽东为之苦恼的短板。

无常性的另一层意思，是这类特种兵都活不长。政去词亡，人死语消，势所难免。尽管红歌总会有人唱，但是，你还能听得到《牛鬼蛇神嚎歌》吗？

【文化评论】

引用的等级秩序

乌扎拉

1. 小学生的课文

文革话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引用语大量且频繁的使用。引用是修辞之一种，引用的方式有四种：正引、反引、明引和暗引。不管怎么引，都是为了增加话语的说服力。如果引用得当的话，还可以达到简洁含蓄之效。文革中的引用语，主要是主席语录，其次是林彪语录，再次是马列语录。毛、林语录的大量使用，要归功于小红书的巨量印发和媒体的大力宣传。

请看下面的例子——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对外进行武装侵略和战争挑衅，这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他们是决不会改变这种本性的。苏修叛徒集团生疏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到处进行战争讹诈，镇压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苏修叛徒集团武装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就是他们侵略本性的大暴露。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帝、修、反如果要和我们打，我们坚决奉陪到底，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这是北京市小学试用课本语文第七册第十二课“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的课文。[1] 它引了林彪一段语录，毛泽东三段语录。这四段语录，第一、二段是明引，第三、四段是暗引。

不用说，它们全是正引。“九一三”之后，没有人再正面地引用林语录了。而批林批孔的时候，林彪的语录被大引特引，但全是反引。

在课文中，主席的语录用黑体字印刷，林彪的语录，没有享受这一待遇。另外，从“指出”和“教导”的不同动词中，可以看出被引用者的尊卑，分出引用的等级。

2. 封疆大吏的难题

对此，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周兴有相当的敏感和特殊的经历。

1971 年 9 月 14 日凌晨，周恩来用保密电话亲自向各省最高长官通报林彪外逃的情况。但周兴从总理处得到的信息相当模糊。他起初怀疑此人是陈伯达。但是，总理在通报了情况后，要求周兴马上下令，派云南陆军接管所有空军控制的机场。这使周兴犯了疑：陈伯达一介书生，和军队全不沾边，和空军更不沾边，他跑了，干嘛要让陆军接管机场？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暗暗提醒他，非常时期，应该有非常思维。他想到了林彪。

当时云南正省委正在召开“政治边防”工作会，周兴要在闭幕式上讲话。总理的电话给周兴出了个大难题。“政治边防”是林彪提出来的，“如果真是林彪出事，且总理还亲自打了招呼，你还在讲话里口口声声林副主席怎么着，不是严重政治问题吗？”（周孜仁：《省委秘书记忆中的“九一三”》，

[1] 这本教材由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时间是 1969 年 12 月。

载《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页133，台湾，秀威出版，2012）请看，周兴如何处理这个难题——

（9月15日）他来了我们办公室，先是让刘秘书把草稿给他审看。他左看右看，什么意见也没提，最后只一本正经地提醒道："你们引用林副主席这些语录，都校对过了吗？如果拿不稳的，就省掉吧！"

"都反复校过了！"刘的回答非常肯定，"没错的！"

周兴犹豫，出得门去，片刻又推门进来。"那么——"他又交代："你们再看看稿子。要注意：引用主席语录和林付主席语录，数量和比例一定要掌握好。"片刻，又说："林副主席的数量不能超过主席啊！"

"没超过。没超过的。"办事认真的刘秘回答永远肯定，"我们逐条计算过了。"

"那好。那好……"周兴终于退出门外了。

我们正狐疑这老头儿今天到底怎么啦，周兴第三次又推门进来了。这一次他什么也不再问，直截了当宣布："这个稿子我看，行了，到时候照念就是。只是——把林副主席的语录再稍微减少一点，行不行？记住，就这样！"

刘秘一头雾水了，忙说行的行的。（同上，页122-134）

我们无从知道媒体对语录引用的规定，但是，从周兴的反应中可以窥知，"躐等"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大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引用林彪语录的数量，也不能超过毛泽东。

3. 引用语的等级秩序

其实，语言学早就透露了这一信息，"永远健康"只能用于副统帅，"万寿无疆"才属于毛主席。副统帅只能"说""指出"，不能"教导"；伟大领袖既可以"说""指出"，更可以"教导"。英明的、敬爱的可以用在主席身上，也可以用于周总理、江青、华国锋，但是，你不能说伟大的周总理，也不能说伟大的华主席。就个人而言，"伟大"就像主席那条打了补丁的毛巾被一样，破了旧了，也不能扔。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林彪深知个中三味，他的讲话、文章掌握这么一个原则，对主席，要无所不用其极的阿谀。对其他人，则视与主席的亲疏来掌握火候。比如对江青，一定要吹捧，但要有分寸。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江青——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见《邱会作回忆录》页562）。

林彪在这里大拍江青的马屁，毫不吝啬地在两句话里用了六个"很"，这个"很"很微妙。它意味着：在杰出、革命的人当中，江青出其类而拔其萃。但是，江青还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并不妨碍江青，很有思想、很敏感且很能看出问题。拍马，拍到这里就可以了。再拍，可能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不能说江青非常杰出，极其革命，极有思想，极敏感，极能看出问题。因为你这么拍，就把她拍到了顶峰上，而这个顶峰上只能站一个人，你要把江青往上面推，那个人——不管他是江青的什么人——都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会认为你在挑拨离间，别有用心。

4. 主席诗词——文章中的维生素

如果说，主席语录是文章中的高蛋白，那么，主席诗词就是其中的维生素。诗词本来就能给文章增光添采，何况主席的诗词。文革中，人们把主席诗词捧上了天："它是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是世界文学著作的灿烂顶峰，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革命人民捧在双手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它，从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伏虎""爆破""大无畏"战斗队编《毛主席诗词注释汇编》编者说明）造反派各逞才华，注释、读解主席诗词蔚为

时尚，各种自作多情又千人一面的“注释汇编”如过江之鲫。引用主席诗词成了写手们的最爱。

主席诗词不负众望，为人们提供了多维征引的可能，无论是对敌，还是对友；无论是励志，还是抒情；无论是上天，还是入地，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都可以从这个万宝囊中找到对口的表达。

如果你要讴歌大好形势，上等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个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些诗句既适合热血青年的浪漫口味，又符合文革媒体的狂欢风格，而且又有极大的适应性，可以用在文章的任何部分。

如果你要抒发革命的壮志豪情，可选的就多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最可显示出造反者不可一世的横霸之气和蒙昧无知的自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适可彰显造反者继续革命之勇气和改天换地之决心。“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里面有革命家的感喟，有哲学家的自负，有乌托邦追求者的偏执。它们常常用在文章的结尾，以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

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勇气胆魄和存心高远，同样有多个选项：“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不到长城非好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都保证让你满意而归。

在大灭敌人威风的方面，主席诗词也大有用武之地：“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将对立面比做虫豸，极尽嘲讽之能事。“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视对手为苍蝇，自比傲雪迎霜的梅花。“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把异己者打成妖怪，把他们的地盘看成鬼蜮，为那些受蒙蔽者启蒙解惑。“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想象自己的一派成了胜利者，对手与瘟君一样，一命呜呼。

如逢春季，则有“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备用。到了夏天，尚有“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可选。秋天来临，可用“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天寒地冻之时，可以把“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塞进文章里。

在所有的主席诗词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引用得最少。因为它们1976年1月才公开发表，是时，引用热已降温。这两首诗词中的佳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仅仅赶上了盛世的一个尾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美好时光。而其中的“莺歌燕舞”和“不须放屁”虽然脍炙人口，引用的寿命较为久长，但是引用者是正引还是反引，尚存疑待考。

5. “一句顶一万句”的后果

主席语录、诗词被大量引用，充斥媒体、课本、会议发言，说明几个问题：

（1）依赖。说话作文的人，没有自我言说的能力，因此一定要把伟大领袖请出来替他说话。这种依赖性之养成，与媒体有大关系。“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每句都是我们工作的指针，行动的准则，战斗的号令，前进的方向。”（社论：《句句熟读，句句照办》，《解放军报》1966年12月19日）话说到了这份上，不依赖，行吗？

（2）恐惧。他们有言说能力，但是，他们害怕，如果不引主席语录，怕被人家抓辫子、打棒子、扣帽子。所以，即使不用语录也可以说明白的话，也一定要把语录请出来做保护伞和护身符。

（3）习惯。引用语录诗词成了社会规则，久而久之，深入到人们的心理层面，就像饭前洗手，睡前刷牙一样，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不洗不刷不引，就会觉得不自然。这个习惯形成了一种顽固不化且令人生厌的文风，以至于文革结束N年后，好多人讲话写文，还是“帮腔帮调”，“穿靴带帽”，公式化概念化。

【文化评论】

中学生喜欢用四字语

向南雷

1. 四字语

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们往本子上抄那些华美动人的词藻，抄了一年多，她发现了问题——各人抄的不一样，没法检查。于是，她改了办法，要求家长，给孩子每人准备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并勒令我们从第一页背起。她每周检查两次。不用说，她给作文打分也全看词藻的丰歉华简。谁用的成语多，就得高分。而我是高分的保持者。

装着满肚子词，我上了初中。没想到，班上一位同学比我的词还多。一次集体参观军事博物馆，回来写作文。这位同学在不满千字的作文中，用了 42 个“成语”，而我还不及人家的一半。老师一边口沫四溅地念这些“成语”，一边龙飞凤舞地往黑板上抄。看着黑板，我疑惑起来，光芒万丈、无比辉煌、英勇作战，勇敢杀敌，这些词在我的成语小辞典里怎么找不着呀？这位同学是不是有一本汉语成语大辞典？

二十年之后，读吕叔湘的书才知道，那些不是成语，而是“四字语”。吕老说得中肯：“成语很少连着用，四字语常爱连着用。谁最喜欢多用四字语？中学生和小报的投稿者。”[1]

2. 大家都成了中学生

文革来了，两报一刊中的四字语满坑满谷，各司其职——

若提到主席就是：伟大领袖、伟大号召、伟大思想、伟大红旗、伟大胜利、战无不胜、万寿无疆……

若谈到敌人则是：滔天罪行，老实交待，悬崖勒马、阴暗角落，反攻倒算，大肆宣传，恶毒攻击，大肆鼓吹、恶毒咒骂，恨之入骨，死不悔改……

而人民群众就只能：努力学习、坚决贯彻、激情满怀、万分激动、热泪盈眶、振臂高呼、拍手称快、热烈欢呼、誓死保卫、大风大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要是谈到形势，就一定是：红旗招展、万象更新；东风浩荡，春雷滚滚；红旗飘飘，凯歌阵阵；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

这种连着用的四字语还有很多，比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多了。其中最著名且被用得最得的是林彪的名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文革“破旧立新”，摧枯拉朽，却不能创造出一种史无前例的新语言，这很让无产阶级司令部郁闷。郁闷之余，司令部想出了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向法国大革命学习。人家法国人不是用菜场大妈，打工粗汉的语言改造了法语吗？咱们为什么不能用毛主席语录诗词、无产阶级的短语词组、两报一刊上的惯用语、英雄模范的豪言壮语给汉语掺掺沙子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社论、无数英模日记的培育下，司令部的话语急剧地扩大地盘，迅速地成了口头笔下的常用语。作为文革报章的生力军，四字语更是磅礴万里如虎。有了它，写文章就方便多了。首先，有了规

[1] 吕叔湘：《文风问题散论》《吕叔湘文集》（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 286 页。

矩方圆，人们知道提到主席的时候，应该用哪些词；谈到人民群众的时候，应该写哪些话；说到形势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其次，效率大大提高。因为再也不用为遣词造句费脑筋。

不用说，四字语是套话。套话古已有之，与今为烈："党在心中，民在心中，法在心中"；"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这些四字语被冠以"公文套话"之名，成百上千，大大方方地亮相于网，大有推广普及之意。文革中的四字语则不同，它长于自我保护，誓死否认自己是套话。因为它知道什么是羞耻，知耻而后勇，所以，一旦发现有谁说它是套话，就视其为"恶攻"，请他当反革命。

吕叔湘说，中学生喜欢用四字语。文革把成人都变成了中学生。

3. "热烈欢呼"引人入睡

中学生喜欢四字语，因为它易记易懂，"铿锵有力"[2]。这也是文革风行四字语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四字语都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效力。司令部接纳它们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死心塌地为政治服务；第二，必须易记易懂，为百姓喜闻乐见；第三，必须经常在媒体上露面。

也就是说，凡是被司令部收到帐下的四字语，在以上三方面都要有杰出的表现。比如，"热烈欢呼"吧。一开始，这个四字语并没有引起司令部的注意，因为"热烈"是一个有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形容词，它经常随心所欲地跟很多动词、名词结合：热烈欢迎、热烈气氛、热烈庆祝、热烈鼓掌、热烈交谈、热烈拥抱……；"欢呼"作为动词也有问题，它缺乏原则立场，可以出现在各种场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它会出现在人群之中；老师宣布明天放假，它也会跑来为学生们助兴。

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它们结合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热烈欢呼"作为一个固定词组，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67 年 6 月 18 日《南方日报》有一则简讯——

> 本报讯，广州地区广大革命群众昨天怀着高度的自豪感，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辉煌成果，千万遍地欢呼毛主席的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的胜利实现。

一连三个"热烈欢呼"，使司令部决心把它收入帐下。是啊，这场革命怎么能没有它呢？批斗刘邓陶需要它，揪出杨余傅需要它，打倒王关戚需要它，把林彪定为接班人需要它，把林彪定为卖国贼还需要它，发表最新指示更需要它。

翻翻当年的报刊，随便找一段念念，你很快就会昏昏欲睡。所有的生凑出来的四字语都会产生这种效果。吕叔湘说得不错："读这样的文章，像是躺在夜车的卧铺上，听车轮在铁轨上行驶，发出均匀的格登格登之声，引人入睡。"[3]

[2] 陈原《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 272 页。
[3] 吕叔湘：出处同上。

【读片与读书】

《不夜城》
——爱国主义与自食其力

梁幼志

在《不夜城》（江南，1957）之前，至少有三部电影写到了资本家。最早问世的是吴祖光编导的《红旗歌》（东影，1950），故事也发生在纺织厂，其中的资本家平时压榨工人，上海解放前夕，卷走工人的工资，逃往香港。此后是沈浮编导的《纺花曲》（昆仑，1953），其中的资本家也是拖欠工资，抽逃资金，弃厂逃港。结果在香港活不下去，又回到上海，看到工厂生产蒸蒸日上，深受教育。第三部影片《三年》（上影，1954）中的资本家狡兔两窟，关掉上海的纱厂，把资金、原料抽逃到香港。当上海厂恢复生产，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又回到上海，表面上伪装进步，背地里投机倒把。五反运动来了，他的“五毒”行为被揭发。

《不夜城》中的张伯韩，与上述三个资本家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剥削者，都不关心工人的死活，都有“五毒”行为。不同的是，张伯韩是个有专长，有事业心，有个人报负的实业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爱国者。影片通过这个人物的转变，告诉人们，什么是爱国，应该爱什么国，怎么爱国。

故事从 1935 年开始，年轻的张伯韩从英国留学归来，带着实业救国的雄心，投身到上海纺织工业大发展的洪流之中。张伯韩刚回来，日本资本就找上门来——买办宗贻春告诉他，日本人看上了他们的“爱国牌”，要出高价买下，条件是把大光明的招牌摘下来。以后张家不必办厂，只须给日本做批发就可以发大财。

张伯韩断然拒绝。宗贻春警告他：跟日本人硬碰，要吃亏的呀！父亲张耀堂忧心重重：日本人看中了，这就算是掐上咱们的脖子了。张伯韩不信邪。他开导父亲：“日本人为什么要买咱们这个牌子，爱国牌为什么吃香，中国人要用国货，这就是力量！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厂，只要我们能自产自销，就能跟外国人竞争。”像当年许多企业家一样，张伯韩是爱国主义者，他要用自己的专业和管理知识，提升中国纺织业的地位。

经过十余年的打拼，张伯韩把父亲留下的，代人加工的里弄小厂，变成了上海纺织业的巨头。实业救国的梦似乎变成了现实。然而，日本投降了，国共开战，政经动荡，原材料匮乏，产品无销路，工资开不出来，张伯韩不得不求助买办宗贻春，购买美国的棉花。宗贻春反问他，这对于爱国牌不大合适吧？此时的张伯韩保住厂子就行，已经顾不上爱国不爱国了。

解放了，濒临倒闭的大光明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工人的爱护下，订单纷至沓来，生产蒸蒸日上。张伯韩成了上海同业的龙头老大。逃到香港的妹夫凌大年一家六口，在香港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回到上海恳求他收留。在同行聚会上，踌躇满志的张伯韩，举杯祝贺：为我们事业的黄金时代干杯！

《不夜城》用这些新旧对比，传递了四个明确的信息：第一，中国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但是，爱国只有一个。爱旧中国，不是爱国；爱新中国，才是爱国。第二，实业是救不了旧中国，即使如张伯韩这样的爱国者，早晚也要屈服于外国资本。这说明在旧中国，企业家无法发展，爱国者不得善终。第三，香港跟台湾一样，代表着旧中国，逃到那里的人，得到的只能是家败人亡。只有回到新中国，才有出路。第四，爱国必须爱党，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在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看来，爱国心就表现在："一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1] 这个爱国标准为上面的信息做了明确的注脚。其实，爱国不是能用脚投票的。跑到台湾、香港、美国的中国人，多数爱国。你能说，蒋介石去了台湾，张学良去了美国，就不爱国了吗？你能说，滞留美国，不回大陆的胡适、张大千不爱国吗？你怎么面对，那些为保卫祖国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最后退守台湾的军人？你怎么理解，龙应台笔下的那几百万因为恐惧中共统治而逃离大陆的同胞？

显然《不夜城》的爱国观，与陈毅一样，是政党的爱国观。这是一种偏狭的，荒谬的，以党代国的爱国观。它将祖国所蕴含的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深厚多元的历史内容，简化成干瘪浅薄，至今仍在毒化人心的党派教条。

这部影片的主旨是宣讲新中国对资本家的成功改造。改造的办法有二，一是让他们负罪，二是让他们感恩。让张伯韩负罪的故事来自于两次工伤。

1948 年，磨车工瞿海生被机器"咬掉"了四个手指，过了病假期，不但仍不上班，还率领工人闹事。张伯韩不得不把他开除，瞿海生的父亲瞿永根恳求张伯韩，看在他为张家服务多年的面子上，给海生一条活路，张伯韩只给了他三个月的工钱，算是补偿。瞿永根拿出了工人阶级的骨气，没要这笔钱。

1953 年，张伯韩忽视安全生产，要求工人提高产量，导致挡车工沈银娣受了重伤。张伯韩到医院探视，与区工业局领导瞿海生相遇，看到沈银娣伤势沉重，张伯韩自认有罪。沈银娣的公公，瞿永根随后赶到，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吼着要张伯韩赔他的儿媳妇。瞿海生劝慰父亲，瞿永根举起瞿海生被咬掉了四个手指的手给张伯韩看。张伯韩这才知道，跟他谈话的就是他几年前开除的的瞿海生。由此更加悔恨交并。瞿海生拿出了工人阶级的气度，教育张伯韩："不爱惜工人是天大的罪过，工人阶级是不记私仇的。可你们也应该记住这些教训。后悔是没有用的，旧的道路已经是行不通了，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让张伯韩感恩是通过"五反"运动完成的。

先是沈银娣等工人代表找张伯韩谈话，让他交待"五毒"（即行贿、偷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罪行。张伯韩瞒报自己的偷漏税数额，企图蒙混过关，被沈银娣等人揭穿。为了帮助张伯韩，沈银娣到学校里做张伯韩的爱女张文铮的工作，张文铮回家斥责父亲无耻，伯韩之妻也劝他彻底坦白交待。在内外压力下，张伯韩误认为，政府就是要勒索自己的钱财，以便霸占他的大光明厂。于是破罐破摔，夸大偷漏税的数额，答应退赔 150 亿。

挨了父亲一耳光的张文铮离家出走，伯韩之妻埋怨张伯韩。张伯韩的弟弟，大光明的合伙人张仲鸣对哥哥的夸大偷漏税的数额心怀怨怼，万念俱灰的张伯韩走上了外滩大厦的顶部，看着下面蚂蚁般的车辆和人群，他陷入沉思。他可以纵身跳下去，摆脱一切痛苦。像那 34 名自杀的同仁一样，用结束生命来维护个人的尊严。四川船王卢作孚不是自杀了吗？他给国家民族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人家不是还没完没了地逼他交待退赔吗？我张伯韩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他没有跳下去，他的女儿还没有音讯。他的妻子，他的弟弟还等着他，他这么死，又怎么向父亲交待？何况，就是死了，他也摆脱不了剥削阶级的臭名声，他的亲人戴着这顶帽子怎么活下去？

张伯韩慢慢地走下外滩大厦，他不能死，他要活着，摘掉剥削阶级这顶帽子。为自己为亲人造福——世事是如此诡异，想当初，他削尖脑袋，往实业家的队伍里挤，也是为自己为亲人造福。而现在，他千方百计逃出这个队伍，同样是为了自己为亲人造福。

正在这时，天降福音，增产节约办公室来信，

[1] 陈坚、陈奇佳著：《夏衍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第 459 页。

把张伯韩列为“基本守法户”，只要他退赔 20 亿。沈银娣适时地出现，告诉张伯韩：我们考虑到你能主动退赔，所以算你基本守法。经核查，你报的偷漏税 150 亿是假的。我们不想要你的厂子，我们是实事求是的。

张伯韩一家感动得无以言表，张上前握住沈银娣的手，道谢连声。政府实事求是，工人宽大为怀，张伯韩能不感恩戴德？负罪感和感恩心的交相进攻，使张伯韩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他对妻子说：“死抱着这个厂不放，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出路！我们早晚得坐上社会主义这条船，恐怕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影片的深刻处，在于写出了张伯韩内心的挣扎，尽管他同意公私合营，但是他还要问妻子，也在问自己：“可是我们这厂，你舍得吗？这个事业是我们半生的心血。”并不是像工人代表以为的那样，更不是像张文铮说的那样，张伯韩就是爱钱。是的，张伯韩要赢利，这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事业，是他的大光明。这里面有他的理想，他的价值，他的人生意义。

并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价值观决定命运。性格的深处价值观。张伯韩的价值观是实业救国，他是一个爱国者，他要用自己的平生所学，为祖国的强盛贡献力量。这是影片一开始就交待了的。要是只为了发财，1935 年，他就可以把“爱国牌”卖给日本资本家，换取那终生享受不尽的财富。要是只为了发财，1948 年，他就可以像很多资本家一样，携金弃厂，逃往香港。宗贻春虽说品质很差，但看问题很准，他劝张伯韩：“老弟，这个年头办工厂办个什么劲呀，吃力不讨好，时局很坏，万一共产党来了，资产阶级，你还想活呀！”张伯韩明知道共产党来了，他没有好果子吃，却仍留在上海苦熬。为什么？他不舍，不舍得他的理想、他的人生意义，他还在苦苦坚守着以实业救国的价值观。

包括沈银娣在内的大光明的工人们，未必有这样的境界。包括陈毅在内的大上海的管理者，能有几人能理解这样的志意胸怀？

黎澍在反思文革时，谈到了当年知识分子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共错误地把“这些看做是改良主义而否定”，“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是进步的。在反动统治下，从事工业、科学、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的工作者在自己领域做出贡献，都是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是向现代化前进，越是从长远看，他们的工作的意义越大。”[2]

而此时的张伯韩，已经重新做人了，他的价值观，从实业救国，变成了自食其力——“难道我们就愿意永远背着剥削阶级的臭名声，永远过着那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吗？我们有能耐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呀？！”

张伯韩放弃了他的人生意义，影片给了他一个最大的奖——失联三年的女儿回来了！一家人团圆在上海的人民广场，“火树银花不夜天”，活下来的资本家们跟全市人民一起庆祝全市的公私合营。

张伯韩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并不意味着接受了剩余价值学说。自食其力？难道我对工厂的管理，从人事到生产，从原料到市场，这一切付出都不算数，都不是自食其力吗？剥削阶级？难道没有我置办的厂房，没有我买的机器设备，没有我提供的原棉，工人能纺出纱吗？难道没有我开辟的市场，产品能卖出去，工人能发上工资吗？难道我父亲张耀堂，一个穷学徒，当初光着身子，带着铺盖卷来到上海，吃辛吃苦几十年，撑起来的大光明，也算是剥削？

张伯韩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人需要他解。马克思主义早已放之四海而皆准了。遗憾的是，上海的工人阶级一点也不给这个主义做脸——1957 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刘少奇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

[2] 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 133 页。

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不久，整风变成了反右。所有的媒体都投入反右斗争之中。上海工人罢工报导无法见诸报端。刘宾雁在《自传》中告诉人们：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多年后，人们认识到，“僵硬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活泼的自由经济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所在。”[3]大光明公私合营了，张伯韩自食其力了。沈银娣和她的姐妹们却从罢工转向了怠工。张伯韩为了防止工人闹事，开除了瞿海生，不准罢工的社会主义只能在无声中腐烂。

无声的腐烂终于结出了果实——九十年代，经济转型，国企转制，资产重组，过去的资本家，现在的民企老板重新归来。毛时代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失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胜利。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买办成了香饽饽，宗贻春成了英语精英的前驱。送子女留洋成了不变的风景线，新一代的张伯韩改名“海归”接了前辈的班。1949 年有钱人逃往港台的场景，以更大的规模上演，移民发达国家成了“中国梦”，凌大年的后人宣称，只有在国外生活，才能获得安全感。

历史成了“鬼打墙”，无数啼笑皆非的故事在无数家庭中上演：当年领头清算张伯韩的沈银娣，其儿女遭到“改制”的清算，或外出打工，或操持贱业。瞿海生当年因闹事被张伯韩开除，投奔了共产党。四十年后的瞿海生还不及闹事，就被买断了工龄，赶出了工厂。他们投奔的只有律师事务，而等待维权律师的，是“709”大抓捕（2015 年 7 月 9 日，中国警方约谈、抓捕多名律师。详见《709 事件是什么》等网文）。1949 年，张伯韩因为拖欠工资被工人围堵在办公室；2009 年，陈国君（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命令工人复工，被工人群殴至死[4]。背了一辈子家庭包袱，努力改造仍不受重用的张文铮，这时候才觉悟到自己吃了大亏。聊以自慰的是，她的儿子，张伯韩的外孙，继承乃祖的事业，重新当上了资本家。

张伯韩们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被工商业改造拦腰打断。四十年后，资本主义换了个说法，重新进行原始积累——工人们吃大苦流大汗建设的国有厂矿，在资产重组的名义下，落入民企老板手中。工人从名义上的主人公，变成了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且大批下岗。以襄阳轴承厂为例，该厂老党员、老工人鲁爱国写道：2003 年该厂“改制”，为了把厂子卖给资本家而“瘦身”，五十岁以上的工人，党员全下岗。2004 年，一批正在上班的较年青的工人也被“买断”下岗了。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联合抗争。襄轴、襄棉、钢絲绳厂、化纤厂、制药厂的工人……几万人涌向城里，要求和市领导对话。省公安厅厅长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堵路、堵桥、引起交通堵塞的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次堵桥堵路，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发现十个组织者，他们叫 XXX……。他们应当主动地去公安部门说清楚。”他刚说完，一工人走上讲台发问:“厅长先生，我就是你刚才宣布的组

[3] 《小鹰概念六日谈》，见《小鹰博客》。

[4] 通钢事件，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9%92%A2%E4%BA%8B%E4%BB%B6/8793344（最近登录时间：2018 年 7 月 1 日）。

织者之一，我请教厅长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堵桥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 年 2 月 7 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犯不犯法？犯了谁家的法？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砍了头，你说、应该吗？”从那以后，资本家成为市委的坐上宾，一次又一次地商讨，怎样把我们工人用劳动和汗水在山沟里建成的三线工厂卖掉，把工人的身份买断。[5]毛时代整天宣传的“吃两遍苦，受二茬罪”，在后毛时代，以另一种方式，变成了现实。

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夜城》是唯一一部歌颂工商业改造的影片。此片封镜之时，正值反右，由于担心成为反右的靶子，厂方将其封存。1965 年，在毛的批示下，此片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并列为“四大毒草影片”，为了“供批判用”，与观众见面。仅 1965 年 6 月到 9 月，“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争议与批判文章达 260 篇以上。”[6]

文革期间，写作组以罗思鼎、丁学雷之名，向这部可怜的影片发动了持续十年的口诛笔伐。与此同时，编剧柯灵、导演汤晓丹，以及上海管宣传、文化、统战的领导都遭到批斗。柯灵后来回忆：“强加给刘少奇同志所谓的‘剥削有功论’，也和影片挂起钩来。和这部影片直接间接有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一律被揪，排着队陪斗。甚至祸及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当然是斗争会上‘天然合理’的配角。株连之广，使封建帝王在地下也要张口结舌，自叹不如。”值得一提的是，全市游斗的场面，也被拍成了纪录片《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与《彻底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相媲美。[7]在批判者眼里，这部影片一无是处：它为资本家歌功颂德，把“张伯韩塑造成反帝爱国，积极发展生产的“时代英雄。”[8]它丑化工人阶级，“要求工人群众不要记阶级仇恨”，以便“维护资产阶级的长期存在”。瞿海生这个区委工业部长不是中共干部“而是阶级投降主义者。”[9] 张伯韩的女儿张文铮是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而影片却把她吹捧成了一个追求进步，背叛家庭的共青团员。[10]

这部影片似乎就是为批判而生，一旦停止批判，它的银幕生命也随之结束。后毛时代赋予这部影片新的生命，将其打捞出来，洗掉历史的污迹，剖析其中的迷思，探讨其中的新意，这里仅仅是开始。

---

[5] 《一位老工人党员：补交党费引起的风波》：https://tieba.baidu.com/p/5843259550?traceid=（最近登录时间：2019 年 9 月 15 日）。

[6] 张学正主编：《文学争鸣档案：1949-199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第 644 页。

[7]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我的人生旅行），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第 2-3 页。

[8] 赵志强、刘景清：《为资本家歌功颂德》，载《解放日报》1965 年 6 月 28 日。

[9] 以群：《宣传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不夜城〉》，载《文艺报》警 9675 年第 7 期。

[10] 吕启祥：《把青年引向何处——剖析《不夜城》中的张文铮形象，载《光明日报》表 965 年 7 月 28 日。

【读片与读书】

《王蒙自传》浅议

——言之有文，行之不远

方延曦

我看了《王蒙自传》，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有三，一是他被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一是他在新疆的生活，一是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对第一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王蒙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毛称赞过“有才气”；后来，毛还曾对他说过一些保护性的话，而王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厄运？

对第二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虽然知道王蒙被打成右派后去了新疆，但对他在新疆的生活详情始终不清楚。听说那个外号“王胡子”的上将王震尽管左得惊人，却对一些右派分子庇护有加，不知王蒙是否也有这样的福气。另外，王蒙在新疆呆了19年，我在文革后期也曾在新疆呆了一年半，我想我们对新疆的感受做个比较。

对第三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社会上曾有传言，说王蒙虽然划了右派，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因此经常与他心目中的“真右派”划清界线。几十年过去了，王蒙终于苦尽甘来，不但冤案平反，衣锦还乡，而且创作热情如火山般喷发，著作颇丰。不仅如此，还“著而优则仕”，当上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及文化部长，至今虽年过古稀，头上还戴有全国政协常委的桂冠。这样一个人物，他对毛泽东如何评价不是很引人注目吗？

第一个问题，书中没说清楚。

第二个问题，王蒙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得非常详细，读者因此而清楚地了解了王蒙的生活情况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尽管身处逆境，他仍旧对生活、对未来充满热情，永远不放弃希望。就像他19岁时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里面那些青年布尔什维克一样。建国以来，政治运动频仍，特别是1957年以后，多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赶上文革延续长达20年的迫害，受害者数量就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倍。而王蒙不但身体精神都没垮，还能苦中作乐，小日子过得挺不错，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蒙自身所具有的超强的承受能力。

第三个问题，看得出，王蒙对毛的知遇之恩是相当感激的，请看如下文字：

>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
> ……我常想，毛主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太重要太巨大了，无所不在。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不爱也罢，亲也罢疏也罢，毛主席的一切，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的天才与震怒，毛主席的深思与冲动，毛主席的豪情与机变，毛主席的一声咳嗽与一个笑容……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命运的一部分，喜怒哀乐的一部分，生的一部分与死的一部分了，也常常是决定性关键性“能源”性的一部分了。
>
> 他老人家的一切，决定着你的吉凶祸福，生死存亡。你的存在已经无法与他分开。你已经习惯于他的口气，他的文体，他的逻辑，他的振聋发聩的批示，他的令多少亿人一身冷汗的指责，……我必须强调，毛主席对我有直接的关注，他才是知遇，

他才是慧眼，当然我这样说涉嫌过分高攀。他老人家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评价，对王某人文才的评价，对于我对于文坛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引人注目的……毛主席的一些谈话，毕竟对我的一生起了的是正面的作用。我永远感激老人家。

王蒙写文章特别爱用排比句，多的时候能一气用上几十句，端的是高山流水，淋漓尽致，大雨滂沱，气势非凡。这种“地毯式轰炸”效果非常强烈，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极其“煽情”。有些的确不乏深刻，让人感到颇有新意。但也因为排比句用得太多了，有时也显得滥俗或有卖弄之嫌。

但聪明如王蒙者，他不可能看不到毛给中国，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规模的扩大，这种灾难早已是洞若观火，没有人看不见，也没有人能否认。知遇之恩理当感激，然而如果一方面是对个人的知遇之恩，一方面却是对广大人民的荼毒，两个方面同时存在，那该怎么办呢？

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对毛的歌颂是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如果什么人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对他老人家表示一点点的不敬，那一定会落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悲惨境地。君不见那些只是不小心打碎了毛的塑像，或是无意中把印有毛照片的报纸垫在了屁股底下的人，竟为此付出多年牢狱之灾的代价。今天，文革被官方彻底否定，尽管毛被免于与“四人帮”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举国上下没有人不知道毛才是“四人帮”的真正后台。

我反复琢磨：王蒙身上主宰他一切思想、言行的究竟是什么？马列主义？最多是些朴素而肤浅的马列主义ABC；民主主义？那就离得更远，共产党那套组织原则等教条早就统治了他的头脑；王蒙的主导思想充其量就是个“小资”，不是吗？你看他多么善于适应环境？你看他多么津津乐道于他所过的小日子？“那不是打成右派被迫的嘛！”有人会这样替他辩解。我说不一定。说得不客气一点，假如王蒙不是误打误撞倒了霉，他整起人来也是不会手软的。王蒙自己说，他与姚文元之流不同……王蒙确实没怎么整过人（我说“没怎么”是因为，王蒙自己承认他也曾因过于坚持原则以至于对不起某个同志），但人们注意到，在《王蒙自传》中他始终未有触及民主、自由这些重要的概念。一个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以追求自由、民主新中国为己任的进步青年，为什么会这样？恐怕并非偶然。

凭王蒙的敏感与机智，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些东西是犯忌的，是犯大忌的，即便是在今天——毛泽东不在了，邓小平也不在了，历史都迈进21世纪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躲开这些话题。为什么？他绝不肯放弃对他老人家表达由衷的感激，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感恩”。对这样的说法心存宽厚的人们也许会很不以为然：这是人之常情嘛，毛肯定了王，王难道不该表示感谢吗？甚至有人还可能会说，这不正是王蒙品德高尚的表现吗？你看，王蒙本人被打成了右派，受了很多苦难，但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反而力求公正地评价领袖。问题是这样简单吗？王作为一个作家，他与别人、甚至是领导人的关系，或者别人、甚至领导人对他作品的评价，本来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问题在于，在1957年那么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刚刚作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余音尚在耳边时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发起了一场“不是阴谋，是阳谋”的反右派运动，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从此偌大的一个中国竟没有人再敢吱一声。虽然王蒙也因为自己的作品被打成了右派，但他与其他右派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毛主席老人家曾经夸奖过王的文才，还说过保护王的话。即便是这样，王蒙还是没能逃过厄运，这说明了什么呢？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凭着毛的巨大权力与威望，如果他真想保护王难道会保护不了吗？

这也许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真实答案。

我不禁想起封建时代臣子俯伏在地，诚惶诚恐说的一句话：“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想起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失败后，临刑时总要高喊的“天皇万岁！”那种时代里出现这种现象很正常。问题是，我们不总在标榜说，我们的社会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消

灭了剥削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最最民主的新社会吗？这个“新”倒底新在哪里呢？

文革以后，据邓小平讲，毛自己说过，像苏联斯大林那样的违反法纪的事情，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王蒙被打成右派不承认、不服气，可能真有他的道理：他不是右派，他怎么能是右派呢！？问题在于，你认为你一心跟党走，你认为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党之心，可是党认为你有二心，你正在向党进攻，你就是党的死敌。怎么办呢？谁有评判之权呢？谁说了算呢？当然不是你，因为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而个体往往是跟“个人主义”，跟“资产阶级”连在一起的，因此，在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辞典里，从来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个人的丝毫位置。

但我又要说，打王蒙右派冤吗？也可以说不冤。为什么？那要看你用什么标准衡量。如果你过去不了解王蒙，现在你应该了解了，至少通过《王蒙自传》可以了解了。你看王蒙同志多么善于适应环境，多么富于小资情调。王蒙为什么没受那么多苦难？他说是因为遇到了很多贵人（这种说法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未免太远了点），其实大抵是因为他天生的小聪明（见他与周扬谈话后的心态描述）。他尽管没能逃过毛的阳谋，但他比其他许多右派难兄难弟的境况还是好得太多了：有多少人身陷囹圄？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有多少人自辱自戕？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无法想像，那些当事者或他们的后人，如果看到右派王蒙田园诗般的生活会作如何感想？

有人会说，那是人家王蒙懂得苦中作乐，你怎么能当真呢？也有人会说，那是人家王蒙能以革命乐观主义面对逆境。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不，不对！还记得鲁迅怎样说过的话吗？他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便暂时失败，还是带上了镣铐，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于这生活。”

《王蒙自传》的封底有一段话：“一位智者的心得阐述：王蒙的人生坎坷曲折，多事也多难，但他处乱不惊一一化解，遇难呈祥，涉险成趣，令人叹为观止。王蒙在人生历程中处处表现出一位智者洞察世事的大智慧，丰富了我们的生存认知。”“大智慧”？这是在夸王蒙，还是在损王蒙呢？

本人父亲也被打成右派，从此本来和睦的家庭乱成了一锅粥。我当时年龄尚小，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直到 1964 年高考前经班主任老师暗示，追问家长后才知道实情。我并未因此而怨恨谁，而是虔诚地认为党是不会错的，需要改造的只能是自己。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努力改造自己，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竟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我以为，这体现了党的“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的英明。文革爆发，我这样的人本来应该躲之唯恐不及的，而我却积极参加了运动，因为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的周总理现身说法太让我感动了，他说：一个人出身好只是一好，加上表现好才是两好。我想这不正是对我这样的人说的吗？现在看来，这该有多么天真！一个右派的儿子，谁能相信你对党的忠诚？果然，我被打“反革命”，直到 1979 年三中全会后才平反。与此同时，父亲的右派也得到了“改正”。十年浩劫过去，全党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反思，我也不例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浩劫？痛定思痛，人们普遍认识到民主与法治的重要。而这些仿佛跟王蒙没有多大关系。

《王蒙自传》不仅生活经历写得详尽而生动，语言也充分表现出王蒙特有的风格，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这种坦率特别表现在对自己家庭、自己父母的缺点、甚至是“丑行”的解剖上，这称得上无情的坦率是非常难得的，他完全不顾“为长者讳”的古训，为的是让读者知道，“中国人怎样生活过”。

然而我还是要说，《王蒙自传》的最大缺点是缺乏思想，然而这怎么可能呢？说王蒙这样生活经历如此丰富的作家缺乏思想简直意近诬蔑，可是把这本《自传》从头到尾仔细看过来，确实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火花与光彩。因此，王蒙的坦率不仅大大打了折扣，而且显得有点儿可疑。

【考证】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

何 蜀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镇压了至少几十万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震慑了更大数量的其他人士之后不到十年，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打击了大批敢讲真话的领导干部之后不到七年，毛泽东竟能在1966年10月到年底的两三个月里成功地发动起全中国数以亿计的民众投入到他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是冒着再遭批判打击的风险向各地各级党政领导进行“造反”，达到其人为制造“天下大乱”局面的目的，到底是施用了什么魔法？

毛泽东的魔法，或曰骗术，就是提出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概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以批判这一路线为号召，发动（实为蛊惑、煽动、挑动）起了亿万民众。

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就有必要研究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从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宣传）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五十多天”里，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采取的派工作组、抓“右派”等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宣布撤销工作组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核心即让刘、邓受到批判并失去权力之后，都没有给刘、邓定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罪名。这个罪名是两个月之后才炮制出来的。

毛泽东喜欢给人编造罪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初出现的罪名有“黑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这些罪名来打倒某些领导干部，已经足够了。但是却不能煽动起更多的民众投入这场运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邓已经基本上被打倒，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班子已经确立，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大政方针已经得到全党“热烈拥护”“一致通过”。随后近两个月内，毛泽东都还没有给刘、邓想出另外的新罪名。直到当年国庆节后，才终于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新的“帽子”。

经毛泽东审定后由林彪在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宣读的讲话中，都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只说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据王力回忆：“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

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1]

王力所说的《红旗》社论，指《人民日报》于10月2日发表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并发出对其进行“彻底批判”的号召。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里说：“这个概念和这个号召的提出，十分引人注目。它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给造反派以最有力的支持。”[2]严格说来，“武装了造反派”只是一方面，指的是已经存在于一些学校和少数工厂的造反派，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在全国范围各个领域里催生了更多的造反派。

在《王力反思录》中，王力还提到一个细节：对这篇社论，总理（周恩来）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对王力说，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对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的提法。总理去找了毛主席，事后对王力说，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说原来是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好。“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的主张驳掉是不可能的。”[3]

《戚本禹回忆录》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有他的另一说法：“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曾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晚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 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4]

按《戚本禹回忆录》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是关锋最先提出来的，而且是早在一个多月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就提出来了。但是仔细推敲他的说法，就会发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关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小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概念，随后陈伯达也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

[1] 访问王力谈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446页。
[2]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3]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47—948页。
[4] 《戚本禹回忆录》下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508、509页。

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但是《戚本禹回忆录》却又说：“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曾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里却一点也看不到关锋的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的影子。如果真是“就这样确定下来了”，那还用得着在林彪国庆讲话的提法上再作争论吗？江青还用得着在国庆当晚让中央文革小组再讨论研究一下“反对革命的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用法吗？

此外，《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关锋最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后，陈伯达夸奖“还是关锋的提法好”，也得不到证实。如果真是这样，在陈伯达参与修改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怎么没有直接用上这个提法？而且，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由中央公开提出批判之后的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所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讲话中，仍然很少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大量使用的是“错误路线”的提法。似乎这位理论家并不怎么欣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2.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

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概念的提出已经可以看出，这纯粹是为了定罪名而且是定新罪名，才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概念。那么，就有必要考察一下“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毛泽东时代由褒到贬的演变。

假如今天谁要像 CCTV 记者在大街上拦住路人询问“你幸福吗”那样，问一下人们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上的五颗星分别代表什么，可能许多人会答不上来或答不完整。但在五十年代初期，那却是连幼儿园的小朋友（笔者就是其中一个）都在老师的反复灌输下记得烂熟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由四大阶级组成的“人民”，是毛泽东在其建国执政前夕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白纸黑字向全世界宣布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5] 在这里，并没有“无产阶级”的位置。而且，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后来在官方宣传中，“资产阶级”有时指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又包括了小资产阶级）当时并不是“敌人”，而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毛泽东说的只是“在现阶段”，而这个“现阶段”转瞬即逝，不仅这两类“资产阶级”很快都被当成了“敌对势力”，成了受到反复批判、打击的目标[6]，另一颗星代表的“农民阶级”（作为农业大国里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也被撕裂开来，按照当时各地的相对富裕程度，硬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甚至并不富裕而只是在当地显得不那么穷的）农民划分为地主、富农这样的“专政对象”及“富裕中农”“上中农”等随时可能遭到打击的对象，最后只剩下一部分贫农、下中农按“越穷越革命”的毛氏理论成为其执政的依靠对象。于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国旗上的四颗小星只剩下一颗半还在闪亮了。

“资产阶级”，也就从一个好名词（“人民”的一部分）变成了坏名词（“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敌人），变成了一顶专门给批判对象扣上的黑色帽子，诸如“资产阶级作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老爷”“资产阶级小姐”“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

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5 页。

6 毛泽东 1957 年初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语录》第 16 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毛主席语录》第 18 页。）

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

毛泽东最初宣布的组成“人民”的四大阶级中，用了工人阶级而没用“无产阶级”的概念。这是为什么？

按照以往长期宣传的所谓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了生产资料以后，就不应再称“无产阶级”而应称“工人阶级”了。早在延安时期就被奉为经典的由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工人阶级已不是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没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它已把资本主义消灭，已从资本家手中夺得生产资料而将其变成公有财产。它已不是原来的旧有意义的无产阶级了。拥有国家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已经是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即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工人阶级。”[7]

毛泽东在建国执政时要向苏联“一边倒”，当然就必须在有关提法上与斯大林“保持一致”，这就是他在“人民”这一概念中用工人阶级而不用“无产阶级”的原因。

对“无产阶级”，《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8]

《辞海》干脆对“无产阶级”不作解释，只有一句“即‘工人阶级’”，其“工人阶级”的解释则是：“工人阶级：亦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指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9]

按照这些解释，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分，就在于那个“产”，即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中国，恐怕只有那些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有的甚至被剥夺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被打入社会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黑五类”及其子女那样的“政治贱民”，才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不会是他们的“革命”，而只能是他们的噩梦——不，应该是噩梦般的残酷现实——在毛式“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连“出卖劳动力为生”都受到各种限制，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如 1966 年“红八月”北京的乱打乱杀，1967 年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当然，还有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如那些既无政治上的社会地位又无经济上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甚至不计算工龄的临时工、合同工（包括因“家庭出身”或本人“政治历史问题”而失学、失业的人员，被一些企事业单位压缩、开除的人员，以及时称“劳改释放犯”的劳改刑满释放人员等等），也算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并非他们的革命。这些临时工、合同工在文革初期建立的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的组织，无论是北京的“全红总”还是上海的“红工司”，都很早就遭到了镇压，而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造反派的联手镇压。

文化大革命，最初并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1966 年 4 月 18 日动员全军指战员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就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约一个月后，中共中央那个“纲领性文件”《通知》（“五一六通知”）里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此后一段时间，如《人民日报》6 月 1 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 月 2 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都还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种提法并用。直到 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后就统一只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为什么要改变这个提法？中央全会上到底是谁提出这样改的？似乎没有人作过解释。

可见，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中本来就是从未说清楚过的

[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 年莫斯科版，第 420 页。
[8] 《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 1327 页。
[9]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1729、1335 页。

模糊概念。他常常是随心所欲，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比如，“反右派”运动之后，共产党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所有的教育单位，大、中、小学校无不是由“打退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党委、党支部在领导，可是毛一旦不满意了，就硬说成还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教育部门的各级组织，全都又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亲自选定的一个个“革命接班人”，最后都被他戴上了“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他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一批批地揪出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变色龙”“小爬虫”甚至“国民党特务”“托派”……最后他干脆宣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只剩下他一个人，就像鲁迅讥讽的那样：“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10]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准确含义的、仅仅为了一时政治需要而生造出来的概念。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却不但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反动”的路线，这不是很滑稽、很离奇的吗？因此，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生拉硬凑的怪罪名。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通常用法，路线分歧是指党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比较系统的分歧意见，一般是属于党内矛盾。它可能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党内的反映，也可能并不是不同阶级意识的表现，而只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认识。……将党内的路线分歧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极不恰当的。特别是再加上反动二字，就更显得不伦不类了。”[11]

3.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内容

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工作组。因为毛泽东是从下令撤销工作组开始对“刘、邓路线”进行清算的。不过，工作组只是个形式，工作组具体做了些什么，才是这条路线的内容。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经典的描述，当然应该是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了，其内容是：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12]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中对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邓路线”的描述，会看到大“帽子”满天飞而具体内容少：“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都只是些似是而非的抽象罪名——其中的“是”与“非”，“黑”与“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白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都是没有确切标准，随时可能互换的，全靠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就像有部电视剧中唱的：“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整个《炮打司令部》所描述的这条路线中最核心、最具体的内容，只有这一句：“压制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把领导人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都称之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所以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一些老红卫兵和一些造反派，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压制不同意见的言行，就是

[10]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四卷，109 页。
[11]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第一版，186—187 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90 页。

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以大字报、传单、大会发言、上书质询等方式提出批评或批判，从而被认为是掀起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遭到严厉的镇压、围剿。这与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压制不同意见”有何不同？

4.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

那么，“压制不同意见”真是“刘、邓路线”或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有的吗？

不，这恰恰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大法宝。

早在建国执政前夕，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踌躇满志地宣称：“‘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所谓“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实质上就是压制不同意见。因为“反动派”是个模糊概念，随时可以强加给任何人的——包括曾经与毛泽东一起并肩战斗打击“反动派”的“革命战友”。

在毛泽东执政初期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毛泽东又在一篇重要按语中写道：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13]

因此，在北京镇压“联动”和“炮打中央文革”的“黑风”时，中央文革小组及号称“中央文革小组铁拳头”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也毫不手软：禁言，抓人，批斗，关押……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者一律实行“专政”。

更为荒谬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还可以由“压制不同意见”（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方给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们戴上。在1967年初，当部分造反派和底层民众趁各级党政领导惶惶不可终日之机提出一些经济上维权要求的时候，竟被上海的各主流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召集和主持）通过的《紧急通告》指责为“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并将这次维权行动以“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名义打下去，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于是，提出不同意见的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压制不同意见”的反而成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到了1967年初全面夺权时期，《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更是按照毛泽东的历来教导斩钉截铁地宣称：“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14]

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十年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各种观点很难达成一致，但在有一点上却基本上是共识：如果按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所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开展文化大革命，必定会把文化大革命搞成又一次“反右派”运动。许多因为这一点而坚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自己得到了“解放”的造反派，却没有把这一认识向前再推进一步：“反右派”运动是谁搞起来的？“反右派”运动是什么路线？

毫无疑问，“反右派”运动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只要正视毛泽东执政的历史，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就连刻意为毛泽东辩护、粉饰、唱颂歌的《戚本禹回忆录》中，也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经意间写出：

[13] 出自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对第43则信摘（胡风致张中晓信）的按语。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70页。以后此篇按语被选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57页。编者所加的标题就是“驳‘舆论一律’”。

[14] 《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和 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15]

杜钧福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另一面》[16]一文中说：“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名称的荒谬、不伦不类，所以很多文革历史著述众口一词，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前一直是这样干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派工作队是中共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将群众划分为左中右分别对待也是惯常做法。即使不搞运动，群众也被分成左中右。如果运动来了，这样的分类就更加具体。”

“文革前一直是这样干的”这句话，道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这就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

杜钧福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分析了“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文革前的一些问题”，概括起来有：

（1） 文革前的政治生态——“党支部专政”体制遭到打击。

（2） 对“党的不好作风”开始一定程度的反思（主要谈到了文革前的档案制度问题）。

（3） 一批政治旧案被提出并得到重新评价。

其中最核心的“党支部专政”体制，也就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党天下”（储安平因提出这一说法而被打成大“右派”）。杜钧福指出：“党支部专政”“其一是形成一种政治等级结构，即在平时即按政治态度和与党支部关系的亲疏将所管辖人员划分为左中右。待政治运动来临时，三类人员自然分别成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其二与前者相关。为了区分左中右，就须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动态。为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告密网，专门收集每个群众的一言一行，逐级上报，并以此作为是否‘积极靠拢组织’的标准，当然也作为升学、入党、提级、提干的标准，并由此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今后的命运。”

从杜钧福所列举的三个方面（党支部专政，档案制度，政治旧案）可以看出，无一不是文革前就早已存在的，无一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产物，并不是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的新发明新创造。

杜钧福文中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归结为“斯大林体制”，其实，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不能丢的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即“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问题。

因此，当刘少奇、邓小平都已经被打倒以后，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波接一波搞起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再次打击到曾经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遭到过打击迫害的底层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的时候，他们就再也无法用当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候的认识来进行解释和理解了，只能随着运动中新的宣传调子陷入茫然与惶然，被迫检查交代、低头认罪甚至绝望自杀。

5.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短暂批判

既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路线”，毛泽东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要批判“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呢？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否则他就不会在打倒刘少奇之后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志得意满地发布这样的“最新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7]并且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强调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18]

原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恰恰相反，是要“巩固无产阶

[15] 《戚本禹回忆录》，第 509 页。
[16] 载《记忆》第 68 期，2011 年 2 月 28 日。
[17]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 年 11 月 2 日《人民日报》。
[18] 转引自 1969 年 6 月 9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级专政”而且要落实到基层。他所号召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为了不择手段把群众发动（或曰煽动）起来的权宜之计。他完全清楚，文革前他执政十七年来反复开展的政治运动，不断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让广大民众苦不堪言，他要利用这种民众情绪，将火引向他所认定的“中国赫鲁晓夫”（即有可能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对他进行清算的接班人）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因此他不能不暂时鼓动民众对一些长期扰民虐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完全可以借用当年的套话说是“假批判，真包庇”——因为他批判的目的是要“巩固”这条路线。

那么，从造反派这一方面来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如某些“两个文革”论者说的是“反共起义”呢？当然也不是。

当年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得到平反，同时销毁个人档案中对自己不利的“黑材料”，以保证今后的政治身份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单靠提出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口号是无法把民众煽动起来的，必须让民众得到实惠，尝到甜头，而这一实惠和甜头，就是毛泽东执政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同样堪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

10 月 5 日，毛泽东批准下达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明确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19] 不少有关文革的论著在提到这个“史无前例”的文件时，都只强调其取消了“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一方面（即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20]），却不注意研究其得到广大群众欢呼、拥护的核心内容：平反。许多在此后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以“105”为名，就是纪念这个文件发布的日期。

随后，11 月 16 日又进一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宣布：“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但为了防止出现涉及到文革前的翻案风，对需要清理和销毁的档案材料划定了时间界限：“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并且严厉规定对这些材料：“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为使这一平反运动实现“全覆盖”，还明确了：“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21] 这些规定都是“史无前例”的，受到广大民众欢呼、拥护的，所以此后一些群众组织以“11·16”为名，以纪念这一文件发布的日期。

尽管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批判、冲击，但最根本的是没有谁提出过要改变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核心的“党天下”体制，而且还都以“党天下”的捍卫者自居（尽管他们许多人并非中共党员），比赛谁更“听党的话”，谁更能“毛主席

[19]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 在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聂树人所著回忆录《“地质东方红”史》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论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是谁？”，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论证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是上级党委及其派来的工作组（工作队），“‘踢开党委闹革命’原本与平民百姓无关，更与当时还不存在的‘造反派’无关。我及我的同学在文革初期，不仅不敢，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们根本就没有‘踢开’的气魄和胆量。”“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学校党委是工作队‘取代’的，踢开的。”“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工作队是党中央、毛泽东下令撤走的，不是‘造反派’‘踢开’的。”“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工作队撤走后，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是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的。”（摘自该书电子版）

[21]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宣布将某“走资派”或保守派头目开除中共党籍的闹剧——因为造反派认为这些人不配当中共党员，不配在“党天下”里执政。当中共组织恢复活动重建各级党委以后，造反派又都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中共。

1968 年 8 月 9 日，已经在北京地质学院夺权、掌权的红卫兵头头、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被经过“群众性整党”的全体党员表决通过，成为中共党员。8 月 18 日出版的地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特地发表评论《做彻底的革命派》，其中说：“我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震奋人心的好消息，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王大宾同志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两年来的斗争证明了，他是我院广大东方红的典型代表，是一个真正的忠实于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代表，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在此前，北京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树人也经支部大会一致表决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入党后来并未得到工、军宣队的承认。[22]

在 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一些地方的原造反派人士借毛泽东有关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最新指示”，纷纷要求突击入党。重庆有一个小工厂的原造反派人士，还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求给他“补办入党手续”而不是批准他入党。他这是仿照了文革初期郭沫若的一个说法：1966 年底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郭沫若在发言中引用了鲁迅临死前不久的一段话以后，别出心裁地分析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23] 上述那个造反派人士便仿照郭沫若这种说法，写出一张大字报，要求为他“补办入党手续”，其大意是：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这是文革初期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著名论点），本人自从参加造反之日起就已经从思想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要求市委给我补办入党手续……这张大字报贴在重庆市中心闹市区二十九中学的大门口，颇有一点影响，但大多只是被当作笑料谈资而已。

总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造反派，当时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都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更不可能彻底的（尽管口号中都是喊的“彻底批判”），因为他们都不会触动这条路线最根本的核心——压制不同意见的“党天下”专政体制。

6. 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推行的是同样路线

在全国开始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的 1966 年 11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出版，其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内容作了这样的概括：“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这样的概括，当时的确鼓舞了许多民众打消顾虑起来“造反”，因为这里所描述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上到下各级中共组织的一贯做法。

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推行的仍然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仍然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变相的而且更不讲政策也更不懂政策的工作组）强行进驻清华大

[22] 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史》（电子版）第七篇第 18 章。
[23] 郭沫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人民日报》1966 年 11 月 1 日。

学进而结束红卫兵造反运动之后，1968 年 8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社论中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我们要把亿万革命人民，都紧紧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仍然是“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还是那篇社论中提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特别需要我们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仍然是对群众搞“训政”。派工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和所有文教科研单位，举办各级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24] 这些不正是比刘、邓路线派工作组、集训教师更为深入全面的“训政”？而且毛式训政与孙中山提出的训政不同的是，孙中山设想的训政是要训练从长期皇权专制时代生活过来的民众逐步适应、接受民主宪政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公民；而毛式训政则是要让民众屈从于更为严苛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成为这个专政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仍然是“压制群众”，把矛头指向群众。看一看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整人运动，哪一次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镇压群众？只是被“压制”、被“矛头指向”的群众就不再被视为“革命群众”，而是“右派”“反革命”了，“围剿五一六”不再是“围剿革命派”，“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不再是“制造白色恐怖”。

历史已经证明，在毛泽东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所谓“五十多天”，一些在刘、邓路线迫害打击中还幸存下来的造反派，到了“清查五一六”时却走投无路地选择了自杀。他们中的不少人，至死也没有明白，让自己死于非命的，到底是什么路线。

[24]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68 年 2 月 5 日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社论还指出：“河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只要抓住这个关键，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变成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形势就会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就会越来越好。”“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机关、学校、直到街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红花开遍河北全省。”

【考证】

1964 年末中央工作会议毛刘之争小考

——兼论张霖之“走资派”说

越 人

1964 年 12 月 15 日到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文件，以解决“社教”运动前一阶段开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争执。毛刘这次争论影响深远，按毛自己的说法，他感觉到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始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1]。”

由于这次“毛刘之争”影响巨大，所以研究者对于此一历史事件亦多有关注。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对于此次毛刘之争的历史场景是这样叙述的“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2]。”

在不少相关的研究论著中亦多有类似的叙述，此前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中，戚氏以所谓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对于这一历史情境作出的回忆叙述，也和上述引文较为一致[3]。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余汝信先生在《〈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 1964 年 12 月-1965 年 1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只点名了一位部长，是冶金部的王鹤寿而非张霖之。所谓毛在和刘争执时说张霖之是走资派纯属子虚乌有[4]。

1964 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毛刘分歧之真实历史场景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两人谈话争论时到底有无涉及张霖之，毛有没有在谈话中定性张霖之是走资派，张霖之在文革中是否因此事而被打倒乃至被迫害致死。现有的研究结论说法不一，相关历史过程的叙述亦多有混乱之处。由于有关档案资料至今并未解密，极大地制约了历史研究的深入性和准确度。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尽可能梳理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从史料出发对于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考证，希望能有所获，亦望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1. 张霖之在文革中被强加之“罪名”与其被打倒之原由

张霖之在文革中被打倒并惨遭迫害致死，与戚本禹确实有不小的关系。1966 年 12 月 24 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发表讲话，指责“煤炭部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干好事。煤炭部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但要打倒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

1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12.18），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另可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7 页。

2 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 10 年史》，红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04 页。

3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上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339-340 页。

4 余汝信：《〈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昨天》第 75 期，2016 年 8 月 30 日。

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继续炮轰，狠狠地打击[5]！”

除了戚本禹之外，江青在 80 年代初“两案”审判时被确认应对张霖之被迫害死亡一事负责，“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江青点名诬陷后，遭到非法关押，被打成重伤致死[6]。”

但作为一部之长，打倒张霖之的最终定性不是戚本禹或江青就可以随便决定的。1967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位成员（包括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和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学生、工人、军事院校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当周恩来在讲话中指责“肖望东不是好人”的时候，江青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7]”。而在周讲话的末尾，他正式宣布“军队里来的工作队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主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要适当地尊重，一般要照顾，但肖望东、张霖之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8]。”

很显然，周和中央文革主要负责人（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在此次接见中对于张霖之“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政治定性，彻底宣判了张霖之政治上的“死刑”，在此次接见 12 天后的该月 22 日，张霖之被迫害身亡。

周恩来在张霖之死后发表的几次公开谈话中对于张的所谓问题及其死亡都有所涉及，其语气和用词与 1 月 10 日晚的定性又有所区别。2 月 17 日，周恩来与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谈话时专门提到了张霖之之死：

“张霖之到底是怎么死的？硬是矿业学院把他关在一个地方四十多天。尽管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他和彭真、薄一波特别是跟彭真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今天不能作结论。这个同志还有他的长处。煤炭工业部的造反派和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斗住不放，四十多天我不晓得，他死了才突然晓得[9]。”

3 月 1 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 7 个部群众代表时，在谈话中称“煤炭部的事，我过问太少。矿院把张霖之揪去四十多天，那样搞法我很难过。张霖之如果确是自杀，那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还直接追问参加谈话的矿院造反派同学，“为什么四十多天没有让张霖之回家，应让他回家，回国务院嘛！这等于拘留，今天看见钟子云，但看不到张霖之，不管煤炭部如何黑暗，这件事我是失职，我很难过，张霖之已经化了灰，为什么要留四十多天，死了连一个报告也没有给我们。”对于张霖之的问题，周谈话中的定性和 1 月 10 日相比也有所减轻：“张霖之与彭真关系密切，确实有严重的心脏病，从外地休养回来，一下火车就被揪走了，使我们都未见过他。他确实和彭真接触多，共过事，但不一定是黑帮，要调查嘛[10]。”

4 月 6 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计委群组织代表时严厉批判了薄一波，他在讲话中这样说到薄一波和张霖之的关系：“他（指薄一波——引者注）在工交口，搞了十一年，什么东西都七上八下。管煤炭，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拉张霖之，一会儿打张霖之。薄对张亦打亦拉，一会儿打张霖之，一会儿捧张霖之；邓小平、彭真宠张霖之的，不加任何批评。薄一波是打张霖之，一打一拉，弄得张霖之晕头转向，后来犯了大错误，搞成这样的结局，实

5 戚本禹：《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的讲话》（1966.12.24），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1981.01.23），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7 《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1967.01.10），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8 《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讲话纪要》（1967.01.10），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9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1967.02.17），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10 《周恩来接见国务院工交口七个部造反派的谈话》（1967.03.01），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际害了张霖之[11]。”

从周恩来在张霖之死后几次谈话中对张所作的评价及后来他主持国务院会议为张部分恢复名誉一事来看[12]，他在 1 月 10 日讲话中对张霖之作出“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政治定性[13]应该源于更高级别的决断[14]，较大可能是毛作出的决定[15]。

毛为何同意打倒张霖之，研究者说法不一。余汝信先生和张光渝先生的文章都指出当时任煤炭工业部机电局局长的肖声远多次给中央文革写信，揭发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等。认为张霖之是“为肖声远这样的宵小所累”“中央文革利用萧声远的诬告信，把“彭真死党”当成打倒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声远借助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上位，投靠效忠，双方一拍即合[16]。”但两位先生的文章对于毛在张霖之被打倒一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并未涉及。

如前所述，不少文革研究论著中都记述了张霖之在文革发动前的毛刘论争中已被毛视为煤炭部的“走资派”一事，也多认为此事与其在文革中被打倒乃至被迫害致死有着微妙联系[17]。余汝信先生在指谬文章中认为“张霖之”走资派说源自于《南方周末》1998 年发表的记者文章《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是该篇文章首先编造了这一说法，“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材料证实毛泽东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文革期间，无论是中央、中央文革的什么人（包括戚本禹本人），有谁引用过毛泽东这句话吗？没有！群众组织编印的所有毛的讲话集中有这句话吗？没有！[18]”张光渝先生早前文章中对于毛点名“张霖之”走资派说并未提出质疑，但其文中也提到“实话实说，我父亲当年被批斗最残酷最厉害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造反派别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点过张霖之的名”“我是到了 1998 年 11 月才从《南方周末》刊登刘源、何家栋的文章中得知毛泽东早在文革开始前一年半就把我父亲划入‘另册[19]’。”

笔者认为，虽然戚本禹回忆录中关于张霖之的相关叙述内容疑点多多，但也确有回忆史料提及文革期间发行的政治传单中较为详细的记录了毛刘

---

[11] 《周恩来与国家计委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1967.04.06），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12] 1970 年 7 月 31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该会议审议了原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死亡问题。国务院随后给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张霖之问题的通知(通知内容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该通知称：“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5 页；《国务院关于原煤炭部长张霖之问题的通知（概要）》（1970.07.31），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13]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但在 67 年 2 月中旬“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前，周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依然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责任。周 1 月 10 日讲话时在江青插话点名张霖之后加以配合，对张霖之作出明确的政治定性，可见双方在事前对张霖之问题应已取得较明确的一致意见。

[14] 当时的中央二号人物、副统帅林彪与张霖之被打倒没有任何关系，据邱会作回忆，林彪在 70 年底和邱会作一家人（邱大儿子文革时期和张霖之女儿结婚）见面时讲“张霖之是好同志”，还和张霖之妻子李蕴华等一起合影。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界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95-596 页。

[15] 同时被周恩来在讲话中点名定性的文化部长肖望东被打倒与之前的陶铸倒台有着不小的关系，毛泽东在 1967 年 1 月 8 日就陶铸问题有一个讲话，其中这样说到肖望东任部长的文化部：“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1967.01.08），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16] 余汝信：《〈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张光渝：《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昨天》第 75 期，2016 年 8 月 30 日。

[17] 如钱理痒所著《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局到反修防修》一书中叙述毛刘之争时这样写到：“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使张霖之成为‘文革’的第一批高级干部的殉难者之一”。钱理痒：《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卷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局到反修防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9 页。

[18] 余汝信：《〈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昨天》第 75 期，2016 年 8 月 30 日。

[19] 张光渝：《“点名”与“审判”》，《昨天》第 42 期，2014 年 10 月 30 日。

在文革前的论争内容。前唐山市副市长冯国安在其回忆录《岁月》中记述了他在文革时期的活动，该回忆录提到他在 1967 年时曾搜集和印发传单，其中有一份传单内容称 65 年元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毛刘矛盾公开化，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可以提分子，毛则坚持认为运动重点应是整党内哪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问煤炭部、冶金部谁是走资派，毛即指张霖之就是[20]。

冯国安的回忆史料目前来看还只是孤证，其写作回忆录时有否受到当时已经出版的一些文革研究论著的影响而产生回忆上的某些失真也未可知。但至少在讨论张霖之文革中被打倒原因时，毛是否在文革前的毛刘论争中涉及到张霖之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历史疑问。接下来，我们从目前已披露的原始史料入手，对于 64 年底毛刘之争的相关史实展开系统的梳理与分析。

2. 1964 年 12 月 20 日会议上毛刘之争的历史场景及双方对话内容考辨

一般认为，毛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公开冲突始于 1964 年 12 月 20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对此事都有明确记载，《毛泽东传》如此记述：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22]。”

《毛泽东年谱》中关于 12 月 20 日会议的记述内容和《毛泽东传》所载较为类似，但对于毛在会上点名中央部长一事则略去不提[23]。

《毛泽东传》中隐去了这位部长的名字，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文库》资料中收录了一份《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12.20）》文件，其中明确提到了这位部长的名字：

“薄一波：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一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鲜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

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毛：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20] 冯国安：《岁月 冯国安回忆录图文辑》，大众传媒河北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16 页。感谢网友 yangharrylg 兄提供此一史料信息。

[21] 中央工作会议于 1964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从 15 号到 19 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主要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他此前率党政代表团访苏情况汇报、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和谭震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发言，毛泽东在 19 日下午会议上宣布会议停开几天，再开会时再通知大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48-451 页。

[2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35-2338 页。

[2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1-453 页。

薄一波：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整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干部了。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

刘：冶金部根子是谁？

毛：我没听说过冶金部根子是谁。薄一波：王鹤寿嘛！

彭真：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是四不清……以四不清干部，当权派为主。

刘：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毛：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它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24]。”

文革期间由群众组织整理印刷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也收入了毛泽东 12 月 20 日会议讲话内容，与《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收录的文本内容比较一致。

从现有史料（包括《毛泽东传》引述的 196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的部分内容和《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的毛泽东 1964 年 12 月 20 日会议讲话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 1964 年 12 月 20 日会议上毛刘之间确实围绕“主要矛盾”问题发生了分歧争执[25]，毛在谈话中也重点关注了“走资派”问题，但毛当日谈话中只提到了冶金工业部的前部长王鹤寿，提出要把王鹤寿“擒下马来”[26]。目前已披露的两人谈话内容中并没有涉及到煤炭部，更未提及张霖之及定性其为“走资派”。

值得注意的是，冶金部和前部长王鹤寿之所以在当日毛刘谈话中被几度提及，和四清运动中发现的所谓冶金部问题密切相关。

四清运动中的白银公司夺权斗争被树立为四清运动典型之一，而作为白银公司上层领导的冶金部则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追责，刘少奇在 1964 年 9 月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时就提过和冶金部相关的根子问题，“白银厂上面没有根子？不能相信……白银厂的‘五反’工作，不要冶金部直接领导，要经委直接领导，工作组就算是经委的。如果要冶金部领导，就追不到他自己[27]。”

毛泽东在 12 月 20 日会议的前一天批示了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关于白银公司阶级斗争带动生产斗争的报告，称该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而在更早的 12 月 5 日，毛泽东在谢富治提交的沈阳冶炼厂蹲点报告上作了批示，其批评矛头同样指向冶金部。谢富治报告在讲述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时提到来自上边的影响，即冶金部有关业务单位对于冶炼厂只追求超额完成任务、指标，甚至默许下面企业弄虚作假。毛在“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一句话后面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28]。”王鹤寿也因此被免去冶金部长职务调往鞍山任职。而煤炭部在四清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远不如冶金

[24] 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12.20）》，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25] 据《毛泽东传》等记述，12 月 20 日会议上刘几次提到农村主要矛盾问题，在他提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时，尽管陶铸当场表示赞成，毛却只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结合毛两天后谈话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表态，他的这句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35、2337 页。

[26] 王鹤寿在 1964 年已调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吕东接任冶金部部长。凌华倩、邬大震、赵祥骥：《王鹤寿传略（初稿）》，《冶金管理》1988 年第 1 期，第 37 页；凌华倩、邬大震：《吕东传略（初稿）》，《冶金管理》1988 年第 3 期，第 31 页。

[27] 刘少奇：《刘少奇在国家经委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讲话》（1964.09.23），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2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7、257 页。

部严重[29]，张霖之也在三届人大上继续被任命为煤炭工业部部长，直到文革狂飙将其吞没。

另外从已公开的毛刘对话及他人插话内容看，刘在当日谈话中已经提问了“冶金部根子是谁”，而在薄一波作了“王鹤寿嘛”的回答后，毛在谈话中更明确提出要搞主要的当权派，“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如此清楚的确定了冶金部的根子及当权派之后，刘少奇再向毛发问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岂非是多此一举。

梳理与12月20日会议相关的史料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初步结论，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档案资料，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之间确实发生了重大分歧和微妙的争执，但两人的谈话中并不存在刘提问煤炭部、冶金部谁是走资派和毛指“张霖之就是”的内容。

3. 12月20日之后的毛刘政治博弈状况及该博弈有无可能涉及张霖之?

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分歧争执之后，双方的政治博弈继续展开。12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30]”。

23 日下午毛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具体内容不详；24日上午他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该稿为第二稿，一共十六条。在该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中列举了三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指第三种——引者注）提法较恰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1]。”

虽然修改后的社教文件已按毛的想法将运动性质定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也确定了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毛仍是余怒未消[32]。26日是毛泽东生日，毛在当晚邀请部分人员共进生日晚宴，在晚宴上毛泽东不点名的指责“有些人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毛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33]。”

27日下午，毛在河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十七条”）。陈伯达在会上对该文件作说明，称“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

[29] 刘少奇在64年9月23日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时，对煤炭部的关注点是将煤炭、石油两部改为托拉斯公司，部长改为公司经理。刘少奇:《刘少奇在国家经委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讲话》(1964.09.23)，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3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页。

[31]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1964.12.28)，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注释，28日发出的文件与24日的第二稿相比只增加了第十七条，并修改了题目。《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中央通知的批语与修改》注释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32] 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继续发怒的原因是虽然文件进行了修改，但他在政治上所获甚微，所以“他（指毛——引者注）认为，或有人告诉他，他的胜利是花了重大代价的，而刘仍能按他自己的意志来进行社教运动”。笔者则认为毛的愤怒更可能是他前一段时间对中央一线领导层累积不满的爆发，这从毛在批评刘时又指责两个独立王国这一点上可以得到验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 浩劫的来临 1961-1966年》，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404页。

[3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8-233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页。

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问题。”毛在陈伯达讲话时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之后他又在董必武发言时插话称北京存在两个独立王国[34]（指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引者注），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当日会议上发言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该部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点了文化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35]。

当天晚上，毛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质问题听取李的意见，并对李的一些个人缺点及其在西南局的工作问题进行了批评[36]。从毛专门约李谈话一事来看，围绕主要矛盾问题的高层博弈并没有结束，所以毛在这时候需要与地方大员交流意见[37]并获得他们的支持[38]，至于毛对李井泉的批评，则应该与李在贵州“四清”运动中积极配合刘少奇不无关系[39]。

12 月 28 日下午，毛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七条”。开会前，毛跟身边工作人员要了两本书带去会场，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毛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着重谈了“十七条”文件中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和第十六条“工作态度”。“运动性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第三种提法比较妥当，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他再一次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以陈毅为例，说“只要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在讲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时，毛提出“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会议快结束时，毛又讲了一番话，要到会者回去看党章、宪法，作为公民应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40]？”毛讲话中关于工作态度的论述和会议结束时讲的这段话，显然是发泄他对于刘少奇此前在会议上插话，即所谓“不让我讲话”的不满情绪。

28 日会议后，毛刘之间的矛盾分歧继续扩大。本来“十七条”文件在 28 日会议结束后已决定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名义发出，中央工作会议也在当日按计划闭会。但在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

---

34 毛对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的怨气是因为这两个机构及其领导者邓小平和李富春在三五计划制定思路变化和三线建设推动方面紧跟毛不够。

3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6-457 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1964.12.27），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39-2340 页。

36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7 页。

37 据王力回忆,党内外矛盾交叉的说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王力：《王力反思录》上，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2 页。

38 陈云在 80 年 11 月上旬和胡乔木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问题谈话中提到“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0-261 页。但也应看到，在 62 年的经济恢复和 63 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封疆大吏对于刘少奇的工作是相当配合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看高华先生的相关研究论文。

39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总第 93 期，第 75-89 页。

4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7-458 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40-2342 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二十八日讲话的摘录》（1964.12.28），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通知，“十七条”文件停止下发[41]，中央工作会议则在 65 年 1 月继续进行。十七条被停发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是毛的“乾纲独断”，反映了毛刘之争进一步激化。毛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42]。尤其是毛这大半年来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积累的诸多不满现在都要逐步发泄出来。在接下来的中央会议中，毛对刘的批评意见也越来越多。

1965 年 1 月 3 日晚，毛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如“扎根串连”等，毛以河北新城四清为例子展开激烈批评，“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学文件“越学越蠢。反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钟头就看完了，你带下去学么。下去一不要学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孤立地扎根串连。”“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就是没依靠好，如果依靠好了，一个县十几个人就够了。”“一千多户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一千多户你依靠七八百户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与会者如邓小平等在毛讲话后陆续发言同意毛的主张[43]。

1 月 5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少奇的不点名批评也在延续：“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对于刘少奇此前讲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观点毛更是在会上严厉批评指责，“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4]”。

1 月 8 日，彭真、陈伯达、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意见，修改“十七条”为“二十三条”[45]，毛泽东则在新修改文件[46] 上又加写和改写了一些重要内容，他在第二条“运动性质”上专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47]。”可见其对于此前与刘少奇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一直耿耿于怀。

---

41 薄一波回忆录中称停发十七条是陈伯达建议的，认为陈伯达的发言建议进一步加大了毛刘之间已发生的分歧，但陈伯达的回忆则称毛在 28 日讲话的当晚把他叫去，口授了关于二十三条文件起草的意见，在和陈伯达谈话中毛“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很大的意见”，令陈大为不安，所以他在和王力商量之后，决定找陶铸、彭真出面和刘少奇谈话，劝刘向毛作检讨，以缓和毛刘之间的关系。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的说法较为一致，在王看来，因为当时“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在这点上陈伯达是有功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33 页；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253 页；王力：《王力反思录》上，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3 页。

4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48 页。

43 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1965.01.03），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42-2344 页。

4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44-2345 页。

45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86 页。

46 杨尚昆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新修改文件：“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0 页。

4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1 页。

1 月 11 日，毛泽东将华东组的讨论意见转给刘少奇，该意见中明确提出“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对于基层组织，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不能说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可以团结[48]。

随着二十三条的进一步讨论修改，毛对四清运动的意见完全占了上风。刘少奇也一改之前锋芒毕露的气势，他在 13 日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14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文件。正如杨尚昆日记中的准确评价，“刘话不灵了”，毛重新取得了四清运动的主导权。这与他此前发话让少奇挂帅，统管四清、五反、经济[49]，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四清运动后继的具体事务处理，则主要交由邓小平和彭真负责[50]。而被他指控为“两个独立王国”的国家计委和中央书记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51]。

总的来看，在毛刘 20 日会议上发生分歧争执后，双方在随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进行了一场复杂微妙的政治博弈，在双方的具体博弈斗争中，28 日的毛讲话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 28 日之前的毛刘争执中，刘似乎还有一些与毛博弈的勇气，有研究者根据陈伯达回忆指刘“不让毛说话”一事发生于 27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52]，此一判断可否成立仍有待更多史料的佐证。但从当晚毛找李井泉谈话内容来看，毛刘围绕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博弈仍在激烈进行中。而在 28 日毛发表长篇讲话后，刘少奇的态度有很大变化，他“讲的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53]”。在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刘开始变得小心谨慎，并完全接受毛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54]。毛则“宜将剩勇追穷寇”，1 月 3 日会议上不点名的猛烈批评刘少奇主导四清运动的种种做法，当日刘少奇的反应则是步步退让，据杨尚昆日记记述，其在该次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有“现在这种做法，是不赞成的”，“三依靠不对，但也不能依靠工作队，不能揭，一揭就漆黑一团[55]。”面对刘的退让和自我批评，毛最终取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推出符合其心意的“二十三条”作为四清运动的主导文件。

分析这场政治博弈的复杂过程，我们可以判断在 20 日毛刘发生争执之后，到 28 日毛讲话前，毛刘之间依然有着较为激烈的政治较量，如果陈伯达的回忆可靠的话，27 日会议上的毛刘之争可能是这次毛刘博弈过程中的又一个关键点，但关于该天会议的详细记录至今未解密，毛在当天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也只有部分被披露，刘少奇有无在当天会上发

---

4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66-467 页。

49 毛在 64 年 11 月 26 日的一次讨论三线问题的会议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2 页。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15 页。

50 印红标：《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 年 8 月号，总第 36 期，第 39 页。

51 按毛的要求，1965 年 1 月成立了计划参谋部（一般称为“小计委”），专门负责“三五计划”的制定任务，毛还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位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这意味着从 58 年开始由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总书记掌握的经济计划主导权由此逐步转移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手中，而小计委人员随后也在原计委主任李富春的配合下接手主持计委的全面工作。另据杨尚昆晚年回忆，毛在提出建立小计委的同时，还打算另外建立一个书记处，由陶铸来管，因周恩来不赞成而作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07 页；张培森：《杨尚昆 1986 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 年第 3 期，第 36 页。

52 陈伯达晚年回忆说“那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天毛主席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少奇却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在说刘少奇不许他发言”。《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据此判断刘不让毛讲话一事发生在 12 月 27 日。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251 页；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上，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5 页.

5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42 页。

54 刘在 12 月 30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我们党内哪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2 页。

55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8-489 页。

言还难以确定[56]，其发言的具体内容更是不得而知。所以在 21-28 号这段时间的毛刘博弈对话中有无涉及煤炭部及其部长张霖之，鉴于相关资料的披露还相当有限，其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屡屡强调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对于这类走资派具体如何处置，毛的说法又带有某种“温和性”。毛 12 月 20 日谈话中讲要擒王鹤寿，但又表示对王是“擒下马来，然后改造”。他还在会上问起王鹤寿“有没有转变”，在薄一波回答“有进步”后毛即表示“已变好，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没有他，我不知道[57]。”1965 年 1 月 3 日会议讲话中毛讲“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是严重的，大多数是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还有用处。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58]。”所以王鹤寿在被罢免冶金部长后仍能当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直到文革中才被彻底打倒。因此，张霖之如果在此次毛刘之争中被提及，在当时就受到严厉政治处理的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

4. 结语

在梳理和分析相关历史史料之后，我们对本文讨论的主题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毛刘之争开始于 1964 年 12 月 20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刘在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等问题上发生了颇为尖锐的分歧，但目前所公开的当日会议史料中并没有毛刘争论冶金部、煤炭部谁是走资派的内容。

（2）在 12 月 20 日之后到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刘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一番复杂的政治博弈，以 12 月 28 日毛在会议上讲话为分水岭，毛刘博弈在 28 日后逐步向毛节节进逼、刘步步退让的方向发展。毛刘围绕主要矛盾问题的后继争论对话应发生在 28 日之前的中央会议上，张霖之是走资派的问题如果在对话中被提及，也应在这一时期。

（3）文革时期张霖之被定性打倒并非中央文革或江青、戚本禹少数“坏人”的陷害打击，而应是中央高层的集体决定，毛泽东应该是给张霖之定性的最终决策者。毛同意打倒张霖之是否与文革前的毛刘之争有关，从现有史料出发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4）1964 年底发生的毛刘之争是复杂的“政争”与“权争”的混合体。诚如高华先生所言：“许多情况都表明，刘想借‘四清’真正树立起他‘号令天下’的权威[59]”，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两人之间的争斗必然愈演愈烈。虽然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半段步步退让，也失去了四清运动的领导权，但其掌握的权力和影响力仍让毛多有担忧和忌惮[60]，通过一场新的运动解决所谓一二线之间存在的问题，改变毛“大权旁落”的局面也就是势所必然。

56《毛泽东传》中只提到朱德、陈伯达、董必武和陆定一发言，杨尚昆日记中还提到并记录了赛福鼎的发言内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39-2340 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8 页。

57 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12.20）》，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58 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1965.01.03），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59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总第 93 期，第 85 页。

60 刘虽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他自己也做了检讨，但高级干部包括诸多封疆大吏对于刘仍是毕恭毕敬，不敢懈怠。毛泽东 65 年 11 月中旬来南京，接待毛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表示要按照主席指示和少奇同志来信精神进一步检查江苏省委作风，令毛大为惊讶的问：“你们还要做检讨”。在贵州四清运动的问题处理上，尽管毛要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给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复职，李最后只安排周林当了西南局的一个空头书记。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 年 4 月号，总第 46 期，第 81 页；《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总第 93 期，第 84 页。

【往事】

东厢记

——我的忘年交

华聿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牙牙学语的时候，家里就租住了这院子的一角，在这里，我一直生活至文革中下乡插队，因此，这院子便承载了我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梦。

院子坐北朝南，东西向呈对称性地一隔为二，分别由两个相邻的大门进出，后院有一狭长的天井把东西两院贯通。当年，房东之所以这么设计建造，是打算有朝一日把它分给两个儿子的，这就使我觉得它很像是《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简缩版。

本是十分典雅的江南居宅，秦檐汉瓦，唐牖宋户，明净的厅堂中铺着深灰色的清水砖，虽然没有花园，但后院的井台边种着草树，高墙上爬满了绿油油的藤萝，却也十分别致。只因为分别租给了十几家居民才使它成了一座大杂院。于是，过道、客厅、楼梯间和灶披间，凡是能利用起来的空间，都挤满了各类杂物。若干年后，我读龚自珍的《项脊轩志》，读至“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座院子。

院子里的住户有工人和革命干部，也有教师和职员，资本家和小业主，还有反革命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不过，与外面的世界不同，在我们这个院子里，从来就没有形成鲜明的阶级对立，人以群分的基石还是传统的忠厚与奸诈，而浓浓的小市民习气则又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好时坏的凝固剂或分化剂。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氛围才使得我能够与东厢房的那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成了忘年交。

东西厢房分处于大院的东西院，遥遥相对，但隔着一道墙，我去东厢房是要从后院转过去的。两间厢房都宽不足六尺，长不满一丈。据传，刘禹锡被贬和州时，其居室仅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而刘禹锡却据此而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陋室铭》。我的这位忘年交也能把他的陋室布置得有情有调：其一床、一桌、一椅，外加一书橱，都以毛竹制成，是他家乡宜兴山区的产物，只可惜书橱中的书不是竹简的；桌上有几本他常读的书，其中有郁达夫的小说散文选、芦焚（又名师陀）的《里门拾记》和孔尚任的全版的《桃花扇》，还有一只笔筒，也是竹制的；室内最诱人的是窗棂上悬着的几只拳头般大小的小竹笼，笼中供养的是俗称“叫哥哥”的蝈蝈，每当夏秋季节，这些蝈蝈儿就会鼓动着绿色的翅膀，发出嘹亮的鸣叫声，使得这个繁杂闷热的大院似乎顿时清凉起来。

我一开始到东厢房去，只是为了看那些蝈蝈。我说：“蝈蝈好可爱，为什么要关进笼子呢？”他却说：“和麻雀一样，蝈蝈也是害虫。”我说：“你骗我！它们为什么要大声鸣叫？不是说‘不平则鸣’吗？”他无语。

我后来到东厢房去，是为了看他的书。因为，他的书中有许多吸引我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厢房虽然极小，但好书却能展现一个无限广大的世界。比如，那一本《桃花扇》就让我领略了明末清初那些风流才子和风尘女子的别样情怀，懂得了什么是家国恩仇，及李香君和侯方域之间的人格区别。不知为什么，从书中南明“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及他儿子阳羡词派的代表陈维崧，我会联想到眼前的他，不知是否他们都是出生于宜兴的文人的缘故？

他原是一名拉丁文教师，且通文学，又懂中医。因为私下里不慎吐露了几句心里话，被身边的人告

密了，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他在发配农村劳动改造时得了一身痨病，搞得奄奄一息，后来终于能够回城，在这个东厢房养病了。他的母亲，一个特别善良又特别坚韧的缠小足的女人，曾生育过十六个孩子，一生操劳，至风烛残年，又来照顾他的生活，就住于二楼一小室之中。我和他交往的时候，他经常咳嗽吐血，足不出户，只是偶尔站在院子的大门里头向门外的石子路张望几眼。

那一次，我来到东厢房。天很冷，他坐在被窝里，手中捧着一本唐诗选，正抬着头，用他的宜兴山区的乡音吟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首诗，我也背诵过，是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于是我就抢着背出了后四句："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

他很吃惊，一双小眼睛从近视镜片后打量着我，就像第一次认识我似的。过了好一会，他才问我："你怎么会背的？"

我得意地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能背的诗多着呢！"

他就问是否我父亲教的，我说都是自己偷偷看来的。于是，他就很兴奋，从被窝里爬了出来，穿好衣服，说："'曲径通幽处'有另一个版本，是'竹径通幽处'，你看，用'曲'好，还是'竹'好呢？"

这真是一个难题，我支支吾吾的，不知从何答起。他就说他喜欢"曲"字，弯弯曲曲的，像煞了人生之路。我心中实在无法分辨哪个更好，但却不愿在嘴上服输，就说喜欢"竹"字，还说，来自竹乡又特别爱竹的他也应该喜欢"竹"字。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的意见，这一下，我们就争辩起来了。他比我大二十年呢，居然也像个孩子一样与我争得脸红耳赤的。

第二天，他遇到我父亲，就说："这孩子，要是好好培养，必能成才！孺子可教，可教！"

以后，他就经常讲解一些诗词给我听，有时也讲一些对联和谜语。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用他老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喝墨水长大的。我最喜欢听他讲吴承恩写在《西游记》中的那首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见太平?"他告诉我，这首诗的奥妙就是巧用了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伏苓、防己、竹沥、茴香等九味中药的名称来展示玄奘取经的经历。因为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中医知识，他讲起来，就格外地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渐渐地，这间东厢房就成了我求知的乐园，但是，在我心中，他的地位却与学校的老师不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朋友，因此，我也会时不时地和他开个玩笑。

那年春季的一个雨天，他教给我一个字谜，谜面是"春雨绵绵妻独宿"，谜底是"一"字。他解释说："既是'雨绵绵'，又何来'春'中之'日'？既是'妻独宿'，又何来'春'中之'夫'？'春'字去掉'日'与'夫'，剩下的不就是个'一'字吗？"我拍手叫绝，但随即便指着窗台上滴滴答答的雨点儿调侃说："这个'雨绵绵'倒是符合今日情景的，可惜这屋子里没有'妻'啊！"他楞了一下，紧接着，脸上就露出一丝哀怨之色，伴随着的是一阵猛烈的咳嗽，然后就吐出一口血来。我这才发觉玩笑开大了，是呀，如他现在的处境，又怎么可能娶妻成家呀？我分明是触着他的痛处了！檐外，天井中的雨正不紧不慢地下着，像永远也没有尽头似的。

我怀着凄皇的心情离开了东厢房，在经过几家人合用的堂屋时，见他的老母亲正在煤球炉上为他熬药，听得她嘴中轻轻自语："哎，这哪里是肺病，明明就是心病嘛！"

以后的一段时间，他给我讲的几乎都是关于暮春的宋词。中国历代的文人，多的是伤春与悲秋两种情结，这大概和那些敢于为百姓发声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遭受不公有关吧？可是，我在听他讲那些伤春之词的时候，还不懂得其中的深意，只是隐隐觉得这些词中有他的清癯消瘦的身影。记得他在吟诵黄庭坚的《清平乐》时，把调子拖得很慢很慢，声音也越来越低沉："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听这几句，就如看见那只婉转啼鸣的黄鹂鸟，在绿肥红瘦的原野上渐

飞渐远，直至消失在苍茫的天地间，而落下了一个孤寂的他……

六六年的初夏，文革开始了。院门外的石子路上，不时有带着红袖章、唱着战歌、高喊着口号的红卫兵走过，斗争的浪潮铺天盖地般汹涌而来。我们的院子里每天都发生着必将让千秋万代的后人匪夷所思的故事，大多的家庭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开过栈房的、办过报馆的、收过租米的，自不待言，连正在教书的、在机关当秘书的、做小生意的也纷纷遭殃。七十多岁的房东老太太被人从她的正房赶了出来，住进了厨房后的杂物间。东院的一位在工厂做党委书记的老干部也被造反派押解到院门口来，当着众乡邻的面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嘴中还须不停地高喊："我是走资派！"不过，这位老干部心理素质特好，晚上回家后一边抿着小酒，一边笑嘻嘻地问我们："我白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幸运的是，在如此激烈的大风暴中，我的那位忘年交却躲过了一劫，因为长期在家养病，他单位中的造反派谁也记不起还有这样一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不然，他的身体是无论如何也经不起一击的。那时，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而我又无意参加两大派之间的"文攻"或者"武卫"，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到东厢房去。但是，我已没有闲情和他谈诗词、猜谜语了，我只是把外面发生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讲给他听听，或者是把大街上散发的一些传单拿给他看看。他听了，看了，却很少讲话，只是苦涩地笑笑。

然而，有一天，他要我帮忙雇一辆三轮车，再陪着他坐车到大街上去转一圈。那是深冬的早晨，天色阴沉，霜华如水，风刮到脸上有刀割一般地痛。我们坐着一位老师傅踩的三轮，从院子前的石子路出发，穿过一条青砖小巷，就上了大街，来到市中心。作为这座城市零坐标的图书馆楼顶的大自鸣钟还高高挺立着，只是钟面的时针和分针早已停止转动了。崇安寺前那座拱北楼斑驳的墙面上悬挂着巨幅的领袖像，大街两边张贴着成千上万幅标语和大字报，无数的"打到""横扫""敬祝""万岁"之类的字眼从我们的两边闪过，令人目不暇接。

东方红商厦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响着，先是劲狂的歌声，后是某个造反派组织讨伐另一造反派组织的战斗檄文，那气势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突然，前面有举着红旗和大刀、长矛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过来，我们便慌忙让老师傅调转车头，赶回家去。那天，他吐了好几次血，并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超乎想象啊！超乎想象啊！超乎……"

几天之后，他脸色凝重地问我："将来的某一天，你大学毕业，西装革履地回到家乡，那时候，还会记得在这件小厢房里曾经有一个病得快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

我听了，哈哈哈地笑起来，说道："你不知道大学都停办了吗？"

他摇摇头，连说道："你不懂，不懂。"过了一会，他又轻轻叹了口气："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那天，他把全版的《桃花扇》送给了我。

六八年的春节，农历正月初八的清晨，我走进东厢房，见他还睡着，就嚷嚷道："起床了，起床了！懒虫！"我的声音很响，他却毫无反应。我伸出手，按了按他的鼻子，说："别装了，太阳都晒屁股了！"但他还是没有反应。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仔细看去，见他脸色煞白，嘴巴在不停地呼气。我转身便跑，到堂屋去报告他的老母亲……。他再也没有醒来，后来才知道，晚上，他吃了整整一瓶的安眠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间东厢房连同整座的大院和整条的石子路都早已在拆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还是常常记起他，尤其是在国家为反右扩大化纠错的时候，我更为他激动不已。当年，他说我"不懂"的事，我也终于悟出了一些道理。只是他送我的那本《桃花扇》找不到了，因为，这几十年的颠簸实在太多，但书中有几句曲词，却一直缠缠绵绵地萦绕于我的心头：

"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哼哼。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往事】

艰难岁月

——我的中学生活（1958—1961）

李耿立

1. 抗日英雄李墨林

老师告诉我们，一位抗日英雄要来给我们做报告。我们都眼巴巴的盼着。星期天，我们在马嘎啦庙的院子里集合了，倒班上课的同学们也来了。北房台阶下摆好了一张桌子。铺上了白桌布，还放了一盆花。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李墨林来了。他当时是四季青公社的社长。他中等偏上的个子，身躯壮硕，红脸膛，短平头，两道浓眉，眼睛特亮。他是个大嗓门，说话带着膛音。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都是洋学生，是国家有用的人。我是个种菜的，我种的是最好的菜。为什么说是最好的呢？俗话说："百菜不如白菜，百面不如白面"，我们种的最多的就是大白菜，千家万户离不了。干什么都是光荣的，种好菜就是我们的光荣。

风趣的开头一下子吸引了大家。那句俗话成了我们后来老念叨的话。他是保定那一带的人，那是个出豪杰的地方。他家里穷，小时候没上过学。日本打进来，他就参加了武工队，在京南一带活动。他是个孤胆英雄，常常腰揣两把盒子枪，到敌人占住的地方锄奸，他一进镇，汉奸们都吓得藏起来，说李阎王来了。解放了，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开会领导讲话也记不全，只能当个公社社长，而他手下的都升官了。

所以，他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得好当大官坐小汽车，学得不好只能坐大汽车。校长一看，报告跑调了，一时不知如何收场，赶紧递上茶水，老师也领着我们喊口号，向老英雄致敬，向老英雄学习！

他还想再讲，校长赶紧打断话头，开始总结。把他弄下台来。我当时想，老英雄觉悟不算高呀，应当想着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怎么想当官呢想坐小轿车呢？原来英雄也是凡人，也有落后思想。老英雄走后，校长又讲话，叫我们吸收正面的东西，说太阳里也有黑子等等。

2. 挨饿年代

1960-1962 我们国家经受了灾荒。其实从 59 年就可以看见端倪了。那几年华北地区没有天灾，59 年还是大丰收。大白菜又大又瓷实，白薯长得把地都挣出了缝，用脚一扒拉就踢出一大块头。但那年农村开始吃大食堂，"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敞开肚子吃大米白面，我同学家是农业户，他爸从大队食堂打一盆子小米饭，不小心扣地下了，收也不收，再去打一盆。那么好的白薯没有人收，都烂在地里了。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折腾，很快大食堂吃不起了，没粮了。

我妈所在的研究所的南边全是麦子地。当时推广密植，要放卫星。转过春来麦子返青后，苗长得密不透风，就是不出穗。农民们隔一行拔一行，一边拔一边骂大街。骂干部"拉出的屎往回坐"，是"倒骚"（北京土话，我吃不准意思，大约是来回折腾）。

到了 60 年，错误政策的恶果开始显现，饥饿像乌云压城一般笼罩了祖国大地。居住北京的人们算是幸运的，粮食定量削减了，副食和蔬菜都跟着减了，但比全国其他地方好得多。每家都买了秤，做饭每顿都得称量。学校里体育课停了，减少热量损失。老师们在操场上种起了庄稼。人们开始寻找

一切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大伙跑到收过白薯、土豆的地里刨找，找落在地里的根子、须子，那叫做“遛土豆”“遛白薯”，城里的人也下来拿着炉钩子，饭铲子之类“遛”，地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头一遍是农民们溜，他们刨白薯时故意不刨干净，可以刨到大块的；我们刨第二遍，根子、小须留块的还能见到；等城里人知道了来刨第三茬，基本上是什么也没了。

失望的人们把目标转向了树和野菜。首先是榆树的榆钱，榆树叶子，接着是榆皮面（剥下榆树皮，砸烂泡水沉淀，得到一种红色的面，很劲道好吃）。榆树剥死了，开始找苋菜、灰菜、扫帚苗、马齿苋等野菜，掺一点棒子面蒸了吃。也很好吃，先还掐嫩尖，后来连老叶子也不放过。这些都没了，我们试验过杨树叶和柳树叶，去掉黄叶，叶柄，嫩叶子煮了，掺点面蒸“苦累”，也还可以下咽。杨树叶子好吃一些，柳树叶子很苦。低处的叶子没有了，高处的又很难够到。我姥姥决定试试麦苗，因为麦子春天返青，冬天羊吃了苗，春天又会长出来，拔走一些不会影响它生长，不会有人管。但麦苗实在是不能吃，无论是蒸还是煮，它始终是粗纤维，嚼着它，就如同嚼麻绳子，咽不下去。连咽下的水也没一点好味，人毕竟没有羊的消化器官，试验失败了。

全国人们都在试，什么膨化食品（又叫粮食倍增器）、什么小球藻（又叫人造肉）。奇怪的是，随着粮食没了，菜也没了，原来在四季青公社到处可见的大白菜都没了，要拿着副食购货本去副食店买，一人一周二两半白菜（基本就是一个菜帮子的分量），排半天队，你只买回几个白菜帮子，那是一家子一周的量。我和弟弟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姥姥把她那份口粮省出来让我们吃，不久她浮肿了，腿肿得老粗，和她原来的小脚都分不出个了，按一下一个大坑。后来脸也有些肿了。妈妈带她去医务所看，大夫给开了二两黄豆，这是不用粮票的。姥姥把黄豆炒了，用擀面杖压成碎面，装在小瓶里，一天吃一小勺，现在看就是补充蛋白。

为了充饥，人们发明了一种汤。叫做“兑汤”：一大勺酱油，一点盐和一点醋，兑上开水，喝下去马上有饱的感觉。如果有葱花、香菜末、虾皮、紫菜任意一种，再点上一两滴香油，那就是贵族级兑汤。当然，那是坚持不了一小会的。早上一般是一大碗兑汤，不吃其他东西，早上那份挪到中午一块吃。到食堂、饭馆吃饭的人们都会护着饭碗，眼睛余光扫视四周，防备有饿急的人来撒一把土或吐口吐沫，你嫌脏不吃了，他就拿去狼吞虎咽。吃完了的饭碗各个被舔得干干净净，掉到地下的饭粒，窝头渣都会捡起来，没有蚂蚁的份。直到现在，掉到地下的馒头渣我还会下意识地捡起来丢到嘴里。反正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不会浪费粮食的，算是时代的烙印吧。

那时人们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减少热量消耗，到哪里能整到填肚子的东西，可越想就越觉得饿。碰到一块说话，说着说着就会讲到吃饭，有人就会讲到当年在哪里胡吃海喝，几盘几碗，让人觉得更饿。其他东西也跟着涨价了，听说农村集上兔子卖到了 20 元钱一只，烟叶子卖到 10 元一斤，烟瘾熬不住又没钱的，可以一毛钱抽一口烟卷。花一毛钱，把气吐尽，尽力一吸，气足的可以抽掉多半根烟。一块钱可以买 3 斤萝卜。买萝卜的农民说，我拎两个大萝卜就能逛趟北京城，连理发带洗澡还有富余。可不是吗？理个发一毛钱，洗个澡，用澡堂子的手巾肥皂带搓澡才两毛六分钱，汽车费一毛五就够。那时乡下有亲戚是人人羡慕的。抗过了三年灾害的人，绝对吃嘛嘛香。文革期间我在大学，搞不忘阶级苦的教育，吃忆苦饭，大个糠团子我一口气吃了四个，一点也没觉得苦。

3. 父亲从北大荒调到了农垦部

父亲在我幼年的印象里是十分模糊的，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工作，极少回家。后来听他讲过，他十五岁时我爷爷去世，他独自在北京四中上学，19 岁和母亲结婚，20 岁时有了我。1949 年父亲考入华北革命大学，算是参加了革命，后来又考入了外国语学院，成了新中国第一届学生，当时的录取通知，是登在人民日报的，我姑姑还保存着那张报纸的复印件（因为我姑父也被录取）。那时我母亲也在北京，但我太小，没有记住什么事。1950 年，母亲到

察哈尔省盐务局参加工作，到了张家口，他们开始分居。1953 年，父亲毕业，他选择了参加志愿军到朝鲜而不是留校。他在中朝苏联合空军大队做侦听翻译。不久朝鲜战争停战，他转入北京空司，到山东荣成工作，后来又调到南京空司，在福州鼓山继续做侦听工作。而母亲调干到太原机械学院上学，1954 年毕业分到北京冷泉的研究所，我们全家跟着母亲搬到北京。1958 年大裁军，十万官兵下北大荒转为农垦，我爸又积极报名，从福州直接到了北大荒，而没有回家，记得他在天津换车，母亲是到天津和父亲见了一面。那时候的人们都充满革命豪情和使命感，把自己当成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以革命的需要当第一，没有个人的意愿。我父母那时都是三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每年只有几天探亲假是团聚的日子。父亲分到北大荒密山、虎林一带的 858 农场，当军垦战士种地，还在乌苏里江边打过鱼，后来是食堂管理员。

小时候只记得他总是寄回儿童读物，少年文艺等书籍，探亲时带回很多好吃的。我写去的信很短，有时只是在妈妈的信上附上几句，他回信总是很长，连我写的错字也一一订正。大一点了从他的来信里约略的知道一些情况：比如每人要种 250 亩地，秋收时机器、牲口、人一起上阵，几天几夜不休息，和老天争粮。夏天时，那里变成大沼泽，人马都出不来，隔绝在那里，天天吃黄豆。我还记得我和妈妈买了好多大块的碱（约一尺见方，三寸厚的大块），缝到布袋里给当食堂管理员的爸爸寄去，因为那里买不到碱，只能吃酸馒头。

到 1960 年情况有了变化。王震去 858 农场视察，见到我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在干着完全不需要文化的活儿，勃然大怒，指着那里的官们说，你们这是浪费人才，马上给我调走，我要他们。他在哪儿坐镇，包括我父亲在内的 40 多人调回了北京。父亲分到了农垦部外事处。可是，等王震一走，调动的事马上停了，许多人才又被继续浪费了。

当然这些变化我不知道，估计连我妈妈也不知道。那时一封书信到北大荒怎么也得半个月。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课，老师把我叫到教研室告诉我，你不用上课了，你爸爸回来了！下课后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事，好朋友曹随咬着耳朵对我说，一会你见了爸爸，一定会扑上去，抱着他，激动地流泪大喊。

我一出教学楼，就看到校门口阳光下站着一个人。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意识到那就是父亲，往那里走过去。父亲也慢慢往我这里走过来，走到十来米的地方，我们都站住了，相互打量着，他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一个瘦瘦的老头，胡子拉碴的，带了个皮帽子，穿了一件油脂麻花的绿军大衣，脖领子那儿是一条子黑黑的油腻。却是满脸的笑容。看我不动，他叫我的小名：立立，回家吧！我说：嗯！就跟着他一前一后地往家走，没有拥抱，没有叫喊，没有激动。我知道：他一定是刚到家就迫不及待的来叫我的。我没有扑上去抱着他，他或许有些失落。但太生疏了，或者是因为小男子汉的矜持，我做不出那些。想写篇文章记载这次见面的曹随一定也失望了。

尽管没在脸上表现出来，心里却是激流滚滚，浑身发热：我爸爸回来了！仿佛有了主心骨。全家都沉浸在欢乐中，尽管粮票紧张，细粮很少，也要吃顿饺子。姥姥、妈妈和爸爸一起动手拆洗我爸带回来的被褥衣服。北大荒那时非常冷，冬天几天不洗脸，几个月不能洗澡是常有的事，经常在地里摸爬滚打，脏，油腻、长虱子是必然的。但再脏也不能扔掉，因为全家一年的布票也不够做一套铺盖的。那一阵，我家和邻居家门口的晾衣绳上成天挂满布片、衣服，在冬天的阳光下先冻后干。上午学校上主课，下午就是体育和副课，音乐美术之类，那几天老师特准我下午不上课，在家里陪父亲。父亲详尽地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我还跟他一起到我小学上学的蓝靛厂逛了一次。在蓝靛厂丁字街一家叫做“三路居”的小饭馆吃了饭。父亲要了几个菜，他自己并没怎么吃，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和弟弟吃完。

4. 绿面包和活鱼食堂

1961 年春天饥荒更严重了，树叶和野菜都没长出来，溜过多少遍的地里连个白薯须须也不会找得到。副食品越来越少见了，买糖酒烟茶之类全凭各

种票，豆腐、粉条之类春节才有。每家都有个副食本，蔬菜也要凭本供应，数量是不确定的，每次副食店会挂出小黑板写出本周的供应量。记得一次一个人供二两半白菜，排了半天队，只买回几个白菜帮。

有一天父亲回来的比平日晚得多，满脸笑容，夹了一个大包。揭开一层层的报纸，里面露出个长方形的东西，像是个大枕头，足有一尺多长，颜色看不出是灰还是绿。原来这是农垦部下属的农场研制的玉米棒面包，是用玉米棒的芯芯、玉米秸和叶子充分磨细后制作的。农场试制成功后到农垦部报喜送的样品。农垦部的职员都分到了一个。这正是雪中送炭，马上切下一片全家都尝尝。没有粮食的香味，但也没有怪味，有点刺嗓子，但绝对咽得下去，长久空虚的肠胃感觉就更好了。那个绿面包是个救命的宝贝，我们吃了一周多。

我那年十三岁，弟弟十一岁，都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饿，周围的人们天天琢磨着吃，越琢磨就越觉得饿。也影响着我们的感觉。我的一根根肋骨隔着背心都看得出来，弟弟的圆脸也变成了长脸。那天父亲宣布，我们全家去吃一次“活鱼食堂”。活鱼食堂在紫竹院公园里，靠近南门的地方。当时那可是远近闻名的。食堂门外有个圆形水池，里面养着很多大鱼。如果出 20 块钱，一家就可以不用粮票足吃一顿，一个主菜就是从池子里现捞的活鱼。出 15 块钱，也可以足吃一顿，但没有鱼，菜也差一些。20 块钱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差不多是父亲半个月工资。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多次决定的。当然去吃活鱼食堂的前一天，我们就不吃饭了，留着肚子去吃那一顿。那顿饭多么好吃没法形容。现在的人饿上一个星期再去吃没准能体会得到。

5. 粮食出口古巴

一天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消息，我们援助了古巴一万吨大米。我们都觉得很对。我们要站在新中国，放眼全世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古巴站在抗美斗争的最前线，我们当然要支援他。我们那时学了一首歌，叫做“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只记得最后两句：古巴西，扬基诺，古巴西，扬基诺！

但慢慢就有了一些流言，我们自己都没得吃，干嘛给别人？同学们之间也有这么说的。学校老师开始做政治工作。那时我们正讲公制和市制单位的区别，老师拿出一架天平，一头放上一克的砝码，另一头往上放大米粒。量了几次，让三个同学数米粒数，然后平均。57 粒米重一克。老师说：按一克米六十粒，大家算一算。一万吨多少粒米？大家开始算：一公斤六万粒，一吨六千万粒。一万吨六千亿粒。老师说中国六亿人，每人核到六千粒米。一年 365 天，每天只要省出 18 粒米就够给古巴的了。你们连 18 粒米也省不出来吗？少掉几个米粒就行了。大家一起喊，省的出来！

于是又开唱“古巴西，扬基诺！那时的政治工作多么到位呀！学了知识又化解了怨气。

6. “顺”东西

因为饥荒迁延的时间不短了，同学们的家庭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什么门路，多数也没有农村的亲戚。所以大家最常说到的话题不是功课，而是哪儿能弄到吃的？不知何时，一些同学间流行起练习偷东西（叫做“顺”东西）的游戏，课间时凑在一起，或挤你一下，或拍你一把，在你转移注意力时，从你身上顺走一件东西，然后迅速的转移到别人那里，或自己藏起来。

有一次我的钢笔被一个擦肩而过的同学顺走了，我当时就觉察了，不过一两分钟。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他从大衣下摆那掏出来了，原来他在大衣口袋里弄了个洞，钢笔从洞里掉到下摆那儿。

也练习两个手指从口袋里夹钱包，或在手指缝里夹半片刮胡刀片捌口袋。这样的练习并不真的要偷你的东西，偷了会还你，或者告诉你让你找。完事一笑而已，并不避讳大家。

后来这几个人就开始真的干了。工体路上有六路公共汽车（那时缺汽油，车厢顶上都背着一个老大的橡胶汽包，里面灌着煤气作动力源），上下班

时坐车的人很多，几个同学就在那路车上“干活”。后来听一个同学带着羡慕的口气总结他们的经验：在人们往车上挤的时候，他们跟在后面连叫带挤，互相掩护，那时下手，并不上车。偷了钱包，立刻掏走钱和粮票，钱包多半扔在下水道口，证件留下。

我去车站附近的下水道口看过，里面真有不少钱包。他们几个得手之后，结伙到饭馆饱餐一顿，往往会带回一饭盒肉菜，分给班里的同学们吃。像我这样的好学生，班干部、女同学不给。其他人都能享受到。或许是他们的道义，或许是一种贿赂。总之，没有人去告发他们，他们有群众基础。

7. 天线和敌台

即使在那样的氛围里，老师们还是督促我们学知识，努力开拓我们的视野，成立了课外小组。我参加的小组是学装矿石收音机。矿石其实是黄铁矿的晶体，颜色金黄，一般是个四面正方的晶体，装在一个玻璃管里。玻璃管一头有根细细的金属丝，搭在矿石上。玻璃管两头有接线柱，好像也不用电池，接上天线和耳机就能听到电台的广播。黄铁矿石有方向性，你得调节那根细金属丝，戴着耳机仔细听，反复比较，就可以找到最佳的一点，搭在那一点声音会大一点。父亲很支持我，给我买齐了所有东西。

我装了一台，把它固定在木板上。一回家就调它。居然有了声音，不过只有一个电台，时断时续，老得调那根细丝。后来在一本叫做《家庭实验》的书上看到，要想收听效果好，天线是关键。我决定按照书上的图样做个天线。我找了一根长竹竿子，头上绑一根横棍儿，成十字架形，十字架上钉上小钉子隔开距离，让爸爸买了几米多股铜线，在十字架上绕成菱形的网。正巧我们的房子和围墙之间的夹道里有一棵很高的臭椿树，我把天线架到树上，准备好好调调矿石机。

不料刚架上两天，派出所的警察就找到家里来了，他们来调查天线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要收听敌台？敌台当时是指所有外国的广播电台，台湾、港澳的的广播电台。那时所有的收音机都是没有短波的，根本收不到敌台。何况我们家还没有收音机，否则会很麻烦。我把矿石机让他们看，他们始终半信半疑。过了一天，他们又来了，叫我把天线撤掉。晚上父母亲下班回来后一商量，赶紧把天线弄下来了。从此再没有兴趣弄什么矿石机了。

8. 东直门开荒地、膏药和买萝卜

那时东直门的城墙还没拆，城墙外还有护城河，不过河里没有多少水。我们住的东羊管胡同离城墙也就是 200 米。城墙根一带没有人家。因为粮食紧张，人人都得想辙找到填肚子的东西。姥爷说咱们开点荒地吧！他已经看了多次了，看好了护城河外边一块地，离大路较远，没多少人去。一天他带着我和弟弟，拿着一把镐，一把铁锨去刨地。护城河的地不算好，是硬硬的黄土疙瘩，还掺有不少的小石头。一镐下去只能刨进一两寸深。弟弟一会儿就不干了，我是主力，咬着牙一直干。手上起了泡也不停。第二天又接着去刨，终于刨出了一块有 20 来米长。3 米来宽的地。捡走地里的石子，码到地边上做成边界，靠近道路的一边埋上酸枣树枝子。那地还真有模有样了。我们祖孙三个坐在地边，一边喝水休息看风景一边商量着着种点什么。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傍晚的阳光把城墙勾出了金边。只见一只喜鹊叼着个虫子飞过，它后边一只黑乌鸦俯冲下来，用一只翅膀猛地敲了它的脊背。大概是感觉疼了，它吐出了虫子，喳喳地直叫。那只乌鸦急扇了几下翅膀，超过喜鹊，抄起半空的虫子就飞走了。我气得捡起一块石头扔向乌鸦，没有打到。好心情被这恃强凌弱。抢他人口粮的家伙破坏了。

那块地我们种了麦子。从护城河里提了水来浇，姥爷还到东直门外去捡了些马粪做肥料，我和弟弟搂了烂树叶子，增加腐殖质。终因地太差了，只收了多半面口袋麦粒。547 厂（和平里）俱乐部后边那时是个村子，村里有个碾子。我们把麦子碾了，没有找到细罗，筛出的面很粗，麦皮也没出净。第一次用那面试蒸馒头，大伙眼睛都紧张地盯着锅。一掀盖，颜色黑黑的，面没发得起来，皮上疙

疙瘩瘩不光溜，还看得出没压好的麦子粒。别看样子难看，一吃还真香。

后来我们再做时，就掺点好面，蒸成窝头。姥爷在 547 厂当临时工看锅炉房。他就带着我们自制的窝头上班。锅炉房还有个临时工小伙子，外号叫“傻子”。他觉得的食堂里的馒头“喧”，不抗饿，我姥爷发的不好的“窝头”沉甸甸的，实在，非要和我姥爷换着吃。姥爷有时就多带几个给他。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傻子”有时也到家里来，他有风湿病，姥爷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方子，熬膏药给他，据他说挺有效。渐渐地后来好多人都来要，姥爷熬了不少回。那方子只有一味药叫做藤黄。是画国画用的颜料，也是中药，略有小毒。都是我去药店买。藤黄是圆圆的柱状，像一截甘蔗。外表灰糊糊的，心里是黄的。砸碎成小丁快，铁锅里放山西老醋，倒入藤黄块，小火开熬，不断搅拌，最后成膏时，就变成黑色了。趁热倒在白布上，呆会儿一对折就成了。贴的时候稍微一热就可以。

那时人们不认什么高蛋白、高热量，老想找到有体积的东西填满胃的空间，白薯是要粮票的，五斤白薯顶一斤粮食。剩下的萝卜就是首选了。萝卜后来买到了一块钱两三个，离城远的地方价格低。我和表哥邢泽华被派去买萝卜，我们决定去顺义那边找。顺义离东直门 60 里，我们一大早骑自行车出发，骑到中午，觉得够远了，见到路边有卖的就问问价。终于问到肯一块钱三个的了。我们买了 17 块钱的，应当 51 个萝卜。装到麻袋里兴冲冲地往回走，快到家时，饿的骑不动了，想分一个萝卜吃，垫吧垫吧。一数，怎么只有 50 个。肯定是趁我们高兴时那家伙少给了。两个大小伙子，平日自以为数学学得不错，居然没数清数！太丢人了！商量一下，萝卜不能吃了，回去就说我们吃了一个，好对上钱数。那时的 17 块钱绝对是个大数目呀。

【往事】

红色教育

——北京大学读书记（1959—1965）

徐明曜

我是 1959 年考入北大的，读的是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入学时说是五年制，但 1960 年学校规定所有理科系均改为六年制，到了 1964 年，根据毛泽东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又要改回五年制，但为时已晚，教学计划是按照六年安排的，实在难于再缩短一年，所以只缩短了半年，改为五年半制，而 1960 年入学的则改为五年制。这样，我的毕业时间应该是 1965 年 1 月。但实际的毕业（离校）时间是 1965 年 4 月，比低我们一年的 1960 级仅早离校三个月。

我在大学读书的近六年时间，恰在反右（1957－58 年）和文革（1966－76 年）这两个毛时代最大的政治运动之间，这段时间读大学是不是风平浪静，可以专心读书、很少政治运动呢？从我的大学六年的经历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也经历了不少难以忘怀的政治运动，经历了惨烈的批判与斗争。同学们对于当时的错误做法也有痛苦的思想斗争，也有公开和不公开的抗争。只是因为反右和文革过于惨烈，受害的人也多达百万、千万，人们对于这两大运动之间的那段历史关注的少些。即使关注，也多关注全国性的“四清”运动，对发生在大学里面的事很少有人提及。更何况各个大学的情况差别很大，即使同在北京，即使近如北大与清华，里面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大不同。正因为此，我想把我在北大的经历写出来，就有它的必要，总算记录了一段历史吧。

2009 年我们年级的同学出了一本《回忆文集》。我写了《走出北大校园以后》一文，回忆了 1965 年离开北大到 1978 年又回到北大的 13 年间发生的事情，但我没写在北大读书时的情况。若干同学建议我再写一下大学时的回忆，认为这更有价值。我决定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把读大学时的思想斗争尽量理清，为别人，也为自己。

我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我在大学各个阶段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希望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为此，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上大学之前的我。

1. 上大学以前

上大学前，从政治思想上说，大部分时间里（1957 年反右以前）我是自觉的左派，相信党，决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1957 年反右后开始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所思索，可以认为是痛苦思想斗争的开端。

我为什么相信党，并不单纯是因为相信正统的东西总是对的，而是在国民党时代的生活经验告诉我，或者使我相信，国民党是专制独裁，共产党讲民主自由；国民党贪污腐败，共产党清正廉洁。记得在 1948 年底，大概傅作义还没有和共产党谈妥北平的和平解放，北平已经有国民党兵勒索抢劫的事。一天晚上，几个国民党兵敲砸我家的大门，父亲见势不好，用一根粗木杠顶住大门，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要借东西修工事，父亲说修工事要工具就够了，于是把锹、镐等物从院墙扔到外面，就是不开门。僵持了一会儿，他们悻悻地走了。这事是发生在北平内城，城里有什么工事可修呢？这件事使我对国民党产生恶感。再加上我的小学班主任（后来知道）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我作为听话的好学生，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影响。因此，解放前

我的思想已经被赤化。

北平和平解放那天，我打着小红旗去欢迎解放军，看到他们个个洋溢着青春的风采，唱着革命歌曲，我真盼望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常唱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专制独裁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还有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这些歌颂民主，反对独裁的歌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再有，我们从小学到初中所受的教育，都是把民主、自由、平等作为正面的政治理想来倡导的。我们作为不谙世事的孩子，还不可能全面地评估一个党派的政治作为与政策取向，更不理解古今中外政治的肮脏。再加上对共产主义社会诱人前景的铺天盖地的宣传，这就使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自觉地按党指引的方向努力，甚至标榜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我这样说，那些多多少少还把我看成是反动学生，或"按当时标准"是反动学生的同学可能不大相信，我再举一件我做的至今仍感到内疚的事供同学们思考。这是我个人的隐私，是关于我和我父亲的。为了说清这件事，还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

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职员，解放后留用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编辑《金融通报》。"三反"运动时，被当作贪污犯揪出，由于态度不好，被正式逮捕。可他仍然坚持自己没有贪污，声称如果查出他有一分钱贪污，就枪毙他。经过一年多的审查，也确实没有查出他有贪污，但总要找个罪名。于是说他泄露了国家经济情报，什么情报呢？写的是"黄金黑市"。这是指解放后，黄金禁止公开交易，只准卖给国家，但有些资本家还在做黄金的黑市交易。我父亲给我看了他的判决书，说"黄金黑市的价格怎么是国家经济情报呢？"表示对判决不服（他其实没被判刑，仅判'机关管制二年'，降职降薪，调到绥远省（现内蒙）工作，两年后因病退职回京）。开始我对他表示同情，但他总因为这件事发牢骚，说"共产党政治上厉害，他被冤枉了"等等，我就不耐烦了。我当时认为，即使是被冤枉了，也不应总发牢骚，"三反"运动是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怎能一点偏差不出？于是，在一次他又发牢骚时，我指着他说："你这就是'没落阶级的哀鸣'！"这句话给他的伤害太大了，事后我也觉得有些过分，总想向他承认错误。但直到他于1991年去世，我也没有找到机会向他承认，让他带着感情上的伤痛离开了人世。今天看来，我也真是太左了，更何况我在几年以后就也感到了他这句牢骚的份量。今天我说这些，就算是对他的忏悔吧。

由于我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自然积极要求入团，14岁入团后一直做团干部，上高中后，做了两年北京四中的团委会常委和学习部部长。

那时我崇拜共产党员，认为他们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别人活得更好、更幸福，我也发誓要做这样的人。最近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我在中学时的笔记本上，总要在扉页上写着大家都熟悉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还写着马克思年轻时说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吓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对党的信仰的第一次动摇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我看到我很崇敬的王老师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对党的工作提了一些意见，内心很不理解。如果单为王老师被打成右派这件事，也许我还会认为，这是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偏差。但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读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反右的指导性文件）时，看到有"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提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68页第2—5行），这使我大为不解。在我当时幼稚的政治理想里，民主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共产党就是靠实行民主才能战胜国民党政权的。怎么突然变成了实行

某种目标的手段呢？那么，是不是说，达到了所追求的目标——取得了政权以后，就可以不要民主了呢？这使我陷入了长达数日的思索。我拿着这本小册子，在四中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着，总解不开心中的矛盾。后来，到了 1958 年 5 月，我病了，不得不休学，但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有目的地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卢梭、狄德罗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不得其解。

1958 年暑假，北京四中团委搞了整团运动，我因病没有参加。但也听说同学挨整的事，我也很不以为然。心想，经济建设搞得好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又号召向科学进军，怎么又搞整起人来了？明明毛主席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那为什么不好好搞建设？于是对党的疑问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休学后在丰盛街道团委工作，亲历“打麻雀”“街道炼钢”等荒唐事，对党的一些做法的正确性的怀疑已经十分严重。此时又正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社会上说假话的风气已经盛行，粮食高产卫星天天放，居然有亩产数万斤的“卫星”放出来。记得有一次我和街道上的朋友提及此事，他说，你可不要不相信，报上登的农民科学家 XXX 还论证可以达到亩产 100 万斤哪！我说，妈呀，亩产 100 万斤，那每平方尺就要产一二百斤哪，怎么可能？这不是明显在吹牛吗！于是我对大跃进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1] 这样，我从小在党的教育下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与社会的实际情况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再加上神经衰弱的折磨，使我感到的无法摆脱的痛苦情绪促使我决定不再复学，遂于 1959 年 5 月去北京四中办了退学手续。

我爸爸问：“你小子退了学想干什么？”我说：“我想以同等学力资格考一次大学，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当时我想去中国科学院当实验员，那时有好几个研究所都在招实验员，我的几个初中同学都在那里工作，感到这样会离政治斗争远一点。而且那时我很自负，相信自己通过自学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既要考一次大学，我就开始读高三的课本，两个多月的时间，数学、物理看了一遍，化学没有时间看了，想想高三化学就是有机部分，最多出一道题吧，放弃了。这样就进了考场，碰运气吧。哪知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偏偏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力系，于是我的生活就又改变了方向。

2. 初识政治运动

上大学前，尽管已经有了反右运动，我对大学还多少抱有一点“世外桃源”的幻想，以为总会比中学自由些。上北大的第一个月风平浪静，学习也不费劲，又有名师讲课，闵嗣鹤教数学分析，程庆民教解析几何。我注意休息，身体也有好转。记得开学上课的第一天（是上的劳动课）正好是我的十八岁生日（1959 年 9 月 7 日），颇有纪念意义，感到自己成人了，曾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

但一个多月后，就让我见识了什么是政治运动，这就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我当时实在是太幼稚，以为只是学习学习，端正一下思想。哪里知道这是在中央全会批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以后，在群众中抓小彭德怀呢。在学完文件，联系个人思想的阶段，当党团干部动员我发言时，我毫无顾忌地讲了在街道炼钢的荒唐，说“砸了不少锅，一两钢也没炼出来。”当时还没有什么，哪知很快，大约在十一月中旬，党团组织就对怀疑三面红旗的言论进行了批判，而且我被选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这使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政治批判的厉害。虽然对一般同学暴露出

[1] 在修改本文时，我查了一些文献，那个农民科学家叫王保京，他在 1958 年 9 月 27 日《陕西日报》上发表“有高度密植，才有高额丰产”一文，论证用他发明的所谓“楼种法”每亩地每年即可收粮 240 万斤（不是 100 万斤）。为此，他 13 次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并当上了咸阳市副市长，作地市级领导 22 年。又，《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7 日曾发表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1996 年 8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著文指王保京对这个口号有发明权，被王保京告上法庭。

来的错误思想的批判还算温和，但对每个班选出的一至二名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时，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层层加码、无限上纲，最终都往“反党”上拉。我不知道事前是不是有布置，单就我个人的感受是批判会组织得有条不紊，批判者有论点，有逻辑，虽然都是一些歪理，但火药味足，震慑力大。这使被批判者感到自己真是犯了弥天大罪，必须认罪，并努力改造。心里想不通也只能免开尊口。

那时常用的批判逻辑有：1. 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党是群众运动的领导，而你反对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就是反党。2. 对党的领导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你说三面红旗是好的，但你们那里执行的有偏差就不行；你说人民公社是好的，但你们村的农村干部有缺点也不行。3. 主客观的一致性。你说你主观上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但客观上你的言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那就说明你主观上也是反对三面红旗的。4. 怀疑就是反对。对党的方针政策怎能怀疑呢？你怀疑不就是认为它可能错吗，那不就是内心里反对吗？这样，连思考一下都不允许了，只能盲从。这不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嘛！5. 阶级立场不对。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精神为三面红旗而奋斗，而你却还在思考三面红旗对不对，你不是站在反对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吗，反对人民群众的立场不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吗？诸如此类的歪理甚多，几个回合下来，被批判者只能承认自己是从主观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党的，于是承认自己有罪。我也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承认自己有罪的。

光承认有罪还不够，还要深挖思想根源。拿我来说，在休学时曾看过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等人的书，觉得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好的，那就和党内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指彭德怀，他曾在 1943 年提倡平等、自由、博爱）一样，只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样，我的立场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因此，就变成了党的敌人。批判深入到这种程度，我就被彻底孤立了。那时，同学不敢理我，我也不愿意过早回到宿舍。每当我不得不回宿舍睡觉时，本来谈笑自若的室友突然都不讲话了，这又给我很大的压力，更觉得自己问题的严重。就是一句“我家所在的街道一两钢也没炼出来”，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那时只有 18 岁，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势，心里真的很害怕。我终于理解了我父亲所说的“共产党政治上厉害”的含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我向党交心时只说了“我家所在的街道一两钢也没炼出来”这句话，但内心里没说出的话还有很多，一挨批就吓回去不说了。比如，在打麻雀运动时，我曾感到很荒唐可笑；报纸上经常宣传的放高产卫星我也有怀疑等等。另外，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时，农村来的同学的发言又使我知道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比如农村干部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的事，农村已经出现粮食不够百姓挨饿的事，农民群众对大办集体食堂的不满等。

运动以把暴露思想的被批判者批倒斗臭而群众受到教育（即不敢再说与党的方针政策不同的话）为结束。接着就要鼓足干劲投入到大跃进运动中来了。至于对我这样的被批判者，则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勉励我们要在今后的革命运动中接受考验，悔过自新。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年级领导宣布不放寒假，要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里继续革命。

3. “编红书”运动和教育革命

寒假里，年级党团组织利用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学习产生的政治热情，在全年级开展了“编红书”的革命运动。所谓“编红书”，就是要学生自己编写上课用的新教材，不管是学过的部分还是没有学过的部分。旧的教材都不能用了，因为是封资修的。那时的指导思想是，要砸烂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旧教材”也属于要被砸烂的东西，不能再使用了；而新教材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为什么要由没有学过的学生去编呢？因为没学过，就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坦白地说，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时受的批判，并没有引起我太激烈的思想斗争，只是从没见识过批判会的架势，内心极为害怕而已。可对于“编红书”，我内心里有太多的不理解。比如编数学分析教材，说用“ε－δ”方法描述极限是资产阶级的故弄玄虚，我就很不赞成。在第一学期学习“ε－δ”方法时，我为终于找到了一种严格的描述极限的方法而兴奋不已，认为这是用有限步骤描述无限过程的天才创造，丝毫也没有感到难学。怎么现在又要批判呢？说句题外话，这种对“ε－δ”方法的曲解在文革时就发展成为“一把大锉锉出微积分”的荒谬说法。又比如，要我编没有学过的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我说了句“还没学过怎么编？”负责编书的老师马上说：“破除迷信嘛！”登时吓得我不敢再说下去。我只好看了看辛钦的教材的有关部分，写了写，负责老师居然说我写得好，特别是编的例题更好，说得我内心好惭愧，觉得简直就像开玩笑。我想到当时已经不大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话，内心感到戚然。又比如，在为编书造声势时，师生贴了不少大字报，提出“砸烂牛家店”“火烧哥家楼”的口号。（“牛家店”指牛顿，微积分的创始者之一，“哥家楼” 指哥西，19世纪数学批判运动的领导者，对微积分的严格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口号则模仿五四运动时的“砸烂孔家店”“火烧赵家楼”。）

又有人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数学”的口号，我看到后内心一震，这与我休学时读过的，列宁极力反对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 的主张何其相似。[2] 可我当时不敢说，但1962年我都说了。我认为编书运动反映了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倾向，即在哲学上用唯意志论代替唯物主义；政治上过度强调阶级斗争，不承认存在无阶级性的事物；以及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只讲创新，不讲继承。这些话我当时虽然没说，但在思想上已经把自己放在党的对立面上。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

紧接着，一年级下学期开学又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整整搞了近一年。宗旨大约是用总路线精神指导教学，来个学习大跃进。于是把课表完全打乱，好在有编书时形成的“一切时间党安排”的传统，每天上三段课，即上午、下午和晚上，大约十节课。如果上数学分析，就全天都上数学分析；上高等代数，就全天都上高等代数。课堂上老师讲得疲惫不堪，学生在下面打瞌睡。十天半月过去，宣布这门课学完了，还要开总结会向党报喜，真是大跃进！另一方面，教学要联系实际。比如高等代数，不按课本顺序讲（其实那时也没有课本），而以“图上作业法”和“表上作业法”来带，据说矩阵、矢量空间、线性变换等概念都是实际中产生的。结果呢，什么也没学会，这阵风刮过去，到了高年级还要补一年级的基础课。比我们高一班的1958级同学甚至在四年级（还是五年级）还要上一年级的数学分析，成为数学教学史上的笑话。

另外，那时浮夸风也很严重。上了课总得考试吧，没学会怎么办？只有作弊。如果有文革时张铁生白卷英雄的先例就好了，可惜那时还没有。那么怎么作弊呢？仅以俄语大跃进的考试为例。由于师生都心知肚明，老师干脆考学生当场阅读《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俄语版。规定考一段时间（比如半小时），老师喊：“开始！”同学们则煞有介事地翻开书看，只听得肃静中一片翻书声。突然老师喊：“停！”同学们标出他看到哪里。然后依次请同学

[2]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基本组织的苏联早期文化派别。它于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卢那察尔斯基任协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卡里宁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席。1918年以后，列别杰夫—波梁斯基和普列特涅夫先后接任协会主席职务。

“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旧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 主张将其全部抛弃，要抛开广大工农和知识分子，要远离社会实践，要把无产阶级关在实验室里，创造一种特殊的纯粹又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这篇演说和他所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1920年10月 8日）等文章中批判了这种极“左”的小资产阶级错误观点，指出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他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 ”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要由人民群众来创造，因此，必须大大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同时还要团结改造资产阶级专家和知识分子，才能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讲他看的这一段的内容。由于政治学习时已经把这三篇文章熟记在心，当然每个同学都能讲出来。最后是统计你读了多少印刷符号，读得多的分数高。据说我们班一位同学半小时读了几十万印刷符号，是列宁阅读速度的五倍！

这荒唐吗？当然荒唐！可是我们都是这样荒唐过来的。真是：满嘴荒唐言，作弊亦无愧，考试皆高分，谁管会不会！

4. 一切时间党安排

前面提到的“一切时间党安排”，是一年级第一学期末到二年级第一学期末那一年大学生活的突出特点。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指引下，那时没有周末，没有假日，没有个人自由活动时间，完全统一行动。就是说，“一切时间”不是指一切课内时间，而是指所有时间，即每天的 24 小时，每周的七天，每年的 365 天。

具体地说，每天统一时间起床，洗漱后做操，统一时间去早餐，统一时间到教室上上午的课，这是上午的安排。中午买来饭后，要回到宿舍边吃边开会，布置本日大跃进的安排，然后有短暂时间休息或写大字报、小型誓师或批判会等，然后一起去上下午的课。晚饭时与午饭大体相同，然后是上晚上的大约三小时课。课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倦，不少人上课时就打瞌睡，但回宿舍后还有很多安排。一般是写大字报，向党表决心，有时开批判会，有时搞卫生，有时搞文娱活动，合唱革命歌曲等，但这一切都是作为政治运动来搞的，自然就没有不参加的可能。当然也有复习功课的事，但也要集体行动。特别是学习较差的工农同学，要和学习较好的同学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红”。一般学习差的多为代培生，他们几乎都是党团员，学习好的多来自大城市，有的连团员都不是。如果学习好的同学没有讲懂，或者有不耐烦情绪，则会被扣上轻视工农同学的帽子，那是要上纲到阶级立场问题上去的。扯远了，还是回过去继续说晚上的活动。

记得有一天，我班级团支书突然宣布，在未名湖发现敌情，其时正下大雨，同学们分几路跑到未名湖寻找，终于发现在湖中岛上隐藏的几个同学，于是告诉大家这是军事演习。类似这样的突发的安排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活动搞完了，常常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于是领导宣布休整几小时，到这时同学们才可以上床去睡觉。多数同学已经十分疲惫，倒床上就睡着了。但也有些同学因白天过于兴奋，犯了神经衰弱，反而睡不着了。第二天周而复始，还是一样的安排。我记得有几位同学就是因为不适应这种紧张的生活而不得不休学的。

终于盼到了星期天，以为会休息了（那时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六不放假），结果领导说要发挥不断革命、不怕疲劳的精神，要继续跃进，仍然不休息。星期日班上通常安排需要较长时间的活动。比如去校外参观，突击搞卫生，开大批判会，或参加劳动等。记得我曾和几个同学到我家所在的丰盛街道合作搞超声波，砸扁了铁管夹个刀片，用蒸汽吹，刀片震动即产生超声波，可用于做饭，蒸馒头等等，其实都是假的。

有时周日也有几小时休整时间，可洗澡、洗衣、拆洗被褥。为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记得男同学理发都是同学互理，买个推子，不管会不会理，反正拿同学当试验品，理几回也就学会了。由于集体活动这样紧张，北京的同学想回家就很困难了。在这一年中，我记得只有很少几次能抽出时间回家的，而且常常是周六晚上回去，周日早晨赶回来。因为北京同学不多，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北京同学有意见也不敢说。有的朋友会说，过年过节该放假了吧，其实不然。在那革命的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放假简直是罪过。根据我的记忆，仅在 1960 年的春节给北京同学放了一天假，回家看了看。外地同学却没有这样的福分，还要在校坚持闹革命。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了一年有余，一直到 1960 年底公布“劳逸结合”才告结束。

我曾和几个年轻人说过这事，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的还说，又没到愚人节，你瞎说什么呀？可这确确实实就是发生在所谓的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时间从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底的真事。

5. 批判马寅初校长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一年级第一学期末，大概在 1959 年底开始了全校师生批判校长马寅初的运动。我当时正在挨批判，对这场运动关心得不够。只听说是批判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我看了不少大字报，惭愧的是至今我也没有弄清什么是“团团转”理论。我还有印象的是，一位党委干部批判他说：“马寅初姓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我当时觉得这种玩笑话只能在下面说说，怎能放在严肃的批判会上呢？还有一位据说了解内情的干部批判他说，马寅初在某地吃饭，喝了鸡汤不给钱，还狡辩说，“我只喝汤，又没吃肉，给什么钱！”引起与会者的哄堂大笑。我听了以后，实在笑不起来，这种人身攻击反使我同情马寅初了。再有就是让全体同学写大字报批判马校长，这些就是我对于这次批判的片段记忆。

1960 年的暑假，青海财经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宁嘉风教授到我家看望我的父亲，他问起北大批判马寅初的事，我说了喝鸡汤不给钱那件事。他思索了片刻，叹口气说：“要想把一个人搞臭，编造生活上的劣迹是最简单的办法。”这使我认识到对马寅初批判的不择手段。

另外，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马寅初的态度十分倔强，他在一次批判会上郑重宣布：“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据说，马寅初还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这些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风骨。最近我们常常听人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都被整得服服帖帖，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因此才有反右，才有文革。其实并不尽然。还是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坚持真理，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他们有的只能挨批，有的则往枪口上撞，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辈。他们的牺牲唤醒了广大民众，从而才有了 1980 年代的清明政治。

批判马寅初后，大约在 1960 年 4 月初，校方宣布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由党委书记陆平兼任校长。从此开启了北大历史上的极左时代。也怪了，文革时又说陆平是“右”了，政治的诡谲有谁能懂得呢！

6.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另一件大事是所谓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时间是在 1960 年的上半年，其时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到了尾声，但北大校园里仍处于狂热的气氛当中。这个运动的背景是毛泽东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 15 年赶超美国”说法时谈到要让中国在 15 年内赶超英国，而在 1958 年 6 月大跃进高潮时毛泽东又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8 月版，第 273-274 页。）这就需要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做文章。而 1960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现鞍山市搞得很好，并批转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于是形成了全国性的技术革新运动的高潮。

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班级先在校内，后又下厂、下街道搞了近半年的运动。印象较深的是我们班级试验超声波和半导体的事。前面已经提到，我曾经主动要求带领十几个同学到我以前休学时所在的北京丰盛街道，帮助他们搞“超声波”的事，这其实是为了表示自己积极参加运动。我们把铁管砸扁，再插上刀片，管内通过蒸汽，刀片震动，就认为是“超声波”试验成功了。听说可以用超声波来蒸馒头，我们就把几个这种所谓的“超声波发生器”安装在蒸锅里，另一个锅烧开水，蒸汽通过超声波发生器到蒸馒头的锅里，看多少时间能把馒头蒸熟。结果发现并没有节省时间，效果并不好。但毕竟馒头蒸熟了，就宣布超声波试验成功，于是敲锣打鼓向党报喜。其他班也有到二龙路街道搞的，效

果也不是很好。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超声波的原理，也不知道超声波是否真能用来蒸馒头，并节省燃料。

还有一次，让我们班几个同学（包括我）到固体力学实验室去研究用超声波切割塑料。那种塑料是做固体应力实验用的，价格昂贵。我们还用老办法，铁管夹刀片再用蒸汽吹，结果塑料受热变软，很容易就切成小块了。然后又是敲锣打鼓向党报喜。事后我们被告知，那些塑料都报废了，造成很大的损失。

再说半导体试验，那时的口号是“破除迷信”，不相信权威。我们就寻找各种材料往小玻璃管里放，用万用表测量两边的电阻，当发现两边电阻略有不同时，就“宣布”半导体试验成功，又是敲锣打鼓向党报喜。今天看来，这种活动几近儿戏，只是浪费了半年时间和大量贵重的材料，哪里是什么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

在那半年的运动中，被认为真正有了成绩并登了报的是北大生物系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成功，但我是外行，不知内情真正如何。

7. 疯狂的革命年代

大学的前一年半，除了第一学期前期上课基本正常之外，都被疯狂的“革命活动”所充满。除了前面提到的“编红书”“学习大跃进”“批判马寅初”“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还有大大小小很多次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都是班级或年级负责人布置实行的，因此，应当都是来自上边，不会是班级干部独出心裁的。

具体有哪些运动呢？我凭记忆举出以下几点：

（1）卫生大跃进：即突击搞宿舍卫生，做到无死角。检查时专门找容易藏污纳垢的角落，如用手摸有灰尘必须重新来一遍。而且被子都叠成部队营房中的豆腐块，要有棱有角。被子有点脏的自然要清洗干净，不会缝被子的要找女同学帮忙，而女同学也都愿意帮忙。书籍杂物要放置整齐，不可随意乱丢。搞完卫生后，要通过各级检查，首先是本宿舍内互查，然后小组、班级、年级检查，甚至全校抽查。结果要全校通报。甚至在 1960 年 4 月 8 日，还开了全校的“卫生工作持续跃进大会”，可见领导之重视。

（2）红专问题大辩论：从一年级末就开始了。总的提法是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讨论什么是又红又专。自然要有反面典型，记得那时批了教师马希文，学生中各班都有典型。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学时就有所触及。当时我提出又红又专就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同时也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本领，结果招到了批评。那时我是北京四中团委会的学习部长，参加了一次市里召开的党团干部会，回来后就我的体会说了上面的话。结果某党委副书记批评我说，现在提又红又专就是要讲红，不要提专，说我缺乏组织观念等等。这次辩论我就主动地提自己有白专思想，把努力学习说成是白专，来争取过关。结果不但没过去，反而成了白专典型。

也是在这次运动中，党团组织明确地说，对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党采取的是赎买政策，只是用他们的知识为党服务，并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人。这让我大吃一惊，觉得和周恩来 1956 年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十分不同。后来我发现，周的报告早已被收回，真是觉得自己的思想太跟不上形势。

（3）向党交心运动：读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首先学到的是要把心交给党。即是要找组织谈思想，特别是谈自己不符合党要求的错误思想。与此同时，也要谈别人的错误思想。对于后者，旧道德认为这是告密行为，是君子所不齿的。而现在要转变过来，认为它是应该的，甚至是光荣的，否则就是不信任党，对党不忠诚。

我们班级的向党交心运动是从 1959 年 11 月开始的。那时人人都要写思想汇报，揭露自己，揭发别人。我当然也写，而且写得很多。不仅那时写，后来也一直主动或被动地写，整整写了五年半，直到毕业。因此，对我来说，1959 年的向党交心运动只是一次“向党交心”的教育活动，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底，组织上让我写了多份检查，总长度

达数百页。除主要检查自己外，应该还有对别人的揭发，但因写得都与自己问题有关，而且属组织上早就知道的，故也不存在告密邀功的情况。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深，那是我在 1963 年底写的系统交代材料《对过去的清算》。其中谈到另一位同学曾和我说过的反动话（此话不便在这里写出），用以表明自己对这样的反动话还是有鉴别能力的。当时这个同学已因“偷越国境”被逮捕判刑，不知我的交代是否使他多吃了苦头。虽然现在该同学早被释放平反，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我想起在我的检查中说的话，内心总有愧疚之感，特别是在文革以后。我感到自己无论怎样忏悔，这总是我道德上的一个污点。

想到以前读过的几位法国学者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有英译本“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在该书的前言里面有这样的话：在崇高理想的名义下做坏事比直接做坏事更邪恶。（原文是“The mass murder in the name of a noble ideal is more perverse than it is in the name of a base one.”做的坏事指大屠杀。）我们那时的告密行为都是在崇高理想的名义下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为此忏悔。

另外，在向党交心运动中，“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口号也成了同学们的座右铭和努力方向。刚听到这个口号我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觉得这和“独立思考”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总认为“独立思考”精神是党对我们的教育，记得在中学时提倡所谓“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前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女主角，她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官僚主义等错误勇于斗争，不怕打击报复，是小说中的正面典型。可我并没有想到，在反右派斗争中，“独立思考”早就成了反党的代名词。我还抱着它不放，自然造成后来的人生悲剧。这点容下面再详谈。

（4）教室里的暴力：一年级上学期的解析几何课本来是由曾为右派份子的程庆民老师上，但据说他看不起工农同学，在发考卷时按分数高低发，工农同学都在后面，遂引起他们的不满。于是在个别老师的操纵下，竟开了全年级同学对他的批判大会。批判时，几位同学竟闯到讲台上，高喊口号，甚至还有一位同学从教室的后排跑到台上，使劲摁程老师的头，大喊：“低头！向工农同学认罪！”大有文革时批斗的架势。这种暴力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官方的制止，反而在批判会后，由年级主任宣布取消程老师的上课资格，进行劳动改造。他的课由当时的年轻教师姜伯驹代上。

程老师真是那样反动吗？其实程在 1949 年前就为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1949 年后一直做系团委书记和党委委员，只是在反右时对给学生划右派有不同意见，被定为右派份子。由于“罪行”太轻，摘帽后仍让他教课。他业务上又好，才让他教我们的基础课的大课。一些工农同学演出的这场暴力闹剧实在没有道理，可是幕后的老师（年级主任）就更阴险恶毒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在批判会上动手的场面，因此记忆犹深，内心也受到很大的震动。

（5）作诗、谱曲运动：众所周知，大跃进时毛泽东提倡群众诗歌运动，那时号召人人写诗，又组织文人到民间采风，收集整理群众的诗歌。当时最有名的要算郭沫若编的《红旗歌谣》了。而我们则在 1959 年末开始也号召人人写诗、人人谱曲。我那时被批判，却不甘寂寞，也写了不少诗，谱了不少曲。其中为《红旗歌谣》中《主席走遍全国》谱的曲竟被中央音乐学院选中，把我录取为该校理论作曲系的学员，但被系里阻止未能去音乐学院报到。其他同学作的诗、谱的曲曾贴满宿舍的墙壁，还开了几次诗歌朗诵会。这种活动在当时是作为融入革命浪潮，向工农学习的一种教育活动而开展的。这是指一般群众的作诗作曲活动。而比较专业的团体如北大管弦乐队等，则排练了全套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我班的王理同学就是其中的一名主力。反正北大人才济济，给他们时间，什么活动都可以搞得很专业。

（6）投入社会政治活动：我指的是，为准备建国十年庆典进行队列练习，为这个庆典的晚会跳集体舞，为支持古巴革命游行示威，以及为支持世界革命，反对美帝等等搞的集体活动。有一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

同学们欣喜若狂。这些活动的好处，是让同学们有机会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缺点是耽误时间太多。那时是讲政治挂帅的，当然谁也不敢说。直到大约两年后，陈毅讲话后才有了必须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对学生来讲就是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学习、上课。但这是后话了。

顺便插一句，由于当时强调阶级路线，这样的活动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有些同学因为出身不好，或被怀疑有问题，想参加这类活动也不被允许。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集体参观新开放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具体在什么时间我忘了。在出发前半小时左右，团支部书记突然对我说："根据上级的有关规定，你不能参加这次活动。"至于根据什么规定，我为什么不能去参观，他是不作任何解释的。这样就给这些同学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心里很害怕，觉得自己是政治上的贱民。

（7）学习政治文件：1960 年国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发行。同学们为了表示对毛的热爱，半夜裹着棉被到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为的是能够买到一册。大约是从 1960 年底开始，我们班级开始了学习毛选四卷的高潮。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后，对于后面的几篇文章颇感兴趣。比如《论人民民主专政》，"'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底下解释什么是"人民"，看了看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我想，1956 年中国已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有"定息"二十年之说，可反右时怎么又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其知识分子划为敌人了呢？《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反复提到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是否就是后来的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呢？《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句话不正是登峰造极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吗？再联想到的是当时农村出现的大饥荒，使不少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以后才知道的），这不是矛盾吗，等等。谁也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文章铿锵有力，文采飞扬，但多想想，总会发现不懂的东西，这就是后来批判我反对毛主席著作的一个根据。我崇尚独立思考，自然就会吃苦头。

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主义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重点在反修。那时还没有公开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只是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为靶子。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南共纲领草案，对其中的"人类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不可逾越的"言论很感兴趣。我认为马列主义不是教条，当然它也就会发展进步。说马列主义是不可逾越的显然是把它说成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教条主义。这是后来批判我支持修正主义的一个论据。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学习了很多其他政治文件，不在这里赘述。

（8）参加体力劳动：我是赞成学生适当参加体力劳动的，这对学生的身体发育和了解社会都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参加劳动要适量，不要造成对学习过大的影响。

我们上大学的前一年半，参加了过多过重的体力劳动，其中在 1960 年 10 月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十三陵修铁路劳动是最艰苦。由于很多同学对这次劳动都有描写，我只简单地谈谈个人的感受。这次劳动的任务就是挖土石方，每天劳动七个半小时，上下班还要走大约三个小时的路。而且粮食不够吃，一天下来真是又累又饿。不仅如此，劳动还要搞竞赛，又有拉拉队助威，可以说，这对每个人的身体极限都是一种挑战。我们班方肇满同学就是由于累、饿、医疗不及时牺牲在十三陵筑路工地上。等一个月劳动过后，我的体重由 70 公斤减少到不到 50 公斤，洗澡时看到自己骨瘦如柴的样子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而且，我记得因为我注意计划用粮，期间还给我减了定量，我不敢抗议，因为正处在受批判阶段。

8. "劳逸结合"了

十三陵筑路劳动结束了，我们于 1960 年 11 月 14 日返回学校。又过了大约两三周，系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这个指示即中共

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也称“十二条”。其中的第十一条是“认真实行劳逸结合”，虽然是针对农村中的问题写的，但其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这一条的原文是“实行劳逸结合，保证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必须坚决保证社员每天睡足八小时。可以实行男社员每月放假两天、女社员每月放假四天的制度。农村中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侵占社员的睡眠和休息时间……”等等。

“劳逸结合”指示传达以后，学校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的是承认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也承认粮食是不够吃的了，因此要减少不必要的各种活动。前一年半搞的各种革命活动都停止了，体育课也减为一节，后又完全取消。文件传达以后，同学们都很高兴，毕竟有了较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了。当然，造成困难的原因仍说成是“大规模的天灾加上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等，人为的因素说成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尽管如此，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大家普遍认识到过去搞的“教育革命”“编红书”是不对的，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得以恢复，从这时直到毕业课堂教学基本上没有再受到冲击。

对于同学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和所谓“落后”同学来说，“劳逸结合”是一次解放。我当时感到异常兴奋，虽然还背着思想反动的包袱，但似乎又看到了前途。听说有的同学激动得竟在夜里徒步走到西直门，又徒步走回学校。

9. “民以食为天”

“劳逸结合”以后，政治上宽松了。同学们的真实思想也就能有所表现，谈吃的现象明显增多，当时叫精神会餐。今天的读者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可能会说我们太庸俗，低级趣味、没出息。可是我不这样想。我真正感到古人讲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如果只是一天不吃饭，谁都能忍受；就是饿上几天，也都能挺过来。但若让你长年累月地吃不饱，吃的念头就会逐渐占据你的头脑，挥之不去。这大概就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过去儒家讲女人守节以饿死为最难，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十三陵劳动的后期，就发现有的同学有腿部浮肿的现象，回校后，这些同学到校医院检查都说是由吃不饱引起的。听说校医院给这些同学一些黄豆、白糖，吃了后都有好转。“劳逸结合”以后浮肿现象越来越多，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应对粮食的缺乏，学生食堂研究怎样能用较少的粮食做出看似更多的饭食，当时叫“增量法”。又从树叶、藻类等寻找可供食用的部分，以补充能量的不足。但这些方法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那时还盛传毛泽东不吃肉了，意思是说领袖都和百姓同甘共苦了，要大家以积极态度来度过困难。我每个周末回家总要吃顿饱饭，虽然这是父母的疼爱，但他们就要少吃挨饿。今天想来也真不好意思。

这时食堂里经常发生少交饭票、做假饭票的现象，后来改用饭卡，又多次发生涂改饭卡的事情。这种现象被抓住当然丢脸，有的还给了严厉的处分，可他们也是饿的呀！我虽然没干过这样的事，但也有趁熟悉的同学帮厨卖饭时让他给舀一碗稠一些的粥的时候。直到今天，我对于浪费粮食的现象仍十分气愤，在某些学校食堂看到学生们吃完饭用馒头抹抹嘴就扔掉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他们不知道他们扔掉的馒头在那个全国缺粮食的特殊年代里也许就能救活一个人的命啊！

在饥饿时代的末期，大约是在 1963 年初，我在读著名数学教育家 Bolya 的书“Mathematical Discovery”的第 I 卷时，第 5 章开头作者解释什么叫“问题”（problem）时有这样一段话：

Getting food is usually no problem in modern life. If I get hungry at home, I grab something in the refrigerator, and I go to a coffee shop or some other shop if I am in town. It is a difficult matter, however, when the refrigerator is empty or I happen to be in town without money; in such a case, getting food becomes a problem. ”（在现代生活中，吃东西通常不是问题。如果我在家饿了，我会到冰箱里拿些吃的。如果我在城里，我会去一家咖啡店或别的商店买吃的。但是，当冰箱空了或者我碰巧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得到食物就成了问题。）

看了这段话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十多年了，却连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10. 甄别工作

1961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干部甄别工作》的指示，决定“对 1959 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也是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次序来进行。大约在 1961 年初冬，我年级党团组织对于在 1959 年底八届八中文件学习时被重点批判的近十名同学进行甄别平反，其中也包括我。记得是自己先陈述，然后组织上宣布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给予平反。

我当时说了有一个多小时，代表组织的团支部书记很耐心地听，之后只简短地宣布给我平反的结论。这使我当时感到有些窘。本来我还以为要就批判的问题一条一条地讨论，因此说得很详细，哪知只是简单地说批判搞错了，恢复名誉就算了。至于什么地方搞错了，怎么搞错的，完全不涉及。后来我还经历了一次平反，也看到过多次给别人平反，也是同样的模式。这使我感到，共产党搞整人，都是无限上纲，非批倒斗臭不可，但平反都是一风吹，顶多留个尾巴。

这次平反对我简直就象是一次解放。我感到自己又回到同学们的队伍中来，和同学们逐步恢复了以往的交往。不久，又选举我当团小组长，就感到是真正回到群众中了。

【序跋】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华学人论文集》序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短，算得上成果的东西不多，也就一、二本书以及若干文章而已。借用陈伯达常说的一句话，我不过是文革研究中的一名“小小老百姓”而已。不过，主编先生诚邀我为此煌煌四卷作序，“小小老百姓”虽然不胜惶恐，但也只得向鲁迅学习，写一篇“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维护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者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九年前（2009 年 4 月 27 日下午），我在清华大学文北楼的 309 室演讲时，谈到了两种文革研究者：一种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对从事这项研究的历史学者来说，目前的形势好得很，可能还越来越好。证据是，一些重点大学开设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另一些人则是相当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形势糟得很，而且会越来越糟。理由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不了，说真话的文章无处发表，且年轻的一代对历史明显缺乏兴趣。

九年后，当我为这本书写序言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当年的悲观主义者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他们的远见卓识在今天都一一落到了实处——大学开设的文革课被叫停，有关文革的著作完全无法出版，研究文革的博士们毕业就得改行。这本论文集从香港转战台湾，直到逃到海外才落户。

不过，忆苦思甜会让我们从悲凉之雾中走出来——四十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念书时，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汽车拉我们去看了一场名为《沙漠的春天》的电影。我们留学生普遍认为这部电影很糟糕，简直傻透了。回学校的途中，我在校车后排找到了老师，想跟他交流交流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说：“老师，您得承认，今天这部电影真不怎么样。”老师跟我打起了官腔：“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按照 1957 年对六种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来判断，这部电影好极了。经过文革的锻炼，特别是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中国电影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性第一位、艺术性第二位把握得很好。”虽然他的逻辑我能听懂，但我当时还年轻，我在想，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但是那位老师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现在的中国，还会拍《沙漠的春天》吗？还会有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老师吗？还会用这种荒唐的逻辑为傻透了的作品辩护吗？不会，完全不会了。今天中国的银幕上，放的是好莱坞大片；中国的电视上，放的是“跨界喜剧王”；今天大学的教师们，最喜欢妄议国政。今天盛行的逻辑是以一元统率多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这么一番今昔对比，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中国有了巨大且惊人的进步。

正是这一进步，使这本论文集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成为可能。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掩盖言论管制的严酷现实，也并不是对曲线出书的艰难困苦视而不见。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学者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这么说，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这四卷本，不就是成绩？不就是光明？不就是中国同仁勇气的凝聚吗？

随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关于毛时代的有价值的学术出版物的日渐稀少，这本论文集的价值更加突出。它成为备受期待的、毛时代文献的重要

补充。这洋洋百万言，是中国学者们严肃的研究成果——这里的“严肃”并不意味着冷峻、枯燥或者沉闷，而是尽责、真实和坚定的体现。这里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高校、研究院所批准的学术课题，也不是国家拨款支持的研究项目，而是来自民间、业余、退休的作者之手。在这些作者中，有耄耋老人，有年轻的八零后，有业余写作的史学教授，有改行从文的工程师。从文革的参与者到外部的观察者，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如同《记忆》一样，这本书是百科全书式的，它记录了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到山高皇帝远的边疆、从乌合之众的暴力到“三支两军”的维稳、从集体的大屠杀到文艺的雅俗体制等一切内容。而对于此书的主编而言，这本书则代表着孤身的耕耘和韧性的苦干，意味着数年心血的付出和时间的付出。

2006 年 3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一位研究文革的著名中国学者指出：“文革研究断档，后继乏人……在最应该了解文革的人群（大学生、研究生）之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文革。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失忆的一代’，而文革则会成为‘失传的学问’。”（吴迪，引自郝建编《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纪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 年，第 173 页）今天，摆着各位面前的这四卷本的论文集告诉我们：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研究非但没有断档，而且八零后，九零后已经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当文革六十周年到来的时候，他们将成为学术主力。只不过，他们得学会游击战，而且要不断地转移阵地。

四十年前，在复旦念书的时候，我最讨厌上政治课，尤其是批判修正主义的课——辞典上的解释，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改。可在课堂上，我们不但要批判苏联对马列主义的修正，还要拿起笔做刀枪，批判宋江、孔老二，以及农民起义的头领方腊。这些古人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关系？与修正主义有什么关系？

有一次，政治老师要求我们批电影《武训传》，有位胆大的同学（就是在《记忆》第四期中《1976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给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大字报》出现的那位瑞典学生，叶 XX）提出：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看了电影再批。老师马上驳斥了他的这种反动谬论：这条语录不能用在这个地方，因为毛主席也说过这个电影是坏的，它就是糟得很，同学们要相信毛主席。

为了逃避政治课，我把自己锁到四号楼（现已拆）的男厕里，可是老师还是用钥匙开了门，把我找过去上课。那时我很苦闷，怀疑自己来到这个怪地方，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这只是私字一闪念，我很快就战胜了逃跑主义，决定留下——我要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观察这个奇怪的国家，它是什么样的制度？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想看看，它到底能奇怪到何种程度，它的奇怪有没有极限？三十年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写在我和老马合著的那本《毛最后的革命》一书之中。

我的答案大部分来自于政治史。如果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还会有新的解释。此书主编对此深有体会：“人亡政息，但文化不息。……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新生事物消失了，但是，它的精神仍旧活着人心之中，而且版本更新，升级换代：梁家河取代了韶山冲，输出革命变成了输出模式，‘艰难探索’取代了‘十年浩劫’，歌德效忠继续奏响主旋律，毛时代的文艺母题提升为新时代的红色文化，革命传统加冕为文化软实力……。乌托邦走了，中国梦来了；‘群专’关张，‘喝茶’兴旺；梁效臭了，贾桂吃香；无法闭关锁国，就搞媒体管制，网络封杀，海关检查；放下了阶级斗争，捡起了‘预防式管控’；昔日的无良政治带来了今天的无信经商，邓氏的实用主义，承袭了毛式的不择手段……。”

当年毛泽东从需要出发，生造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则欣然接受了这个新词儿，当造反派利用这个新词儿，把他们批得七死八活的时候，他们仍旧拥护这个“强为之名”。其实，真正名副其实地“革”了中国文化之“命”的，并不是当年走上街头“破四旧”的青年或喜欢折腾的激进分子，而是毛后这四十年的盲目“改革”，因为它不但在“破”字上狠下工夫，而且

还在“立”字上立了新功！还好，这本论文集的第二卷集中了十五篇文章，专门讨论文革文化。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创举。以往的论文集总是把政治看成老大，排在第一；把文化看成可有可无的小不点儿，排到老末。最近几年，文化的身价看涨，四个自信之中，就有一个文化自信；五个创新之中，就有一个文化创新。政治是硬气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文化是软实力——“温水煮青蛙”，“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五年前，我曾经给《记忆》写过一封信，全文如下——

《记忆》编辑部的同志，你们好！

在多种多样的有关文革中的惨案报道中，提到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分子的文章多，提到非正常死亡的工人的文章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一类人太普通，他们的“命”被认为不太值钱呢？还是因为前一类人“名”气大，所以纪念他（她）之死的“历史意义”更大？

琢磨了一两周后，我觉得不妨试试用两张档案中的故纸来校正“纠偏”这个“主旋律”。毫无疑问，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死难，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文革也害死了更多的工人、农民等草根民众。附上的名单是我从潘家园的小贩那里买到的，它们仅仅是一大堆详细史料的冰山一角。我相信，尽管是一角，也足以提醒我们的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忘记民间悲剧！

编安！

沈迈克 2 月 18 日

这封信，作为读者来信刊发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记忆》第 94 期上，第 95 期刊登了我附上的名单。尽管，《记忆》此后没有刊发同类的的名单，但是，它做了类似的事——刊登了一些草根的回忆录，记载下了毛泽东时代带给这些人的苦难。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文集中的地方文革卷，这些作者多来自民间，出身草根，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他们的优势——亲身的经验，广泛的人脉，对第一手资料的占有，以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足以使这些养老金领取者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罕见，也最优秀的史学家。

刘少奇写过好多文章，最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现在已经成了对这位国家主席的反讽。刘少奇说过好多话，留给今天的，大概只有他跟王光美说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往常对我是个空洞的概念，而在这卷中，我体会到了它具体而实在的含义。

每人都会有一个与别人意义不同的文革——脑子里的、肚子里的、书架上的、嘴上说的、心里想的。三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轰动神州学界的新观点，说文革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还说前者是权力斗争，后者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文革不光有一个，也不光有两个，而是有上万个。在这里万是“极言其多”。

但是，不管你怎么理解文革，也不能把文革单独揪到历史的审判台上批斗。那是“懒汉哲学”。文革不是孤立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文革是半个世纪前的若干年当中，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一小部分。同时，还不要忘了，文革也是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片段。在这个大语境中研究文革，才不至于滥竽充数。

“懒汉哲学”的另一个表现，是把文革当成一抓就灵的工具。不管谈什么问题，只要一贴上文革二字，似乎就迎刃而解。文革成了“解释”和褒贬当代中国史的“捷径”。有了它，发挥它，可以绕过或避免接触很多棘手而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因果关系，本来是应该认真追究和实事求是地解释的，但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或不肯这样做，于是，干脆“赖”到文革身上。古代叙利亚有个阿里巴巴，今日的学界没有，以为喊一声“芝麻开门”，学术的大门就会打开，历史的答案就尽现眼前，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种简单化的办法。

应该琢磨的是，作为人类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那一“整块”该怎么去理解和概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名言，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序跋】

思想独立，温故知新

——《文革孽文集》序

印红标

“不平”先生将他在 1967 年至 1972 年期间的文稿汇集为《文革孽文集》出版，所谓“孽文”是自嘲，更是对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的讥讽，这本书比 2003 年出版的文集《挑战毛泽东》收录了更多的资料，为文革时期批评性思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大约十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馆初次读到“不平”自编的文集《挑战毛泽东》，书中收集了从 1967 年至 1972 年撰写的 12 篇文章。那时我正在修改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的书稿，并希望补充新的资料。为发现新资料感到惊喜的同时，作为历史研究者，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文稿可信吗？认真研读之后，我判断这些文稿应当成稿于那个时代。我已经读过一批青年的思想史资料，除了经验性的感知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其一，这些随笔、杂文及政论探讨的问题以及思维逻辑，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例如：真理的阶级性问题、模仿鲁迅的笔法等；其二，文章的行文比较粗糙，不够成熟，符合作者自述从高中到上山下乡知青的学历和经历背景，不像有事后进行过重大补充修饰的样子。后来，我得知“不平”是当年一个上海知青的笔名，前几年还看到了手稿原件。

这些杂文、札记、论文记录了 1967 年秋季群众运动逐渐低落之后至 1972 年，作者对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抵触、质疑、嘲讽及批判。

作者对个人崇拜甚为反感，针对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写道：“世界上会有这种情况吗？一个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不会有，这种情况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一定不会有。”他反对“统一思想”，对于林彪所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作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为什么说它是不妥呢？就是因为它不可能，就因为它不符合辩证法。”（1968 年）

作者明确地反对个人崇拜。针对毛泽东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但需要降温的说法，作者斗胆抗辩：“我看是应当停止了。”（1971 年）

作者评论当时无所不在的泛阶级斗争论，说：“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是大人们所施订愚民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大人们为了统一七亿个中国国民的思想，为了使中国的老百姓驯服，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理论。”（1971 年）

作者尤其关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伸张言论自由的权利，抨击当时的现实是：“只有某些人把别人打成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别人不被打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只有某些人剥夺别人言论自由的自由，没有别人享受言论自由的自由。当然也有自由，那就是思想堕落的自由，那就是当逍遥派的自由，那就是吊儿朗当的自由，那就是浪费国家财产的自由。”（1968 年）

在林彪出逃之后，官方的阐释和宣传难于自圆其说，批评性的社会思潮悄然破冰涌动的时候，作者在 1972 年 5 月将自认为政治敏感度很低的一篇旧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抄写成大字报，张贴于上海人民广场。大字报贴出以后几小时就被撕去，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也没有遭到严厉惩罚。他所在农场召开了批判会，批判他的观点，未多做追究。自然，从贴大字报开始，他私下里离经叛道的

写作也就停止了。

作者是文革期间走向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的青年代表。在文革的严酷思想专制统治下，一些青年人，经历了从盲从、迷茫到冲破思想藩篱的过程。在几千万青年之中，这些人是很少数。客观地说，他们中多数思想探讨的深度有限。他们苦苦思考的成果，在后人看来可能只是常识。但那是一个说出真话，说出常识就要付出沉重的、甚至是生命代价的黑暗年代，能独立思考，发出批判的声音就弥足珍贵。在知识分子被严密看管的漫漫长夜中，他们除了“坦白交代”之外，留下的独立思想遗产寥寥无几。而那些以知青、青年工人等非知识分子身份对本来应当由知识分子回答的问题所进行的探索，虽然稚嫩，却使中国的思想史上不至于留下令人蒙羞的空白。然而至今，中国学术界，对文革历史上闪光的这一页，依旧很少涉及，似乎当时全中国真的只剩下对领袖的歌功颂德或随声附和了。上海学者朱学勤称这些独立的思想者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作者在文革中是孤独的思想者，这本文集虽然也难免继续寂寞，但是，它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案例，为后人的追寻，留下了一个“失踪者”的足迹。

作者当年提出的问题是否已经成为翻过去的历史？泛化的阶级斗争论是被放弃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则继续躺在宪法的条文里，等待唤醒。中共中央曾经郑重宣布摒弃的个人崇拜，近年来重新在官媒中游荡，新版的“皇帝新装”似乎已经登堂入室。人们在问：历史果然已经翻篇了吗？

人类进步是不断在前人的知识、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积累而实现的，文字和历史学使每一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成为可能。然而，近几十年来，知识被当权者高度管控，民间的体验被选择性封禁，文化大革命时的造反和知青一代不知道十年前右派的言论；八九年的学生昧于年民主墙和八零年竞选青年的思想探索；当代青年尽管有条件从美国或西方吸取自由民主意识，却对曾经发生在脚下的前辈人的五七年、七八和八九年思想一概懵懂。几十年来，民众常常不断重复错误或在思想上原地踏步，对历史的茫然是原因之一。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人们期待历史悲剧不要重演，希望未来光明灿烂。为此，不遮掩，不回避，真切了解中国人走过的路，十分必要。

【序跋】

《毛泽东时代：历史与现实》序与跋

韦　陀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货郎担，前面的担子装的是文革，后面的担子装的是评论。前者的写作在近十年间，最早写的是毛泽东的新人；最近写的是江青的笔名。后者的写作时间跨度更长，读哈维尔的感想写于上世纪末，《评梁启超传》则是前两个月刚完成的。评论之中，还夹杂了几篇述往忆旧的小文。活了一大把年纪，总有些值得说说的人和事。王年一的赍志而殁，刘向宏的抱恨长逝，北京四中的经历，北京大学的见闻，老乡给我的回扣，学界的“猪窝化”……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对于大陆的把关人来说，统统是劣品私货。

私货劣品不合规格，把关人要删削斧正。刀斧手来自各类官媒，而号称最敢言的《南方周末》则君子动嘴不动手。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南周找人为《梁启超传》写书评，知我在写，大悦，来电索后告余：“大文确实是一篇佳作，神完气足。只是，大文的尺度太宽了，我们这里发表起来有困难，特别是十七加一大前后。我建议，您把与现实联系的一些话，都拿掉，然后我们再试试。如果此稿直接拿给领导去审，肯定被直接枪毙，那就无可挽回了。”

如此用心，可谓良苦。而“十七加一大”的自撰新词更让人感到形势之肃杀。莞尔感慨之余，挥泪自删，从五千字删到二千七，原标题《改良与革命》改为《多变善变梁启超》。自以为如此痛下杀手，总可以通过。没想到，主编先生在一番小小的踌躇之后，还是把它毙了。理由是“影射现实”。证据是文中引用了龙应台的一段话：“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

为什么主编先生从中看到了“影射”，是因为，他从梁启超时代的皇权想到了当今的“党天下”，想到了结束专制，落实宪政，实施民主的艰难。他知道这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存逆亡，但是，为了安全地渡过十八大前后这一晦暗不明的敏感期，还是把此文枪毙了为好。他的选择有相当的合理性，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在他的位置上都可能这样做。后极权时代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犬儒的普遍化。阿伦特说，即使是超级极权也无法夺去人们的思想，因此，思想是反抗专制的最后的武器。（大意）阿伦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识别犬儒的方法——判断一个人是否犬儒，以及犬儒的程度如何，只消看看他对专制的态度。我们不妨以莫言为例。

前不久，莫言有一个著名的“答记者问”——

南周记者：你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昂道挺胸，从贵族中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你说年轻的时候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但他的教养，让他跟大多数百姓一样，站在路边脱帽致敬。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礼仪，比如国家的尊严。和许多象征性的东西。

英国王子结婚，戴安娜葬礼，万人空巷，那么多人看，你能说，路边的观众全都是卑劣，没有骨气吗？你往女皇的马车上扔两个臭鸡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气吗？所以当挑战、蔑视、辱骂权贵没有风险而且会赢得喝彩的时候，这样做其实是说明不了什么的。而跟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尊重世俗礼仪，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老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2012-10-18）

莫言这番言论的核心思想是“服从专制”，其论证方法是混淆是非，偷换概念。众所周知，贝多芬是反封建反专制的音乐家，他在权贵面前昂首挺胸，不仅仅是由于个性高傲，还源于其骨子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莫言只看到了贝多芬这样做“没有任何风险”，而没有看到这种思想性格让贝多芬付出的沉重代价——贝多芬 57 岁时在贫病之中死去。生无体制给予的富贵，死无来自国家的哀荣。

被莫言视为有着真正勇气的歌德终生寄身于体制，从走出校门到 82 岁辞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魏玛公国的官员，从枢密公使的参赞到枢密顾问，从公国持政到文艺大臣。尽管歌德有人本思想，有文学成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为权贵服务。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权贵之一。看到国王贵族，这位帝国议员的儿子自然会毕恭毕敬。其恭敬的，除了莫言所说的礼仪，恐怕更多的是权势，是体制，是社会等级。

权势喜欢才子，更喜欢顺民，歌德兼顾这两种身份，自然更受恩宠。大公两次送他带花园的房子，后一幢房产在他死后成了国家博物馆。歌德的低眉顺眼换取了丰厚的回报：生有体制赐予的名利富贵，死有隆重的葬礼和官史的芳名。

莫言把贝多芬对权贵的蔑视，等同于向女王的马车上扔鸡蛋，不但污蔑了贝多芬，而且污损了所有反抗专制的前辈后生。谁都知道，反抗专制与暴民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莫言把它们混为一谈，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一个莫氏的理念：“反抗专制未必高尚，臣服专制未必可耻。”以此来为他手抄《讲话》寻找台阶。

莫言说：“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礼仪，比如国家的尊严和许多象征性的东西。”这种说法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国王代表的是什么国家？仪仗队代表的是什么政体？英国人在争看英国王子结婚，戴安娜葬礼的同时，可以对他们品头论足。而曾几何时，中国人只要议论一下江青、林彪、毛泽东就犯了“恶攻”罪而生命不保。这两个政体哪个值得尊重？

不用说，代表了民主的东西会赢得人民的尊重；而专制极权的象征物则无法令人起敬，所以，李白痛恨“摧眉折腰事权贵”，傅山拒绝清廷的三邀四请，乾隆南巡到了金陵，吴敬梓“企脚高卧向栩床”；而章太炎则把袁世凯发的勋章，当成了扇堕儿。

身为作协副主席，享受着局级待遇的莫言，努力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遍老百姓”，无非是想用这个招牌掩饰自己对专制的态度——你看，老百姓都尊重世俗礼仪——向专制鞠躬，我为专制服务，为文网歌唱，不是很正常吗？他忘了，自古以来，反抗专制的造反者都是“普遍老百姓”。

如果说，莫言是装糊涂，那么，龙应台则是真糊涂。记者问她：“在西方媒体看来，政治标准应是授奖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你看来是否应该如此？”

她回答：“我觉得挺烦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单纯的能力——就用文学来看文学？”

或许，龙应台看到南周主编的“影射说”会多少明白一点，能否“用文学来看文学”不在能力，而在条件——当今的大陆，跟当年的台湾一样，凡是与意识形态沾边的，无论是文艺还是社科，都离不开政治。当年深受台湾一党专制之苦的龙应台，一旦当上文化局长，就去力挺为一党专制说话的莫言。你说她是不是糊涂？

专制时代，说话著文离不开政治，这个道理古人早就懂。所以，嵇康跑到树下，光着膀子打铁。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刘伶携酒登车，一边喝酒，一边吩咐家人：“死便埋我！”

我小的时候，奶奶就说我眼大心肥。人生短暂，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大不易。而我却像八爪鱼似地

什幺都抓，又是电影研究，又是文革史、又是社会语言学、又是思想评论，又要述旧怀人，稍微有点空，还要写剧本、小说。这个货郎担虽说是只有文革和评论这两捆草，但也足以累垮贪吃的小毛驴。眼大心肥跟眼高手低是亲兄弟，选文入集又敝帚自珍，免不了心慈手软。你说，挑着这个货郎担，能不惴惴乎？

跋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邀请我去访学，各种证件者齐了，包括台湾移民署开来了“入台许可证”。我在国台办和小西天（我所在的研究中心）之间跑了 N 次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结果——人家压根不想让我去。

没有功夫郁闷，我要出这本书。校对之际，看到莫言答记者问。想起了几年前填的《山坡羊》：

一

今日如猪，昨天似鼠。
由鼠变猪朕做主。
读书人，毛焉附？
洗罢脑筋大锅煮。
嘴上了嚼子头上了箍。
生，心为奴。
死，魂为仆。

二

求真是祸，造假是福。
梁效朝霞没入土。
文史哲，中药铺。
售与官商壮阳术。
着书立说都换了禄。
老，也媚骨。
少，也媚骨。

文人过去是臭老九，现在是香饽饽，从过街鼠一变而为座上宾。地位、身份变了，可角色、心思没变。当初，梁效为主流而写，《朝霞》为主流而办，投稿人为主流而作。现在呢？人们不也是围着主流转吗？不同的是，如今的主流不光有官，还有商；如今的文人不光拿政府的奖，还能拿洋人的奖。以学术、文艺换来的，就不光有名，还有利。说他们一身媚骨，“生为奴，死为仆”并不算冤。

此书本来想在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的，是它在互联网上的主页宣传吸引了我。遗憾的是，这家出版社的高价和冷漠，让我改了主意。这也是我要感谢美国华忆的原因，华忆华忆，追忆似水年华。这其中的沧桑感，与其价廉而质高的服务相加，使我成了它忠诚的拥趸。

【综述】

文革中的军队

——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余汝信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 1929 年 12 月为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早就明确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

中共建政后，毛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绝非单纯地被视为国家的国防军事力量，相反，更多的是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文革十年尤甚。1966 年 5 月文革开张在即，毛就指定其“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2]

本文为笔者写作中的《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暂名）一书的前言。此书以时间为序，以纪事本末为体，力图完整地记载十年文革风暴中人民解放军作为毛的政治力量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并力图还原其与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

为叙述方便，笔者依据十年间（并上溯至文革前一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负责人两个层面，将此历程分为若干阶段。

1. 文革前夕

本时段为 1965 年 1 月至 12 月一整年。

1965 年初，人民解放军总人数达到 447 万。[3] 这一支全球人数最多，绝对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指挥的庞大武装力量，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保证。

1965 年，经历了两年之久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声誉日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地方，如毛泽东早在 1963 年 12 月所言，“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4] 自 1964 年初至 1966 年文革前夕，从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机构工作，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农林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基本建设政治部、外事政治部和文教政治部，在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单位亦先后设立了政治部。1965 年 2 月，调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萧望东任国务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部长陆定一兼）、中共党组书记，以改组、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

---

[1]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页 79。

[2]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1966 年 5 月 7 日。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 1 版，页 306。据该书披露，447 万人中含陆军 338.5 万人，海军 18.2 万人，空军 43.3 万人，公安部队 30.3 万人。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8 月第 1 版，页 455。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一系列举措，已经具有文革中“三支两军”的雏形。

这一年，已经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与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措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度。这一倒退性做法，使军队正规化建设遭受重创，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一年，随着毛泽东对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愈见不满，对党内第六号人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以厚望。1 月初，林彪取代党内第五号人物陈云，成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1 月底，林彪的艺术形象首次出现在纪念邮票上，这是建政后除毛泽东、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过的殊荣。2 月中，毛泽东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5]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炙手可热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指为觊觎军内更高权力的“野心家”，遭到毛泽东、林彪的合力清洗。12 月 8 日—1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有 61 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6]

罗瑞卿作风强悍，能力过人，惟性格上有明显缺陷，一为独断专行，惯于揽权，二为不注意团结同志，易得罪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揽权”被放大为“有野心”，成为政治品质要害问题。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7]

2. 毛—林—（周）—叶、萧、杨“三驾马车”时期

本时段由 1966 年 1 月至 1967 年上半年，约一年半时间。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秉承建政以来的一贯作风，对军队大权（包括但不限于作战行动、一定级别以上部队调动、一定级别以上人事任免等）一人独揽。

林彪名义上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惟自 1967 年 1 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具体的“三支两军”任务往往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时期，周恩来在军队中并没有任何职务，惟其以历史上形成的威望，对军队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忽视。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林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当甩手掌柜。

上海会议后，1965 年 12 月 29 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1966 年 1 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同年 5 月，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原毛泽东—林彪—（周）—罗瑞卿（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军委秘书长）的军委领导架构，被毛—林—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三驾马车”所替代。

进入 1966 年，罗瑞卿问题升温。3 月 4 日—4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以“彻底弄清罗瑞卿的问题”。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为罗问题定调称：“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了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1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1 版，页 482。

[6]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 年 4 月 30 日。

[7] 王任重日记，1965 年 12 月 28 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页 1400。

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8]

在中央正式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曾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军队系统负责人谈话[9]，将毛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要况及时通报他们，告诫他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全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会改组，林彪取代刘少奇取得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被戴上毛“亲密战友”的桂冠。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现役军队领导人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至于军内文革，原来的设想是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10] 此计划三个月后发生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就军以上机关文革问题发表指示称，“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要认真地、切实地搞一下，不是走过场（师以下部队按军委总政指示，搞正面教育）。要全面审查干部，破‘四旧’，立‘四新’，精简机关。大整官僚机构，大整官僚作风。这次大整机关运动，从全军范围说，要搞两、三个月，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大体准备从九月份开始。”[11] 8 月 13 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讲了相同意思的话。8 月 16 日，第 54 次军委常委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上的设想很快就被突破。

1966 年 9 月，毛泽东同意将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的有关问题在高级干部中打招呼。1966 年底至 1967 年 1 月初，贺龙问题呈公开化，贺于 1 月中旬失去人身自由。1967 年 9 月，毛同意对贺龙立案审查。贺于 1969 年 6 月 9 日在关押状态下病逝。

1966 年 10 月 5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林彪指示起草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自此，全军院校十万青年军人解除束缚，汇成汹涌澎湃的造反洪流，其巨大的冲击能量波及军内外。

1966 年底，在文革狂潮冲击之下，中共原有的地方党政权力架构根基已然动摇。翌年 1 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更深层次的分崩离析局面，各地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受冲击最小而相对而言尚表现为强而有力的、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从而承担稳定局势的重任。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3 月 19 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军队在文革中“三支两军”的基本任务。惟“三支两军”的作用并非是平行的，“三支”中最重要者是支左，“两军”中重点是军管。

文革期间，军队介入地方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就广度而言，以 1967 年初最具战斗

[8] 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时的讲话，1966 年 4 月 8 日。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 5 月第 1 版，页 46。

[10] 总政治部《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转引自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页 242。

[11] 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的谈话（节录），1966 年 8 月 1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1987 年 8 月，页 417。

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31 个军、1 个军级指挥部为例，沈阳军区陆军八个军“三支两军”负责范围为：第十六军负责吉林长春市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二十三军负责黑龙江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及鹤岗、鸡西、双鸭山、伊春、牙克石等地区；三十八军负责吉林通化地区；三十九军负责辽宁鞍山市、营口市及海城、复县、新金、盖县、盘锦等地区；四十军负责辽宁锦州、朝阳、阜新地区；四十六军负责吉林省吉林、延边地区；五十军负责辽宁丹东地区；六十四军负责辽宁本溪、抚顺地区。北京军区陆军六个军：第二十一军负责山西省；第二十四军负责河北唐山地区；第六十三军负责河北石家庄地区；第六十五军负责河北张家口地区；第六十六军负责天津市；第六十九军和河北省军区共同负责河北保定地区。济南军区陆军三个军：第二十六军负责山东烟台地区；第六十七军负责山东青岛地区；第六十八军负责江苏徐海地区和山东临沂地区。南京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十二军负责江苏苏北地区；第二十军负责浙江省除舟山群岛以外地区；第二十七军负责江苏苏州、镇江、常州、无锡地区；第六十军负责江苏南京地区。福州军区陆军两个军、一个指挥部：第二十八军负责福建晋江地区；第三十一军负责福建厦门、龙溪地区；闽北指挥部负责福建福安地区。广州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四十一军负责广东汕头地区；第四十二军负责广东惠阳地区；第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省和广西桂林地区；第五十五军负责广东湛江地区和广西柳州地区。武汉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一军负责河南开封地区。昆明军区陆军两个军：第十三军负责云南滇南地区；第十四军负责云南滇西地区。成都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五十四军负责四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

1967 年 2 月，第三十八军调防至河北保定地区，第二十一军调防至陕西省，第六十九军调防至山西省，调防后的三个军各自负责所在地区的“三支两军”。6 月，第五十军调防至四川成都、乐山、绵阳地区，负责此三个地区的“三支两军”。7 月，第十二军根据中央决定入皖支左。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赴赣支左。8 月，第二十军代行浙江省军区职能。此外，年内各野战军的“三支两军”地区范围多有所扩展。

1967 年 1 月后展开的“军事管制”，是在原有的地方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的一种非常措施。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事代表。

以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为例，1967 年 3 月至 5 月间，由中央批准实施军管、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 8 个，按先后顺序为江苏、广东、浙江、云南、安徽、青海、福建、西藏，占总数的 28%。8 个省、自治区军管会中，由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担任主任的占了大头共有 5 个，大军区副司令员任主任的 2 个，省军区政委任主任的 1 个。此后，省、市、自治区一级再未实行军管。

1967 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 48 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 45 个。其中国防工业 6 个部（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初期由军事科学院、空军和海军各负责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 年 3 月后军事科学院人员大部撤出，继由空军、海军、总后和总参接替其军管任务。国防工业口以外的部（委）共 39 个，其中组成军管会的 18 个，军管小组 3 个，派出军事代表的 18 个。派遣人员方面，由总参机关负责的 7 个，总后 5 个，海军 4 个，空军 3 个，炮兵 2 个，装甲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部各 1 个，工程兵 5 个，通信兵 2 个，高等军事学院 1 个，先军事科学院后为工程兵 1 个，北京军区 2 个，南京军区 1 个，多部门或其他 3 个。担任部（委）军管机构领导或军事代表的军方派遣人员，级别相差甚大，最高级别者为各军兵种或大军区副职，最低为团级干部。

国务院 21 个直属机构中，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已由空军接管，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列入军队序列，国家档案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情况未详外，其余机构及国务院秘书厅共 18 个单位全部实行军事管制。其中组成军管会的 1 个，军管小组 4 个，派出军事代表 13 个。派遣人员中，由总参机关负责的 3 个，总后 8 个，空军、装甲兵、防化学兵部及政治学院各 1 个，多部门或其他 3 个。

1968 年 4 月至 8 月间，对中共中央主要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分别实行军事管制。中共中央组织部虽未实行军管，但早已于 1967 年 5 月派驻由军方组成的业务组以负实际领导责任。

最令人惊诧的是，军事管制的形式竟然延伸至军内单位。1967 年 4 月，军委决定，对大军区级的军队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任命原上将、当时已无军内职务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为军管会主任，曹广化（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为副主任。1968 年 10 月，对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实行了不符常理的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陆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为副组长。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组成部分，偏于保守，追求稳定为其必然。故而，在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军事机关、部队往往倾向于维护旧秩序的保守一派。1967 年 1 月 28 日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颁布，使军队自以为拿到了对付曾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军委八条”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惟中央以至毛泽东本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何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谓“右派”，何谓“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制定、公布一个严格的统一的划分标准（事实上也难以有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这就为各地军事机关留下了充裕的操作空间，换言之，划分标准全凭各地军事机关主观地自行掌握。而各地军事机关（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以至人武部）一般来说，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份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接近，关系天然地较为亲和，这就难免与保守派的对立面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稳健一派的对立面激进一派，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1 月底至 3 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大大小小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又以新疆、福建、湖南、内蒙、广东、四川、湖北、江苏等地为甚。

1967 年 4 月 6 日，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军委十条”，对“军委八条”引发的军队对造反派、激进派的无情镇压进行纠偏。“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任意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等等。“军委十条”解救了造反派，却又引发了其对军队及保守派的报复。军队及保守派不服，两派矛盾加剧，武斗频仍。7 月，在倾向保守派的武汉军区眼皮底下，发生了武汉地区部分保守派群众与军人围困毛泽东及中央要人居住的东湖客舍，要挟中央改变对武汉地区既定政策的“七二〇事件”。该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反映到军内的一次总爆发。它使毛不得不夜半三更仓皇离开住地，转移到空军机场，并且打破十年来不乘飞机的惯例，清晨即离汉飞沪。这一事件对毛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使毛看到事态演变下去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性，促成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逐步从“乱”走向“治”。

全国范围的武斗最终平息下来，两派纷争走向缓和，经历了年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排除在个别地方军队的介入反而加剧了两派矛盾，但总体来说，对于平定大局而言，军队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此外，军队对各地的无政府乱状亦加以压制，典型的如湖南道县事件。1967 年 7-9 月间，道县发生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 4,519 人。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零陵地区其他 10 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 9,323 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未成年 2,862 人，另致伤残 2,146 人。8 月 29 日，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炮兵团（代号 6950 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9 月下旬基本得以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 10 月底陆续结束。[12]

[12] 谢承平：《湖南道县“文革”杀人大案揭秘》，载《上海法治报》2010 年 12 月 24 日。

在军内，“军委十条”颁布之后，一度受压的军内造反派重新抬头。在大部分驻京军内单位，受萧华、杨成武及年初成立的新军委文革小组实际支持的造反派（“新三军”又称“反三军派”）与受军内实力派[13]支持的保守派（“老三军”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形成了势力强弱不一而相互对峙的局面，惟这一局面很快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得以打破。毛泽东、林彪表态支持了参加 5 月 13 日演出的“老三军”（“演出派”），冲击演出的“新三军”（冲派）随即一蹶不振，萧华在“五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也正式宣告倒台。

3. 毛—林—（周）—杨成武时期

本时段由 1967 年 9 月至 1968 年 3 月，为期很短，仅有半年时间。毛、林、周的作用与影响力基本与上一时段相同。

1967 年 8 月，由于萧华的倒台，加上叶剑英、徐向前[14] 自批判“二月逆流”后在军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三驾马车”仅余杨成武一人。此时，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 4 人组成军委办事组，9 月，又决定增加杨成武为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初，“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15]

“五一三事件”之后，杨成武的日子亦不好过。1967 年 9 月间，江青曾几次大发脾气，指称原热心为江办事的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杨要“放长线钓大鱼”。[16] 年底前，毛泽东在“绝对权威”的问题上又不点名地重重敲打了杨。[17] 文革以来位高权重的杨成武[18] 实质上存在的“华北山头”倾向引致毛、林及部分军队实力派人物的警惕与不满，最终酿成了 1968 年 3 月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倒台。

4. 毛—林—（周）—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时期

本时段由 1968 年 3 月至 1971 年 9 月，为三年半时间。仔细区分，又可分为两个子时段：1968 年 3 月至 1969 年 4 月，为林彪尚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名份时期；1969 年 4 月至 1971 年 9 月，林彪已失去此名份。而毛、周的作用与影响力与上两时段相同。

1968 年 3 月 25 日，“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经毛、林同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成员的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三天后，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周恩来称，“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称，“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称，“把它悬空起来。”毛称：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

[13] 指（但不限于）空军的吴法宪、余立金，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二炮的李天焕、总后的邱会作及北京军区的郑维山。

[14] 徐 1967 年 1 月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5] 军委办事组 1967 年 10 月 15 日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见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 年第 7 期。

[16] 陈虹：《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载《炎黄春秋》2015 年第 10 期。

[17] 1967 年 11 月 3 日，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在官方主要媒体上发表。12 月 17 日，毛泽东借批复湖南一份报告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提出严厉批评。

[18] 杨成武与萧华 1967 年 3 月成为军委常委，在此前后均为中央碰头会成员。

毛泽东的话里，隐含有以黄代替林主军的意图。[19]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一方面发出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一方面将军队的“支左”方针调整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号称“一碗水端平”，以促进“革命大联合”，促成“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多由军队作主导。到1968年9月，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一批军队高级干部担任了省一级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职务：

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由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由军委常委谢富治担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担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由江西省军区政委（原陆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担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由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担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六军政委王淮湘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二十军兼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担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由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担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由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担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由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新疆军区司令员龙金书担任。以上现役军队领导干部共20人，占同级革委会主任人数几近七成。其余原地方领导干部9人，除河北李雪峰、广西韦国清早已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外，1967年5月后，黑龙江潘复生兼任沈阳军区政委，山东王效禹兼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山西刘格平、天津解学恭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河南刘建勋兼任武汉军区政委，陕西李瑞山兼任兰州军区政委。

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文革发展到“斗、批、改”阶段。所谓“斗、批、改”，以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20] 在此前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些全国性的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两年多时间没有消停。这些运动，基本上是由各级革委会尤其是革委会中的军队代表主导，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群众受到无端的猜疑和批判，逼 、供、信盛行一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中臭名昭著者如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在江苏掀起的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历时三年多，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和立案审查13万多人），死伤6,000人（其中被逼死打死2,540人）。江苏省1957年反右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江苏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反右斗争伤害面的20倍。作为清查“五一六”试点单位的南京大学，全校被打成“五一六”的多达1,560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389人，被判刑16人，被迫害致死21人。[21] 又如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在内蒙古领导的“挖肃运动”，根据官方不完

[19] 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20]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1968年9月7日。

[21] 丁群：《冤狱遍地的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载《文史精华》2009年第1期。

全的统计，“在全自治区共挖所谓‘内人党’346,220 人，刑讯武斗致死 16,222 人，致严重伤残 87,188 人。”[22] 惟对内蒙古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滕海清却未有受到应得惩罚，事后且平调至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 25 人，其中现役军队领导人 13 人，占 52%（四野系 5 人占 20%）。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军委未设常委，军委办事组部分行使军委常委职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1969 年 3 月，毛泽东借中苏边境发生的小规模冲突“珍宝岛事件”，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使全国进入紧张的战备时期。

1969 年之前的几年，军队的兵力已呈逐年递增趋势。1969 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始大量组编部队，军队员额持续上升。1969 年间，陆军增加了三个军部（陆军第十一军、第十九军、第二十九军），组建和改建了 30 个陆军师。第二炮兵组建了第五十六基地。总后勤部组建了 20 个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海军组建了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组建及扩编水警区各 1 个。空军组建了空军第十一、第十二军 2 个军部，组建了 8 个航空兵师，2 个高炮师。[23]

1969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部队的部署调整。10 月，军委发布命令调整列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的 13 个军和 17 个技术兵种师的部署，加强了“三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兵力部署，并在战略纵深留置强大的机动兵力。[24] 至年底，北京军区达 8 个野战军的兵力，加上沈阳军区 6 个军，兰州军区 2 个军，“三北”地区共有 16 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总数的 44%。

至 1969 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加至 631 万余人[25]，超过朝鲜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军队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1969 年 9 月中下旬，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研究苏联的战备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各项具体措施。毛、林、周分别到会强调：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全军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根据毛、林的指示精神，军委办事组向全军发出国庆节期间加强战备的指示与部署，要求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驻大城市部队的车辆和石家庄、张家口方向的部队，适当向附近农村疏散，加强机场等要地防护。10 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即离京赴武汉，林彪随后疏散至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主持党、政、军工作。10 月 17 日，林彪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作出指示。[26] 依照这个指示，全军各部队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涉及部队约有陆军 90 余个师、520 余个团，海军 430 余艘舰艇，空军 4100 余架飞机。此阶段部队战备工作进入最紧张时期，达到了最高潮。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紧急战备和疏散待战状态，到 1970 年 4 月底稍有缓解。[27]

自 1967 年初始军队以“三支两军”修复地方走资派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力架构，加之 1969 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亦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1980 年 11 月 2 日。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 114。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 113。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 115。
[26] 这个战备指示经军委办事组下达全军时冠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标题，即后来所说的“一号命令”或“第一个号令”。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 107-109。

人形成戒心，视其为“尾大不掉”。加之林彪对毛的“不断革命”渐生厌倦，毛有意在激进派文人中另选最能深刻领会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传承者。林彪虽则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当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惟他的权力不仅未有因此而获得实质性的增加，反而却有被架空的明显迹象。相对于其在党内唯一的副主席的“独一无二”的名份，他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那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之一，不但没有被予以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未如十年前新军委成立时一样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0 年 3 月。毛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6 月，经毛同意国务院由文革前的 90 个单位精简为 27 个单位，各新单位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惟虚设的国防部未有如其他部门般任命负责人。林彪直至此时对外仍沿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义，在政权体系中地位低于中共第三把手周恩来。周试图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向毛提议解决此一问题，8 月，周与陈伯达、康生向毛提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28] 惟毛有意不予回应，及后在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宪法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虽称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坚持不给予其“副元首”的尊称。

在 1970 年 8、9 月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为以张春桥（毛心目中的真正传承人）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翻脸。庐山会议之后，毛明里狠批陈伯达（并无辜牵连李雪峰、郑维山），实质剑指林彪。毛逼迫军委办事组诸成员为庐山事检讨再检讨，最终目的也是逼迫林彪低头就范，惟林不为所动。整整一年后的 1971 年 8、9 月间，已铁心抛弃林的毛到南方“巡视”，发动各地诸侯倒林，毛、林关系濒临绝境。历史上毛的整人手段使林一家（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惧，令林与妻、子不惜孤注一掷，冒九死求一生，于 9 月 13 日 00:32 在海军山海关机场乘专机强行起飞逃出境外，02:25 在蒙古肯特省苏布拉嘎盆地坠毁，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5. 毛—叶—邓时期

本时段由 1971 年 9 月至 1976 年 1 月，为四年又四个月时间。叶剑英被毛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力在此一阶段渐告淡出。

蒙古草原深处的一声巨响，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破产。毛顷刻间一脚踏入黄昏岁月，他的事业由此从“辉煌”走向破败。“九一三事件”之后，红极一时的被视为林彪一系的军人遭到清查清洗，“批林批孔”持续经年，军队的高、大、上形象黯然失色。

1972 年 8 月 21 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自此，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则就地转业。至此，军队“三支两军”工作结束，各地方权力重新回到文革前当权的地方官僚们手中。

“九一三事件”后，军队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1973 年 12 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 年 1 月，邓更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邓、叶主持下，同年 6-7 月间，举行军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会议决定军队消“肿”，三年减少兵员 160 万，全军总人数精简 26.2%（其中陆军步兵部队精简 27.3%，海军精简 17%，空军精简 16.4%，各军区及直属单位精简 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 16.6%）。到 1976 年，全军

[28]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版，页 279-280。

总人数比 1975 年减少 13.6%，成绩不俗。正当其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起，使精简整编和整顿工作没有全部完成即被迫中断。[29]

6. 毛—华—陈锡联时期

本时段由 1976 年 2 月至 10 月，为期八个月。陈锡联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6 年 1 月，毛泽东取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又决定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 月 6 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以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8341 部队）部分兵力，未费一枪一弹，一举抓获“四人帮”，清除了在中央的文革极左派全部势力。笔者曾言，“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让汪检讨过关，‘信任如故’，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过他的老婆，还有毛远新。没有汪主动，坚决的支持和参与，1976 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30]

如此说来，结束文革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也是由军队最终完成的。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征求意见稿，2001 年 7 月，页 273、286-288。

[30] 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 704 期，2009 年 6 月 8 日。

投稿须知

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作者需提供所在单位和通讯方式，并请以脚注方式在文章首页呈现。

本刊采用双向匿名的同行评审制度，来稿三个月内如未得到本刊之反馈，请自行处理。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不同意删改者，请声明。

本刊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为使论文符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通行的方法，对论文撰写特做以下规定：

1. 总体要求

资料可靠，论据充分，文字精练，文责自负。回忆性和评论性文章篇幅不超过 6,000 字，专稿、综述和研究性文章字数不超过 15,000 字。论文要求 WORD 文档格式，简体中文。

2. 文字

1) 字体：一律采用宋体。
2) 字号：论文名 14 号，署名、正文 12 号，脚注、注释、参考文献 10 号。
3) 加粗：论文名、标题（包括“注释”“参考文献”“摘要”“关键字”四个标题）。
4) 位置：论文名、作者名中间对齐，标题左对齐，正文每段开头空两个字符。
5) 脚注编号用带圆圈者，如：①、②、③。

3. 行段

1) 文行距 1.2。
2) 空行：论文名、作者名、标题隔空一行。

4. 论文组成

1) 论文格式包括：题目、作者姓名、内容提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2) 内容提要与关键字：论文超过 4,000 字，必须有提要和关键词。其中，提要不超过 150 字，关键词不超过五个，关键词总字数不超过 25 字。
3) 脚注：单个脚注不得超过三行。超过者一律先在脚注中标明注释号，然后放入文末编号的注释。

4) 参考文献：详细的文献信息仅在文末的参考文献表内出现，正文中避免。不要求提供原始文件。

5. 标题

1) 论文需要分段，并注有标题，允许三层标题，用阿拉伯数字排序，数字后加“.”。
2) 第一层，如：“1.” “2.” “3.”。
3) 第二层显示第一层的顺序，如：“1.1.” “2.3.” “4.2.”。
4) 第三层显示第一、二层的顺序，如：“1.1.3.” “2.3.5.”。

6. 数字

1) 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如：1966 年 5 月 16 日。
2) 测量、计数量用阿拉伯数字，超过三位用分节号。如：5.4 千米，6,124 人。
3) 大约数量：有具体数字的用阿拉伯数。如：约 150 人，30,000 多人。无具体数字的用中文。如：数十辆车，几百万人。
4) 成语和俗语用中文，如一针见血，不管三七二十一。
5) 其他：十以内用中文，十以上用阿拉伯数字。如：比赛有五个项目，12 名选手。

7. 引语

1) 直接引语：较短的引语用双引号，直接放在句中。
2) 以单独段落呈现的引语，该引语仍用宋体，不得改为其他字体。段落整体向右缩进两个字符，不加双引号，并与前后正文各空一行。

8. 内文中的引证

1) 只列出作者名、出版年、页数（出版年与页数之间用冒号隔开，用“-”表示“至”）。如：（王年一 2005：20），（乔晞华、张程 2015：9），（胡杨、乔晞华、张程 2019：139），超过三人用“等”，（韦陀等 2019：123-124）。
2) 只列出版年、页数。如：王年一（2005：21-23）谈到…，乔晞华、张程（2015：1-3）认为…,王年一等（2005：15）反驳说…。
3) 多位作者用顿号隔开。如：胡杨、乔晞华、张程。
4) 多篇文献用分号隔开，按年顺序。如：（王年一 2005：乔晞华 2019）。
5) 引用网文须注明文章名、网址及最近登录时间。如：蒯大富。“人生权术三十六则。”https://wenku.baidu.com/view/ca69dac6a1c7aa00b52acb25.html。最近登录时间：2017 年 3 月 15 日。

9. 文末参考文献

1) 参考文献按第一作者姓的拼音排序。
2) 著作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书名。出版社驻地：出版社。如：
   （1）王年一。2005。《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张程、乔晞华。2015。《多棱镜下：中国电影与时装、时尚》。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3) 期刊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论文名（用双引号）。期刊名（用书名号），期刊卷数、期数（之间用冒号）与页数（之间用逗号）。如：关向光。2006。“文革再认识。”《展望与探索》，4：6 期，第 7-11 页。
4) 编著书写顺序：作者。出版年。论文名（用双引号）。页数。编著名（用书名号）。编者。出版社驻地：出版社。如：徐友渔。2007。“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第 594-606 页。《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

10. 外文的使用

1) 如果参考文献是中译本，必须用中文。如果作者坚持引入外文，可以在脚注中引入。
2) 如果参考文献是外文，必须用外文。如果作者坚持引入中文，可以在脚注中注明。
3) 正文中尽量避免外文的出现，除非必要。如为了区别外文（如：Movement 和 Campaign，或 Game 和 Play 等）不同概念的意义。否则不建议使用外文。

【投稿与征订】

征订启事

《记忆》季刊是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份国际性的中文学术刊物，是原同名电子刊物的升级版和实体化，其刊号是 ISSN，2687-9964（实体版），2687-9972（电子版）。与原同名刊物不同的是，它关注的重点是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

《记忆》季刊每年四期，每期 20 万字左右。设有专稿、研究、序跋、译文、综述、学人自述等栏目。专稿是本刊主编所约之稿，研究是作者投来的学术论文，序跋刊载近期问世的中文著作的前言、后记，译文是对西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综述是本刊组织的，介绍某一领域研究情况的文章。学人自述是学者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治学心得、师从、同道、方法、著述的绍介和总结。

一般来稿，一经刊发，本刊会给作者惠赠当期的电子刊。凡重点文章，本刊将给作者奉上实体刊。凡经双向匿名评审通过的综述性文章和学术论文，本刊除呈送作者实体刊之外，还将略付薄酬。

现将本刊的订价、邮资、付款方式等情况说明如下：

1. 价格

《记忆》季刊实体版每期（每册）：35 美元，邮费另计；年费（四期共四册）：140 美元，邮费另计。（订一年用户可获优惠：每期赠送电子版）。电子版每期：15 美元，年费（四期）：60 美元。

2. 邮资

计算方法：按一册计算。美境内：4 美元；加拿大：5 美元；美、加以外欧、亚地区：8 美元。全年四期邮费×4；如订两册邮费×2。订购者请自行计算邮费并与订书费同时支付本出版社。电子版无需邮费。

3. 付款

（1）币种：美元；方式：支票。

支票抬头收款人写：Remembering Publishing

邮寄地址：

Attn: Dr. Joshua Zhang

Remembering Publishing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USA

寄支票时请附征订表（见下页），写明：订购者姓名/单位、收件邮政地址、电话，email。订购者如计划成为长期用户，请发 email 至上述地址告知本出版社经理：Dr. Joshua Zhang（乔晞华博士）。并

请同时发 email 告知本出版社对外联络部主任：Mr. Wang Fuxing（王复兴先生），email：wang.fhd@gmail.com。

（2）网上支付

本出版社网址：https://jiyi2008.com/。进入网站后，进入购物车，填写相关信息。

本出版社确认款到帐后，将向订购单位或个人寄出由经理签名的公司发票（Invoice），并在八个工作日内寄出期刊；每个季度第二个月最后一日之前，保证寄出该季度期刊。如违反此约定，用户有权要求退款并终止订购。如因特殊原因，本社不能按时出版并寄出期刊，将提前正式通知。

《记忆》季刊征订单

订户信息

姓名/单位：_____

地址：_____

城市：_____ 州/省：_____ 邮编：_____

国家：_____

电话：_____ 电子邮箱：_____

单期（注明第几期） ☐ _____

一年四期 ☐ _____

收款单位： Remembering Publishing

收款地址： Attn: Dr. Joshua Zhang

Remembering Publishing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USA